

一。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与卢托维诺娃在什么情况下相识的，尚不十分清楚。据邻居们说，也许不完全可靠，有一回，在团里担任军马采购员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庄园斯巴斯科耶来购买军马。于是，由于公务上的访问，他们就相识了，并开始求婚。然而，求婚显然是出于交易上的需要。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比未婚夫年长六岁，而且与他迥异，其貌不扬。

这位青年军官给卢托维诺娃留下了摇魂荡魄的印象。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再三劝说儿子，要力求得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允婚，他说：“看在上帝份上，娶卢托维诺娃吧，要不然咱们很快就得去讨饭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求婚表示同意。他们于一八一六年二月在奥廖尔结婚，随后搬到了鲍里索格列勃街自己的宅子。

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未来的作家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屠格涅夫家的长子尼古拉比他大两岁。第三个儿子谢尔盖生于一八二一年，是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未满十六岁就夭折了。

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以上校衔退职，携带家眷由奥廖尔迁居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村。

一八二二年，屠格涅夫一家决定举家出国作长途旅行。他们在奴仆们的伴随下，乘坐自家的马拉的篷车动身了。老爷们乘坐四匹栗色骏马拉的、由总“御车夫”驾驭的祖传大马车，走在前头。

屠格涅夫一家途经莫斯科、彼得堡、里加，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到过德国、瑞士、法国的许多地方。

柏林、德累斯顿、卡尔斯巴特、苏黎世、伯尔尼、肖蒙、巴黎……屠格涅夫一家在法国首都逗留了几乎半年之久。返回时，未经彼得堡和莫斯科，而是从南方、路经基辅到达斯巴斯科耶的。

后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自传中谈到了当时他在伯尔尼发生的几乎使他丧命的事故。他从市立动物园里围着熊穴的栏杆跌下去，险些丧命；幸亏父亲及时抓住了他。

屠格涅夫一家这次旅行归来之后，便开始了“那种拖沓、阔绰、琐屑的贵族生活。当代人对这种通常雇佣外国教师和本国教师、瑞士人和德国人、家仆和农奴保姆的生活差不多已经淡忘了”。这座庄园的生活，几乎半个世纪之后还浮现在作家的脑际。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独揽管理庄园的大权。她眼看着斯巴斯科耶发展、扩大。在十九世纪初叶，它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着手彻底改建本地的几处田庄（他在其它省份还有几处田庄）时兴建的。离卢托维诺夫家族的老世袭领地——彼得罗夫斯科耶不远，有一个地方在慢坡的大山岗上，隐现在白桦林之中，景色宜人。卢托维诺夫便选择这个地方作新庄园。

那里的老住户很久还记得，松树、枞树、冷杉和阔叶树是怎样移植到新花园里来的。为了把刨出来的、带着大块护根土的树木竖着运来，只好制造了专门的运输工具。

地主宅邸是宽敞的、呈马蹄形的两层楼房，宅邸四周开辟了果园，建造了各种温室……新花园中央，林荫道纵横交错，构成了罗马数字“XIX”，表示斯巴斯科耶兴建的年代。

庄园的创始人早已长眠于他去世前不久在旧墓地为自己建造的陵墓里

了。但庄园里却照常过着另一种自有其欢乐和悲伤、嗜好和忧虑、动荡和寂静的生活。

客厅里的青铜大钟依然日以继夜地滴答滴答地响着，韶光流逝，斗换星移……花园——世代嬗替的木然无语的见证人——逐年扩大。昔日勉强可辨的丁香、洋槐和金银花、长成了枝叶扶疏的丛林。通往池塘的长长的斜坡两侧，生满榛树、花楸和乌荆，树下露

出一簇簇石南和真蕨。

在偌大、宽阔的花园里，景色万千，变化无常：一会儿仿佛是茂密的森林，一会儿是浓荫碧翠、黄沙铺盖的小径，一会儿是灌木丛，一会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遍布沟壑的小白桦树林。

这里，各种树木似乎应有尽有。有参天的橡树，阔叶林，松树，栲树，挺拔的杨树，栗子树，白杨，枫树，菩提树。在僻静的角落里，有铃兰，草莓，长着褐色脑袋的蘑菇，花朵呈天蓝色的菊苣。

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屠格涅夫后来在晚年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忆及一位心灵上充满激情的诗人的家奴领他到花园的隐秘去处，给他朗读诗，屠格涅夫写道：“这些树木，这些碧绿的叶子，这些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绝；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意，陶醉在诗意里……”

男孩子早就发现，周围的一切不知为什么都听命于飞扬跋扈的父母的专横、任性和怪癖。这种感觉冲淡了他对故乡斯巴斯科耶和它那自然景色的热爱。

父亲不大过问家事，老是外出行猎、打牌、酗酒，向邻近庄园的小姐们献殷勤。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自己的中篇小说《初恋》的自传性。他同纳·亚·奥斯特罗夫斯卡娅交谈时坦率地说，他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自己的父亲。当她问到《初恋》里年青主人公的原型是谁时，他答道：

“这个男孩子是您最恭顺的仆人。”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成年时期思考父亲的性格时，得出结论：他“对家庭生活不感兴趣，他喜欢别的事情，并且在那些事情上完全得到了满足”。

“你能够拿到手的，你就去拿，千万不要让别人控制你，做自己的主人——人生的全部‘滋味’就在这儿了。”有一回，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对儿子说。

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四十二岁去世），所以无忧无虑地寻欢作乐。

他对周围的人严厉、冷酷、几乎总是孤癖、彬彬有礼和矜持。孩子们是多么贪婪地感受父亲向他们表示的那种极短暂的、不多的温柔或关怀啊！

作家在中篇小说《初恋》中这样描写他和父亲的关系：“父亲有一种左右我的古怪能力——而且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古怪。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是决不使我伤心，他尊重我的自由——我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对我挺客气……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爱他，我崇拜他，我认为他是个模范的男人——唉，我的上帝，倘使我不是一直感到他在推开我，我会多么热烈地爱他啊！……有时候我仔细地望着他那张聪明、漂亮、愉快的脸……我的心就颤动起来，我整个心都倾向他……他好象也觉察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顺手在我的脸颊上轻轻拍了一下，就走开了，不然就动手做什么工作，再不然就

突然变成冷冰冰的了，这是他一个人有的一种独特的态度，我立刻也就退缩了，我也冷了下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很少失去自制力，但假如他怒不可遏，就会变得十分可怕。孩子们记得，父亲是怎样惩罚德国家庭教师的。有一次，尼古拉淘气，不听话，气得教师发了火，便揪住了孩子的头发。正巧这当儿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到楼上来，走到课堂房间的门口。他抓住这个倒霉的家庭教师的领子，把他拖到楼梯旁，举到空中，从梯栅中间扔下去，喝令仆人立即收拾德国人的东西，把他撵出庄园。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从不为孩子们的前途担忧。他最操心自己的事情，关心自己的享乐和安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可以象自己的短篇小说《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的主人公那样说，“母亲以乡下女地主的全部热忱来从事”对他的教育。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个性格复杂、脾气极坏的女人。

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遭受的苦难，婚后生活中醋意带来的内心的苦恼，毁坏了她的性格，使她容易动怒、偏执、喜怒无常，甚至暴戾。她仿佛集矛盾于一身。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时对孩子关怀备至，甚至温柔体贴，但这并不妨碍她虐待他们，常常无缘无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惩罚他们。“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屠格涅夫后来说，“没有一个愉快的回忆。我害怕母亲，就象怕火一样。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使我受到惩罚——一句话，象严厉训练新兵一样对待我。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打；当我胆敢问母亲为什么打我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你比我知道得清楚，你猜猜吧。’”

如果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孩子们是冷酷的，那么她对农奴们的残酷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仆役们一听到女主人的名字就胆战心惊。他们常常在马厩里被鞭打，遭受各种各样的侮辱，被放逐到穷乡僻壤去，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傲慢、急躁、粗暴到了疯狂的程度，暴怒时极端残忍。她意识到自己对农民拥有无限的权力，因此苛刻、专横。“我对手下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不为他们任何人承担责任”，“我想杀就杀，想赦就赦”——诸如此类的话已成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口头禅。

她遵照古老的惯例，在家里雇佣了人数众多的仆役，竟达四十人之多。

单身汉和未婚女人在饭厅里用膳，有家室的人则领取月饷：米、面、油、肉、茶。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时到自己在奥廖尔、图拉和库尔斯克的田庄去，检查村长的工作，整顿秩序。开出一整支车队，女主人乘坐的轿式马车，医生乘坐的带篷马车，洗衣女工和清洁女工乘坐的带篷马车，厨子乘坐的装载炊具的带篷马车。阿·阿·费特根据作家的叔父尼·尼·屠格涅夫（他曾一度管理斯巴斯科耶）的话，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去其它田庄和莫斯科时，除了几辆轻便马车之外，还派出一辆由管家护送的装着衣服和餐具的有篷马车。预定供途中就餐或住宿用的房屋事先挂上洁净的床单，铺好地毯，支起并摆好旅行用的桌子，陪伴他前来用餐的婢女必须穿透花短袖连衣裙。”

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政论家和翻译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拥护“为艺术而艺术”，言论甚为反动。

骑手 加弗留什卡每个星期运送两次邮件。为了不惊扰女主人，因事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办事处来的区警察局局长在一俄里至一俄里半之外就摘掉铃铛。只有姆岑斯克县警察局局长才有权驾带铃铛的马车到宅子跟前来。

每天早晨，严厉的女主人于规定的时间在“领主办事处”听秘书、主管、总管的汇报，有时还把管事，甚至连管理员也叫来。如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满，发现田庄有什么混乱现象，就对手下大发雷霆。当她走进办事处时，在那里静候的秘书、总管和主管就急忙把身子挺得笔直，向她低头鞠躬，她便坐到摆在高处的胡桃木办公桌后面的安乐椅上，对秘书做命令式的手势，叫他开始报告。

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她奉为楷模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的画像。画中他身着缀有假宝石钮扣的淡紫色法国长上衣。

手下可以准确无误地猜测出女主人的心情：如果有什么事情使她开始感到烦恼，她马上迅速、急躁地拨响琥珀念珠，于是众人明白：灾难临头了……关于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在斯巴斯科耶的生活的回忆，深深铭刻在屠格涅夫心里，并且后来反映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有一次他说：“我的全部传记都在我的作品中。”

在屠格涅夫的一些人物的形象中，可以猜测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性格的某些特征。

譬如，对粗鲁无礼的小狗木木发火的老地主婆：“太太一直到晚上都不快活，她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打牌，她一夜都不舒服。她觉得给她用的花露水并不是平常给她的那一种，而且她的枕头有肥皂味，她叫那个管衣服女人把她所有的被褥床单都闻一遍，——总之，她心里烦，而且气得不得了”。

譬如，拉弗列茨基的姑姑，傲慢的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她把管理弟弟的田庄的大权独揽在手里了。譬如，中篇小说《普宁和巴布林》中好用权势的祖母，她和《领主办事处》中的太太一样，也是手不离琥珀念珠。

对手下农民的冷酷无情和对戏剧、绘画、书籍、乃至花卉的喜爱，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身上古怪地融为一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非常喜爱花。她热切关心自己的花园，这里有最优良、最稀有的玫瑰、风信子、郁金香。在她的小桌上，总是放着儿子伊凡和尼古拉一八二五年在她的命名日赠给她的关于花卉栽培的法文书。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后来回忆，他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见过在斯巴斯科耶那样美丽的花卉。但他也记得，母亲对花匠们是多么残酷。“他们动辄挨打，马厩离得很近，所以我全都听得见。有一回，有人摘了一朵名贵的郁金香。这件事发生后，全体花匠都挨打了”。

一个出生在斯巴斯科耶的农奴孩子拥有非凡的绘画才能，引起了女主人的注意，他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他被送到莫斯科去学习绘画，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于是责成他为大剧院的天花板作画。后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硬把他要回田庄来，为她作花卉写生。

旧俄贵族的马车多半套四匹或六匹马，马分为两排或三排，马夫有两个，一个坐在驾车座位上，另一个骑在前排的马背上，叫做骑手。

一俄里合一·六七公里。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的男主人公。

大剧院：今苏联莫斯科大剧院。

“他画了几千次，既画花园里的花，也画树林里的花，带着满腔仇恨，含泪作画……”屠格涅夫记述道，“这些花也叫我讨厌了。可怜的人儿苦苦挣扎，咬牙切齿，堕落成了酒鬼，便一命呜呼了。”

笼罩在斯巴斯科耶的专制气氛，很早就在这个少年的心灵里激起了对于农奴制不共戴天的仇恨。“我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切，几乎全都在我心中激起不安和愤懑，并令我厌恶不已”。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喜欢事事井然有序，而且要求事事按时进行。她说：“认真——这是我的座右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概莫能外。”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种暴躁、好冲动的惊人性格和遵守时间、规章制度的习惯，屠格涅夫在《领主办事处》里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庄园里起身很早。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做过晨祷之后，一定在喝第一次茶和喝第二次茶之间在卧室里用纸牌占卜；天啊，倘若抓到黑桃皇后，就整天心绪恶劣。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从不忘记在日志里记录这一天是怎样度过的，然后分别在纸头上写明，哪一个孩子和家人应该做什么：“十点钟至十二点钟：钓鱼”，“十二点钟至两点钟：玩耍或阅读”。

随后，她派小厮去把管家唤来，以便向他就家务发号施令，检查开支。村里的开支有：牛肉，鱼，蜡烛，肥皂，颜料和——用她爱讲的话来说——“其它零七八碎的玩意儿”。

正午十二点钟，凉台上响起铃声，鸽子便“扑嗤”飞到一块儿，啄食为它们准备好的饲料。

午饭前，她和婆婆打牌。打牌时，老太婆总是着急，“啊呀！”“哎唷！”地哼叫个不停。打牌打到三点钟，直到管理餐室的老仆安东来了，用千篇一律的腔调和表情报告：“饭菜摆好了。”

午饭后，众人各自散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偏远的房间里关起门来读书，一直读到掌灯时分。她喜欢书，尤其是法国人写的书，而且博览群书。

晚间，搭有戏台和合唱台的正屋大厅里演出家庭戏剧，参加演出的是农奴艺人：有演戏的，奏乐的，跳舞的，唱歌的。有时演出在花园里进行。屠格涅夫后来依稀记得那花园里树下的舞台，在他的孩提时代，这里在油灯和五颜六色的灯笼的亮光下为客人们演戏。

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还是作姑娘的时候，诗人茹科夫斯基从图拉省别列夫斯克县到斯巴斯科耶来过好几趟，而且在一出戏里扮演过魔术师。屠格涅夫小时候在贮藏室里看见过这位著名诗人扮演魔术师时戴的饰有金星的尖顶帽。

宅院深幽而宽敞；在没有尽头的迷宫似的房间里，似乎很容易迷路。在紧靠儿童室的一个房间里，有许多家制的带玻璃门的黑柜橱。那里凌乱地堆满了尘封的、鼠咬虫蛀的深褐色封皮的古书——家庭藏书的一部分。

八岁那年，屠格涅夫起了钻进这些柜橱里去的念头。他和一个酷嗜诗歌的家奴谢列勃里亚科夫约好在一天夜里撬开柜橱上的锁。孩子爬到谢列勃里亚科夫的肩膀上，很费劲地从柜橱里取出两本大书。他把一本书给了参与者，

家奴匆匆把书带回自己的房间里；把另一本书藏到楼梯下面。那天夜里，小盗窃者很久无法入睡，急不可耐地盼着天明：他急于想知道，他从朝思暮想的柜橱里取出的是什么样的稀奇书籍。

藏在楼梯下面的那本大部头的书原来是《象征与标志》。谢列勃里亚科夫带走的那本书是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

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中描写拉弗列茨基的幼年时，曾忆起《象征与标志》一书。

他没有忘记那位最早使他对俄罗斯文学作品发生兴趣的家奴。作家在一部中篇小说里讲到了他，把他写成普宁。

屠格涅夫在中篇小说里写道：“我无法描写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象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在我面前出现，腋下夹着一本沉甸甸的书，用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脑袋、盾毛、肩膀、整个身体指着园中偏僻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找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一股刺鼻的发霉和陈旧的气味，当时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无法形容的芳香！……”

卢托维诺夫家的藏书中有许多俄文书、英文书和德文书。但大部分藏书——三分之二——是法文书。甚至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者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克拉丽莎·哈尔洛》在这里也不是原著，而是法文本。

藏书五花八门。有古代的经典著作，流行的小说，百科全书派（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巨著，莫里哀的喜剧，德·斯达尔夫人、沙多布利昂、瓦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本国作家——康捷米尔（11）、苏马罗科夫（12）、卡拉姆辛、德米特里耶夫、鲍格丹诺维奇、茹科夫斯基、扎果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古典主义作家，以叙事长诗《罗西亚达》等驰名。

普宁：中篇小说《普宁和巴布林》中的主人公

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散·理查逊（1689—1760）：英国小说家。

百科全书派：十八世纪团结在百科全书出版部周围的法国进步思想家。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卢梭（1712—1778）：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莫里哀（1622—1673）：法国著名的喜剧作家。

德·斯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前驱。

沙多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

瓦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11）安·德·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最初的讽刺诗人，俄国古典主义的始祖。（12）亚·彼·苏马罗科夫（1718—1777）：俄国作家，俄国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国卓越的作家，历史学家，俄罗斯文学中感伤主义的创始人。

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伤感主义诗人，寓言作家。

伊·费·鲍格丹诺维奇（1743—1803）：俄国诗人。

斯金、伊兹马伊洛夫 的作品。有历史和神话著作，无数的各国游记，大量的植物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花园和花圃设计指南，古代文选，占梦书，日历……同外国教师和本国家庭教师经常发生误会。时常更换他们，因为他们有的玩忽职守，有的则不学无术。譬如，一位教德国文学的德国人非常多愁善感，一读起席勒 的作品来就情不自禁地落泪。后来才弄清楚，他根本不是教师，而不过是鞍匠而已。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曾试图亲自指导儿子学习。在备忘手册中保存了她的记录——“科里亚 的学习计划”。最初他必须背熟寓言《撒谎的人》、《乌鸦和狐狸》、《蜻蜓和蚂蚁》，回答关于季节的问题等等。伊凡的功课大概也是这样进行的。

这个男孩子对玩具并不感兴趣，却向往大自然。他喜欢在偌大的花园里漫步，钻到花园最远的角落去，到花园尽头的池塘去。池塘里养着许多鱼——鲫鱼， 鱼，甚至当时各地开始逐渐绝迹的白鱼。这里，他喂鱼，给鱼扔面包瓢、蒸熟的黑麦和小麦，以此娱乐。阴雨天，他感到寂寞，老是惋惜不能到池塘去。

他从七岁起就学会用逮鸟器和网捕鸟。斯巴斯科耶的花园里有许多鸟。地主宅第的一个漆成绿色的房间里设有一个“小花园”，这里养着金丝雀、黄雀、金翅雀、鹦鹉。由一个因为个儿过于瘦高而被人取绰号叫作鲍尔佐伊的看守人准备饲料，饲养鸟儿。

斯巴斯科耶的守林人和猎人发现孩子对打猎感兴趣，便向他讲述鸟类的生活，候鸟的迁徙，田鹬、鹧鸪、鹌鹑、野鸭的习性。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带他到森林和沼泽去，教他学会打枪。于是他开始酷爱打猎，这个嗜好使他很早就接近老百姓，并且有助于他目睹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米·尼·扎果斯金（1789—1852）：俄国反动的历史小说家，剧作家。

阿·叶·伊兹马伊洛夫（1779—1831）：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席勒（1759—1805）：德国杰出的剧家，诗人。

科亚里：尼古拉的小称。

均为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

鲍尔佐伊：在俄语中意为“细高个儿的”。

第二章

迁居莫斯科——寄宿学校——上大学

长期离开斯巴斯科耶的日子来到了。为了让孩子们准备正式上学，屠格涅夫一家决定迁居莫斯科。他们搬到莫斯科后，在萨莫捷卡购置了一幢房子。不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病倒了——据医生诊断，他患结石病，劝他到国外去动手术。他把孩子们送进维伊坚加密尔寄宿学校，便偕同妻子去巴黎。

人们对屠格涅夫在这所寄宿学校里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屠格涅夫在中篇小说《雅科夫·巴生科夫》中描写了德国人文特尔凯列尔开办的私立寄宿学校，根据这篇小说才可以多少想象出他这几年的生活情景。

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记述，一个在豪富的地主家庭里长大的傲气十足、娇生惯养的男孩子，起初只谋求和贵族子弟接近，后来突然跟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穷孤儿成了朋友。雅科夫·巴生科夫穿着样子难看的上衣和短裤，下面露出一双粗线长袜，很象一个家奴出身的侍僮或者小市民的儿子。这就足够使享有特权的寄宿学校学生对巴生科夫态度随便、高傲了。无疑，这部描写一个少爷同平民——精神上的浪漫主义者和诗人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小说，是以某种现实为依据的，反映了屠格涅夫在维伊坚加密尔寄宿学校里所体验的生活。

过了约莫两年，一八二九年八月，父母把尼古拉和伊凡送进莫斯科的另一所寄宿学校——克拉乌泽寄宿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拉扎烈夫东方语言学院。弟兄俩在这里学习了仅仅几个月。屠格涅夫在那里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第一次了解刚刚出版的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情景。

寄宿学校的督学决定从头至尾给学生复述这部长篇小说。复述占用了好几个晚上。学生们屏息凝神地听了关于基尔沙、阿列克谢伊和强盗奥姆里亚什……的奇遇的故事。

许多年后，屠格涅夫在致谢·季·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无法向您描述我们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情景。有一次，一个孩子在听讲时讲起话来，我立刻一跃而起，扑过去打了他。县巡警基尔沙、奥姆里亚什——贵族沙隆斯基——这些人物几乎都成了我们整代人的亲人，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小说的细枝末节。”

不久，孩子清楚地了解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作者——他原来是他父亲的密友；三十年代，屠格涅夫一家在莫斯科居住时，他几乎每天到他们家里来作客。

但他觉得，在《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孩子觉得这部小说是尽善尽美的佳品）的作者身上没有什么雄伟的、与众不同的、“足于激发年轻人的想象”的东西。相反，他甚至使人觉得是滑稽的。他那好象被压扁了似的脑袋，四方形的脸盘。眼镜后面的圆鼓鼓的眼睛，挥动双手、感叹、惊讶的可笑姿态——

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著名作家。

指听讲《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原注。

一切都给人留下一种滑稽的印象。这位蜚声文坛的小说家没有足够的根据就以为自己是不起的大力士，能够赢得任何女人的欢心，他的这些弱点都瞒不过孩子的眼睛。扎果斯金对法语有一种癖好，但是怎么也学不好，老是把数和性搞错，因此他在屠格涅夫家里得到“冠词先生”的外号。

屠格涅夫离开克拉乌泽寄宿学校之后，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其中一位教师——伊·彼·克留什尼科夫是一位诗人，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署名 。后来他参加了斯坦凯维奇小组 。克留什尼科夫教屠格涅夫俄国历史，教他俄语的是在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学术著作的作者德·尼·杜宾斯基。屠格涅夫对帮助他准备投考大学的老师们一直满怀感激之情。当他已经是著名的作家时，还从巴黎写信给诗人亚·彼·波隆斯基说：“得知克留什尼科夫还健在，我又惊又喜。请告知他的地址——不要忘记。我跟他是老相识啦……”

在家里，时间和在学校里过得一样——一堂课紧接着一堂课：地理，历史、代数、俄罗斯文学，外语——德语、法语、英语，图画。学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法语教师杜勃列能吩咐他分析米拉博 的任何演说词，或者用法语写论虚荣的作文。十二岁的孩子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业。

父母对两个儿子的成绩看来是满意的，但是有一件事使他们感到苦恼：为什么孩子们给他们写信通常不用本族语。

“你们老是用法语或者德语给我写信。”父亲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你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的本族语呢——如果这门语言你们掌握得很差，我是非常惊奇的。该学好俄语啦！该学好俄语啦！俄语不光要会讲，而且要会写——必须做到这一点……”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大概是想鼓励孩子们更加努力学习本族语，所以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叫他们解释。

“希望你们常用俄语给我写信，不然我在这儿 会把俄语忘光的。我的一位同伴也很少讲俄语，虽然他时常和我争论语言规则，但不大相信我，所以我们指望得到你们的评判，因为你们对语法规则一定比我懂得多。譬如，……

方尼亚 ，请要来信告知，如果你自己不懂，就请教你的俄语老师。科连你，你代我问问杜勃列……以后我们这里所有的疑难我都要请你们解决，你们大概已准确知道，应当怎样讲才正确。我没有词典，你们要是能给我当词典，我是很高兴的。

希腊字母。

斯坦凯维奇小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先进知识青年的哲学、文学小组，其主要领导人是斯坦凯维奇，因而得名。尼·弗·斯坦凯维奇（1813—1840）：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

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自由主义诗人，晚年的作品带有反动倾向和神秘色彩。

米拉博（1710—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领取王室报酬的走狗。

指在国外。——原注。

、
、

：屠格涅夫的父亲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俄语前置词、运动动词的用法和表达方式等问题，汉语无法表达，故省略。

万尼亚：伊凡的小称。

“万尼亚，我还忘了一件事，你问问俄语老师……”

一八八三年八月四日，屠格涅夫还未满十五岁时，就申请投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组当自费生。恰好在此之前不久，大学实行新的考试制度。这个考试制度使新生入学困难得多。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国民教育部大臣乌瓦罗夫下令，语文组考生必须懂希腊语，虽然大学里也向语文组学生讲授希腊语，但以前入学时它不是必考科目。此外，下令特别注意考核学生的神学、俄罗斯文学、拉丁语及一门外国语——法语或德语的知识；其中一门科目考试不及格者不得继续参加考试。下令对自学或者在私立寄宿学校就读的考生严格考核中学的全部课程。一八三三年春，乌瓦罗夫在特别通令中再次要求，“录取大学新生必须遵守去年对莫斯科大学大有裨益的严格规定”。

屠格涅夫顺利渡过了这些“暗礁”：在入学考试中，他没有一门科目不及格，所以考试委员会决定录取他进莫斯科大学。

比屠格涅夫早两年进莫斯科大学的伊·亚·冈察洛夫后来回忆这个时期过：“半个世纪前，我们年轻人把大学视为圣地，并且是战战兢兢地跨进它的大门的。我说的是和整个莫斯科一样——用格里鲍耶多夫的话来说——带着特殊烙印的莫斯科大学……在莫斯科，我们的大学不独对我们学生，而且对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圣地。在这所大学里所受到的教育比在其它大学里所受到的教育更受人器重。莫斯科以自己的大学自豪，爱自己的大学生，认为他们是未来最有裨益、也许最负盛誉的出类拔萃的社会活动家”。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诸如赫尔岑、奥加廖夫、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这样优秀的人物几乎同一时期在这里就读。

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赫尔岑指出了莫斯科大学尤其在一八一二年以后，当莫斯科和这所大学的新时代开始了的时候在俄国教育史上的作用，他写道，莫斯科大学日益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俄国年轻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汇集到这里来，好象流进一个总贮水池一样；在大学的课堂里，他们肃清了在家庭里沾染上的种种偏见，达到了同一个水平，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然后再散布到俄国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中去”。

青年一代对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引起的反响还记忆犹新，在尼古拉一世政府日益加剧压迫，竭力压制国内自由主义思想的一切表现的时期，他们开始觉悟。一八三一年霍乱的蔓延、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一年间的波兰革命和法国七月革命的反应……激起的农民暴动和人民起义，使当局胆战心惊。

尼古拉一世将大学视为自由思想的温床，对莫斯科大学早已备加注意。

科连卡：尼古拉的爱称。

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杰出的作家。

亚·谢·格里鲍耶多夫（1795—1829）：俄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尼·普·奥加廖夫：（1813—1877）：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政论家。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著名的诗人。

一八一二年，俄军击败了入侵的法军，在俄国人民中激起了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

十二月党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在俄国首次发动反对沙皇暴政的武装起义而得名。

对波列扎耶夫 事件（一八二六年）、大学生把反动教授马洛夫 赶出课堂、孙古罗夫革命小组、受指控与叛乱者有联系的波兰大学生“案件”……他是刻骨铭心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一八三二年八月至一八三三年十一月），有五十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别林斯基）被开除。此外，另一些学生被“劝告”退学，实际上是强迫离校，只是形式上稍微体面一些而已。莱蒙托夫的情形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组学生名单”中，这位诗人的姓名后面写着：“劝告退学”。

大学领导千方百计清除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禁卫军退职上尉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捷普洛夫担保，大学生伊·屠格涅夫在校期间将穿着领导规定的制服，行为检点，不给领导带来任何麻烦。

一个月后，屠格涅夫本人签字保证“既不加入共济会 分会，也不加入帝国内外的任何秘密团体，不同它们发生任何关系”。

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学就读的时间不长——统共只有一年。他在这里听过其课的那些教授并非都能为这所大学增光。他们之中有复古主义者，有只会照讲稿宣读的教师，有思想反动的学者。

然而大学的整个气氛促进了先进大学生自由主义思想的觉醒。二十年后，赫尔岑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与道，虽然他上学时大学里的讲授内容比四十年代贫乏，但大学在那时也启发了年轻人的疑问，教他们学会提出问题，因为“青年们在教室里的争论、思想交流、阅读……比讲课和教授更多地培养了大学生……莫斯科大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些用讲课促进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伊·屠格涅夫·卡威林 和皮罗戈夫 的发展的教授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可以更安心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往事与随想》的作者作出了结论。

屠格涅夫在一年中学过的必修科目有：俄罗斯文学，世界通史，物理，拉丁语，法语。

不久，他在莫斯科大学对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时，大概是最优秀的教授之一——米·格·巴甫洛夫的授课，最早激发了这位青年特别重视这门科学。按课程表，他讲授物理学和农业，实际上他是谢林 及其拥护者的哲

亚·伊·波列扎耶夫（1804—1830）是具有民主精神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诗人，一八二六年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期间因写反政府长诗《萨什卡》被充军。

马洛夫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政治系教授，他为人粗暴，在课堂上为专制制度辩护，赞扬农奴制度，故被大学生赶出课堂。

孙古罗夫小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的一个秘密结社。其领导人是尼·彼·孙古罗夫，故名，孙古罗夫于一八三一年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后死于该处。

共济会原为保守性的宗教秘密组织，是在西欧影响下产生的，所以有时被人误认为主张自由思想的组织。到十九世纪初，自由派青年曾企图利用共济会开展活动。一八二二年，共济会被官方取缔。

赫尔岑于一八二九年考取莫斯科大学。

康·塞·卡威林（1818—1885）：俄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教授。

尼·伊·皮罗果夫（1810—1881）：俄国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

波士顿：一种牌戏。

弗·威·谢林（1775—1854）：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人哲学家。

学观点的传播者和宣传者。

尽管巴甫洛夫持唯心主义立场，但据同时代人证实，他天才地讲解了谢林的学说，唤起大学生对哲学的独特兴趣，从而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尼古拉王朝统治下的俄国，哲学科学受到轻视，莫斯科大学的哲学课尚在一八二六年就被取消。巴甫洛夫以哲学原理作为他所讲授的科目的根据，由此可见他巨大的胆识。“德国哲学是米·格·巴甫洛夫移植到莫斯科大学来的。”赫尔岑说，“巴甫洛夫站在物理数学组的门口，问学生：‘你了解大自然吗？但大自然是什么呢？了解是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刚考进大学的我国青年根本没有学过哲学；只有特种中学 学生才懂哲学，但他们对哲学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巴甫洛夫的授课使学生能够进一步独立钻研哲学体系。他的学生，如赫尔岑、奥加廖夫、别林斯基，当然没有停滞在掌握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上，而是继续前进，以独立的精神突破它，突破黑格尔 的哲学，以便把俄国的哲学思想提到很高的水平上来，推动它向社会主义思想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俄罗斯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一文中分析三十至四十年代俄国活动家复杂的精神探索的结果时写道：“现在，我们祖国的智的生活，第一次培养了和欧洲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象先前那样追随他们的人们……自从我国智的运动的代表以独立的精神批判了黑格尔体系以来，运动已不再受任何外国权威的支配了”。

他在这本书里也指出了巴甫洛夫的讲课在培养人才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巴甫洛夫“对在莫斯科大学求学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的是达维多夫。空洞无物的华丽词藻，对作品的公式化的评价，缺乏说服力和真挚的激情——这一切只能使学生在他讲课时打盹儿。他们都说他的课“空洞无物，华而不实”。

波戈金教授讲授通史单调、平淡、枯燥。

修辞学教师波别多诺斯采夫——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把学生束缚在罗蒙诺索夫 的颂诗上，并且给他们留“演说词”当作业。

在升学考试中，屠格涅夫获得总分三十六分，和三十名学生中的六名学生一同升入二年级。

但他没有在莫斯科大学继续学习：屠格涅夫的父母决定迁居彼得堡。他们的长子进了彼得堡近卫军炮队，父亲希望弟兄俩住在一起。

特种中学：指中等宗教、师范学校。

黑格尔（1770—1831）：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人物。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青年文学家中间传播对哲学的爱的光荣”正是属于巴甫洛夫的。他所说的青年文学家指的是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那些构成从柯尔卓夫〔一〕到屠格涅夫先生的我国文学的荣誉的卓越人物几乎全部来自这个小组”。——原注。〔一〕阿·尼·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杰出的诗人。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伟大的学者，古典主义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

第三章

彼得堡——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友谊——最初的文学习作——果戈理——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柯尔卓夫的会见

一八三四年夏，屠格涅夫迁至北方首都 之后，申请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组就读。

屠格涅夫一家刚刚在彼得堡定居，家里就发生了不幸的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突患重病，于十二月三十日中风病故，当时他的妻子在意大利。

他的早逝使亲人们深受震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甚至数年之后谈起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之死时还异常悲恸，好象这件事昨天才发生似的。她开始更经常地到斯巴斯科耶长期住下，在那儿沉缅于回忆之中，时而愉快地忆起一同在遥远的国家的旅行，时而痛苦地忆起强烈的醋意和对未来的担忧。

“父亲的书房寂静而空荡，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她在给伊凡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的坟墓，我在这里为父亲祈祷，

心里暗暗地和他交谈。我在这里办事，在这里靠回忆往事度日……只有在斯摩棱斯克墓地 时我是幸福的。啊！……我忘记了你的请求……不要触动你的痛处 。”

她珍藏着丈夫的每一件遗物，他的遗像，书籍……有一回，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请求母亲查阅一下旅行指南时，她在回信中写道：“新的旅行指南好象你拿走了，咱们和父亲旅行时用的旧旅行指南在我这儿……亲爱的朋友，我再看它一眼是感到十分痛苦的……有的地方用铅笔画了线，有的地方用指甲划了道，有的地方折了角——这一切使我如同万箭攒心。我还想对你谈一谈遗像。譬如，我这里的遗像有的象父亲，有的则不象。我看一眼不象父亲的遗像时就说，这不是他 ……但是！——象父亲的遗像我连一眼都不能看，血全都涌进心窝。他永远离开我们了……”

父亲去世前不久，屠格涅夫开始创作诗剧《斯捷诺》。这是他最早的诗歌习作之一。和这部幻想剧一样，大概一年前在莫斯科写的一些短诗带有因阅读拜伦 的作品而产生的浪漫主义的痕迹。这个剧本取材于意大利生活，充满了库科尔尼克 式的传奇性效果——既有凶杀，又有疯狂，还有自杀。主人公关于人的努力在死亡面前是徒劳无益的独白，充满了绝望的悲观情绪。

后来，屠格涅夫不能不带着自嘲的微笑回忆自己最初的习作。他称《斯捷诺》为“荒诞不经的作品，其中以幼稚的笨拙表现了对拜伦的《曼弗雷德》的盲目摹仿”。当然，它确实是这样的。但在创作这部剧本期间以及过了若

北方首都：彼得堡。

屠格涅夫的父亲葬于彼得堡斯摩棱斯克墓地。——原注。

“不要触动你的痛处”：原文系法语。

“这不是他”：原文系法语。

拜伦（1788—1824）：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涅·瓦·库科尔尼克（1809—1868）：俄国反动诗人，剧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曼弗雷德》：拜伦于一八一六年完成的哲理诗剧。

干时间之后，“他的缪斯 的早期成果”对年轻的屠格涅夫是珍贵的，而且他想必以为是颇有意义的。所以两年之后他下了决心，将自己的长诗交给在彼得堡大学执教的普列特涅夫 教授审阅。

在彼得堡居住的头一年，屠格涅夫会见了诗人茹科夫斯基，这次会晤使他永志不忘。

这件事是在下述的情况下发生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希望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 想起她来，便在他的命名日即将到来时给他绣了一只漂亮的丝绒枕头，枕头上绣着一个身穿中世纪服装、肩上立着一头鸚鵡的少女，差儿子把枕头送到冬宫 茹科夫斯基的住处去，嘱咐儿子向他通报自己的姓名，讲明他是谁的儿子，然后献上礼物。

屠格涅夫狂热崇拜《水中女妖》 和《格罗莫鲍伊》 的声誉卓著的作者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他准备完成母亲吩咐办理的事时，却仍然十分激动。屠格涅夫后来写道：“当我来到了至今没有见过的宏大宫殿，穿过石头长廊，登上石头阶梯，不断地碰到石头般一动不动的卫兵，当我终于找到了茹科夫斯基的宅邸，来到一名身高三俄尺、穿着红制服、所有的衣缝都镶着绦饰，绦饰上绣着双头鹰 的侍从面前，——那时候，我是那样战战兢兢，我觉得那样惶悚，以至我在红衣侍从的招引下走进一间书房，发现诗人的沉思而亲切的、但也尊严并且有些惊讶的面孔正从一张长长的斜面写字台后边望着我时，——我不管怎样努力，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羞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掉下眼泪，我象生了根似地站在门坎上，只是平伸着双手抱住——好象行洗礼时抱婴孩一样——那只不幸的枕头……我的窘相大概在茹科夫斯基善良的心里引起了怜悯之情，他走到我的身边，轻轻地接过我的枕头，叫我坐下，然后用宽容的态度同我谈起话来。我终于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于是就尽快地跑开了。”

即使同诗人的会见结束得这样突然，屠格涅夫回到家里以后却“怀着特殊的感情想起他的微笑，他那温柔的嗓音和缓慢而令人愉快的举止”。

在孩子的想象中，“神秘幻影的歌手”从前原是非常消瘦、苍白的，如今却以迥然不同的模样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明显地苍老了，身上已经出现宫廷官吏的派头，胖胖的脸庞流露出平静和安详。这一短暂的会晤，就足够屠格涅夫后来仅用寥寥几笔便生动地勾画出大家根据布留洛夫 的画所谙熟的年迈诗人的画像了。“他侧着头，仿佛在谛听和思索；纤细、稀疏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翘在几乎完全光秃的脑袋上；他那一对乌黑的、中国式的吊梢眼的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艺与诗歌的女神。

彼·亚·普列特涅夫（1792—1862）：俄国作家、诗人、批评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校长，普希金逝世后至一八四七年任《现代人》杂志编辑。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科夫斯基的教名和父称。

当时茹科夫斯基是皇太子（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师保，住在冬宫。

《水中女妖》：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德国诗人、作家拉莫特—幅凯（1777—1834）作于一八一一年的一部童话诗。

《格罗莫鲍伊》：茹科夫斯基于一八一一年写成的诗体“古代故事”《十二个睡着的少女》的第一部。

俄尺：旧俄长度单位，一俄尺合 ．七一米。

帝俄的国徽是双头鹰。

卡·巴·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著名画家。

深邃的目光中闪烁着恬静的慈祥，两片相当肥厚而轮廓端正的嘴唇上总是浮现出不易察觉的、然而却是诚恳的微笑，表示他对人的眷顾和情意……。”

在彼得堡大学度过的两个学年里，屠格涅夫最接近的是彼·阿·普列特涅夫教授。屠格涅夫在描述他时说：“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教授来看，他并不以博学著称，因为他的学识十分浅薄；但他由衷地爱好‘本行’，他具有稍微缺乏自信的、但是纯正而敏锐的鉴赏力，说话简洁、明了，带几分热情。主要的是，他善于用自己强烈的爱好去感染他的听众，——善于使他们发生兴趣……。此外，作为同著名的文学巨匠们有往来的人，作为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和果戈里的朋友，作为普希金把自己的《奥涅金》题献给他的人，他在我们看来是很荣耀的。我们都能背诵这些诗句：‘无心取悦高傲的上流社会……’”

屠格涅夫上最后一个年级时的另一位语言文学教师是著名的文学家、记者亚·瓦·尼基坚科。他身兼教授和书刊审查官，并且在这一生涯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者的声誉。根据当时实行的制度，他有时因偶然的纰漏被拘押。有时普希金、果戈里和其他大作家，包括后来屠格涅夫的作品是经他审查后发表的。上大学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曾将自己的早期诗作送给尼基坚科教授审阅。这样一来，屠格涅夫便在文学上和大学的老师们建立了联系。

讲授哲学的是奥地利人阿·阿·费舍尔。他俄语差，讲解哲学基本知识非常不合要求，致使格拉诺夫斯基以后在柏林研究黑格尔的学说时，从那里来信写道：“我到这儿来之前，不知道哲学是什么。费舍尔给我们讲的是另一门科学，现在我根本不明白，这门科学有什么好处。”

他所讲解的课程观点极其反动，叫做“形而上学及对最主要的哲学体系的批判性评论”和“劝谕性哲学”。

讲授古典哲学的是弗·勃·格列费，他是个思想陈旧的典型的德国教授，用拉丁语讲课。学生们和他一起翻译《奥德赛》选段和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的部分章节，他则把正文添上历史和语言文学方面的说明，老是啧啧赞美希腊语的悦耳动听和古希腊生活的无与伦比的美。

讲授罗马学者的著作的是德国人弗·克·弗列达格，他是个自信、傲慢的人，对学生象家庭教师那样严厉、轻蔑，他发现学生出错就幸灾乐祸，用拉丁语或者半通不通的俄语大开不合时宜的玩笑。

屠格涅夫并不满足于听大学的课程，所以在家里跟拉丁语学家瓦尔特尔博士学习，听他评价贺拉斯、塔西佗、荷马、索伏克利斯及其他古典作

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国伟大的诗人，现实主义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叶·阿·巴拉廷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尼·瓦·果戈里（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叶弗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著名诗体长篇小说。

《叶弗盖尼·奥涅金》中给彼·亚·普列特涅夫的献诗的第一行诗。——原注。

《奥德赛》：相传是古希腊诗人荷马（公元前12—8世纪）所作的叙事长诗。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著名的诗人，文学批评家。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家的作品。

一八三四——一九三五年度，讲授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是尼·瓦·果戈理，当时屠格涅夫和他的同系同学都知道他是《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但他们认为，他们的教授果戈里——雅诺夫斯基先生（课程表上这样称呼他）和作家果戈理毫无共同之处。稍后屠格涅夫才明白，他搞错了。

他和同年级的同学一样，对果戈里的讲授反应不好。讲台上果戈里瘦削的身材深深地印在屠格涅夫的脑海里；他“前言不搭后语地低声说些什么，把一些画有巴勒斯坦和其他东方国家风光的小型钢版画片拿给我们看”。

他还记得，期考的时候，他包着一块丝质的黑头巾，仿佛害牙痛似地哭丧着脸，一声不响地呆坐在那里，让舒尔金教授代他考问学生。屠格涅夫回忆道：“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尴尬处境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就在那一年辞职不干了。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大发感慨：‘我登上讲坛的时候没有受到赏识，走下讲坛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赏识！’他生来便是为了做他的同时代人的导师，不过不是从讲台上宣教而已。”

第二年，青年教授米·谢·库托尔加接替了果戈里，他在世界通史方面学识渊博。

但屠格涅夫这一科目的成绩不算理想。正是由于世界通史不及格，一八三六年他念完哲学系时和另十名同学仅仅获得“学士”称号，而他们的五名同学却获得候补博士学位。

屠格涅夫不肯就此罢休，因为他打算继续深造。他征得校长同意后，用一冬的时间再次听了最后一年级的课程，并且通过了考试，获得哲学系于一八三六年授予的候补博士学位。

当屠格涅夫还在念二年级时，就和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念最后一年级的季莫费伊·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认识，并且不久后和他交往相当密切。他们是同乡。格拉诺夫斯基出生在奥廖尔城，他的童年是在离城二十五俄里的父亲的庄园波戈列里茨度过的。

屠格涅夫经常到格拉诺夫斯基家里去，因此发现他的朋友家境贫寒。他占用的房间里家具简陋，仿佛空空如也。格拉诺夫斯基通常让这位客人坐在晃悠悠的小桌前，桌子上只摆着一瓶清水和一罐果酱，没有任何饕餮的东西。他大多靠喝茶、吃土豆充饥，所以有时开玩笑说，他耗费茶叶不比奥廖尔城的商人少。格拉诺夫斯基的母亲早已故世，父亲对孩子们的前途漠不关心，并且把庄园里的事务弃置不顾，使家庭濒临破产。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本来可以过宽裕的生活，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认为对爱子的费用还是严加限制为好。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非常擅长摹仿熟人们的面部表情、手势、习惯和谈吐，他有时告诉朋友们，德国女房东听他抱怨自己的命运时，对他说：“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生活这玩意儿象是苍蝇这种叫人讨厌的虫子！有什么办法呢！得忍耐啊！”

年龄上的差异——格拉诺夫斯基比屠格涅夫年长五岁——并不影响这两位青年接近。他们都爱好艺术、文学和科学，并且正处于充满年轻人所特有

索伏克里斯（公元前 497—406）：古希腊大剧作家。

季·尼·格位诺夫斯基（1813—1855）：后来的俄国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第二句“不要难过”：原文系德语。

的充沛的活力和奔放的激情的浪漫主义时期。他们都写诗，翻译英国诗人的作品。

在他们的想象中，前途是渺茫的。屠格涅夫说过：“每个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充满‘独创性’，狂热的自信和参加友谊的聚会、小组的时期”。

其中一个在青春初期曾幻想诗歌生涯，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当时格拉诺夫斯基的文学才能已引起普列特涅夫的注意；有一次，教授向普希金介绍了他，赞许他的才华。过了不久，深入研究历史的渴望才最后压倒了格拉诺夫斯基的其他一切兴趣，于是他面前便展现了他日后的真正道路。

另一个具有跻于伟大小说家的行列的才能，却长期向往从事科学活动：于一八四二年，即这里所描写的时期之后七年来彼得堡大学应试，希望考取哲学硕士学位。

屠格涅夫和格拉诺夫斯基相识那年，他们醉心于诗歌。因此屠格涅夫对他们那些曾朗诵诗歌的会晤还记忆犹新，不论朗诵的是自己的诗歌，还是他们喜爱的诗人的作品。

这两位朋友都崇拜普希金，但在他们的心中，对普希金的崇敬和对别涅季克托夫 浮夸的诗歌的赞赏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们被虚假、空洞的浮华辞藻和离奇古怪的比喻所迷惑，无休无止地反复背诵他的《悬崖》、《玛季莉达》、《群山》。

屠格涅夫醉心于别涅季克托夫的诗歌、马尔林斯基 的小说和库科尔尼克的剧作为时不长。别林斯基评论别涅季克托夫的文章使他看清了他的作品的实质。屠格涅夫叙述道：“一天早上，大学里的一位同学 来看我，气冲冲地告诉我说，别兰糖果店 来了一期《望远镜》。上面有别林斯基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这个‘吹毛求疵的评论家’居然敢打击我们的共同偶像别涅季克托夫。我立刻赶到别兰热，从头至尾读了全文，——我自然也冒火了。但是说来真奇怪！无论是阅读的当时，还是阅读之后，我心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不由自主地赞同‘吹毛求疵的评论家’，认为他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无懈可击的。这使我自己也觉得惊讶，甚至懊恼。我为这个真正出乎意料的印象感到羞耻，竭力压制这个内心的声音；在朋友们中间，我更加激烈地批评别林斯基本人和他的文章……可是，心灵深处的那个东西仍旧悄悄地对我说：他是对的……过了一些时候，我果然不读别涅季克托夫的作品了。”

从那时起，别林斯基的名字就深深地印在这位青年的脑海里了，他那时当然没有预料到，他后来和伟大批评家的密切交往将在他的一生中起多么大的作用。

当《国民教育部杂志》刊载了屠格涅夫的第一篇作品——他“作为习作”写出评论安·尼·穆拉维约夫的《俄罗斯圣地游记》一书的短文时，他还未

弗·格·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反动浪漫主义的代表。

马尔林斯基：亚·亚·别斯士舍夫（1797 - 1837）的笔名，十二月党人，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

大概是格拉诺夫斯基。——原注。

那时规模较大的糖果店都经售报章杂志。

《望远镜》：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文学、社会半月刊。

《国民教育部杂志》：俄国国民教育部机关报，月刊，自一八三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

安·尼·穆拉维约夫（1806—1874）：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正教及早期基督教。

满十八岁。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很久没有再写评论文章，主要是写诗歌，翻译《奥赛罗》、《李耳王》和《曼弗雷德》，他自己对这些译文非常不满意，于是后来把这些译作销毁了。

有一次，屠格涅夫有些胆怯地把自己的剧本《斯捷诺》交给普列特涅夫审阅。教授批评了这个剧本，当然，按照系里的惯例，没有点出作者的名字。他说，这个剧本的整个内容夸张，不真实，不成熟。大部分诗句不合韵律，如果说它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也不过是一些极个别的地方。

当天下课后，教授在街上碰见屠格涅夫，委婉地批评了他几句，却又说，他“还有点小才能”。

这句话鼓起了屠格涅夫的勇气，不久后他给普列特涅夫送去了几首诗，教授挑出了写得最成功的两首诗——《傍晚》和《献给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维纳斯》。教授使初出茅庐的诗人产生希望：他的诗歌也许能发表，并且邀请他到家里来参加文学晚会。

事后，屠格涅夫好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竟在家里耽搁了一些时间，结果到普列特涅夫家时已经有些晚了。在教授寓所的前室，他碰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正在向主人告别，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是啊！是啊！我们的那些大臣太好啦！真没说的！”他笑了起来，走出去了。

屠格涅夫仅仅来得及看清他那洁白的牙齿和灵活、敏锐的眼睛。这原来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习惯于认为是半神明的人物……这就是普希金。

屠格涅夫以前从未见过普希金，所以没有马上明白刚才在他面前的是谁。当事情弄清楚之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感到非常难过。

诚然，过了不久，命运多少使他得到了补偿——在不幸的决斗前不久，屠格涅夫有机会再次在恩格利加尔特大厅的音乐早会上见到他。那是诗人一生中最痛苦、艰难的时期……“他站在门口，身子倚着门框，双手交叠在宽阔的胸前，带着不满的神情环顾左右。”屠格涅夫写道，“我还记得他那微黑的、不大的面孔，他那非洲型的嘴唇，微露的洁白的大牙齿，下垂的连鬓胡子，高高的前额下面那对几乎没有眉毛的、含着怒意的乌黑的眼睛，以及卷曲的头发……他也急速地瞥了我一眼，我毫无礼貌地凝神注视他，这想必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烦恼地耸了耸肩，——他好象老是心情不好——便走到一边去了。过了几天，我看见他躺在棺材里，于是情不自禁地默诵道：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疲惫的前额，异常地平静

《奥赛罗》、《李耳王》：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的剧本。

普列特涅夫的确于一八三八年将这些诗刊载在普希金逝世后由他接办的《现代人》杂志上。——原注。

瓦·瓦·恩格利加尔特（1785—1837）：普希金的朋友，大富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彼得堡盖了一座大厦，经常举办音乐会和舞会

普希金的母亲是原籍埃塞俄比亚的阿布拉姆·汉尼拔（1692—1781）的孙女，因此他的面貌带有非洲人的特点。

屠格涅夫于一八三七年二月构思了题名为《我们的时代》一文，这个作品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他的这一构思是不是由于普希金的惨死而产生的呢？

上流社会的无知之徒、宫廷和沙皇的走狗蓄意谋害诗人，激起了俄国社会先进人士的深切愤慨。屠格涅夫的上述作品是不是和莱蒙托夫为纪念诗人之死而作的诗 共鸣呢？

据屠格涅夫自己说，《我们的时代》是他“见一些人在我国文坛实行专制，横行霸道而勃然大怒，于二月中旬写就的。”

可能是关于莱蒙托夫因其“大逆不道的诗篇”受到惩处的传闻——屠格涅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促使《我们的时代》的作者在竣稿后不久就销毁了自己的讽刺、揭露性的作品。

屠格涅夫觉得，那天晚上不大著名的作家们在普列特涅夫的客厅里进行的谈话非常平淡，既不活跃，所提出的问题也不深刻。话题有时涉及文学，但主要涉及上流社会和官场的新闻。

普列特涅夫的一位客人引起了屠格涅夫的特别注意。他身着旧式的常礼服，谦逊地坐在一旁，虽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但不参加谈话。这是诗人柯尔卓夫。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深邃的智慧，赋予他那朴质的俄罗斯型的面孔以几乎觉察不到的美妙。

主人请求柯尔卓夫念一念自己的诗，可是诗人非常窘促，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普列特涅夫只好不敢坚持了。

晚上十一点多，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已离开以后，屠格涅夫才和柯尔卓夫一同走到前室，提出送诗人回家。

归途中，他们畅谈起来，屠格涅夫便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念自己的诗。

“我为什么要念呢？”柯尔卓夫苦恼地回答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刚走，我哪能就念呢！您饶了我吧！”

这些话充满了对普希金的敬重，使屠格涅夫自己也感到自己的问题提得不合适。

到了柯尔卓夫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他下了雪橇，匆匆地扣上车毯，裹严了破旧的皮袄，消失在夜幕的寒雾中。

这是普希金描写连斯基在决斗中丧命后遗容的诗句。见《叶弗盖尼·奥涅金》第六章。

指《诗人之死》。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教名和父称。

第四章

出 国

屠格涅夫早就渴望去国外完成学业，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没有立即同意让儿子前往异国他乡。

“你要明白，”她对儿子说，“你不在，我会倒霉的。”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最小的儿子谢尔盖看作是上帝恩赐的十字架，——他生下来就残废，患瘫痪症，当他在十六岁上死去时，她怜悯他，痛哭了一场，但也松了一口气。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象以伊凡自豪一样，也以长子尼古拉自豪，但觉得在他身上没有爱子伊凡所特有的温厚和善良，伊凡甚至能用这些特点改变她那坚定不移的愿望。在屠格涅夫家长大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养女日托娃常常亲眼看见，她那不容任何人反对的保护人仅仅有时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让步。“他在时，她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正因为如此，他在场时一切都显得轻松、活跃。他很少回家，大家象等待幸福一样等待他。他在家时，母亲不仅不给谁捏造什么罪名，甚至对确凿的过错也宽宏大量；她待人温厚仿佛是为了在儿子的脸上看见愉快的表情”。

“我的一切都寄托在你们俩身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母亲，没有姑姑，既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朋友……只有你们……你们……你和哥哥。你们俩我都疼爱，但爱得不一样。我特别疼你……我可以打个比方来说明，假如有人捏我的手，——我觉得疼，但假如有人踩我脚上的鸡眼，——我就觉得受不了。”

她用开玩笑的口吻温柔地把自己的万涅奇卡 叫做女儿。她称呼道：“我的女儿，我的让内特！”

儿子年纪愈大，母亲就愈加疼爱他，愈加强烈地经常为他感到不安。一八三七年夏天，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回到斯巴斯科耶度假。有一回，他从竞赛马车上跌下来，摔坏了胳膊，此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特别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在田野里；在附近割草的农民赶来救助，用腰带给做了个跨带，把他送回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正在不耐烦地在窗前等待儿子散步回来，看见驶进院子的马车上坐着的不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而是一个农民，儿子则由几个农民陪伴着在后面吃力地步履蹒跚地走着，她吓得往后一跳。如果她好久没有接到儿子的来信，便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她的脑海里浮现出种种惨状：儿子又跌跤了，摔伤了腿或者胳膊，说不定生命垂危，或者已经不在人世……谁也无法开导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消除她的忧虑。这一来，时间就过得非常缓慢，令人忧愁和痛苦——日不思食，夜不思寝，直到她接到望眼欲穿的来信。但总是重提出国问题，于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逐渐开始让步。儿子认为必须在柏林大学深造的理由是不无道理的。确实，她认为，伊凡的俄语知识是相当渊博的。可是要知道，他准备当哲学硕士哪。国民教育部也用公费派遣成绩优秀的青年学生、教授苗子进德国各大学留学。她想，她可能断送儿子的“功名”，所以终于同意和儿子长久离别。在

万涅奇卡：伊凡的爱称。

“我的女儿”：原文系法语。

“我的让内特”：原文系法语。让内特是母亲把屠格涅夫当作女孩看待的昵称。

那里，说不定他能学到母亲认为他这个“庄户人”所欠缺的上流社会的风度呢。“你和哥哥都聪明、善良，尊敬我……但是，——你别见怪——你们都长成了怪人。我没有责备的意思！不，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你们是可爱的。但是……上流社会要求有上流社会的风度。你哥哥是军人，这件事对他并不难，可是你，伊凡，你啊！唉，我希望你十全十美！”

屠格涅夫自己的想法则截然不同，但他对主要之点避而不谈，只是坚持，他不能仅限于念完彼得堡大学，“在俄国只能学到一些预备性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源泉是在国外”。

假如他那时对母亲——顽固的农奴主声明，促使他采取这一步骤的正是他对地主专制的俄国这一社会制度的仇恨，那是欠考虑的。三十年之后，他才公开说出了他去国外时所抱的主要动机。

屠格涅夫写道：“我个人认识得十分清楚，这样远离故土，这样强行割断把我和我从小所过的生活结为一体的全部联系和纽带，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没有法子。那种生活，那种环境，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区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所隶属的地主农奴区，简直没有一点使我留恋的地方。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几乎全都在我心中激起不安和愤懑，并令我厌恶不已。我不能长期犹豫不决。或者屈服，老老实实遵守常规，沿着老路慢慢地走下去，或者一刀两断，抛开‘所有一切’，甚至不怕失掉我内心觉得珍贵和亲切的许多东西。我就这样做了……在我面前没有别的道路……”

母亲让儿子远行还是第一次，所以要儿子答应她，一路上和在国外持身处世一定深思熟虑。叮咛、教诲、劝告没完没了。她告诫他不要打纸牌和玩轮盘赌，不要胡乱花钱。“事事都要精打细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要谨防欠债。要铭记保姆瓦西里耶芙娜的金玉良言：‘债务象毒疮，只要长出一个，就会布满全身。’在那儿别跟戏子打交道，你一欠债，我就登报声明，我不替你还债，你们的田庄不是父亲的”。

决定派原先在斯巴斯科耶当医生的家奴波尔菲利·季莫费耶维奇·库德利亚绍夫出国当随身待仆。据传闻，他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同父异母兄弟。

五月十五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由彼得堡启程那天，屠格涅夫一家带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小不点儿的养女贝贝，去喀山大教堂作了告别祈祷。这时，行李已送到莫尔斯克街轮船公司办事处。祈祷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坐在折叠椅里，一直悲伤地哭泣。

先得用不大的《伊若拉》号轮把旅客送往喀琅施塔得，再从那里上《尼古拉一世》号战列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搭乘这艘军舰出国。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彼得堡码头的堤岸上和儿子告别，她没有走出马车，——在此之前不久，她动了一次大手术，不能自如走动。

一个姓氏不详的画家，大概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一个农奴，遵照她的意图绘下了她和儿子告别的戏剧性时刻。她回到斯巴斯科耶村之后，便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信道：“在画架上，就在我面前，呈现出彼得堡堤岸的风光和启碇开航的《伊若拉》号轮。送行的人们挥动手绢和帽子……停着许多马车……阳台上，人们举着长柄望远镜眺望。轮船已经冒烟，响起了第三遍铃——于是母亲大叫一声，在马车里的小窗口前跌倒了，双膝跪地……”

轮船拐了弯，象鸟儿一般飞走了……堤岸上，马车夫赶起马来……远航的人儿不久就消失了……飞走了，于是四周顿时冷落空寂……”

即使顺风，也要航行好几天。《尼古拉一世》号在第四天应该到达吕贝克。乘这艘船的有二百五十名旅客。一些较富有的旅客随身携带自用马车，以便乘坐马车继续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旅行。屠格涅夫数了一下，船上有二十八辆这种老爷们的马车。

为了消磨时间，他便向一个有钱的地主提议下象棋。那人同意了，于是，一场持久战便开始了。屠格涅夫从小就酷爱象棋，尤其在钻研了理论，并且照彼得罗夫和阿尔盖叶尔的书熟悉了棋谱之后，他的棋艺不断提高。屠格涅夫的对手棋艺也十分精湛。他们是那样顽强地力求摧毁对方，以致观战的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未了说道：

“你们下棋，真叫人以为你们是在做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呐。”

当轮船途经波恩荷尔姆岛附近时，许多旅客急忙到甲板上去欣赏嶙峋的花岗石巉岩。在一堵最高的峭壁上，隐约现出一座破败的古堡，给北国风光严峻的美姿增添了雄伟的气魄。一群群海鸥在荒凉的海岸上空翱翔；远方，繁花似锦的草地和掩映在花园之中的红屋顶的农舍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如今离特拉弗明德已不远了；那里，吕贝克已遥遥在望。时间过得很慢，轮船在浩瀚的海洋上似乎也行驶得很慢。机器的敲击、颠簸和浪涛的拍溅，使所有的旅客疲惫不堪。

第四天傍晚，屠格涅夫已经玩腻了象棋，便到统舱去。那里，人们正围着一张大桌子狂赌。顺便说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发现，这里有几个是彼得堡非常有名的赌徒。屠格涅夫写道：“这里头的一位绅士看见我置身局外，不知道此中的原因，便突然邀我赌博。当我以十九岁的人特有的天真，向他说明自己克制赌欲的原委时，他哈哈大笑起来，对伙伴们大声说，他发现了一个活宝：一个年轻人，从来没有摸过纸牌，因此注定会得到巨大的空前的幸福，头脑简单的人的真正幸福！……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过了十分钟，我已经坐在赌桌前，手里拿着满把分得的纸牌，不顾一切地赌起来了……”屠格涅夫已经深信不疑，他在赌场中确实交了空前未有的红运，就是现在，就在这里，他注定即刻便可以大发横财（“钱象流水一般向我手边流来；桌上，在我那双颤抖着的、满是汗珠的手两边，耸立起两堆金币。”）——就在这个紧张时刻，突然舱门洞开，一位太太闯了进来，刚喊了一声：“失火了！”便昏倒在沙发上。赌手们扔下纸牌，忘掉了撒得满地的金币和纸币，霎时一跃而起，向出口处奔去。

“处处燃烧着煤火般赭红色的火光。转眼间，大家都到了甲板上。沿着烟筒的两侧和桅墙升起两个半夹杂着火的烟柱；极可怕的、再也不会停止的混乱开始了。当时的混乱是难以想象的；可以感觉到，一种不顾死活的保全自己的感情攫住了所有这些人，其中头一个便是我。我记得，我抓住了一个水手的胳膊，答应他，如果他能救我一命，那我一定以母亲的名义给他一万卢布。这水手当然不能把我的话当真，所以摆脱了我的纠缠；我自己也不坚持，因为我懂得，我的话里没有一点正经……”

一些旅客，特别是刻薄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发现，在可怕的危险面前，

亚·德·彼特罗夫（1794—1867）：俄国著名的象棋手，象棋理论家。

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3）：俄国诗人，文学批评家。

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惊慌得太过分了。经爱搬嘴弄舌的公爵这么一散布，后来首都的沙龙和客厅里便纷纷议论，说什么《尼古拉一世》号失火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反复他说：“这样年轻，什么事情也没做成就死掉……”人们还添油加醋，说他大叫大嚷：“救救我，我是母亲的独生子！”

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心中幸灾乐祸，赶紧把这些流言蜚语告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个骄傲的女人听后，肺都气炸了！

“为什么轮船上的人先发现了你的哀哭呢？……谣言会闹得满城风雨的！——许多人也已对我说过，使我大为不快：‘这个身躯高大的屠格涅夫这样埋怨——他老是说：‘这样年轻就死掉……’，一个叫托尔斯泰娅的……一个叫科利增娜的……还有……还有。那里有太太，有母亲。为什么偏偏议论你呢？身躯高大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胆怯了，其他人在当时的惊慌中居然能发现……这件事即使不给你留下污点，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料。”母亲对有损她的自尊心的风言风语作了这样的反应。

当然，很难说，屠格涅夫在极度惊慌的时刻是否确实不由自主他说了人们认为他说过的那些关于自己的话，诸如“独生子”之类。他本人曾断然反驳（有一次甚至是刊物上）“俏皮的公爵”的证实。“死亡的逼近可能使十九岁的孩子惊慌失措，——我并不打算使读者相信，我对死亡漠然置之，但上述的话我没有说过……”

逝世前不久，作家又一次重提这一事件，在特写《海上火灾》中讲述了这件事。在这篇特写里，也出现了关于十九岁就死掉的话，但是从行文上看，这句话只不过是作者的独白而已。

在屠格涅夫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刻，他听见了船长的声音：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你们会死掉的，跟我来吧。”

年轻人连忙跟随一位水手，穿过浓烟，顺着绳梯爬去，来到了船头，几乎全体旅客都聚集到这里来了。水手们从右舷放下一条大救生艇，携带孩子的母亲和老人急忙沿着舷梯登上救生艇。紧接着，从左舷放下一条较小的救生艇。

水兵们驾着救生艇，在熊熊燃烧的轮船和海岸之间往返，逐步把几乎全部乘客运走。只有几个人丧生，其中有和屠格涅夫杀了个你死我活的象棋对手……下着冷冷的濛濛细雨……衣服淋得精湿的幸免于难的旅客们上岸眺望正在缓缓地烧毁的军舰……

“这个身躯高大的屠格涅夫这样埋怨——他老是说：‘这样年轻就死掉……’”：原文系法语。

“身躯高大”：原文系法语。

第五章

在柏林大学——和斯坦凯维奇相识

离下学期开学还早，于是屠格涅夫决定去莱茵河畔州旅行，在矿泉稍作勾留，以便在梅克伦堡海岸经受了一场大惊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轮船失火后一个月光景，他来到埃姆斯。当时正在该地的斯坦凯维奇在致亲人的信中写道：“屠格涅夫途经此地，我是在莫斯科大学认识他的，他后来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他是和罗津一同乘失火的轮船来的，曾目击这一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事故。”

一八三八年九月底，屠格涅夫移居柏林，开始在大学听课。课余之暇，他常常去看戏，听音乐，探望许多相识的同胞。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期间，柏林还丝毫不象欧洲的京都。这里，乡气还颇为惹人注目。“关于这个城市，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写道，“这里早晨六点钟起身，两点钟吃午饭，就寝比鸡要早得多；晚上十点钟，只有神态漠然、喝得醉醺醺的守夜人在空寂的街头踟躅，任何横行无忌的微醉的德国人从蒂尔加登走来，在勃兰登堡门附近都仔细掐灭雪茄烟，因为‘他们对法规总是忍耐的’。不是开玩笑，柏林至今还不是京都；至少在这个城市里毫无京都生活的迹象，虽说您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感到自己是在欧洲运动的一个中心或发祥地。”

大学、科学、黑格尔所说的“思想的王国”、使德国甚至在最严重的政治崩溃时期也享有声誉的对理论的强烈兴趣——这一切都赋予这个城市以欧洲运动的中心之一的意义，纵然它的生活方式是土里土气的。

有节奏的、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适宜于学习。

教室里人数众多——除了大学生之外，还有希望在教育方面赶上时代水平的军官和官吏到这里来当旁听生。有时，这里甚至可以见到妇女，这在俄国是令人觉得稀奇的。

几位准备在祖国的大学谋得教授职位的俄国青年认真地听柏林大学教授们的课。在这些教授中，有誉满世界科坛的学者：

里特、兰克、萨文尼、魏代尔、汉斯。

屠格涅夫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写道：“我学的是哲学、古代语、历史，并且在魏代尔教授的指导下特别勤勉地研究过黑格尔的学说。为了证明那时在国内高等学校所受的教育是多么不够，我想举出下面这个事实：我在柏林听楚姆普特讲拉丁古代文献，听波克讲希腊文学史，但由于底子太差，我回到家里还不得不死记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而我在国内还不是一个劣等大学生呢。”

维·罗·罗津（1849—1908）：俄国杰出的阿拉伯语文专家，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科学院院士。

卡·里特（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

列·兰克（1795—1886）：德国反动历史学家，代表普鲁士容克贵族地主的利益。

弗·卡·萨文尼（1779—1861）：德国法学家，反动的法学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卡·魏代尔（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诗人。

卡·楚姆普特（1792—1849）：德国语文学家。

菲·波克（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

讲授比较自然地理学的里特教授被公认为口才最好的教师之一。他在讲解自然地理学时，并不是枯燥无味地列举国家、城市、河流和山脉。他善于把自己的科目讲得生动有趣。里特的感人的外貌——端庄的容颜、大脑袋、富于表情的目光、从容不迫的举止，深深印在屠格涅夫的脑海里，他那从容、流畅的话语对学生产生强烈的影响。

他们从列奥波尔德·兰克关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讲稿中了解到多少饶有兴味和新鲜的东西啊！……听楚姆普特讲课收获很大，这些课帮助屠格涅夫牢牢地巩固了古代语知识，使他后来能流利地阅读罗马历史学家和诗人们的原著，并且用拉丁语给朋友写信。

讲授逻辑学、行而上学和哲学史的青年教授魏代尔是学生们共同爱戴的教师。学生们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精神抖擞。他虽然三十岁了，但却象孩子似的单纯、坦率和信赖别人。魏代尔不仅把听课的人看作学生，而且把他们看作朋友。他们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能到他家里去，因为他们知道，教授不把学生在课堂上不完全明白的内容都解释清楚，是不会让他们离开的。

魏代尔对俄国学生抱有特殊的好感：他很快就和他们建立了质朴、友好的关系。无怪乎魏代尔在和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凯维奇、屠格涅夫、巴枯宁的交往中，深入了解他们之后，对俄罗斯的伟大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那无厌的求知欲，皆在为被蹂躏的祖国造福的活动、为真理和人类的最高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决心，使他大为惊异。

他特别喜欢斯坦凯维奇。在这位柔弱的、被肺结核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青年身上，透出一股非凡的精神力量。死神已经悄悄地潜到他身旁，但他不把死亡放在心上，力求在心灵中始终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

魏代尔对斯坦凯维奇的同情——不让他焦急，给他请医生，竭力为他排忧解难——使斯坦凯维奇的莫斯科朋友们也深受感动。一八三八年，深爱斯坦凯维奇的别林斯基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他对你的同情又是具有多么大的意义啊！……如今，魏代尔对我来说已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形象了……”多么好的、神圣的人啊！”

德国教授当然想象不到，斯坦凯维奇对三十至四十年代期间俄国有头脑的青年一代有着何等巨大的意义，——后来，才被历史证明了。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随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都指出了这一意义。

《概观》的作者把斯坦凯维奇称为在三十年代中，当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被作为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真正的发现来接受时，“最早在莫斯科青年一代中传播对黑格尔的热情的人”。

但是几年之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就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内部矛盾。他们独立地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从而对俄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车尔尼雪夫斯基将俄国文化史上的这一时代称为最高尚、最纯洁的环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讲到斯坦凯维奇的圈子里对哲学的兴趣带有何等非同寻常的性质时写道：“所有这些人 在那时都还是年青人。大家对自己的高尚志向都充满信心，对美好未来的逼近都充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后来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指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康·阿克萨科夫，米·巴枯宁，屠格涅夫的老师克留什尼科夫等。——原注。

满希望，从他们认为能看透一切、调协一切的黑格尔嘴里说出来的睿智，对他们揭示了人们迄今还不可理解的秘密。他们的心灵为诗所陶醉；为了他们向人们宣告了美好的消息，光荣准备给他们戴桂冠。于是，他们为热情的力量所吸引，向前迈进了。这些人把全副精神贯注在哲学上，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日以继夜地谈论它，他们从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一切，解决一切。这是次们最早了解黑格尔哲学的时期，因此，被这位思想家的体系中以辩证法的惊人力量所发展的、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深刻的真理激发起来的热情，有一段时间自然应当压倒青年一代人的其余一切追求，这些青年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做我国所不知道的真理的预言者，这个真理，据他们在第一阵神往的热情中看来，它照耀一切，协调一切，既给人以宁静的内在世界，又给人以从事外部活动的蓬勃力量。”

在莫斯科，屠格涅夫没有机会加入斯坦凯维奇小组，因为他那时还太年轻。大部分组员比屠格涅夫年长五至七岁。他侨居柏林期间，这个年龄差别就远不那么明显了。这里，在柏林，屠格涅夫虽然“晚来”了一些，却进入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的行列。

这是在下面的情况下发生的。屠格涅夫在柏林遇见格拉诺夫斯基之后，发现在离别的两年中，格拉诺夫斯基和他有些疏远了。不久，他不无嫉妒地确信，他们疏远的部分原因，是格拉诺夫斯基新近和别人建立了友谊。如今斯坦凯维奇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我和格拉诺夫斯基成了朋友，人们往往一辈子也没有象这样交朋友。”一八三六年，当他们还刚认识时，斯坦凯维奇说。

屠格涅夫知道，季莫费伊·尼古拉耶维奇 新交的朋友是：刊载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杂志上的几首诗的作者。当时，屠格涅夫觉得这几首诗无足轻重，所以现在，刚听格拉诺夫斯基谈到斯坦凯维奇时，便不假思索，半嘲笑地问他：

“你说的是不是打油诗人斯坦凯维奇？”

但是当格拉诺夫斯基介绍他们认识，屠格涅夫较深入了解尼古拉·斯坦凯维奇之后，就对他感到无限尊敬，甚至夹杂几分畏惧。为什么会产生畏惧呢？要知道，斯坦凯维奇平易近人——他不善于以头头自居，也不想凌驾于他人之上。但是他身上蕴蓄着的精神力量和他那水晶般的纯洁，使几乎所有和他交往的人不由自主地自惭不如。他在场时，所有的人都想使自己更好、更诚恳、更纯洁，以博得他的信赖和好感。

尽管他具有深邃的智慧和清晰的头脑，却心地善良，天真到惊人的和令人感动的程度。他既不卖弄聪明，也不装腔作势。他坦率，自然，温良，因而不费任何力气，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就能使周围的人折服。

他身上没有一点儿唯我独尊的恶习，恰恰相反，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兴趣，并且深表同情，对人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善于了解他们身上主要的东西和特点。

他天性幽默，看出谁身上有可笑之处时，常常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逗趣一番，但毫无恶意。

他那匀称的不甚高大的身材，透出一股天生的优雅。脸庞清秀而富于表情，前额微斜，深褐色的眸子露出和蔼可亲的目光，平分的浓密而乌黑的头

季莫费伊·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教名和父称。

发几乎长及肩膀。当他微笑时，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便微微地歪斜、颤抖，显得分外可爱。大家都知道，他患肺结核，但他极少谈起自己的病痛，而且大都用诙谐的口吻。屠格涅夫没能一下子赢得斯坦凯维奇的好感，斯坦凯维奇起初显然“不欢迎他，而跟格拉诺夫斯基和涅维罗夫的交往要密切得多”。

他们三个人甚至同住一处寓所，一块儿专心学习哲学和历嗣后，屠格涅夫思考斯坦凯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起初跟他疏远的原因时，有勇气说，那时他确实不配做这样纯洁无瑕的、正直的、完美的人们的挚友。

屠格涅夫很早就爱作自我剖析。无怪乎他十七岁时读了卢梭的《忏悔录》之后，也渴望写一部忏悔录。当然，他未能如愿，但这只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创作忏悔录的真正素材，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文学创作技巧。

晚上，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涅维罗夫时常在弗罗洛夫家聚会，这家人在柏林居留了一年就结交了许多当地名流。常有演员、文学家、旅行家和学者到被誉为有风趣的谈伴的叶丽扎维塔·巴甫洛芙娜·弗罗洛娃的沙龙来。在这里，可以遇见声誉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洪波尔特，因与歌德通信而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贝丁娜·阿尔尼姆，批评家法恩哈庚·封·恩捷，魏代尔……社会生活事件、政治和文学

新闻、杂志上的文章和上演的剧目，都是弗罗洛夫家来访者的小圈子里热烈交谈和争论的话题。

看来，那时屠格涅夫还年轻，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善于叙事、引人注目的本领没有表现出来。他说：“我在那里一声不响，听得目瞪口呆。”

在弗罗洛夫家的晚间聚会、看戏、听音乐会、在城郊骑马漫游、在街头散步，稍微冲淡了与祖国和亲人隔绝所勾起的愁绪。

假如他感到郁闷，便去听音乐、看戏，艺术对他的魅力非常大，使他回来时多半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音乐和戏剧成为他的迫切需要——他听格鲁克、莫扎特和贝里尼的歌剧，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四重奏，看莎士比亚、席勒的戏剧，于是艺术鼓舞人心的力量使他克制莫名的焦虑，舒解时而郁积在心头的忧伤。

有一回，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埋怨她不会强迫他小时候学音乐；倒不如惩罚和强迫他弹钢琴呢。那么他现在该是多么幸福啊……深秋时节，霜冻过后，解冻天气接踵而来，白雾弥漫，灰色的云絮仿佛若有所思地在空中缓缓地飘浮，他常常径直走出校门，沿着温杰尔登林登大街徜徉。街道两旁，富豪的宅第、糖果店、饭馆和商店栉比相连。天色尚未断黑，路灯就点燃起来了，于是项链般苍白的路灯在瓦灰色的雾霭中伸展向远方，替大街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冬天不知不觉地逼近了，在柏林，圣诞节的狂欢之夜，集市、舞会便接连开始了。

圣诞节前夕，广场上搭起了帐篷和临时售货亭，出售各种礼品：饼干、

亚·米·涅维罗夫（1810—1893）：俄国教育家和作家，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之一。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俄国地理学家。

格鲁克（1714—1837）：德国伟大的作曲家。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

贝里尼（1801—1835）：意大利作曲家。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伟大的作曲家。

玩具、小梳子、鼻烟壶、小画片、祈祷书和各种各样的烟斗。

街上，携带冰鞋的孩子们匆匆奔跑，到施普雷河去滑冰。小铃铛不停地叮当作响。皇宫广场上，士兵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操练步法。

观看摹仿俄国人滑雪橇是多么好玩啊。当时，一切俄国的东西在这里都很时髦。同女士们坐在雪橇里的男舞伴觉得，他们仿佛在三匹马拉的真正的俄国雪橇里象旋风似地飞驰。为了使幻想的色彩更加浓郁，有一个滑雪橇的人让一个粘着大胡子的化装的马车夫坐在车的前部，叫他跳“哥萨克舞”，使观看滑雪橇的妇女们见了乐不可支。“瞧！俄国人来了！多漂亮啊！真棒！”她们叫嚷道。

其实，这难道象狂风怒吼、银灰色的雪尘飞舞、雪橇的滑木在硬梆梆的雪地上吱吱轧轧作响的真正的俄罗斯冬天吗？不，在这里，你看不见身穿羊皮袄、唇髭冻成冰块、胡子蒙上一层霜的宽肩膀的马车夫呢……蓦地，忽而红场和那里的马车夫和马车、红场高台、克里姆林宫官墙和富丽堂皇的瓦西里·布拉仁内大教堂，忽而彼得堡，以及伊萨基大教堂金色的圆顶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忽而银装素裹的沉睡的故乡斯巴斯科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虽然屠格涅夫已经二十岁了，但他身上的孩子气还相当浓。

格拉诺夫斯基曾对熟人说，他在柏林去看望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时，时常看见这种情景：屠格涅夫津津有味地和波尔菲利在做游戏，轮流打翻对方纸糊的士兵。他还把纸头绑在小猫的尾巴上，欣赏小猫跳来跳去，拼命想抓住纸头，以此作乐。

这些游戏都是在研究哲学、历史和语言的间隙进行的。把书撇到一边——便娱乐起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后悔允许儿子这样年轻就到国外去。她责怪自己让波尔菲利和他一同出国，儿子竟把仆人变成同伴。他们一块儿白白耗费金钱，却得不到好处。根本不必为此出国。她受骗了……她受骗了！……“你干吗出国呢？我干吗让你出国呢？”

她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都责备儿子浪费钱财，胡乱花钱。他有时宁可规避回答，干脆不给她写信。她想出了一条毒计，回敬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默然的抗议——她告知儿子，假如他不及时给她写信，毫无过错的小农奴尼科拉什卡就将为此受到惩罚。她多么了解儿子的心啊……“我重复一遍老爷的专横命令。你满可以不写信，你可以干脆错过邮班，但你必须对波尔菲利说：‘这个邮班我不给妈妈写信了。’那时就由波尔菲利拿起纸和笔，简短而明了地给我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不用给我写别的，我就会三个邮班期间都放心了。我觉得，这够宽容大度的了。可是！倘若你们俩错过了那个邮班，我就一定鞭打尼科拉什卡，我可怜这个……有什么法子呢，可怜的孩子就会受……当心，不要迫得我去干这种不公道的东西。”一八三九年春，收到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来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读信时心都凉了——斯巴斯科耶的宅子烧毁、坍塌了。是啊！是啊！是啊！斯巴斯科耶烧光了……只有叔父住过的厢房保全下来。正如后来多次告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那样，这场火灾发生在五月一日夜间，约十点钟。马车夫阿列克谢伊的妻子，一个爱闹腾的、迷信的女人，打算用飞廉熏刚生牛犊

“滑雪橇”：原文系法语。

“瞧！俄国人来了！多漂亮啊！真棒！”：原文系法语。

的母牛，以便驱邪。熏母牛时，她没有发现，一块阴燃的煤掉到稻草里。灾祸便由此而起。她离开之后，牲口棚起火了。

火焰从那里窜出来，蔓延到院落里的其他房屋，随后火被风从其中一所房屋刮到地主宅邸的左翼，这时候那里正准备进晚餐。当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位在军中当军马采购员的长子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正在斯巴斯科耶逗留。他在往列别甸赶集途中顺便去探望母亲，打算当天夜里就继续赶路。

管餐室的侍仆安东·格利戈里耶维奇已经摆好了餐桌，可是几分钟后他提着篮子走进来，动手把银餐具——刀、叉、勺放回篮子。

“你干什么，安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惊异不已，问道，“你喝醉了？”

“没喝醉，太太，不能进餐啦……”

“为什么不能进餐呢？”

安东还没来得及回答太太，她就全部明白了——火星雨点般纷纷撒落到花园里，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我的天啊！咱们家着火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大叫一声。

此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跑了进来。

“妈妈，咱们家着火了！收拾钱、钻石和所有的贵重物品吧！……”

侍仆们急忙从起火的房厘里把圈椅、沙发、镜子、中国和塞佛尔瓷器、银器、画和历代祖先的画像搬出去。搬出了许多东西，但许多东西被损坏、打碎、抢走了……大火猛烈地燃烧至午夜，直到地主的宅子几乎荡然无存。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信中央求儿子尽快回来，告诉他，她已汇出两千纸卢布作路费，等待他圣彼得节前回到家里。“我的全体仆人的衣物都烧光了，连衬衫也没抢救出来……没有，根本没有一件衣服可以蔽体。要盖房子，要做衣服，大家的东西都烧得精光。在至今还冒烟的瓦砾场上……你的猎枪还完好。你的狗却发疯了……”

“妈妈”，原文系法语。

塞佛尔：法国城市，以出产精美的瓷器著称。

纸卢布：俄国一七六九年至一八四三年间发行的纸币。

圣彼得节：教堂节日，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第六章

在祖国——和莱蒙托夫相遇——赴意大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延误了从柏林动身的时间：夏末他才回到俄国。他在斯巴斯科那居留了将近三个月，暮秋时节告别了破败的家園，前往彼得堡，打算从那里再度出国。

在彼得堡，屠格涅夫有幸两次见到他所敬爱的诗人莱蒙托夫：一次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另一次是在贵族俱乐部的假面舞会上。

当时，莱蒙托夫已名声大震。人们把他看作是普希金的继承人。爱慕虚荣的上流社会力图把诗人拉到自己一边来，使他成为驯服、无害的人物。但莱蒙托夫深知这些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们的底细，对他们感到苦恼。

一八三九年初，诗人由高加索归来后，在给玛·亚·洛普欣娜的信中曾满怀辛辣的嘲讽写道，在首都，他成了时髦人物，人们争先恐后地互相争夺他。“这些被我在诗中痛骂的人们，挖空心思对我大肆阿谀奉承。最漂亮的女人们求我写诗，并且象夸耀胜利似的夸耀这些诗……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奉承我，到处都邀请我……希望自己的沙龙里名流荟萃的太太们都渴望我常到她们那儿去，因为我也是一匹雄狮啊；是的，你也不会怀疑的，我——你的米舍尔，是一个长着满头鬣髻的风华正茂的好小伙子……”

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位太太。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屠格涅夫在她的沙龙里首次见到了莱蒙托夫。

命运把诗人推进狭隘的社会环境里，使他感到窒息；只有敏锐地感觉到诗人内心悲剧的人，后来才能这样清晰而生动地描述莱蒙托夫那与众不同的外表，以及在交际场合中装出另一付模样来的谈吐举止。

这次相遇是匆促的。艺术大师独具的慧眼恰恰在于，他们能够把所见到的事物中最主要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里。

屠格涅夫的叙述极其简短，然而，一瞬间，莱蒙托夫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屠格涅夫写道：“我难得参加，也不习惯于参加上流社会的晚会，在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家的那一回，我躲在角落里，

只是从远处观察这位一举成名的诗人。他坐在一张矮凳上面，当时首都的美女之一、金发的穆一普伯爵夫人穿着黑色连衣裙，坐在他后面的沙发上……莱蒙托夫穿的是骠骑兵团的禁卫军制服；他没有摘下军刀和手套，弯着腰身，紧蹙眉头，闷闷不乐地望着伯爵夫人。她很少同他谈话，却时常转向同他并排坐着的、也是骠骑兵的舒伯爵。莱蒙托夫的外貌有一种不祥的、悲剧性的东西，他那黝黑的面孔和呆滞的乌黑的大眼睛，使人感到有一股阴沉而凶恶的力量、一种沉静的轻蔑和激情。他痛苦的目光同那几乎好象孩子

玛·亚·洛普欣娜：莱蒙托夫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时的一位女友。

雄狮：上流社会中最受人注意和赞美的男子。

米舍尔：莱蒙托夫的教名米哈伊尔的爱称。

即爱米丽雅·穆辛娜—普希金娜，莱蒙托夫曾写过一首戏诗献给她：伯爵夫人爱米丽雅，洁白得胜似百合花，她那匀称的纤腰，世界上休想见到，在她那双明眸中，映出意大利的苍穹。——原注。

指莱蒙托夫在骠骑兵团的同事安·巴·舒瓦洛夫（1811—1876）。

似的细嫩的噘嘴唇的表情出奇地不协调……”

屠格涅夫没有听见莱蒙托夫和对话者在交谈什么，他只看见，一个什么玩笑使他们快活起来，他们不知为什么笑了，莱蒙托夫也笑了，同时却露出一一种令人难堪的惊奇的神色，打量他们两个。此刻，他那呆滞的大眼睛射出忧郁的目光大概使他们感到不舒服。

这个小小的场面和这幅匆匆地用寥寥几笔勾画而成的莱蒙托夫的画像，再好不过地表现了诗人在上流社会中感到的寂寞和苦闷。莱蒙托夫在向洛普欣娜解释，他为什么这样乐意到“上流社会”中来时说：“这一新的体验对我是有裨益的，它为我提供了反对这个社会的武器：如果它要用诽谤来迫害我（这种事必将发生），我就要用报复手段了；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象在那里一样有这么多卑鄙和可笑的现象。”

一八四一年除夕，在贵族俱乐部的舞会上，屠格涅夫又遇见了诗人。

他看见，这里，“人们不让莱蒙托夫有一刻安静，不停地去打扰他，拉他去跳舞，假面具一个接一个更换着，而他却几乎一动不动地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喧嚣，一双阴沉的眼睛挨次地望着他们。”屠格涅夫写道，“我当时觉得，我在他脸上察觉到了诗兴勃发时的美好表情。也许，这些诗句正进入他的头脑中：

每当早已不再畏缩的纤手
带着城市女郎的放荡不羁的大胆
触到我冰冷的手的时候……

正好在这个假面舞会上，莱蒙托夫以挑衅的口吻粗鲁地同两位身居高位的女舞伴说话，其中一位舞伴穿着天蓝色的舞衣，另一位舞伴穿的是粉红色的。

这件事传到卞肯多尔夫的耳朵里，诗人的行为引起宪兵司令的强烈不满。

《祖国纪事》一月号上刊载了莱蒙托夫的诗歌《我常常被红红绿绿的一群人包围着》，他在这首诗里正好描写了这一新年之夜，因而使卞肯多尔夫对莱蒙托夫更为不满。这首诗的每一个字眼都流露出对上流社会的毫不掩饰的仇恨：

啊，我真搅扰他们的欢愉，
勇猛地向他们掷去
注满苦痛和愤恨的铁的诗句！

诗人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他的死期日益逼近……屠格涅夫读《祖国纪

见莱蒙托夫《我常常被红红绿绿的一群人包围着》一诗。

亚·赫·卞肯多尔夫（1783—1844）：尼古拉一世的军警头目，一八二六年起任宪兵司令与第三厅厅长。因为其中一位女舞伴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女儿。

《祖国纪事》：俄国的学术、文学和政治性月刊，一八二一年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创利，当时文学界一些优秀代表人物如别林斯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

见莱蒙托夫《我常常被红红绿绿的一群人包围着》一诗。

事》中的这首诗时，当然清楚地忆起了它诞生的情景。

新年舞会后两个星期，屠格涅夫开始打点行装，准备远行。这次，他的旅伴是彼·伊·克里弗佐夫。“我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结伴离开彼得堡，他和我一同去罗马，将在那儿逗留一个月，随后漫游意大利，并返回柏林完成学业。”克里弗佐夫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他是个有教养的、聪明的人，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连斯基和格廷根大学生。”

年青的屠格涅夫和连斯基确有相似之处。浪漫主义的激情，纷乱的感情，懦怯，好思——当时，他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些特点。

他和克里弗佐夫冒着正月的严寒，乘坐马车，在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平原上驰行，在旅途中度过了许多时日。

旅伴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远亲。这个自私的、在名利场上巧于心计的人任大使馆参赞，正在为自己刚刚受到朝廷的新的任命——“管理”在意大利的俄国艺术家而趾高气扬。

一路上，他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大谈自己在公务上的成绩，使他十分厌烦，所以屠格涅夫决定摆脱自己的旅伴，改变了预定的旅行计划，在维也纳耽搁了几天。

连斯基：普希金所著诗体长篇小说《叶弗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喻具有浪漫主义的狂热和脱离实际生活的人。

格廷根：德国城市。格廷根大学颇享盛名。在该大学学习的俄国留学生，回国后很有影响，形成政治自由派。格廷根大学生此处喻进步青年。

第七章

罗马——与斯坦凯维奇接 近——漫游意大利和瑞士

仲春时节，屠格涅夫抵达罗马。不久，斯坦凯维奇在佛罗伦萨度过冬天后也到这里来了。

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面孔瘦削，形容枯槁，干咳使他极度虚弱，妨碍他说话；他那塌陷的双颊已经显露出濒死的征兆……但他对周围的一切依然满怀兴趣，仍醉心于艺术、哲学、戏剧、文学。

这里，屠格涅夫和斯坦凯维奇几乎每天见面，并且交往比在柏林时密切得多。

这两位朋友在退职的骠骑兵上校霍弗林家里受到亲切的接待，当时他正和妻子、女儿在意大利旅行。霍弗林家里经常聚集着许多人。这里，除了斯坦凯维奇以外，屠格涅夫经常碰见他的朋友、未来的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教师叶弗列莫夫，画家、后来的绘画教授马尔科夫，和李斯特 过从甚密的波兰卓越的音乐家勃林金斯基。音乐家也患肺结核，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他知道自己病情，但在他聪慧、精力充沛的面庞上看不出丝毫沮丧。勃林金斯基那惊人的自制力对斯坦凯维奇大概有特殊的吸引力。屠格涅夫发现，他们彼此怀有极大的好感。德国画家伦特常到这里来，屠格涅夫曾打算向他学习绘画。屠格涅夫昔日对绘画的喜爱，在罗马重又强烈地表现出来。霍弗林一家曾对斯坦凯维奇讲，有一回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他们家里整个晚上都谈论绘画和自己对绘画的嗜好。斯坦凯维奇认为屠格涅夫有绘画才能，常常向他提供各种题材，并且拿他的漫画开心。他对那幅画着马尔科夫和霍弗林的长女亚历山德拉（朋友们给她起外号叫淑素）的婚礼的漫画嘲笑得特别厉害。在这幅画里，屠格涅夫画着自己手擎花环，并把它举过马尔科夫头顶。亚历山德拉·霍弗林娜刚满十六岁。这个可爱、活泼、机敏的姑娘在暗暗地热恋着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对她报之以友好的感情，但他的心已另有所属。他喜欢和她一起消磨时间，也许猜出了她的秘密，所以给她朗读普希金、席勒和歌德的诗，和她四手合弹钢琴。

马尔科夫和屠格涅夫对淑素也不无动于衷，并且兴高采烈地谈论她的美姿。画家描绘她，屠格涅夫写诗献给她：

明月照中天，
白云罩天顶；
波涛自沉吟，
幽光映海心。

我的心啊，是如此不宁，
你呀，你是我心海的月影。
只为你，我永怀欣幸，
只为你，我满腹辛酸。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

我心怆痛，
这无言的爱情给我严惩；
我心苦闷……但你呀，你却如幽月冷清。

许久以后，五十年代末，屠格涅夫创作《贵族之家》时又忆起了他爱恋亚历山德拉·霍弗林娜的那段时光。青年时期写下的诗篇又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再现了。潘辛对丽莎·卡利金娜说：“昨儿我写了一首新的抒情曲；歌词也是我写的，您可要我唱给您听听？”于是他一面用钢琴给自己伴奏，一面唱了三节抒情曲《明月照中天》。

朋友们赶紧利用在罗马逗留的时间，几乎每天作长时间的散步。他们参观罗马的名胜古迹，漫游近郊，逛小酒馆……确实，变化无常的天气往往影响安闲地观赏永恒之城的奇景。那年春天，罗马格外多雨，无意以和煦的阳光来愉悦游人。很少碰到空气明净澄澈、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这种空气，在罗马逗留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

虽然斯坦凯维奇作远距离散步和不停地参观博物馆、古代庙宇、画廊、宫殿颇感吃力，却绝不甘落后。屠格涅夫和斯坦凯维奇一同参观了几几乎所有的罗马名胜古迹——一望无际的科洛西姆大角斗场，集会场的废墟，卡皮托利丘，雄伟的圣彼得大教堂，有几百座大厅、钟楼和房舍、宏大的雕像和绘画博物馆的梵蒂冈宫，巴贝林尼画廊，著名的地下墓道，鲍哥兹别墅，斯西庇昂家族陵墓，并且聚精会神地聆听年长的朋友关于古代世界、哲学、诗歌、绘画和雕塑的议论。

无论他们在观赏拉斐尔的《福那利那像》或者他的学生所作的壁画，还是观赏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巨像或者谷特·勒尼的绘画，——斯坦凯维奇对每一个作品都作了精辟、深刻的评论。令人惊异的与其说是他的渊博学识和对观赏品的罕见的真知灼见，不如说是他对艺术作品的独特、精细的态度。他所发表的关于这些艺术作品的见解“充满崇高的真理、清新的美和青春的活力”。

他们有时去浏览近郊，那荒凉而优美的渺无人迹的罗马田野。这里，遍布古代庙宇和陵墓的遗址，处处都打上了难以言表的肃穆的印记，令人忆起古代的传说和孩提时代见过的绘有手持长拐杖的罗马牧人的图画。

他们还去罗马的远郊——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那里，展现出永恒之城的美丽景色。

、
均为《贵族之家》中的人物。

永恒之城：罗马的别名。

集会场：古罗马城市举行人民集会的场所。

卡皮托利亚：罗马城内七个山丘之一，丘上建有宫殿、博物馆、神庙。在古罗马，此丘曾起堡垒的作用。

地下墓道：地下窑洞和走廊。古罗马时代，受罗马皇帝迫害的基督教徒利用地道作祈祷仪式和埋葬场所。

拉斐尔（11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杰出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谷特·勒尼（1575—1642）：意大利十七世纪的重要画派波罗尼派的代表人物

许多年之后，在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幻影》里，重现了一八四一年的罗马之行留下的印象。

离开意大利的日期越来越近了。离开意大利之前，屠格涅夫到那不勒斯和托尔夸多·塔索的故乡索伦托逗留了几天。那不勒斯湾的美丽、蓝天的色调、四处洋溢着的欢愉，使他油然想起歌德关于这个城市的赞誉之词：“谁即使只到过一次那不勒斯，谁就不能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这次旅行，也给他的创作留下了痕迹。屠格涅夫在三年后创作的长诗《巴拉莎》中，描绘了那不勒斯的夏日：

大海闪耀着诱人的粼粼波光，
宅荡漾，呼吸，却不声不响。

在那那不勒斯港，屠格涅夫聚精会神地谛听老百姓的谈话，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商议事情，或者唱歌，即兴赋诗，借以行乐……在短篇小说《书简》中，屠格涅夫表达了他一八四一年春季的心境。他写道：“我记起在那那不勒斯居留的时光……五月才开始；我刚满二十岁……我孤身一人地漫游，渴望着幸福，那渴望既痛苦，又欢乐；那样欢乐，它本身竟恍若幸福……青春意味着什么啊！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驾着小舟在海湾里游荡。舟中只有我们两个人：舟子和我……多么美妙的夜晚、天空和星星啊！星光在波浪上颤动、闪烁……港口泊着一艘法国军舰。舰上燃着灯光，军舰通体朦胧地发着红光；灯火通明的窗口射出长长的红色光带，倒映在黑暗的海面上。舰长在举行舞会。欢愉的音乐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我的耳鼓；我特别记得，在低沉的小号声中夹杂着长笛的颤音；笛音宛如一只蝴蝶，绕着我们的游船翩翩飞舞。我叫舟子划到军舰跟前去；我们的船绕着军舰走了两周。窗口，闪烁着跳华尔兹舞的急速旋转的女人的身影……我又叫舟子离开那里，径直向黑暗的远处划去……我记得，音乐声久久地追逐我，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孤独的青春，对爱情的渴望，不露声色的渴望的烦恼——这一切说明了这位富于浪漫主义情绪的青年的纷乱心境。

短篇小说《三次会见》以无比优美的诗意描绘了意大利南国之夜的图景，它渲染上的正是这种热烈、深沉的忧郁。

无怪乎涅克拉索夫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对屠格涅夫说：“普希金之后所有的作家加在一起也不及你一个诗人。在新的诗人中，唯有你长于形式。”

在那那不勒斯旅行之后，屠格涅夫在两个星期内游览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利沃诺，比萨，热那亚；穿越了整个撒丁王国，并在马乔列湖作了逗留……他的钱快花光了——要省吃俭用才能到达柏林。因此他决定不作为外国旅行者，而作为普通的徒步者漫游瑞士。他谢绝了向导的效劳，购买了短衫、背囊、手杖和地图，徒步向山区出发。这种旅行方法的确不仅更有趣，而且更省钱。屠格涅夫后来对朋友们讲，那时住在旅馆楼上的英国人所花的膳费比他贵一倍。他在楼下吃同样的饭菜只需一个法郎或一个半法郎，而且给他开饭的时间比有钱的英国人早。

塔索（1544—1595）：意大利杰出的诗人。

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伟大的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领略了意大利柔和的线条和色调之后，那奇峰叠起的悬崖峭壁，那隘口和深不见底的壑谷，那冰川和浅绿色的湖泊，给人留下粗犷而奇伟的印象。

屠格涅夫已经不去回忆在罗马他是怎样在朋友们中间，和亲爱的淑素一起无忧无虑地度过春天的。如今，他心中涌起了拜伦式的烦恼，他甚至常常觉得，他会毫不犹豫地和生命诀别，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有时好象是无谓、可悲的。

在晚年的一篇散文诗中，屠格涅夫曾追忆自己年青时的这段时光，思考当时产生这种心境的原因，他写道：“侨居瑞士的那段时光，我还很年青，很自负，很孤单。我的生活是艰难而忧闷的。尽管我对什么都没有体验过，但已经会烦闷，气馁和发脾气了。世上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微不足道的、庸俗的，于是，象一些非常年轻的人所常有的那样，我曾暗自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想道：‘我要证明……我要报复……’但证明什么？报复什么？这个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的血管直象封住了的酒缸里的酒一样在沸腾……。我觉得，应当让这缸酒倒出来，该砸碎局促的酒缸了……拜伦是我的偶像，曼弗雷德 是我的英雄……”

对生活的肤浅认识 and 无知，受到伤害的傲慢，无法得到满足的自负，孤单，莽撞——这一切乃是“由于年龄造成的”不甚严重的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这篇颇有趣味的自传体小型文学作品指出了这一根源，略略揭示了二十二岁的青年的内心世界的真相。

再过几年，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会发生根本变化，有的东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东西则会获得新的色彩，他以后回顾自己那充满浪漫主义的古怪念头和行为的往昔时，也会感到惊奇的。

屠格涅夫的旅行即将结束。五月中旬，他到达歌德的故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旅费几乎全部耗尽，抵达法兰克福那天，剩余的钱恰好够他用到柏林。当时铁路还很少，游客只能搭乘公共马车。

屠格涅夫订了一个拖车的座位；可是公共马车要到夜里十点多钟才启程。时间还很充裕。他在旅馆里吃过午饭后，便在城里漫步闲游，参观了在鹿砦附近的歌德故居。他在美因河畔徘徊了许久，一面思考：许多俄国游客在外国旅行时其实很少了解这些地方；他们只看城市、房屋、人的面孔和衣着、山峦、田野、河流，但不深入接触他们其间漫游的人民。“他们仅仅知道城市、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名称而已，就象《死魂灵》中的囚犯仅仅满足于发现韦西耶冈斯克的监狱会比较干净，察烈沃科克沙伊斯克的监狱更干净一样，我们的游客也只能说，法兰克福比纽伦堡大，柏林则更大。”

他一面这样思索，一面顺着狭窄的、黑暗的、坑洼不平的鹅卵石马路漫步，傍晚五点多钟，不知不觉地来到法兰克福的一条最小的街道。后来，这条街道使他长久无法忘怀。

他走到一家糖果店，想喝一杯汽水，看见了老板娘的女儿，是一位绝色美人。她焦灼地请求他抢救她昏厥的弟弟。

和这位少女的邂逅相遇，他后来只有匆匆离开才得以扑灭他心中突然燃起的爱情火焰，三十年后成了中篇小说《春潮》的素材。

稍后，他对在国外的一位熟人讲述了这件事，又说，他在小说中将细节作了更动，并且改变了其先后次序，因为他不能，也不想“盲目地摹写……”

第八章

重赴柏林——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友谊

屠格涅夫抵达柏林后不久，从叶弗列莫夫那里获悉，斯坦凯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赴科摩湖途中，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诺维病逝。屠格涅夫得知这个噩耗后大为震惊，于七月四日写信给格拉诺夫斯基，信的开头写道：“我们蒙受了巨大的不幸，格拉诺夫斯基，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戴、信赖、并且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和希望的人。”

这时，米哈伊尔·巴枯宁由俄国取海路去德国。巴枯宁是斯坦凯维奇莫斯科小组的挚友，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去柏林大学听课，打算以后取得教授学衔。

诚然，巴枯宁所确定的目标和他的气质、爱好极不相符。他生性不宜从事安静的教授工作。赫尔岑在描述他的时候说道：“巴枯宁具备成为鼓动家、政论家、宣传家、党和派别的领袖、战士的条件。无论把他置于何处，甚至天涯海角，——他也会成为再浸礼派教徒、雅各宾党人……他也能吸引群众，并且同人民共命运。”

但是，巴枯宁一八四〇年赴柏林的唯一打算，是在大学里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

他还不知道斯坦凯维奇病故的凶讯，所以希望将和在莫斯科一样，在德国同这位朋友一起消磨时间，和他一起研究科学。

送巴枯宁由彼得堡到喀琅施塔得的赫尔岑后来写道：“轮船刚一驶出涅瓦河口，波罗的海上常见的飓风就夹着瓢泼的冷雨向我们袭来。船长只得下令掉转船头。这一返航，给我们俩留下了非常痛苦的印象。巴枯宁忧郁地望着，他打算长期离开的彼得堡河岸，以及布满打着破伞、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海关官员、警官和特务们的不祥身影的滨河街，重又渐渐地靠近我们……我把彼得堡阴森可怖的外貌指给巴枯宁看，并且引用了普希金壮丽的诗句，他在诗中谈到彼得堡时，象扔石头一样说出意思互不连贯的字眼：

豪华的城市，贫穷的城市，
端庄的风貌，抑郁的精神，
青青的天穹，惨淡的天穹，
还有花岗石、寒冷和苦闷。

“巴枯宁不想上岸，他宁愿在自己的舱位里等待轮船启程。

“我离开了他，但是仍然记得他那裹着黑雨衣、雨水无情地浇淋着的高大的身影；记得，当我踏上横在前面的街道时，他站在前甲板上，最后一次向我频频挥动帽子。”

巴枯宁抵达柏林之后几天，认识了屠格涅夫。他们象是在对他们俩都是

再浸礼派：德国、瑞士、荷兰宗教改革时斯的平民宗教派。主张成年时举行洗礼。再浸礼派否认教阶制度，要求财产公有，反对封建制度。再浸礼派在一五二五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雅各宾党人：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即左派共和党人，后来泛指过激党员，急进革命家。

珍贵的人的坟墓上握手相识，希望以此弥补他们可怕的损失，哪怕是部分也好。

他们的天性截然不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是那样温存、敦厚、谦和、喜爱深思，米哈伊尔·巴枯宁却是那样刚毅、容易冲动、坚韧、活动能力很强。

但是迥然相异的性格并不妨碍他们迅速接近，意气相投。

在这一友谊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巴枯宁，这不仅因为他意志比较坚强，目标比较坚定，还因为他比屠格涅夫几乎年长五岁。

他们都怀着年青人的热情，愿意无休止地彼此倾吐胸怀。

“我到了柏林，”一八四〇年秋，屠格涅夫写道，“专心研究科学——我的天空上最初几颗星辰放射出了光芒——我终于认识了你，巴枯宁。斯坦凯维奇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死神也不能把我们拆散。我未必能讲清楚，我有多少成绩应归功于你……我的感情还象波涛一样汹涌，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无法诉诸语言……”

屠格涅夫喜欢在书籍或者手稿上写下他由于什么原因认为对自己特别重要的日期。他对巴枯宁说：“你会不相信，能对你以‘你’相称，我是多么幸福。在我的《哲学大全》的扉页上写着：‘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斯坦凯维奇逝世。’，略下，写着：‘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我与巴枯宁相识。’从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中，我不想得到其他回忆。”

在当时的信札中，巴枯宁也经常称屠格涅夫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和兄弟。

在这方面，巴枯宁也表现了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周围的人，把他们吸引到最高利益中来的才能。屠格涅夫和他一起加倍努力地潜心研究哲学、历史和语言。

散步时，他们也不分离。一八四〇年到柏林来的安年科夫后来回忆道，抵达柏林后的头几天，一天晚上他在温杰尔登林登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碰见“两位相貌漂亮、面孔富于表情的高个子俄国人——当时形影不离的屠格涅夫和巴枯宁。”

他们在一个寓所里相邻而居，简直是从清晨学习到深夜，一学就是一连几天。休息时，他们坐在象棋盘前，专心致志地对弈，或者海阔天空地——话题有严肃的、可笑的、动人的、忧伤的——交谈。他们常常争论不休，竟没有发现时间是怎样飞逝的。屠格涅夫喜欢坐在炉旁，巴枯宁则喜欢坐在沙发上。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聚精会神地听巴枯宁讲他和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的会晤。

距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居住的寓所不远处，居住着来自意大利的巴枯宁的姐姐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斯坦凯维奇是在她的怀里去世的。

米哈伊尔·巴枯宁介绍屠格涅夫和姐姐认识，他的姐姐立即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深深倾慕。“他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崇高和富于温情啊。”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她喜爱音乐，自幼就钻研音乐，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假如她完全献身音乐，也许会轻而易举地成为技艺出众的演奏家。

屠格涅夫和巴枯宁曾不止一次同魏代尔教授、他的与歌德家交好的女友弗罗曼、评论家法恩哈庚·封·恩捷等人一起在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

家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四重奏。

朋友们在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里迎接一八四一年元旦。那天晚上，屠格涅夫把他精心抄录的他所特别喜欢的莱蒙托夫的诗赠给她。这些诗是：《纪念亚·伊·奥多耶夫斯基》，《一月一日》，《哥萨克摇篮歌》，《咏怀》，《捷列克河的礼物》，《不要相信自己》，《乌云》，《犹太曲》。

屠格涅夫和巴枯宁的友谊虽然日益增强，但看来仍然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巴枯宁的性格太自相矛盾和难以相处。要长期同他保持平等的关系是很困难的。起初，他深邃的智慧、优异的天赋、坚毅而动荡的心灵激情、对一种目标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令人折服，但随着他的性格的阴暗面——自私、专横、对周围的人的藐视——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朋友们不是和他疏远，就是断然同他决裂。

巴枯宁处事武断，习惯于粗暴地干涉他人的事情，好当领袖，好为人师，所以受到几乎所有和他接触的人的反对。大概只有他的最亲近的人——姐妹和弟弟们——对他的不良品质才视而不见。他们对哥哥的信赖是不可动摇的，并且心甘情愿而轻而易举地承受他那不容置疑的权威的支配。

巴枯宁在柏林居留时，和住在特维尔省巴枯宁家族世袭田庄普烈穆欣诺的亲人们频繁通信，在给弟妹们的信中，他经常提及屠格涅夫，说屠格涅夫是他所敬爱的人，他认为，同屠格涅夫的友谊是他一生中的一大乐事。

他也经常对屠格涅夫讲述自己的亲人。他的家庭是个非常和睦的大家庭——家里有六个兄弟和四个姐妹。姐妹们的私生活是不幸的。大姐柳波芙·亚历山德罗芙娜曾是斯坦凯维奇的未婚妻，后来斯坦凯维奇怀疑自己对她的感情的真挚。出现了令人痛苦的困境：他不想和未婚妻断绝关系，因为他明白，这会把善感、脆弱的少女置于死地，但又再也无法和她维持原有的关系。不幸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病倒了，医生坚持要他出国治疗。

斯坦凯维奇和未婚妻不辞而别，因为他明白，他见了她就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柳波芙·亚历山德罗芙娜猜出了他感情上的变化。由于和心上人分离，又意识到处境不明，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患了肺结核，疾病迅速导致不幸的结局。一八三八年八月，她病故了。斯坦凯维奇承认：“我失去的不是我所钟爱的，而是我也许会让她终生凄凉的姑娘。命运象通常那样，把一切都结束了：使过错化为乌有。对她的纪念使我那颗因处境尴尬而枯萎的心开朗起来。”

巴枯宁家中的另一悲剧，是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不幸婚姻。她嫁给特维尔省地主季雅科夫，但并不爱他，感情上和他格格不入。一八三八年，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携带三岁的儿子离开了丈夫，到国外去了。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柳波芙·亚历山德罗芙娜死后，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斯坦凯维奇才明白，他们彼此相爱。斯坦凯维奇病放前约一个月，他们事先函商之后，在意大利相会。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注定要博得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第三位姐妹——他最喜欢的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强烈爱慕。但这件事容后再叙。

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常常对屠格涅夫讲述和回忆自己的兄弟姐妹、知己和朋友，引起他对居住在普烈穆欣诺的人们的强烈兴趣。

他离开柏林返回俄国以前，早就要求巴枯宁一定把家信交给他。“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啊，哪怕只见一面！把我作为爱你的人提一下；我别无他求。”

一八四一年春，屠格涅夫修完了规定的大学课程，开始准备登程返回祖国时，巴枯宁写信告诉弟妹们，他的朋友离开柏林回国，不久将去普烈穆欣诺。“请你们把他作为朋友和兄弟接待，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我们来说既是朋友，又是兄弟，同时我深信，他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除你们、别叶尔家 和斯坦凯维奇之外，他是唯一和我真正意气相投的人。我称他为朋友，是绝不会无故地使用这个神圣的、并被出色地证实了的字眼的。在这里，他和我们同甘共苦……他对你们不可能是外人。他会向你们讲述许许多多关于我们的情况，有好的，有坏的，有悲伤的，有可笑的。况且他是叙事能手，——不象我那样——所以你们和他在一起会感到快活和亲切的。我知道，你们会喜欢他的。”

奥尔廖省地主别叶尔拥有田庄沙什金诺（距斯巴斯科耶不远），他的家庭和巴枯宁一家有多年的交好。
——原注。

第九章

爱情的篇章

屠格涅夫乘轮船到达彼得堡，没有在这里耽搁，就前往莫斯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正在那里等待他。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只得推迟到秋天才去普烈穆欣诺看望巴枯宁一家，因为几天之后他和母亲一道由莫斯科去斯巴斯科耶，要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

如果说，一八三九年，火灾造成的满目疮痍的情景冲淡了重归故里的欢乐，那么，屠格涅夫这次归来，目睹一八四〇年无雪的冬天带来的危害，连他的“老朋友”（用他的话来说）——他心爱的橡树和栎树也遭毁坏，则不胜忧伤。气候酷寒，到了十二月底还没下过一场雪；秋播作物都冻死了，许多美丽的橡树林也毁掉了。

在短篇小说《死》中，屠格涅夫描述了他走进稔熟的恰普雷金森林时产生的凄沧。昔日美丽、挺拔、高大的树木竟荡然无存！“干枯的大树高耸在‘取而代之，但远不如昔’的幼林上面”。

斯巴斯科耶的村民兴高采烈地迎接了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他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总是一桩喜事。“我们的天使、我们的庇护者来了。”仆人们说。

这里的人都记得，几年前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由彼得堡回来度寒假，听说母亲要卖掉年轻的女仆卢莎——全村针线活儿作得最好的姑娘，便坚决反对这件事情。他公开对母亲说，他认为买卖农奴是和人的尊严水火不容的野蛮行为，他是父业的合法继承者，因而决不容许这笔交易。同时，他帮助把卢莎藏到一个可靠的农民家里。

买主——一个邻村的女地主气急败坏，要求姆岑斯克县警察局长帮助她得到她所购买的“年轻的女农奴卢克里雅”。她向警察局长控告年青的地主煽动农民“造反”。

警察局长以前曾时常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作客，总是受到殷勤的款待，如今前来完成棘手的差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和警察局长谈了话，拒不“交出”卢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便建议警察局长去搜抢姑娘。但屠格涅夫站在隐藏卢克里雅的房子台阶上，持枪向警察局长和见证人迎去。

“我会开枪的！”他对手持粗棍的见证人斩钉截铁地说。

见证人退缩了。

警察局长无计可施，只得去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她见情况不妙，只挥了一下手，说她愿付违约金，了此一事。

斯巴斯科耶的人也记得，屠格涅夫曾坚决要求母亲发给波尔菲利·库德里亚绍夫农奴解放证。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一同去柏林之前，库德里亚绍夫在医士学校学习，在国外又在医学系听课。后来他当上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家庭医生，所以他认为，仅此一举，她就给他开了大恩。

“这都很好，”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说，“你把他身上的枷锁卸下嘛！我担保，只要你还健在，他不会撇开你的。你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奴隶，不是你可以随时随地任意乱扔的东西吧！”

卢克里雅：即卢莎，卢莎是卢克里雅的小称。

但他始终未能说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母亲死后，屠格涅夫才给库德里亚绍夫发了农奴解放证。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养女日托娃写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回来对我也大有好处。第一，他肯定，孩子们在夏天学习是有害的，所以功课全都停止了。不管我是否理应受到处罚，

他都公开袒护我，因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更经常和蔼地说‘你娇纵孩子。’”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时期的变化判若两人了：她不再无缘无故地对所有的人发火了，以往常见的喜怒无常和暴躁仿佛顿时消失了。

从前儿子在家时，对她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如今，由于长期离别，思子心切，她心里高兴，愿意事事顺从他，不知道怎样讨自己的万涅契卡喜欢才好。

她吩咐做他爱吃的食品，常常派人往厢房给他送他喜欢的醋果果酱，他把这些果酱分给老是在他窗下窜来窜去的农奴的孩子们吃。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常常把摆在幸免于火灾的石头回廊里的“食品橱”洗劫一空，却不受处罚。当然，他这样做与其说为了满足自己任性的要求，倒不如说想叫母亲的养女开开心。

食品橱的钥匙由老仆米哈伊尔·菲利波维奇保管，他原是屠格涅夫的父亲的特仆，如今衰老了，耳聋，甚至精神有点失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拉住瓦莲卡的手，装出一付凶相，扬声说道：“走，抢劫去！”——便带着她果决地大步向回廊走去。“把橱门打开！”他吩咐菲利波维奇，随后在食品橱里为所欲为，把省吃俭用的老头儿吓呆了。

“逗人发笑，而且老是淘气，是他的爱好。”邻村的地主弗·科隆塔耶夫的女儿讲述年青时期的屠格涅夫时说。

譬如，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喜欢用面部表情表现雷雨的各个阶段：开头是闪电的反光——微微地眨巴眼睛，接着嘴飞快地左、右抖动，最后是电闪……这时他的整个脸变得无法辨认，脸部肌肉迅速地乱动，叫旁观的人着实害怕起来。

这次归来，屠格涅夫对母亲非常温顺、体贴。他见母亲和他一起消磨时间感到愉快，因而有时甚至放弃打猎。有时，他在花园里亲自为母亲推车散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闹腿病，几乎不能独立行走）。

在斯巴斯科耶，日子一天天平平静静地过去。然而，牧歌式的宁静突然被破坏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得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爱上了一个在斯巴斯科耶当临时裁缝的普通姑娘。她原是莫斯科的小市民，名叫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

屠格涅夫对俏丽、朴实的姑娘一见钟情。

当你在《贵族之家》一书中读到拉弗列茨基的父母，读到伊凡·彼得罗维奇对一个年轻的女仆的爱情时，会不由地忆起屠格涅夫同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的恋爱故事。

“你娇纵孩子。”：原文系法语。

万涅契卡：伊凡的爱称。

瓦莲卡：即日托娃，日托娃系其姓，瓦莲卡系其名字瓦丽雅的爱称。

伊凡·彼得罗维奇：拉弗列茨基的教名和父称。

长篇小说中写道，伊凡·彼得罗维奇从京城回到草原上偏僻的乡村父母家里以后，因寂寞而感到非常苦闷。“他只对母亲倾吐情愫，时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她那低矮的屋子里，听着那善良的妇人的纯朴的冗谈，一面饱啖着母亲所藏的零食。恰好，在安娜·巴弗洛芙娜的婢女中间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有着明澈的、温存的眼睛和秀丽的容颜，名字叫玛拉尼雅，既聪明又贤淑。伊凡·彼得罗维奇一眼就看中了她；不久之后，就爱上她了：他爱她那胆怯的步态，她那娇羞的回答，她那温柔的声音，和她那文静的微笑。在他的眼里，她一天比一天显得更可爱了，而她，也用着整个的心灵，象只有俄罗斯少女所能眷恋的那样眷恋他——并且委身于他。在乡下地主的村邸里，没有什么秘密是能够长久保持的：不久之后，谁都知道小主人和玛拉尼雅中间的关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刚一听到伊凡·彼得罗维奇爱上了阿芙多季雅的传闻，就大发雷霆，下令立即把“犯了过失的女人”从斯巴斯科耶打发走。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只得到莫斯科去；那儿，她在普列奇斯捷诺克街租了一间屋子，靠做裁缝糊口。她离开时已经怀孕了，一八四二年春生了个女儿，名叫别拉盖雅，她出生后不久，便被从母亲那儿抱走，送到斯巴斯科耶。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后来嫁给小市民卡卢金。屠格涅夫终生每年付给她赡养费。她于一八七五年去世，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是从图拉省省长那儿得到通知的。

屠格涅夫在描写伊凡·彼得罗维奇·拉弗列茨基爱上的农村姑娘的命运时，完全有可能追忆了自己对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的爱恋。

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中把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恋人称为“娴静、善良的人儿，她象一根幼芽似的，不知道为什么被人从故土连根拔了起来，并立刻扔到烈日下曝晒；她枯萎了，毁灭了，任何痕迹不曾留下，也没有任何人哀悼她”。

屠格涅夫于一八四二年或一八四三年所写的《一朵小花》一诗，无疑充满了对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的回忆，诗中有类似的形象：

(当你只身客居异国，)
可曾在幽暗的树林里，
可曾在柔嫩的春草中，
找到质朴无华的花朵？

它孤独地在披露的草丛中开放，
苦苦地期待着你的来访……
正是为了你，它保存了
第一缕纯洁清雅的芬芳。

你折下脆弱的花枝，
面带淡淡的笑容，
把掐下的花朵儿
小心翼翼地插进钮孔。

大道上黄尘滚滚，

烈日当空，火伞高张，
遍地的庄稼火烧火燎，
你的花朵儿早已枯焦。

它吮吸着清晨的雨露，
在幽静的绿荫下成长。
如今却被灼热的尘土吞噬，
在正午的骄阳下香消花残。

这又怎样？何必怜悯！
要知道它来到世上，
正为了能有一瞬依偎在你的心旁。

九月中旬，屠格涅夫离开斯巴斯科耶去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出席文艺小组和沙龙。他常到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的季·尼·格拉诺夫斯基的朋友那里去；常到被贬黜的米·费·奥尔洛夫的寓所去，这位将军因接近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处永远住在莫斯科；他时常出入于亚·巴·叶拉金娜的沙龙，一八四一年，屠格涅夫在这里两次遇见尼·瓦·果戈理，结识了斯拉夫派分子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和阿·斯·霍米亚科夫。他结识的人明显增多。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到莫斯科后不久，探访了在普烈穆欣诺的巴枯宁一家。在这一访问期间，塔季雅娜·巴枯宁娜对屠格涅夫产生了强烈的爱慕。

他到来之前，她就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情况。米舍尔和瓦尔瓦拉从德国给她的来信中多次谈到屠格涅夫，在大学学习的弟弟阿列克谢伊和亚历山大已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相识，都异口同声地多次说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跃的、充满崇高精神的人！他讲故事讲得多么好啊！好象你与他一起目击和亲自经历过一切似的！……”

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二十六岁。她有教养，博学多才，有音乐天赋，精通好几门外语。哥哥培养了她对哲学、艺术、诗歌的兴趣。

米哈伊尔·巴枯宁还住在普烈穆欣诺的那些年头里，别林斯基曾来过这

斯拉夫派：斯拉夫派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断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因为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俄国的国家政权是同人民“融合无间”的。斯拉夫派在农民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主张农民要有人身自由，赞成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且大力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护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包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1808—1856），前者是俄国政论家，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后者是俄国民俗学家，民歌搜集家，斯拉夫派分子。

阿克萨科夫兄弟：包括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1817—1860）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1823—1886）。前者是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后者是俄国社会活动家，政论家，诗人，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社会活动家，作家，斯拉夫派著名的理论家之一。

米舍尔：巴枯宁的教名米哈伊尔的爱称。

里，十分赞赏他的几位妹妹，觉得她们是非常高尚的姑娘。他对每一位姑娘的命运都深表同情和兴趣。“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多么纯美的女性啊！这双象海洋一般深邃的碧眼；这出其不意的、闪电般的、仿佛无限长久的（用果戈理的话来说）目光；这热烈祈求上苍的痕迹仍未消失的温良的脸庞——不，这一切都不应该陈述，也不容许陈述”。

但随后别林斯基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巴枯宁的姐妹们精神世界的片面发展。他感到，她们缺乏直爽、纯朴、自然。她们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他们喜爱的作者是诺瓦里斯、让·保尔·李希特、贝丁娜·阿尔尼姆。由此形成了四十年代的一代贵族所具有的多愁善感、狂热、脱离现实等特点，并在这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精神面貌上，这些特点表现尤其明显。她生活于其中的想象中的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不相适应，使她感到痛苦，使她受到创伤。平庸和单调使她苦恼。她因正在为虚度的青春而忧伤。她想挣脱这些羁绊，但自己并不知道应当追求什么。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到来，使塔季雅娜·巴枯宁娜激动、振奋，使她心中朦胧的憧憬和希望苏醒。

他，诗人、哲学家、机敏的谈伴、她敬爱的哥哥的密友，一下子就使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倾慕。

她心中充溢强烈的兴奋——她看中的人、她的心灵思念的人终于来了！她满怀仰慕之情聆听屠格涅夫的讲述，他的每一句话都铭刻在她的心里。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共同的熟人、朋友和知己——谈斯坦凯维奇和叶弗列莫夫，谈自己和米舍尔在柏林的生活。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哲学、政治、诗歌、艺术，屠格涅夫都谈得很有见地、热烈和合情合理，显示出他那惊人的博学多识。

尽管屠格涅夫在普烈穆欣诺逗留的时间不长——总共才六天，他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却已和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亲近起来。当他确信她爱诗歌，并且对诗歌有很高的鉴赏力和深刻的理解之后，便兴致勃勃地向她朗读自己的诗和别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柯尔卓夫的诗。

“诗是神的语言。”有一次他说，“但是，诗意不仅仅在诗句里：诗意无所不在，诗意就在我们周围。您看这些树，您看这天穹——从任何地方，都散发着美和生活气息，而在有美和生活的地方，也就有诗意。”

和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第一次会见之后三年，屠格涅夫开始写短篇小说《书简》（后来中途搁笔，十年后才回过头来写它）。在这部小说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不久前所经历过的爱情生活。

小说的一些篇页好象出自屠格涅夫和巴枯宁娜的来往书信。

自从相识的最初几天起，屠格涅夫称娜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姐姐（他比她小三岁），随后称她为缪斯。她似乎觉得，在他的谈吐中和目光里看出了爱情。她后来才弄清，她搞错了。但她最初并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况且，看来连屠格涅夫本人也不完全弄清自己的感情。

他从普烈穆欣诺返回莫斯科后，第一次遇见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的弟弟

别林斯基当时曾单方面爱上了巴枯宁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原注。

诺瓦里斯（1772—1801）：德国诗人，反动浪漫主义者。

让·保尔·李希特（1763—1825）：德国作家。

阿列克谢伊时，就请求他写信告诉姐姐们，他——屠格涅夫在普烈穆欣诺度过的日子对他来说将是水志不忘的，因为这六天中的每一瞬间都有永恒的价值。

“就这样写吧……”屠格涅夫反复对阿列克谢伊·巴枯宁说。

不久，他还亲自写信给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表示希望最近在莫斯科见到她。他在信末写道：“我知道，您不喜欢人家对您提及您的健康。我只想说一点。您应当知道，您的生命可能对别人也具有崇高的、神圣的意义——可是，又有谁知道，这种事是否已经发生了呢？”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表示希望相会：“亲爱的，我亲爱的姐妹们，请到莫斯科来吧！”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他在寄往普烈穆欣诺的信中与道。

“请记住我，你们要知道（正如普希金所说的）：

你寂静、冷落的住所，
你别前悒郁的话音，
是我心中唯一的
宝藏、圣物和爱情。”

这些近乎表白爱情的做法，使塔季雅娜·巴枯宁娜失去了心灵的平静和自持。她对屠格涅夫的爱情越来越强烈。巴枯宁娜摈弃了陈规，首先表白了爱情，她在信中写道：“您想告诉谁就告诉谁吧：我爱您，我这样自卑自贱，竟自己向您献上我那未经追求的、您所不需要的爱情。让人们指摘我吧……”

她把屠格涅夫看作完美的典范，预言他有诗人的远大前程，因而仅仅恭顺地提出一个要求——铭记她忠诚的、始终不渝的爱情。

她这样异乎寻常地、热烈地表露自己的感情，使屠格涅夫感到窘迫，甚至使他为难。

“我从来未象爱您那样爱过一个女子，但是，即使对您，我也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深挚地爱着的。”屠格涅夫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后来也亲自对弟弟阿列克谢伊说，屠格涅夫对她并未产生过真诚的爱情，“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而产生的幻想”。

和巴枯宁娜的恋爱，给年青的屠格涅夫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创作的许多抒情诗（《悠悠的白云在飘荡》，《把手给我，咱们一同到田野去》，《涅瓦河》，《当我和你分手……》以及其它许多诗歌），描写了这次恋爱时的感受。

在长诗《安德烈》和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中，也能感觉到他和巴枯宁娜的恋爱的反映。如果说得更广些——不单考虑屠格涅夫和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的恋爱故事，而且考虑“普烈穆欣诺一家”的整个氛围，那么应该说，作家在普烈穆欣诺汲取了许多素材，在创作最初几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时，他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这些素材，有的略有变动，有的则加以综合。

把屠格涅夫献给巴枯宁娜的某些诗节同他写给她的书信的相应片断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这些诗象是他的抒情日记，并且有时和书信直接相呼应。

“把您的手给我。”屠格涅夫在一八四二年三月致巴枯宁娜的信中写道，“如若可能，忘掉痛苦的、半途而废的往昔吧。我的心头充满忧伤……”等等。

请看他写于一八四二年的诗歌的片断：

我思绪绵绵的心灵的朋友啊，
把手给我，咱们到田野去……
忘掉一切痛苦和不幸，
忘掉我们曾经分离。
请相信：我困窘，深受感动，
你总是在我的心头萦回。

“屠格涅夫，只要我一息尚存，您的书信决不会离开我。”塔季雅娜·巴枯宁娜在信中写道，“即使您向我要，我也不会交给您，因为我的痛苦和我的爱情所给予我的权利是世上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您的最后两封来信，自我收到之日起，一直放在我的胸前，感觉到这些信，久久地把这些信紧紧贴在胸前，是我唯一的欢乐……”

这是《涅瓦河》（一八四三年）一诗中的诗句：

她如今也许凭窗而坐……
心中不再感到苦痛；
她却象风中的残烛，
在燃烧、消溶……
或者她正热情地把双手
紧贴在饱经磨难的胸前，
奄奄一息地凝视着
你饱含哀伤的书简……

不仅在普烈穆欣诺，而且在莫斯科以及巴枯宁家的朋友 别那尔家的田庄里屠格涅夫同塔季雅娜·巴枯宁娜见过面。

一八四二年，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离开沙什金诺时，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昨晚我忧伤极了 我玩了很久，想得很多、很人。我和亚历山大 站在台阶上 夜是那样美好，雷雨过后，群星在空中微弱地闪烁；我仿佛觉得，星星径直照进我的心扉……这是我和您第一次在这里幽会后写的信 以往，我老是想推迟发信的时间，但现在我要让您知道我对您的一切想法。屠格涅夫，别了，我们该走了：打您附近经过，我感到愉快，别了，把您的手给我吧……”

屠格涅夫的《雷雨掠过大地》一诗和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的这封信相呼应。当屠格涅夫策马由斯巴斯科耶来到沙什金诺时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离开那里了。这首诗是他在忆起这一情景时写下的。

当他踏上门廊熟悉的台阶时，想起了她、他那“善良、美丽的姐姐”：《你在那里？你在做什么？……》

“亚历山大”：原文系法语。

雷雨低低地掠过大地，
我步入万籁俱寂的花园。
雨后的菩提树格外葱绿，
树梢恰似那柔曼的轻烟。

多美的夜呵！空气清新、明净，
苍穹中闪耀着金色的星星……
从树枝落下雨珠滴滴，
每一片树叶仿佛在低泣。

电光闪闪……从远处
传来低沉的雷鸣……
漆黑的池塘宛如钢板闪光，
我仁立在一所宅院的近旁。

在溶溶的月色中，
屋顶上神秘的黑影凝然不动……
这是稔熟的台阶，这是门扉，
可是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

执拗、盛怒的女神呵，
你可真变得温和可亲？
在家园忘却了忧虑，
爱恋的心恢复了平静？

或许受伤的心依然激动？
心潮在哪儿也无法平息？
依然满怀痛楚，住在
早已冷落、荒芜的故里？

屠格涅夫和塔季雅娜·巴枯宁娜恋爱的时间不长。一八四二年春，他们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屠格涅夫于三月下旬写给她的一封冗长而有些自相矛盾的信证实了这一点。伊凡·谢尔盖那维奇在这封信中写道，他们开始彼此格格不入，但同时又要巴枯宁娜相信，他对她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

塔季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认为，这封信满纸花言巧语，却掩盖不了他的虚情假意。

第十章

硕士学位考试

《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上虽然很少，却间或发表屠格涅夫的诗作。但倘若那时问他，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诗人还是未来的学者，他也许会难以立即回答这个问题。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些熟人没有料到，他署名屠·卢发表诗作。他们认为他决不是作家，而是由柏林到莫斯科来，为了在大学当教授的青年学者。

亚·巴·波隆斯基后来回忆：“我开始探访屠格涅夫，不是把他看作作家，而是看作（根据传闻）由柏林到莫斯科打算在大学充任哲学教授的青年学者。他大概根本不相信，哲学是被视为禁果的，并且被作为一种对我国社会有害的、完全多余的东西而受到摧残。”

他的其它熟人知道，他一面写诗，一面准备献身科学。阿·费特叙述他在莫斯科大学教授斯·彼·舍维廖夫家里第一次遇见屠格涅夫的情景时写道：“有一次，我在他的客厅里和他交谈时，仆人通报有人来访，我对来访者的名字未加注意。

“走进来一位高个子的青年，头发深褐色，留着当时流行的‘李斯特式’发型，身穿黑色常礼服，钮扣一直扣到领口……年青人向教授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他走后，斯捷潘·彼得罗维奇说：“屠格涅夫这个人真是奇怪：前几天他带来了长诗《巴拉莎》，今天却为在莫斯科大学当哲学教授而奔忙。”

屠格涅夫一心想当教授。他打算考取哲学硕士学位，但在尼古拉王朝统治下的俄国，这门科学并不受重视。君主制度的维护者将它视为自由思想和爱好自由的根源。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不久，莫斯科大学取消了哲学课，此后十五年间，这里的哲学教学始终没有恢复。

结果，在莫斯科没有人对屠格涅夫考核这门科目。可是他并没有半途而废，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底前往彼得堡，向彼得堡大学校长晋列特涅夫提出申请，要求准许参加考试。他的申请得到批准。

在彼得堡，屠格涅夫住在格拉弗胡同哥哥尼古拉的寓所里。哥哥给了他一间好房间，屋里有壁炉和三张伏尔泰式圈椅。这里的一切都适宜于学习。住宅里非常安静，街上没有一丁点儿喧哗。

在近卫军炮队服役的哥哥几乎不回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享受着寂静和安宁，潜心钻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的哲学论文。一

《现代人》杂志：普希金于一八三六年在彼得堡创办的进步刊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现代人》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它抨击农奴制度的维护者和自由主义者，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为先进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一八六六年，《现代人》被沙皇政府封闭。

屠·卢：屠格涅夫和卢多维诺夫（屠格涅夫的母亲的本姓）的缩写。

在一八四二年。原注。

他：舍维廖夫，原注。

斯捷潘·彼得罗维奇：舍维廖夫的教名和父称。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杰出的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个星期后他就要参加第一次考试（哲学方面）。

考试于四月八日开始。屠格涅夫出色地回答了考试委员会（由副系主任和四名教授组成）提出的问题：（一）哲学及其内容是什么。（二）真理是主观的。（三）试述柏拉图哲学的实质。（四）各个时期中研究哲学的方法。

屠格涅夫于五月一日参加下一次考试（拉丁语方面）。弗列伊达格教授要他朗读、翻译和解释蒂布尔的哀诗的片断。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柏林努力学习古代语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在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栏中写道：“翻译、解释均优”

希腊文学考得更好。考试委员会一致认为，屠格涅夫翻译、解释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片断“很出色”。

这是最后一次口试。五月五日开始笔试。

费舍尔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看来是最难、最复杂的，这个问题是：“阐明泛神论不断出现的内因，并将其在哲学史中列举的多种形式归纳为少量种类”。

屠格涅夫概述了这一哲学观点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综述以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开始，以“最新泛神论”结束，“最新泛神论”指的是费尔巴哈的学说。

屠格涅夫由于持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并受黑格尔学派右派的影响，否定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实质》一文的作用。

但稍后，他与别林斯基接近之后，重新考虑了自己的许多哲学观点。和伟大的民主主义批评家的交往，也有助于屠格涅夫正确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一八四七年，在涉及黑格尔的拥护者阵营中的斗争时，他强调指出，在他们中间唯有“费尔巴哈没有被遗忘，而是恰恰相反”。同年年底，

在致维阿尔多的信中，他称《基督教的实质》的作者为“最新的德国哲学家中间唯一的天才”。

现在他自己也已信服，“神”是人的思想的产物。

在下次笔试中，弗列伊达格教授对屠格涅夫提出关于希腊哲学和文学对罗马哲学和文学的影响的程度问题。在屠格涅夫用拉丁语写的答案中，贯穿着一个思想：希腊哲学和文学的水平比罗马哲学和文学的水平高得多。

他认为，其原因是罗马人轻视高尚的精神需要，同时忙于征战。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科学家，大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著名的代表物之一。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蒂布尔（公元前50—19年代）：罗马诗人。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的大历史学家。

泛神论：一种哲学观点，把神和自然界等同起来，认为自然界是神的体现。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许多在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往往是在泛神论的形式之下提出来的。现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利用泛神论来拥护宗教，“调和”科学与宗教。

伊奥尼学派：最早的古希腊唯物论学派，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见《柏林来鸿》一文，《现代人》杂志一八四七年第三期。原注。

格列费教授在笔试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历史可从诗人的作品中汲取什么翔实的材料？”屠格涅夫先用拉丁语回答，随后改用德语。他的主要观点归结为：不仔细研究可赖以认识历史的史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在民间史诗中，有可资研究者利用的极其丰富的材料。因而凡是愿意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历史学家，都不能不研究反映“人民的全部生活、风尚、宗教、娱乐、制度及其全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史诗。

在屠格涅夫的答案中，有一段个人的插话。在这段插话里，他向格列费教授解释，虽然他对古代语，特别是希腊语感兴趣，但没有机会成为语文学家，所以他参加了哲学方面主要科目的考试。

可是屠格涅夫的这些努力完全落空了：当局不准在莫斯科大学恢复哲学课。这一来，写硕士学位论文并进行答辩已毫无实际意义。屠格涅夫的学位晋升就此告吹。

一八四二年六月，他从彼得堡回到莫斯科，又由莫斯科去斯巴斯科耶，不过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因为下月底他启程前往德国，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哪里迫不急待地等着他。巴枯宁的一生到了关键时刻。他作出永远不回俄国的最终决定。他以前就有过这个想法，而且肯定尚在大学时代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过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从德国回来后，看来把友好地交谈这一话题的内容转告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弟妹们。

在塔季雅娜·巴枯宁娜致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可以感觉到那些在柏林生活期间支配她的哥哥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情绪的直接反应。“赶快到国外去吧，”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给屠格涅夫写信道，“俄国的气氛对您是有害的。您需要有米沙和您在一起。这里没有生气，这里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这里有可怕的奴隶制度。这个您自己以前说过，而且，为了在这些死人中仍然作个活人，为了在奴隶制度下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自由，需有非常巨大的力量……”屠格涅夫不在德国时，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思想发生了骤变，确信德国的形而上学根本不是他所寻求的学说。他在形而上学中找到的是不是他所曾期待的生机，而是“死亡和苦闷”。他失去了往时对抽象的哲学的兴趣，并且停止研究它。他在柏林大学已无事可做，没有必要听魏代尔讲黑格尔学说了。巴枯宁由柏林移居德累斯顿后，与德国革命者接近，并且专心致力于政治斗争。

现在，巴枯宁以友谊赋予他的权利邀屠格涅夫到德国去，和他商讨自己的决定，安排陷于极度混乱状况的经济问题。他四处借债，不考虑何时能偿清债务。有时他的境况是那样困难，竟好象必然会因无法还债而坐牢。

巴枯宁非常希望屠格涅夫会为他还清大部分债务，使他摆脱困境。假如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不依赖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些希望也许能够实现。她多次告诫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不要胡乱花钱，经常对他提起父亲，用她的话来说，他“不精打细算……但他会象我那样追究你的，说不定比我更厉害，要你讲明花销……他不爱娇纵孩子，也嘱咐我不要这样做。我所求的，是你象关于音乐那样，对我说：‘妈妈，你打我，强迫我弹钢琴该有多好……’”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不愿意让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教名和父称。

米沙：巴枯宁的教名米哈伊尔的小称。

“妈妈”：原文系法语。

在经济上依赖母亲。也许是在他们面前觉得难为情的思想，或许是他年青时所特有的无忧无虑的性格，有时驱使他许诺那些他并不总是能够办到的事情。

这一回也是这样。他和巴枯宁商议他的经济问题时，答应偿还朋友的一部分债务，但是他未能完全、并且在承诺的期限内办到，结果后来招致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

一八四二年底，屠格涅夫由德国回俄国去时，带了巴枯宁给亲人和朋友们的书信、他的画像、委托办理种种事情的单子、

许多份《德国科学、艺术年鉴》，这些杂志上刊载了巴枯宁署笔名求尔·艾利扎尔的《德国的反动》一文。这篇文章当时给人们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赫尔岑把它称之为“艺术性极好的”、“出色的”文章。

巴枯宁劝屠格涅夫认真再检查一遍信件、物品、文稿，并且在越过国境时把违禁品藏好。

“我预感到，”他说，“这次对旅客的检查会特别严。屠格涅夫，要知道，你是相信预感的……”

巴枯宁在给弟弟尼古拉的信中写道：“屠格涅夫即将回国，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并且由于屠格涅夫将向你解释的原因，我决定永远不回俄国。你不要以为，这个决定是轻率的；

这个决定是同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真谛相联系的。

“我命该如此，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违抗这一命运。也不要以为，我决心这样做——永远离开祖国，离开你们，离开我至今所仅爱的一切是轻而易举的。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到，我和俄罗斯，和你们所有的人血肉相连，以后在异国他乡可能等待我的孤独、忧伤、艰难的未来，也从来没有这样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脑际……我对当前的俄国没有用处，对俄国来说，我是个变坏了的人，但在这里我却感到，我还想活下去，在这里我能有所作为，对于欧洲，我身上还有许多朝气和精力。”

临别之际，巴枯宁对屠格涅夫说：

“朋友，永别了！我们会好久见不着面的。我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道路。不要忘记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不会再喜欢和信赖你。当你一旦忘记我，我会以为，你已经死了。真好，我们再次见了面，我们互相了解了——同时我深信：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相见，一定会握手言欢的。”

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初，屠格涅夫由国外回到彼得堡。

德国之行结束了他一生的整整一个时期。屠格涅夫当哲学教授的幻想和计划彻底破灭之后，他以加倍的精力献身于文学创作。一八四三年初，他就告诉阿列克谢伊·巴枯宁，他已写了许多作品。“您也许不久就会听到我的名声的”。

第十一章

第一部长诗问世 和别林斯基相识 供职

确实，一八四三年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标志着文学生涯的开端 这一年，他的长诗《巴拉莎》问世。

虽然长诗完成之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还年轻，但在创作长诗之前，他以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已将近十年了。无论评论文章，还是短诗、小型的长诗、剧本和短篇小说，他都曾试写过。

屠格涅夫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后来把许多习作销毁了。一些短诗发表了，但后来作者断然认为这些作品也不符合要求。已臻成熟的屠格涅夫总是认为自己的诗作是极为平庸的，因而不允许把这些作品收入全集。

他在致谢·阿·文格罗夫的信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短诗感到极度的、几乎是生理上的厌恶，我不仅没有一本自己的长诗，而且为了使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世上存在，甘愿付出巨大的代价。”

对自己过于苛求的艺术大师的这一严格评价显然是不公平的。姑且撇开别林斯基大为赞赏的那些长诗不谈，就是屠格涅夫的一些短诗也可列入真正的成功之作。

譬如，上面举出的短诗《一朵小花》、《雷雨掠过大地》，就是这样的作品。还可以再举出几首出色的诗作：《途中》（《下雾的早晨，苍茫的早晨……》），《叙事诗》《孑然一身，又是孑然一身……》等。

但注定揭开俄罗斯文学史册中新篇章的，毕竟不是屠格涅夫的诗歌。众所周知，揭开这一篇章的是四十年代末期的《猎人笔记》。

然而，诗歌创作使年青的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诗歌创作中，他获得驾驭语言的经验，学习语言的音乐感、形象化、词藻美、表现力和简炼性。

诗歌创作是作家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所经历的阶段。

在屠格涅夫的早期诗作中，尚可感觉到对浪漫主义经典作品的模仿；但在他自一八四三年开始创作的长诗中，模仿则几乎绝迹。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诗的副标题 诗体短篇小说 是有代表性的。抒情诗的题材 爱情，大自然，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 对屠格涅夫来说，已经开始不够了。他要塑造性格，描绘社会环境和生活细节，构思情节。

无怪乎别林斯基将他的一些长诗称之为生理特写，并把它们列为果戈理学派的散文作品。

在这样的特写中，对生活的详细情况的现实主义描写起着主要的作用。屠格涅夫的才能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屠格涅夫几乎是在长诗《巴拉莎》问世时和别林斯基相识的，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他们是在一八四三年初在别林斯基的寓所相识的，当时别林斯基住在阿尼奇科夫桥附近洛巴金家里。他们共同的熟人，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巴枯宁娜的朋友答应屠格涅夫的要求，把他领到别林斯基家里去。

和伟大的批评家第一次见面的详细情形深深地刻在屠格涅夫的脑海里，

谢·阿·文格罗夫（1855—1920）：俄国批评家，文学史家和书志学家。

甚至在许多年之后，他在关于别林斯基的回忆录中还能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详情细节，仿佛他们是在昨天才见面似的。

“我所看见的人个子不大，”屠格涅夫写道，“有点驼背，相貌不端正，但仪表不凡，颇具特色，一缕金发披在前额上，带着腼腆和孤独的人常有的严肃、不安的神情。他一说话就咳嗽，邀我们就座，并且自己匆匆坐到沙发上，眼睛在地板上溜来溜去，秀丽的小手摆弄着鼻烟壶。他身穿旧的、然而整洁的厚绒常礼服，在他的房间里也显露出他喜爱整洁的痕迹。谈话开始了。起初别林斯基说得很多、很快，但语气平淡，面无表情……但他渐渐地活跃起来，抬起了眼睛，于是整个面孔容光焕发。原先严肃的、近乎病态的神情换成诚恳、兴奋、喜悦的了；嘴角漾出招人喜欢的笑容，浅蓝色的眸子里闪烁着金色的小火花，这时我才发现，这双眼睛是多么美丽……”别林斯基从沙发上立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步，一面嗅着鼻烟，时而停住脚步，对自己的和别人的每一句稍微俏皮的话哈哈大笑。应该说，他语不惊人：他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个不甚奥妙的玩笑；但当他心情爽快时……简直无法想象，有人比他更善于辞令（按这个词在俄语中的褒义而言）了：他的话里既没有所谓的华丽词藻，也没有刻意追求的效果，既没有矫揉造作的咬文嚼字，也不因自己的词句而自鸣得意，虽然这些词句往往被说话者本人和听众都当成‘金科玉律’；这是智慧的不可抑制的流露，它是如此迅急、激昂，但又如此清醒、正确，它是他那颗纯洁而热情的心灵喷发出来的火焰，而支配他的心灵的，是对真理和美的敏锐、准确的嗅觉。这种嗅觉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根据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来信，别林斯基以前对这位青年诗人已有几分了解，现在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

无疑，别林斯基很想从屠格涅夫那里详细了解巴枯宁的打算和他的《德国的反动》一文。

巴枯宁很可能就是要求屠格涅夫把在国外成立俄国革命侨民区的方案告诉别林斯基的。巴枯宁很想吸引“激烈的维萨里昂”参加公开的革命斗争。过不多时，巴枯宁又通过阿芙多季雅·巴纳耶娃重提这个话题。

“有许多最迫切的全人类的问题在他心里翻腾着，”一八四四年，巴枯宁在巴黎对阿芙多季雅·雅可夫列芙娜·巴纳耶娃谈到别林斯基时说，“他会被内心的烈火过早地烧成灰烬，他常常不得不扑灭它……当一个人的头脑被老虎钳了紧夹着，当警察时时刻刻可能出现在他跟前，抓住他的衣领，把他关进警察局，这时候，他还能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吗？！……”

巴枯宁和巴纳耶娃分手时，请求她转告别林斯基，希望他迁居国外。

但别林斯基听罢阿芙多季雅·雅可夫列芙娜的话后说，他无法采纳这个计划；离开祖国，离开故土，离开他全力以赴的文学活动，他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我也看得很清楚，”他补充说，“我不可能象我企求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益处，可是少做总比不做好啊！……因为这等于为了要在意大利培植一片桦树林，从这里把一些大树连根刨去，栽在肥沃的土地上。那么，结果会怎样呢？所有的树都会枯萎！他那个叫俄国人移居巴黎的幻想也是如此。巴枯宁太醉心于抽想的幻想了。他以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会象童话中说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教名。“激烈的维萨里昂”是别林斯基上莫斯科大学时的外号。

阿·雅·巴纳耶娃（1819—1893），俄国女作家。

的：傻小子凡卡钻进一只大桶，从那里一出来就成了个美男子，全身披金带玉，当上皇帝了！”

当谈到巴枯宁的计划时，别林斯基大概也用类似的话回答了屠格涅夫。以下屠格涅夫的回忆片断可能与这次谈话有关：“如今，当我回忆起我们的谈话时，最使我赞叹不已的是他那深邃的合理的看法，他本人当时对此还有些模糊不清，因此也就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的重要性，虽然他常常干些冒失的事，但这也不允许他逃离当时唯一有益的事业，即最广义的文学批评事业……”

别林斯基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在给鲍特金的信中对他赞赏不已：

“这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总的说来是个好人。同他谈话和辩论，使我得以倾吐积愆……我真高兴遇上这样的人，他的独特见解一旦和你的见解发生冲突，就迸发出火花来……他了解罗斯。在他的一切见解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使别林斯基格外感兴趣，还因为他非常了解最新的哲学思潮。当时，别林斯基正如饥似渴地探索能够指出变革俄国农奴制现实的途径和方法的正确的革命理论，在他的精神需要中，哲学居首要地位。

在讲到四十年代初期别林斯基同他的彼得堡的朋友和熟人的相互关系时，伊·伊·巴纳耶夫指出，别林斯基在这个圈

子里时常感到苦闷，原因很简单，在当时和他交往的文学家

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理论问题上和他进行较量，而对禀性热烈、朝气蓬勃的别林斯基来说，同势均力敌的战士交流思想、辩论和较量，乃是一种需要”。

因而，别林斯基爱给莫斯科朋友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写长信，谈论当时强烈激动他的深奥而重要的问题。

“屠格涅夫的出现使他活跃起来。”巴纳耶夫证实说，“在他身上，别林斯基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强烈地眷恋他。”

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最初几次见面时，他们的友谊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八四三年四月，屠格涅夫由彼得堡去斯巴斯科耶居住时，别林斯基写信给他：“亲爱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再见吧！非常遗憾，我未能最后一次和您交谈。您的谈话总是使我得以倾吐积愆，一段时间不能和您交谈，我便更深切地感到谈话的宝贵。”

尔后，别林斯基又曾多次对朋友们说，和屠格涅夫的会晤，使他精神振奋，并对他的健康有益。“我非常喜欢并且尊重我的彼得堡的朋友们，但他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左右我的能力。我最推崇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不在时，我感到孤单，凄凉”。

瓦·波·鲍特金（1811—1869）：俄国批评家和政治家，曾一度与别林斯基接近。后来投奔反动阵营，六十年代极力鼓吹“纯”艺术论。

罗斯：俄罗斯的古称。

伊·伊·巴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和记者。

指巴·瓦·安年科夫，瓦·彼·鲍特金，家·德·卡维林，米·尼·卡特科夫等人。其中米·尼·卡特科夫是个反动政治家，曾与俄国文学及社会运动中的进步派进行激烈斗争。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卡特科夫的名字成了保皇党反动派的象征。

为了在佩罗夫斯基管辖的内务办公厅担任官职之前接受母亲的祝福，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启程前往斯巴斯科耶。

此外，他想用自己的第一部大型作品使母亲高兴，所以带去了一本刚刚问世的长诗《巴拉莎》。

屠格涅夫打算在那里供职的办公厅主任并非别人，乃是著名作家和《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的编纂者弗拉季米尔·达里。他劝屠格涅夫担任办公厅特派员。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早就希望儿子担任官职，因为那时贵族规避官职可能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一种表现。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柏林逗留时，她就写信问他：“伊凡，你是否打算担任官职？在哪里担任官职？”

现在，她多年的理想实现了。诚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官运不佳。但因他的上司是比他年长的文学界同行，公务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裨益。

屠格涅夫从彼得堡去斯巴斯科耶那天，上别林斯基家里去了一趟，送去一册长诗《巴拉莎》。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光叫给他开门的仆人把书交给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马上就离开了。

他在乡下待了两个月。在这期间，《祖国纪事》杂志五月号上刊载了别林斯基评论这部长诗的长篇文章。

批评家这样热烈赞扬通常署名“屠·卢·”的《巴拉莎》的作者，竟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读了评论文章之后与其说感到喜悦，不如说感到窘迫。

赞扬使屠格涅夫这样窘迫，以致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在莫斯科遇见他，向他祝贺《巴拉莎》获得成功的时候，他连忙一口咬定那不是他的作品，他不是这部长诗的作者。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坦白地告诉儿子，她第一次读长诗时无动于衷，但以后越读越喜欢它。“我看出你有才能。”她写信给儿子说，“我不是开玩笑，——诗写得很好。《祖国纪事》里的评价是公允的……我为我的儿子有这样新颖的思想而感到骄傲……现在给我端来草莓。我们乡下人爱讲实际。这一来，你的《巴拉莎》、你的小说、你的长诗……便散发着草莓的香味长诗的出版和别林斯基对它的好评——年青的屠格涅夫的命运中的两件大事——奠定了他漫长的达四十年之久的创作通路的开端。

屠格涅夫的长诗是在俄国诗坛失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柯尔卓夫，接连遭到严重损失之后，于一八四三年发表的。

别林斯基仍然坚信，俄国诗坛没有死亡，而“不过是象往常一样沉睡了，它有时会苏醒，并向我们讲述美梦——直到罗斯出现新的诗人……“彼得堡最近几天出版的以‘诗体小说’为朴素的题名的一本不大的书，正是暂时苏醒的俄国诗坛的美梦之一，俄国诗坛久已不曾做过这样的美梦了”。

别林斯基认为，“屠格涅夫的缪斯并不预示着一个新的艺术时代和一个新的艺术学派。

她那不同凡俗的音容笑貌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的教名和父称。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诸女神，是各种艺术和科学的保护者。缪斯的领袖和保护者是阿波罗。

使世界刹那之间齐声叫好。

“屠格涅夫的作品与当代俄国其他诗人的作品截然不同，在莱蒙托夫影响下写就的诗句既坚实、有力、质朴，又瑰丽、诗意葱茏，这些并不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唯一优点：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打上现实和当代生活的烙印的思想”。

批评家坦白地说，当他着手读《巴拉莎》时，抱有很大的成见，以为在长诗中将读到的要么是感伤主义的爱情小说，要么是描写风土人情的讽刺劣诗。“可是我们读到的长诗却不仅写得诗意盎然，而且充满深刻的思想，内容完整，富于幽默和讽刺，这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啊”。

别林斯基指出，《巴拉莎》不甚复杂的平凡的情节中，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和馥郁、清新的诗意，文中难以言传”。

伟大批评家的细心的目光看出了屠格涅夫的才华的特点，那时要看清这一点并非易事。这一特点乃是艺术家和时代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联系有助于他似乎直觉地预料到那些注定将引起他的同时代人瞩目的问题。

别林斯基说，《巴拉莎》作者的诗“显示了凡非的诗才，而准确的观察力，从俄国生活内部撷取来的深刻的思想，含有丰富感情的、优美而巧妙的讽刺，——这一切除了表明作者的创作天才之外，还表明他是我们时代的产儿，他的胸中怀着这个时代的一切悲哀和疑问”。

就体裁而论，屠格涅夫的长诗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努林伯爵》、《在科洛姆纳的小屋》、《萨什卡》、《金库主任太太》这一类型的诗体“诙谐小说”的传统。长诗中大量运用作者对读者随心所欲地发表的评论、抒情插笔、趁机进行的讽刺性抨击等等。但在轻松的半诙谐半抒情的诗句下面，蕴藏着严肃而深刻的疑问。

在生动地描绘外省地主生活的同时，诗人表明，这些人的空虚和庸俗如何扼杀青年一代的美好激情和志向。

作者引用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们倒也在憎，我们倒也偶尔在爱”作为这部长诗的题词。

在他的巴拉莎身上，已经闪露出后来鲜明地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中的特点。

啊，我的小姐……默默地站在
高大的菩提树的浓荫里；
树枝低垂在您的头上，
您叹息，心中充满苦痛和忧伤。
我望着您：您洋溢着草原的美，
您是我们罗斯的女儿……
您美丽，宛如雷雨前的黄昏，
宛如今人苦闷的五月之夜……

《努林伯爵》、《科洛姆纳的小屋》：均为普希金的长诗。

《萨什卡》、《金库主任太太》：均为莱蒙托夫的长诗。

引自《咏怀》一诗。

巴拉莎长诗《巴拉莎》中的女主人公。

诗人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

悲戚而狂热的情欲，
上帝所钟爱的灵魂的保证。

但巴拉莎丰富、善良的禀赋，在偶然出嫁后的庸俗的幸福生活中枯萎、消溶了。他爱上的人原来是个庸碌之辈。

我怜悯她……也许
命运会指引她走另一条道路……
但命运铁面无情，一如既往，
因而对她也同样严酷。

同年夏天，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回到彼得堡之后，进内务部办公厅供职，任十级文官。但屠格涅夫对公务毫无兴趣，工作马马虎虎，引起弗拉季米尔·达里的不满。他不准时上班，在这里主要是读乔治·桑的小说、写诗、讲笑话。

他虽然担任公职，一八四三年几乎整个夏天都在巴甫洛夫斯克逗留，有时可以看见他“在音乐会和车站上”，和轻松喜剧的作者、小说家弗拉季米尔·索洛古勃在一起。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都戴着单眼镜，因而在人丛中格外显眼。

屠格涅夫告知巴威尔·巴枯宁，“为了过更加孤独的生活”，他住在巴甫洛夫斯克，又补充说：“我成天散步，喝克列伊茨勃隆，戴绿色的硬帽檐，身体尚佳。”

他为什么能既这样消遣，又担任官职呢？这个到现在还是个谜。

在弗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达里手下供职期间（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屠格涅夫同这位上司的交往，对他的创作不可能不留下影响。根据一些间接的迹象判断，与达里的交谈以及对他的作品的研究使屠格涅夫受到启发：善于观察的作家能够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多么丰富的营养。同达里的结交，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屠格涅夫选择新的体裁，着手写小说。

无怪乎屠格涅夫在一八四五年写的《论哥萨克卢甘斯基的中、短篇小说和民间故事》一文中，高度赞许这位作家的创作方法和他的才能的特点。

弗拉季米尔·达里对凡是和人民的生活、语言、民间故事、谚语有关的一切都深感兴趣。“他利用职权，”格里戈罗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向俄国全体地方官员发出通告，责成他们搜集并向他提供有关各地的风俗习惯、民歌、俗语等材料。”

这样一来，屠格涅夫就目睹了达里搜集材料的部分情况，而且达里大概不可能不向他介绍他多年来积累的这些文苑中的瑰宝，如同他在四十年代向德·格里戈罗维奇作介绍那样。格里戈罗维奇曾经讲过，达里很乐意让他抄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女作家，浪漫主义中民主派的代表。

克列伊茨勃隆：酒名。

哥萨克卢甘斯基：弗·达里的笔名。——原注。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

录他认为有趣的一切材料。

第十二章

和别林斯基的友谊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的友谊持续了五年左右，因一八四八年伟大的批评家逝世而猝然中断。由于和他过从甚密，屠格涅夫进入了彼得堡文学家的圈子，成为《祖国纪事》杂志，随后又于一八四七年成为经过改组的《现代人》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之一。

和别林斯基相识之前，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或多或少带有偶然的和几分对本行不娴熟的性质。别林斯基使他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作家的作品。

阿芙多季雅·巴纳耶娃在回忆录中叙述，一八四三年，有一次别林斯基得知屠格涅夫认为领取稿费是有损尊严的行为，宁愿把稿酬赠给杂志的编辑时，把屠格涅夫“数落了一顿”。

“这么说来，您认为，承认为您的脑力劳动付给您稿费是耻辱吗？屠格涅夫，我为您感到羞耻和痛心！”别林斯基责备他说。

以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作家的劳动就再也没有发表这种怪诞的看法了。

在家里，使他养成轻视文学工作的态度。

“作家……作家是什么玩意儿？作家和抄写员是一类货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作家和抄写员都是为了捞钱而浪费纸张……贵族应该供职，并且靠公务，而不是靠糟蹋纸张获致功名利禄。”

对屠格涅夫来说，四十年代是以和别林斯基的友谊为标志的，在这些年代里，他成为文学家，甚至记者，而以前他不过是个诗人。

自一八四三年起，《祖国纪事》杂志刊载屠格涅夫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以别林斯基的文学同盟者的姿态出现。

在杂志社的工作使屠格涅夫习惯于把作家的创作看作脑力劳动，看作一门职业，而且后来他竭力使青年作家树立这样的观点：“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愿意作为其它任何一种人死去……”一八五五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道。他三番五次说服列夫·托尔斯泰必须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站在车床旁”干活。

对于托尔斯泰的不同意见，他在回信中写道：“假如我建议您只当文学家，把文学家的意义仅仅局限于抒情的鸣唱，但在我们的时代里，人们顾不上去听鸟儿在枝头啼唱，那么您的意见倒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说，所有的人，只要他还成其为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专家……从您的所作所为中，至今仍可看出，您不是专业作家，您虽有旷世奇才而不是专业作家；我希望您卷起袖子，穿上工作围裙，站在车床前。”

在别林斯基的熏陶下，在当代先进社会思想的代表的圈子里，屠格涅夫也认清了文学的社会意义。

领导果戈理学派现实主义作家运动的伟大批评家的口号，是文学的“社会性”。如今他常常说，我不要“卑贱的弟兄们”所不能同享，而属于极少数人的幸福。别林斯基是为人生的艺术，符合时代迫切需要的社会艺术的热

一八四七年起，《现代人》杂志由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从普列特涅夫手中接办。

“作家和抄写员是一类货色”：原文系法语。

情捍卫者，因而把文学看作改造现实的一种有力手段。

在同诱使读者离开当代生活的尖锐题材和问题的“为艺术而艺术”、伊壁鸠鲁诗歌和反动的浪漫主义的辩护士作斗争时，别林斯基提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提倡生气勃勃的、充满深刻内容的、人民明白易懂和喜闻乐见的诗歌。

他注定不能看到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的真正开展——作家的全部最重要的作品是在后来，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完成的。

但在这位艺术家的成长时期，在由诗歌习作向小说《猎人笔记》的过渡中，同别林斯基的亲密关系对屠格涅夫具有非常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

正是这一亲密关系，为屠格涅夫在四十年代发生的内心的骤变创造了开端。在这些年代里，不仅他的社会政治和美学观点，而且他的道德面貌也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

四十年代初有机会和屠格涅夫接触的人，常常对他产生两重印象。譬如，一八四四年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初次认识时，赫尔岑得出结论：尽管他聪明而有教养，但“金玉其外”，爱在人前卖弄自己。更有甚者，赫尔岑甚至觉得他是个纨绔子弟和赫列斯塔科夫。

当然，过了不久，赫尔岑抛弃了这个仓猝得出的错误结论；当他较深入了解屠格涅夫之后，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

但第一次的印象是那样怪诞和强烈，赫尔岑竟立刻把自己的失望告诉朋友们，同时责备别林斯基缺乏洞察力，不善于识别人。

赫尔岑在屠格涅夫身上所发现的特征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后来便完全消失了。但当时他的一些古怪行为却常常使周围的人感到惊异。几十年来和他过从甚密的巴·瓦·安年科夫认为，了解年轻的屠格涅夫的行为的关键是弄清他当时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力求标新立异。安年科夫写道：“屠格涅夫认为，一个人最可耻的是他与他人相似。为了免遭这种厄运，他把各种各样的品质和特点，甚至恶习，统统强加于自己身上，只求有利于使自己与众不同。”

同时代人还发现年轻的屠格涅夫的其它弱点：他习惯于宣扬自己的风流韵事，喜欢结交权贵。

别林斯基大概也看到了这位青年性格中的弱点，但这并不影响他真诚地喜欢屠格涅夫。

别林斯基不仅发现了屠格涅夫优越的创作禀赋和大智，还高度评价屠格涅夫对生活现象的独特态度，这一态度是建立在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的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使他们亲近的还有对饱受奴役的祖国的爱，对农奴制的憎恶和对俄罗斯人民的美好未来的信心。

屠格涅夫的社会兴趣和政治、哲学、美学观点受到了新的有力的推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爱好自我剖析、忧郁、深思的、温良而有几分消极的性格，同能够忘我地酷爱事业、善于无私而强烈地爱和恨的火热的心灵发生了接触。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古希腊哲学家，主张快乐是唯一的善，而且是一切道德的目标。伊壁鸠鲁诗歌指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要求的诗歌。

在屠格涅夫那个时代，“诗歌”这个词泛指一般文艺作品。

赫列斯塔科夫：果戈里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是个骗子，爱吹牛和夸夸其谈。

别林斯基在晚年的精神探索是格外紧张和卓越的。在那个时期，他砸碎了妨碍他前进的唯心主义的最后桎梏。当他思考宗教的本质和未来的社会制度时，还深受疑惑之苦，他希望早日找到真理，丢掉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

屠格涅夫幸运地成为这些对真理的探索的直接见证人。他们在一起长久地思考和议论那些使时代的优秀人物激动的最重要问题。

在那些年代，俄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别林斯基更深刻地向屠格涅夫揭示每一个现象和事件的真正意义，指出其发生的原因，预料其结果，把他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屠格涅夫后来高度评价他这位终身难忘的朋友的活动的意义时，破天荒第一次对他使用了“核心人物”一词，据他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是最靠近中心、最贴近“本国人民的心”的社会活动家或者作家。大自然慷慨地赋予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以美学鉴别力，明确的观点，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毫不动摇的勇敢和坚强的信念。

从和别林斯基相识的最初之日起，屠格涅夫就无限敬仰伟大批评家的威望，并且对他的精神力量表示折服，其原因即在于此。“他甚至有点怕他。”伊凡·巴纳耶夫说。

饶有兴味的是，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都用“倾吐积愆”这同一个用语来简练地说明他们会晤的性质。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他们是怎样了解周围的现实的，说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只要你冷静地看一看周围，就可以发现生活是如此空虚、如此愚蠢的戏谑！“我们还有什么堪称为生活的生活呢？”别林斯基写道，“它寓于什么之中呢？它在哪里呢？我们是社会之外的人，因为俄国不是社会。我们既没有政治和宗教生活，也没有学术、文学生活。苦闷、消极、在徒劳无益的激情中受折磨——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屠格涅夫对当时现实的理解也充满这种强烈的痛楚。“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屠格涅夫写道，“你向周围投出默默的一瞥吧：贪污成风，农奴制度磐石似地屹立不动，占首要地位的是监狱，没有法院，谣传要封闭大学……阴霾经常笼罩着一切所谓学术、文学机构，此外还有鬼鬼祟祟的告密；青年中间没有共同的联系，没有共同的兴趣，人人都感到恐惧和卑贱，简直糟透啦！好啦，你来到别林斯基的寓所，第二个，第三个朋友也来了，大家一聊起来，心里就觉得舒坦些……”

在四十年代的人们中，涌现出一批道德无比高尚、才华横溢的活动家。“以后，我在哪儿都没有遇见过这样成熟的、多才多艺的、心地纯洁的人们……”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一书中写道。

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近郊的别墅度过了一八四四年的夏天，他们的住所相距不远：别林斯基住在林学院，屠格涅夫住在距林学院五俄里处的巴尔戈洛沃，每天打那儿来看望患病的别林斯基。

天气晴朗，他们常常一起在林学院周围的松林里散步。“我们坐到落满细小的针叶的干燥松软的青苔上，便在这里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屠格涅夫回忆道。

尽管别林斯基体力衰竭，但思想的沸腾并未减弱。他每次继续头一天中断的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谈话的那股热情，使屠格涅夫心驰神往，但二、三个小时后，激烈的辩论已使他精疲力尽，这时青年时代的浮躁就显露出来了——他想散步、休息或者进餐，不过不谈论“重要话题”。有一次，别林

斯基难过地责备说：“咱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呢，您就想吃饭啦！”

后来屠格涅夫说，对他影响特别大的与其说是阅读别林斯基的文章，不如说是同他的交谈。在屠格涅夫以后的创作活动的各个阶段中，总是令人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这一影响。

别林斯基密切注视他的才干的生长。批评家在世时发表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几乎全部作品——长诗《巴拉莎》、《交谈》、《地主》、《安德烈》、剧本《疏忽大意》、《身无分文》、最早的小说习作《安德烈·科洛索夫》、《三幅肖像》、《好决斗的人》、《猎人笔记》中的头几篇小说——别林斯基在论文、书评和概述中都这样或那样地提到过或作过分析。

别林斯基珍视屠格涅夫的诗歌中深刻的生活真实，独创的思想，由抒情向讽刺的得心应手的过渡，生动地描绘大自然的技巧。“他不是作为一个门外汉，而是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热爱大自然的，因此他从不仅仅努力描绘它的富有诗意的景色，而且按自己的想象描绘它。他的描写总是真实的，你总是可以从中了解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的大自然”。

别林斯基认为作为诗人的屠格涅夫是可能成为莱蒙托夫的缪斯的为数不多的继承人之一。他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其才能的类别和诗歌活动的方向而言，《巴拉莎》的作者比所有其它的俄罗斯诗人（假如我国现在有诗人的话）更加接近莱蒙托夫所开创的新的俄罗斯诗歌流派。”

别林斯基则把莱蒙托夫看作“他那个时代的真正产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反映了怀疑、否定、对现实不满和为未来命运而担忧的当今时代的性质”。

这里，别林斯基关于莱蒙托夫的论述和关于诗人屠格涅夫的评论惊人地相似，他也把屠格涅夫称为胸中怀着“时代的一切悲哀和疑问”的“我们时代的产儿”。

很少有这种情况：诗人在学步时就显示出充分的独特性，不受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屠格涅夫也不例外。恰恰相反，他的学习和成长时期也许拖长了一些。虽然屠格涅夫在《巴拉莎》中似乎已找到了自己的格调，但在随后写的几部长诗中突然急剧地改变了艺术手法，并且开始重新探索题材和风格这些探索，是分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莱蒙托夫式的主题，他对庸俗的现实的抗议，他对年青一代的命运的思考（《交谈》）；另一方面，是果戈理式的讽刺，对地主的俄罗斯、农奴制的因循守旧和野蛮的揭露（《地主》）。

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诗《交谈》和第一部长诗迥然不同，它是以完全不同的、他所根本不惯有的锋芒毕露的政论体写成的。

《交谈》提出了父与子的尖锐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纵然思想活跃，但沾染上了意志脆弱、感情冷漠”这一通病的青年一代问题。别林斯基对这部长诗作了肯定的评价。但看来别林斯基在和作者谈话时曾开诚布公地说过，他觉得这部长诗远非通篇都是写得令人信服和出色的。而且在形式上对莱蒙托夫的诗（《童僧》）的模仿表现得过于明显。尽管如此，屠格涅夫清楚记得，别林斯基曾津津有味地多次反复阅读过的《巴拉莎》问世后不久，他不知为什么对屠格涅夫的诗歌创作就冷淡起来了。

那时，屠格涅夫第一次不由自主地想“搁下笔来”，放弃文学生涯。后来，在各种情况的影响下，他也曾不止一次产生过这个念头，但对创作的渴求总是占上风。这次，这一渴求也占

了上风。

照别林斯基的见解，两位青年诗人——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具有非凡的批评才能，因此千方百计吸收他们参加杂志工作。

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赞同别林斯基对当代文学的任务的主要见解，因而作为他的同盟者在《祖国记事》发表文章，为争取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反对旧的浮夸的文学而进行斗争。

屠格涅夫曾一度赞赏宾季克托夫、库科尔尼克和其它“浪漫主义”的台柱，如今却成了他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嘲讽自己先前的偶像，并且对他们浮夸的诗学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则和文学中的人民性的原则，要求朴素，明了，符合时代的要求。

在屠格涅夫这些早期的评论习作，即在关于弗拉季米尔·达里的中、短篇小说的书评，关于席勒的《威廉·退尔》、歌德的《浮士德》、盖杰昂诺夫的悲剧《谢苗·利亚普诺夫》的论文中，已经清楚地显露出别林斯基的影响。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不仅对一些共同问题的答案相同，结论近似，而且有时表述也完全一致。

果理戈的“自然派”的大旗上，写着别林斯基的名字，如今屠格涅夫也站在这个学派一边，这个学派是当马尔林斯基和库科尔尼克之流的作品象肥皂泡一样烟消云散的时候，在“浪漫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屠格涅夫说：“尽管这个学派的作品充斥着达到自吹自擂的程度的自信，专门吹嘘俄罗斯，其实丝毫没有俄罗斯的气味：这是一些不了解自己祖国的爱国者忙碌而草率地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粉饰物。这些作品喧闹一时，狂妄自大，以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的当之无愧的瑰宝自诩，可是它们的末日日益逼近了……”

屠格涅夫的文学和美学观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牢固地形成的。

在他的评论文章里，没有伟大的批评家的论文所独具的明确性，也没有贯穿别林斯基的文章的特有的社会感召力。

他的文章有些地方带有某种程度的言不尽意、自由主义以及温和的痕迹，缺乏真正的政治热情。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使别林斯基激动的问题对年轻的屠格涅夫绝不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单是些诗人。”他在关于《浮士德》俄译本的书评中写道，“我们已经变得和那些人相同了（遗憾的是，还并非完全相同），他们在看到一幅描写乞丐的好画时，不会欣赏‘再现的艺术性’，却由于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可能存在乞丐而忧心忡忡……”

屠格涅夫让自己在“自然派”中占据了一个极不重要的地位。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自己提出的创作任务表明，他在通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仅迈出了最初几步。

当时保存下来的他所草拟的一张“情节”单，是一种类似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练笔的提纲。提纲中列举的题目只是供创作描写从干草广场和多尔

斯·亚·盖杰昂诺夫（1816—1878）：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

“自然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派最初的名称，它的创始人和最大的代表人物为果戈理。别林斯基根据他的作品阐明了新学派的主要原则（现实主义，人民性）。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以及其它在俄罗斯文学中创立了批判的现实主义派的杰出作家们的创作，都是本着这些原则并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库契市场到涅瓦大街的彼得堡生活的简单特写、草图和速写之用的。这些特写的意义，在于准确而详尽地深入研究了生活背景。这种情节对于生理特写是典型的。

上述情节没有得到利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合作家的脾胃，同时现实主义作家的嗅觉提示屠格涅夫，他用什么素材才能写出有充分艺术价值的特写和小说，而不是静止的速写。

开始创作《猎人笔记》之前，屠格涅夫发表了评论一位“自然派”小说家——弗拉季米尔·达里的小说的文章。特别有意义的是，屠格涅夫在文中首次认真地探讨了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问题。从文章里可以看出，他把作家的最高意义的人民性（如充分地表现了人民的本质的普希金和果戈理所具有的人民性）和“狭义的、特殊意义的”人民性（如达里所具有的“人民性”）区别开来。屠格涅夫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个人独特的才华，不如说是对人民的质朴的同情，对人民的亲如骨肉的好感和非凡的观察力。

一八四六年底，屠格涅夫开始创作《猎人笔记》之后，对自己提出的也许恰好就是这种简单的任务——写实。但他的才能和不断臻于完善的技巧彻底地、大大地冲破了这些男限。

第十三章

波琳娜·维阿尔多——《现代人》的初 创——《猎人笔记》中的头几篇小说

一八四三年对于屠格涅夫是终生难忘的，因为这一年不仅是他的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而且在他的私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八四三年秋，彼得堡来了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该团有一位才华出众的二十二岁的女歌唱家波琳娜·加尔西亚·维阿尔多。

波琳娜·维阿尔多出身于一个演员世家，自幼开始舞台生涯。三十年代末，她就在布鲁塞尔、伦敦演出，十八岁首次在巴黎歌剧舞台扮演威尔第的歌剧《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随后扮演罗西尼的歌剧中的灰姑娘（辛德瑞拉），获得巨大成功。

她虽然年轻，但已誉满欧洲，并得到世界音乐巨擘的承认。古诺和李斯特、梅耶贝尔和华格纳、格林卡 and 安东·鲁宾斯坦对她的才华表示赞赏。诗人向她献诗，作家称赞她扣人心弦的圆润柔和的歌喉和悲剧演员的独特才能。“的确，才能是一种天赋。波琳娜·加尔西亚才华横溢，犹如夺杯而出的琼浆。”阿尔莱德·德·纓塞写道。乔治·桑在塑造康苏爱萝的形象时，赋予它与她有过亲密友谊的波琳娜·维阿尔多的一些特征。

一位同代人这样描绘她的肖像：“波琳娜·加尔西亚的容貌优雅，带几分严肃，但富于表情，令人喜爱；她的步态庄重而从容，令人心醉神迷。她身段苗条，一绺绺乌黑油亮，脸色透出一股西班牙女人的热情，动作优美、准确、自然”。

维阿尔多夫人在彼得堡首次扮演《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罗丝娜时，引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一位详细描写过这一盛况的目击者叙述道，女主人公刚出场时还不太引人注目，但过了一会，她的歌声却给全体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霸尔多洛住宅里的一个房间。罗丝娜上场。她身材不高，面部特征相当明显，眼睛大而深邃，热情洋溢，身穿绚丽的西班牙服装，头上微斜地插着一把昂达卢西亚出产的大梳子。‘长得并不漂亮！’我后面的邻座说道。‘确实长得并不漂亮’我想道。蓦地，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响起了人们仿佛从未听到过的美妙圆润的歌声……霎时，电光掠过大厅……起初是死一般的岑静，观众怡然自得地呆然不动……但要默默地听完演唱是办不到的！一阵阵‘好！好！’的喝采声不停地打断和淹没女歌唱家的歌声……再也无法沉着和遵守剧场秩序了；谁也无法自制……她是个魔法师啊！她的歌喉是多么美妙啊！……谁说‘长得并不漂亮’？无稽之谈！……维阿尔多·加尔西亚刚唱完咏叹调，如同洪水决堤：巨浪奔腾，一场我从来没有看见和听见过的暴风雨猛然大作……全体观众飘然欲仙，心潮激荡”。

一次又一次谢幕。演出结束后，欣喜若狂的人群向女演员乘坐的马车抛撒鲜花，把她送到下榻的寓所。

俄国观众立即大为赞赏维阿尔多夫人奔放的热情和超群的技艺，赞赏她有宽广的音域，能从女高音轻松自如地转入深沉的、扣人心弦的女中音。

第一次听了波琳娜·加尔西亚饰罗丝娜的演唱后，屠格涅夫就对她的天才倾倒，于是从这天起，一场也没有漏过这个外国歌剧团的演出。

过不多时，他的朋友和熟人纷纷传说，维阿尔多夫人的演唱使屠格涅夫

神魂颠倒。“现在他完全沉醉于意大利歌剧，而且他象所有热情的观众那样，非常可爱，也非常可笑。”别林斯基在致塔季雅娜·巴枯宁娜的信中写道。

据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得知儿子有新的爱好时，曾多次听了维阿尔多夫人参加演出的音乐会，回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得承认，这个该死的吉卜赛女人唱得真好！”

不久，屠格涅夫得到和维阿尔多·加尔西亚的丈夫路易·维阿尔多一同打猎的机会，随后又被介绍和女歌唱家本人认识。后来维阿尔多夫人戏谑地说，他是作为一位年轻的地主、优秀的猎手，好的谈伴，然而却是个蹩脚的诗人被介绍给她的。

十一月一日——他们相识的日子，对他是永志不忘的。

“最最亲爱的，向您致意。”他们相识七周年纪念日那天，屠格涅夫从彼得堡给波琳娜·维阿尔多写信道，“在结交七年后的这个对我是神圣的日子里，向您致意！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在一起度过下一个周年纪念日，保佑我们的友谊在七年之后亲密如故。今天，我去看了七年前我第一次幸运地和您交谈的房子。这所房子座落在涅瓦大街，亚历山德拉剧场对面；您的住处拐角处，——您可记得？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记忆比与您有关的记忆更为珍贵……

“据我所见，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您更好的了……在人生的旅途中和您邂逅相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对您的忠诚和谢忱是无限的，只能随我一同消亡。”

从青年时代到生命的最后时日，屠格涅夫毕生矢志于这一使他作出巨大牺牲的感情……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旅外演出结束后，意大利歌剧团准备离开俄国。

一八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写道：“伊凡随意大利人离开这儿五天左右，打算和他们一道走，或者为了他们而出国”。

在此以前，屠格涅夫辞去了内务部的全部公务。五月十日，内务部“为赴德国、荷兰治病的退休十级文官伊凡·屠格涅夫将出国护照转寄给彼得堡总督。

又是喀琅施塔得，随后是远洋客轮，又是一望无际的严酷无情的波罗的海的风浪……

盛夏时节，屠格涅夫已和鲍特金、萨京 一同来到法国南部，随后和他们分手，独自动身去“比利牛斯山脉游荡”。

那时，这些地方令他这样神往，莫不是因为波琳娜·加尔西亚的祖国就在附近，在连绵的山峦后面？

然后他到了巴黎，而且大概被邀请去巴黎东南部六十公里处的维阿尔多夫妇的庄园作客。这个地方叫做库尔塔弗内尔，有古堡，有护城沟，有运河，有花园，有小树林。那个地方给屠格涅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从法国回国后，又来到彼得堡，来到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中间。屠格涅夫的文学声誉蒸蒸日上。由于和别林斯基过从甚密，他的交游越来越广。如今，除了赫尔岑、鲍特金、安年科夫、巴纳耶夫、达里、索洛古勃、阿克萨科夫兄弟以外，他和年轻的文学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不久将和他一起，或者几乎同时进入俄国最著名的作家的最前列。

在别林斯基那里，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冈察洛

夫……

涅克拉索夫长久记得，初次见面时屠格涅夫是怎样赞赏他的《祖国》一诗的：

“我读过许多诗，但写不了这么好……我既喜欢这首诗的思想，也喜欢这首诗的形式……”

自从刚刚相识的时候起，屠格涅夫就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折服：“最近，诗人屠格涅夫从巴黎归来，初次见面就对我依依不舍，别林斯基认为这是因为屠格涅夫喜欢上我了。——弟弟，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我也差点儿喜欢上他了。诗人，有才华，贵族，美男子，富有，聪明，有教养，二十五岁，——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先天条件他不具备？此外：他在良好的教育中养成一种非常坦率、非常好的性格。你读一读他在《祖国纪事》发表的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吧。——这写的就是他自己，尽管他不想炫耀自己。”一八四五年，《穷人》 的作者这样激动地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诚然，以后他和上述每一位作家的关系都复杂化了，并且闹得相当紧张，这有时并非由于屠格涅夫的过错，有时则由于他的过错，有时却没有明显的因由。

命运把屠格涅夫置于特别幸福的处境——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遇见、认识过这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人交好并建立精神上的联系。

他见过多少伟大、杰出的人物，多少迥异的个性，多少光辉的事物啊！

在青年时代，他亲眼见到了（虽然时间短促）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和柯尔卓夫——前一个时期的文学的全部精华。

在大学时代，他和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凯维奇、巴枯宁接近。

如今，他刚登上文坛，就进入别林斯基的圈子里，和俄国未来的优秀作家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接触。

他在一生中都是如此。列举屠格涅夫后来遇见的全部作家、画家、演员、音乐家、学者，就意味着说出俄国和西欧的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几百个最著名的活动家的名字。

自四十年代中期起，团结在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开始愈来愈强烈地感到，必须出版自己的杂志。他们对从属于《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安·克拉耶夫斯基的地位感到无法忍受，彼此之间用扎果斯金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强盗的名字库兹马·罗辛称呼他。别林斯基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于杂志工作上，老板仍然不择手段地盘剥他，因而他比其它人更强烈地每日每时都感到这一从属地位。

伟大的批评家是《祖国纪事》的核心和灵魂，他的活动使杂志具有明确的社会倾向，把它提到高水平上来。但不能长此下去。在先进的俄国读者和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崛起的文学流派之间，梗着一个不学无术的市侩，他只能妨碍文学力量团结起来，去为解放人民而斗争，而且妨碍遵循别林斯基制定的方向去进一步发展文学。

除此以外，几年来克拉耶夫斯基毫不留情地剥削别林斯基，因而和他决裂已成为不可避免。一八四六年初，别林斯基毅然决定离开杂志，因为《祖国纪事》和彼得堡的气候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的指头已不能握笔。批评家懂得，克拉耶夫斯基在他认为适宜的时机说：“对别林斯基没有别的办法”。

因此必须在他下手之前，采取行动。

“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别林斯基给赫尔岑写信道，“他的许多做法，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精心盘剥。他叫我评介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语法教科书。……这一切不只是因为舍不得除了付给我薪水之外，再请人写书评，并为此付钱，而且要使我忘记，我是酵母和盐，是厚本的、内容丰富的杂志的灵魂和生命（杂志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的，因为如果没有我，无论你，还是鲍特金、屠格涅夫和其他许多人就不会给他写东西），而且要使我确信，我不过是与其说靠工作的质量，不如说靠工作的数量领取薪水的干粗活的工人。”

“但是为了摆脱这个坏蛋，”他在给赫尔岑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至少要有一千银卢布，因为我向克拉耶夫斯基预支了直到四月一日以前的薪水，所以我不得不工作到这个时候，不再领钱。”

临近一八四六年春，即将摆脱克拉耶夫斯基的桎梏时，别林斯基希望从当代作家的作品中选编出版一本大型文集，作为尝试；屠格涅夫是他打算吸收参加文集的第一批作家之一，答应为打算出版的刊物写一部中篇小说。

现在别林斯基对赫尔岑、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寄予特殊的希望。象对屠格涅夫一样，对涅克拉索夫来说，四十年代是他和别林斯基交好，在精神上发生骤变和异常迅速成长的时期，所不同的仅仅是，他和别林斯基在思想上的亲密关系更加牢固，表现得更为明显。

别林斯基的青年朋友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讨论出版新杂志的计划。现在，办杂志的念头时刻使批评家焦急不安。他把杂志视为集体事业，因而当赫尔岑对他离开《祖国纪事》一举明显表示怀疑时，别林斯基劝说他丢掉怀疑：“如果只是从自身考虑，只从别的几个人考虑，我可能担心事情搞不好，但从共同的事业出发，我宁肯做一个乐天派。你对文学界将不复存在具有崇高、明智的信念的机关刊物感到不安。这样说也对，也不对。我相信，不出两年，我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志编辑的。”

然而，大家都清楚，别林斯基既缺乏健康的身体，也缺乏实际能力去有计划地实现这项任务。因为在这方面，连他也认为自己（还有屠格涅夫）是“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他在筹划的事业中只能在思想上起指导作用。在他们这几个人中，能在编辑部做组织工作的，唯有涅克拉索夫。难怪涅克拉索夫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时候说：

“在理想主义者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是实干者。所以当我们着手筹备杂志时，这些理想主义者直截了当对我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好象创办杂志的任务就委之于我了。”

确实，通过出版几部文集（《彼得堡风貌》、《彼得堡文集》等），涅克拉索夫已经表现了出版才能。“在俄国，只有三本书——《死魂灵》、《旅行马车》和《彼得堡文集》最畅销。”别林斯基说。

涅克拉索夫吸收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马伊科夫参加的最后一部文集所取得的成功，增强了他出版自己的杂志的决心。

“要是新杂志符合现代潮流，就会有读者。”他说，“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正在明显地一天天酝酿成熟；研究这些问题不应当带着枯燥无味的学究气，而要充满火热的激情，这样才能感染读者，唤起他们行动的渴望。”

由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去取得现有的一家杂志的出版权，因为当局不愿

意增加杂志的数量，不准许出版新的杂志。

在彼得堡，许多文学家都已了解，从某一个时期起，普列特涅夫因编辑和记者这一繁重的职务而感到苦恼，在他手中，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早已失去了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变得死气沉沉，读者寥寥无几。

为了振兴杂志，使它真正适应现代的要求，密切联系当代先进的社会运动，于是打算和他进行谈判，以便取得《现代人》杂志的发行权。

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的历史中，屠格涅夫起了不小的作用，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屠格涅夫“是整个计划的灵魂和组织者……目睹《现代人》于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他的许多同仁应该还记得，屠格涅夫如何为创办这个刊物奔忙，他出主意，做工作，为它的传播和巩固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给予了多么巨大的帮助。”但文学研究家们对安年科夫的证实还不够重视。

酷夏来临，首都彼得堡的事务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推迟了几个月。不久，大家各奔东西，别林斯基和演员米海伊尔·谢普金

前往俄国南方，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去后者在喀山省的田庄，屠格涅夫回故乡斯巴斯科耶。个新的社会问题正在明显地一天天酝酿成熟；研究这些问题不应当带着枯燥无味的学究气，而要充满火热的激情，这样才能感染读者，唤起他们行动的渴望。”

由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去取得现有的一家杂志的出版权，因为当局不愿意增加杂志的数量，不准许出版新的杂志。

在彼得堡，许多文学家都已了解，从某一个时期起，普列特涅夫因编辑和记者这一繁重的职务而感到苦恼，在他手中，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早已失去了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变得死气沉沉，读者寥寥无几。

为了振兴杂志，使它真正适应现代的要求，密切联系当代先进的社会运动，于是打算和他进行谈判，以便取得《现代人》杂志的发行权。

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的历史中，屠格涅夫起了不小的作用，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屠格涅夫“是整个计划的灵魂和组织者……目睹《现代人》于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他的许多同仁应该还记得，屠格涅夫如何为创办这个刊物奔忙，他出主意，做工作，为它的传播和巩固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给予了多么巨大的帮助。”但文学研究家们对安年科夫的证实还不够重视。

酷夏来临，首都彼得堡的事务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推迟了几个月。不久，大家各奔东西，别林斯基和演员米海伊尔·谢普金前往俄国南方，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去后者在喀山省的田庄，屠格涅夫回故乡斯巴斯科耶。

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分手时，别林斯基要求他不要忘记他对文集《鳄鱼》所许诺的文学“贡品”：

“这个夏天您在那儿请不要对打猎过分入迷，写作吧，您的小说不能太简短，要好好地写才对；幸好您有充裕的时间，您在彼得堡也逛够了……唉，假如命运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安在我身上就好啦！”

屠格涅夫在一八四六年夏天和秋天打猎的兴致特别浓，原来这对他的文学前途有着极其良好的作用。

他在斯巴斯科耶一直住到深秋，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手不离猎枪，根本没有提过笔。打猎这个富有魅力的字眼能使他忘掉一切。他说：“自远古以来，

俄罗斯人就酷爱打猎。我们的民歌、民间故事和所有的传说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哪儿打猎也不如我们这儿：好象总是有可打猎的地方，而且总是有东西可打……弗拉季米尔时代的勇士在皇家草地射击过白天鹅和灰鸭子。莫诺马赫在遗嘱中给我们描写了自己同原羊和熊搏斗的情景……总之，俄罗斯人民生性喜爱狩猎，只要给庄稼人一支即使是用绳子绑起来的猎枪，再给他一小撮火药，他就会只穿树皮鞋从早到晚在沼泽和树林里游荡。别以为他光打野鸭：他还背着这支枪，‘用燕麦作诱饵去狩熊呢，他塞进枪筒里去的不是子弹，而是自制的马马虎虎砸成的铅块——这样就能把熊打死；倘若打不死，就会被熊抓伤，躺下休息一会，半死不活地勉强回到家里；如果能恢复健康，又会背起那支枪去猎那只熊。不错，往往熊又会把他抓伤，可是要知道，俄罗斯人有一句谚语：“若怕野兽，别进山林。”

面临危险时的坚毅、忍耐、刻苦和冷静，是狩猎在人们身上所培养的品质。它不仅使人接近大自然，而且使人能够深入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因为只有猎人才能“在昼夜的各个时分看到它的全部美丽和可怕的景象”。

对作家来说，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行猎使他和人民亲近，向他充分展示农村生活的情景，有助于他了解和热爱俄罗斯人民的心灵。

屠格涅夫手持猎枪走遍了整个奥廖尔省和与它毗邻的几个省份。经常陪伴他在森林和沼泽东奔西跑的是切尔恩斯科县地主的农奴猎人阿法纳西·阿利法诺夫。他有一套巧妙的本领，区里没有人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感觉寻找野禽，招引鹌鹑，驯养鸢鹰，捉住那些能喝‘魔笛’、‘杜鹃飞渡’的夜莺”。

作家喜欢、眷爱阿利法诺夫，资助他赎身，于是阿法纳西住在距斯巴斯科耶五俄里光景的叫做“维索科耶”的林子里。屠格涅夫经常到阿法纳西·季莫费耶维奇那儿去喝茶，聊天，谈打猎和生活。

屠格涅夫顺便去看看偏僻的村落、草原地主的庄园、猎区和守林人的住屋，乘坐轻便马车去邻县作长途旅行时，仔细观察农民和地主的生活，兴致勃勃地从人民语言中汲取营养。

夏天和呈现出恬静的美色和“绚丽的凋萎”的短促的初秋消逝了。寒意料峭的秋日降临了。于是屠格涅夫想返回离开了几乎半年的彼得堡了。

十月中旬，“猎山鹑的秋天”刚刚过去，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动身去首都；那里，一个愉快的消息在等着他：取得《现代人》杂志出版权的问题圆满解决了。用于准备出版创刊号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别林斯基三番五次劝说朋友们毫不懈怠地工作，使每一期杂志都“充满生气和正确的方向”。

他也向屠格涅夫取得了全力支持《现代人》的保证。

“现在我很忙，几乎谁也见不着。”他写信给维阿尔多说，“我象个道地的隐士，和我的那些我终于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搜集来的书——我的希望和回忆在一起，过着蛰居的生活。”

在这几个月里，他和别林斯基相晤格外频繁：他们几乎每天见面。起初，别林斯基表示不快，说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一心打猎，因而没有带回预约脱稿的小说。

别林斯基那时还不知道，屠格涅夫此行并非一无所获；不久，一旦池动手写作，就会以《猎人笔记》的开头几篇小说使《现代人》杂志增色生辉。

恐怕连屠格涅夫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地想象到这一前景，因为这组未来的各自独立的作品的情节在他的思想中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东西。构思是后

来在写这些小说的过程中形成的。

作家在农村居留期间所观察到的事物是如此丰富，这些材料竟够他后来写好几年，结果写成了一本在俄罗斯文学中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书。

现在屠格涅夫越来越感到，只有到西欧去，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不能和我所憎恨的东西呼吸同一片空气，待在同一个地方；就这一点来说，我大概缺乏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的性格。我必须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我所在的远处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看来，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有众所周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在这个名称下，我搜集和集中了一切，决心与之斗争到底——我立誓永远不同它妥协……这是我的汉尼拔誓言。我到西欧去，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的誓言。”

屠格涅夫深信，假如他留在俄国，一定写不出《猎人笔记》来。

当年，果戈理也曾觉得，他离开俄国后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构思，正是在离乡背井期间，才能对祖国充满更加强烈的爱。

但屠格涅夫想在长期移居国外之前至少为头两期的《现代人》准备几篇小说，一篇评论文章，几篇杂文和一些诗歌。“我拼命写作。”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他给这个季节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波琳娜·维阿尔多写信道，“我承担了一些义务，我想完成这些义务，并且一定能完成。”屠格涅夫打算在写作结束后，于明年初离开彼得堡。

他为《现代人》创刊号写的小说题名为《霍尔和卡里内奇》。小说的副标题——《选自猎人笔记》——是伊·伊·巴纳耶夫想出来的。巴纳耶夫认为，把这篇特写加上这样的副标题，刊载在《杂文栏》里，能使读者“不致要求过高”。

但，根本不需要什么“不致要求过高”。恰恰相反，无论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霍尔和卡里内奇》获得一致的赞许，从而在舆论界立即提高了作者的声望。

诚然，屠格涅夫过了一些时候才得知关于这篇小说的议论，因为杂志创刊号出版后，他很快就去柏林了。

“当您准备动身时，”别林斯基紧跟着给他写信说，“我已预感到我会在您身上失去什么，可是您离开以后，我才发现，我在您身上失去的比我料想的更多；您午饭前一小时到我的寓所来，或者午饭后来待两个左右小时，等待戏剧开演，这不啻是使我延年益寿。您走后，我完全陷入了一种消极的、惶惑的心境中，我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无聊过。”

别林斯基在信中接着写道：“您自己都不知道，《霍尔和卡里内奇》是篇多么好的作品。这是一致的反映……根据《霍尔》这篇小说来判断，您的前途是无量的。这是您真正的丰收……”

批评家表示坚信，《霍尔和卡里内奇》预示屠格涅夫将成为优秀的作家。

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朋友们纷纷询问《现代人》杂志是否将继续登载猎人的小说。

这组作品的以后几篇小说（《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利戈夫》、《独院小地主奥弗西亚尼科夫》）的发表，最终巩固了屠格涅夫的成就。莫斯科的读者欣喜欲狂地谈论这些小说。“如果对您说，这些小说取得了象赫尔岑和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那样的效果，是毫不夸张的。”涅克拉索夫给作者写信道。

显然，屠格涅夫走上了自己的真正道路。作家在创作上的这一胜利不仅

是他个人的成就，而且是别林斯基所团结的果戈理学派的原则的胜利，现实主义美学的胜利，伟大的批评家在晚年所写的文章里以及同作家们的谈话中，曾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和宣告这一美学的原则。他号召他们尽一切可能扩大自己的观察领域，对被压迫人民满怀同情，揭发奴隶制度的残酷，暴露农奴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揭露贵族这股阻挠国家发展、妨碍“俄国生活的优良种子”破土生长的保守势力。

第十四章

萨尔茨勃伦——《总管》 和《给果戈里的一封信》

屠格涅夫出国后，别林斯基也很快就准备动身去西里西亚，疗养地萨尔茨勃伦。他气息奄奄，寿数将尽，已经无可挽回。只剩下一线希望：去矿泉治疗，“把随时可能松开的生命的结子系紧”。

别林斯基只等波罗的海上的冰排流净，就乘首程班轮由彼得堡去斯德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哎，我要是能和您见面该有多好啊！”他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信道，“这时候您在哪儿？是在我去施韦特尼茨途中必经的柏林？……还是在打那儿前来和我会面并不费事的德累斯顿？除了愉快的旅行、休息、有益于健康的空气、美丽的大自然和矿泉水以外，光是跟您见面就足以使我恢复健康了。”

屠格涅夫表示准备从柏林去斯德丁迎接别林斯基搭乘的班轮，但是书信错过了，别林斯基只得孤身一人到达普鲁士首都，费尽周折才在那儿的贝伦大街找到了屠格涅夫的住处。由于不懂德语，他“惹出了许多麻烦和滑稽可笑的倒霉事”。向导沿着高高的楼梯拼命地跑上跑下，终于找到了屠格涅夫的住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不在屋里，不过老板娘让别林斯基进屋。屠格涅夫不久就回来了。“我的突然出现看来使他十分高兴。”别林斯基在家书中写道，“这些都使我放心，并且我觉得自己到达目的地了。因为我的保姆和我在一起了。”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自告奋勇在这里当别林斯基的保姆，请自己的朋友、“父亲和司令”不要同他客气，随意使唤他。

别林斯基抵达柏林后，他立刻给别林斯基的妻子写信说，他将照料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并且拿脑袋对他负责。

不必急于去矿泉，因为那年春天和夏初雨水特别多，但别林斯基又不愿在柏林枯坐：他觉得这个城市令人烦闷。他唯独喜欢蒂尔加登——绿荫如盖的大花园，这时园中的栗子树正繁花盛开。

他们决定去德累斯顿，参观画廊，观看歌剧，去一趟萨克逊瑞士，再从那儿前去萨尔茨勃伦，在矿泉疗养一个半月。

这时波琳娜·维阿尔多正在德累斯顿演出。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热恋她一事持怀疑态度。这件事他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几乎不加隐讳。他本着友谊赋予他的权利，有时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暗示这件事情。譬如，临出国前，他给他与信道：“我们大家都想念您，喜欢您，特别是我。但当我想到您时，我年轻的朋友，不知为什么这些诗句就老是在我的脑际萦回：

一股幼稚的情欲
在年轻的心中激荡……

这就是对您的障碍，非这样做不可：正因为是友谊嘛。”

萨克逊瑞士：指德国南部萨克逊邦的群山，因风景优美，故又称萨克逊瑞士。

引自普希金的《埃及之夜》的这些诗句中，含有这个玩笑的隐晦的涵义。屠格涅夫对这个暗示是清楚的。虽然只字未提维阿尔多夫人，但这里指的正是她。别林斯基把自己的朋友比作和弗拉维伊·克利顿一同接受克莱奥派脱拉的邀请的那个青年：

他的双眸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一股幼稚的情欲
在年轻的心中激荡……
骄淫的女皇把忧郁的目光
投落在他身上……

为了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明白，青年接受克列奥派脱拉的邀请是一种冒失行为，别林斯基在下一封信里采用了更为奥妙的隐晦的办法：“我的奥丽加在《图画世界》里找到了一幅画，上面画着几个姿态各异的疯子，见了其中坐在扶手椅里、手支下颏的那一个，便连忙挨个儿指给我们看，说道：捷坚涅夫。‘别看她无的放矢，却多多少少击中了要害！’我想。这也是对您的障碍。”

到达德累斯顿的当天，屠格涅夫“拉”别林斯基上歌剧院，那里正在演梅耶伯尔的《胡格诺教徒》；波琳娜·维阿尔多扮演剧中的瓦莲金。

屠格涅夫曾多次看过这出歌剧，但仍不停地赞赏它，并且不断发现其优点。他认为，就戏剧表现力而言，它是梅耶伯尔最优秀的作品。维阿尔多夫人唱得非常精采，观众无休无止地要她谢幕，一面欢呼：“快回来，快回来！”

后来，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参观了两次德累斯顿画廊。屠格涅夫事先知道，维阿尔多夫妇也要到那里去；他很想介绍别林斯基同他们认识，虽然别林斯基千方百计回避。但屠格涅夫再三劝说他和他们一起参观画廊。

“维阿尔多先生对绘画很在行，他会把所有的好画指给咱们看。”他说。

“我哪一种话也不会讲，除非用指头比划，所以我不想和他们认识。”别林斯基说，他指的是自己只会阅读法文书籍而不会说法语。

当他们正在画廊的一个大厅里争论时，看见维阿尔多夫妇向他们走来。无处可以回避——他们便认识了。别林斯基大为高兴的是，双方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他们又在画廊里相遇，一切都很顺利；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大厅了，维阿尔多夫人突然很快地对别林斯基说：

“您觉得身体好些吗？”

别林斯基局促不安起来，维阿尔多夫人又问了一遍。他更窘了；女演员便开始讲俄语。她发音不准确，怪可笑的，连她自己也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他这时才拿定主意讲起半通不通的法语来，说他身体很好，虽然由于劳累感到疲惫不堪。

随后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前往萨克逊瑞士，观赏了十四世纪建筑在易比河畔峭壁上的高不可攀的哥尼赫斯坦古堡，然后回到德累斯顿，次日动身去矿泉。当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哥尼赫斯坦古堡时，真想不到，不久他们共同

奥丽加：别林斯基年幼的女儿。——原注。

《图画世界》：一七七三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带图的儿童读物，以后重版多次。

捷坚涅夫：即屠格涅夫。——原注。

的朋友米哈伊尔·巴枯宁会因在国外积极参加革命起义而被监禁在这个地方，饱受煎熬，听候死刑判决。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搭火车到弗赖堡，再往前——去萨尔茨勃伦——就只好骑马了。道路蜿蜒而上，远处现出呈半圆形的连绵的群山。

途中，屠格涅夫忆起，也曾在这里治疗的斯坦凯维奇偏偏管萨尔茨勃伦叫陷阱、监狱、寂寞的峡谷，这里，真叫人不知道到哪儿去，做什么好。

“不知为什么，”斯坦凯维奇说，“正是在西里西亚，我特别强烈地感到，祖国如同家庭，是我们的安身之地，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就象随风滚动，中途枯萎的风滚草。”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很快就充分尝到了萨尔茨勃伦的寂寞给他们带来的苦头。他们下榻于一幢叫做玛利恩霍夫的整洁的两层楼房里，房子座落在主要的、但并不漂亮的街道上。那时萨尔茨勃伦还是个并不繁华的偏僻小地方，有些象高加索矿泉疗养区。这里也看不到大河，也是山涧在单调地淙淙作响，萨尔茨勃伦依傍的群山上，缭绕着如烟的浮云。

日子一天天单调地流逝，没有任何欢娱，也不外出游玩，因为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凄风呼啸，勾人愁绪。屋里寒气袭人，却不生炉子。这使别林斯基想起彼得堡近郊那些廉价租给象他这样经济拮据的人的简陋别墅。

六月刚刚开始，却仿佛已届深秋。“在萨尔茨勃伦，五月和六月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天气。”别林斯基在家书中写道，“这对生长栗子树、法国梧桐、杨树和洋槐的地方来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现象……”

泥泞和霍雨妨碍到萨尔茨勃伦风景优美而荒凉的郊区去游玩。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只有一次去成了建筑在高岗上的伏尔

施太因古堡。由于长时间在萨尔茨勃伦峡谷里枯坐，他们无法从古堡的窗口向着那山脚下曲径盘桓的幽谷，向着那向四面八方伸展的远山，尽情地欣赏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

安年科夫从巴黎来了之后，他们这里热闹起来。他刚一得知别林斯基在萨尔茨勃伦，就放弃了原先打算去希腊和土耳其旅游的计划，赶到这儿来；他和屠格涅夫一样，也表示愿意当他的保姆和向导。

安年科夫后来回忆道，他在布烈斯拉夫尔住了一宿之后，清晨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小地方，沿着一条长街走去，马上碰见了从矿泉回来的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我差点儿认不出别林斯基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个老头，他身穿长长的常礼服，头戴方檐便帽，手拄粗拐杖，这意外的相遇仿佛使他感到措手不及，他不时迅速地挺直身子，整整衣帽，竭力使自己具有他认为得体的外表。他这样做的时间不长，所以骗不了谁。”

安年科夫住在玛利恩霍夫二楼，紧挨着朋友们的房间。如今他们已经是三个人了。他们下榻的房子的庭院里没有花园，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凉亭。早餐时分，他们聚集在代替凉亭的简易木房的遮阳下，一面吃着份饭，一面久久地讨论读过的书籍和杂志里的新闻。

安年科夫从法国和比利时带来了许多消息，他在那里会见过赫尔岑、巴

一种生长在草原的草本植物，果实成熟时，其茎容易折断，被风一吹，就象球似地滚得很远，故又称风卷球。

布烈斯拉夫尔：波兰弗劳兹拉夫市的古斯拉夫名称。

枯宁和德国革命诗人海尔维格，还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顺便说说，他应卡尔·马克思的邀请出席过后者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魏特林的著名会谈。宣布开会时，恩格斯谈到，必须在为改造劳动的事业献身的人们中间创立一个共同的学说，作为其全体拥护者的旗帜。

安年科夫告诉朋友们的新闻可多啦：有欧洲的社会、政治生活，巴黎的俄国侨民，蓬勃兴起的社会运动，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风暴之前的那个时期，这一运动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

年轻的屠格涅夫不象别林斯基那样一贯对政治问题和学说怀着浓厚的兴趣，但在他那个时期的书信中，仍然可以发现长时间议论这些话题的谈话的反应。

譬如，在屠格涅夫一八四七年写的一封信中，可以感觉到类似对新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模糊认识的东西：“生活被打碎了，看来，现在除了也许会成为人类的解放者和革新者的工业（如果从自然力服从人类的才能是有进步意义的这一观点来看待它）而外，没有更为普遍的伟大的运动了……只有社会革命取得成功，才能喊新文学万岁！……”

时间依然过得很慢，令人苦恼和焦虑，因为别林斯基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无论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向泰然自若的医生询问了多少次病人的健康情况，他总是回答说：“是的，你们的朋友病情严重。”

最后，他们和病人一样，不搭理这个医生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江湖骗子。

“每天早晨，”安年科夫叙述道，“别林斯基很早去温泉，回来后就登上二楼，老是用同样的话叫醒我：‘醒醒吧，懒虫。’他爱用一些惯用的字眼和俗语，使用很长时间，直到找到了新的字眼和俗语时才更换……他经常和屠格涅夫争论，争论通常是用这些话开头的：‘小孩子，当心——我要罚你站墙角的。’这些俏皮话里，含有和儿童的柔情相类似的温厚。然而‘小孩子屠格涅夫’有时也向他进逆耳的忠言，特别是对别林斯基不善于生活和不懂得生活最基本的道理这一点。”

安年科夫没有讲明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些争论的话题，但从一切迹象看来，他谈的是，别林斯基对生活缺乏适应能力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理想主义”。

在萨尔茨勃伦无所事事的生活，很快就使屠格涅夫感到无法忍受。他决定继续写《猎人笔记》。

和别林斯基的卧室相邻的斗室变成了临时书房。沙发旁的小桌上出现了墨水瓶，于是屠格涅夫埋头创作了。

几天之后，他向朋友们朗读了自己的新作。这就是《猎人笔记》中社会性最尖锐、反农奴制倾向最强烈的小说《总管》。

别林斯基聚精会神地听了屠格涅夫的朗诵。小说中有一处特别使他感到惊讶：地主彼诺奇金仅仅因为侍从给他递上的酒没有烫温，便低声地、湿文

乔治·海尔维格（1817—1875）：德国诗人。一八四一年，他以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的伟大政治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后来在政治上发生动摇。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革命之后，又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发生联系。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杰出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后侨居美国，不久便脱离了革命。

有礼地下令把他鞭打一顿。

“多么刁钻的恶棍啊！”别林斯基不禁破口骂道。

屠格涅夫那刻划得非常精采的温文尔雅的农奴主的形象，后来引起弗·伊·列宁的注意。列宁写道：“站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文明的、受过教育的地主，他有文化，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全身都是欧洲的漂亮风度……他是那样地人道，毫不关心鞭挞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不允许自己打那个听差，也不允许自己骂那个听差，他只是远远地‘吩咐’，象一个有教养的人那样，采取温文尔雅的态度，既不吵闹，也不面红耳赤，更没有‘公开出面’……”

《总管》使别林斯基深深激动。在《猎人笔记》的头七篇小说中，他格外赞赏《霍尔·卡里内奇》和《总管》，这两篇小说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之下写就的。屠格涅夫的这些小说是别林斯基“难道农民不是人吗？”这一论断的鲜明体现。

“别林斯基和他给果戈理的信是我的全部信仰。”年轻的屠格涅夫在朋友们中间说。

《猎人笔记》写了好几年，但作家对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任何一篇小说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只有《总管》例外，下面注明：“一八四七年七月于西里西亚，萨尔茨勃伦。”

这一附注和也是在这里写就的另一篇作品，即别林斯基那封注明“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于萨尔茨勃伦”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的日期是直接相呼应的。“别林斯基那篇总结了他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列宁于一九一四年写道。

如果把人道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同革命批评家的宣言加以对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感到这些作品产生的气氛，并且更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所追求的目标了。别林斯基临终前写的《一八四七年俄罗斯文学简评》有力地说明，他是多么赞赏《猎人笔记》，他在该文中写道：“他的小说并非全部具有同样的优点：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无不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并且富有教育意义。《霍尔和卡里内奇》直到现在仍然是猎人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其次是《总管》，再其次是《独院小地主奥弗西亚尼科夫》和《事务所》。希望屠格涅夫先生再写出哪怕几本这样的短篇小说集来。”

有一次屠格涅夫从邮局回来后说，他要火速动身去柏林送几位要好的熟人赴英国，他希望以后再和别林斯基在巴黎相会，别林斯基在萨尔茨勃伦治疗后，将到那里去进行补充治疗。

果然，他们不久就重逢了。七月底，安年科夫和别林斯基刚刚抵达巴黎，次日，在库内塔弗内尔维阿尔多夫妇那里作客的屠格涅夫“仿佛从天而降”，来看望他们。一八四七年，他在那里消夏，只偶尔到巴黎来同朋友和同胞们——安年科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等人会晤。

屠格涅夫后来回忆他和别林斯基的这些会见（这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几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十三卷，第四十至四十一页。——原注。

《霍尔·卡里内奇》，《叶尔莫莱和磨房主妇》，《我的邻居拉季洛夫》，《独院小地主奥弗西亚尼科夫》，《利戈夫》，《总管》，《事务所》。——原注。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页。——原注。

次会见)时说,他的朋友“在国外苦闷极了,一心只想回俄国。他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俄国人,一离开俄国就发呆,仿佛鱼儿离开了水似的。我记得,他在巴黎第一次看到协和广场,立刻问我:‘不是吗?这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吗?’等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却大声说道:‘那么好吧;我知道就是了,不要去说它了!’然后谈起果戈理来。我告诉他,在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就设在这个广场上,路易十六就在这里被斩首的;他四下里看看,说了声‘啊!’,便想起了《塔拉斯·布尔巴》里奥斯达普被处死刑的场面……”

这个情节是十分典型的。别林斯基自己也承认,就在他和屠格涅夫到达萨尔茨勃伦的当天,当他们从手提箱里开始往外拿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忧伤不已,不由落下泪来,读了《死魂灵》

后才略微平静下来。

异国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法排遣他对祖国的思念。纵然巴黎乍一看比他所预料的好,纵然他觉得杜伊勒利宫和帕尔罗雅尔好象奇迹、《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他的心却执着地向往着俄罗斯。

九月底,别林斯基没有给朋友们留下康复的希望便返回祖国了。离开巴黎前夕,别林斯基在赫尔岑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嗣后,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对别林斯基说来,一切都完结了,我是最后一次同他握手。坚强、热情的战士把自己烧毁了……他害着极严重的肺病,却依然充满神圣的精力和神圣的愤怒,依然对俄罗斯充满令人痛楚的、‘凶狠的’爱。”

那天,屠格涅夫没有去巴黎,后来他对此总是感到后悔,痛心地责备自己没有和别林斯基告别,而仅仅从库尔塔弗内尔给他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别林斯基,您就要回俄国去了;我不能亲自去和您告别——但,没有对您说离别的话,我是不愿意让您离开的……我虽然是个小孩子(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而且一般地说,是个轻浮的人,但我却善于喜爱好人,并且长期眷爱他们……”

《塔拉斯·布尔巴》: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奥斯达普是该小说中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的儿子,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人处死。

杜伊勒利帕:巴黎的皇宫。

官尔罗雅尔:巴黎皇宫的建筑群。

第十五章

库尔塔弗内尔——巴黎

十月，波琳娜·维阿尔多去德国演出，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则移居巴黎，住在帕尔罗雅尔附近。“这样一来，您就在德国腹地了！”他自巴黎给她写信道：“咱们昨天还在库尔塔弗内尔呢。不管清闲还是忙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但它来得却很慢，好象俄罗斯三驾马车的铃声……”

屠格涅夫对波琳娜·维阿尔多的深沉的眷恋非同寻常的钟情。她那罕见的优异的禀赋，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精明和敏感，以及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都使他迷恋。他经常在给她的信中，有时还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柏林来鸿》、《浅谈梅耶伯尔的歌剧“预言者”》等）里谈到她的艺术才华。

自他们相识的时候起，他就密切地注视年轻女演员才能的发展，了解报刊关于她的表演的评论，时常和她攀谈自己的想法：她应该如何使演技益臻完美。

他给她出主意：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充满热情的因素和悲剧的同素结合起来，砸碎那些束缚凡是尚未完全克服矫揉造作和表演时还注意自己的演员的枷锁，从而使技艺臻于完美。

在给她的信中，他分析了伊菲姬尼娅、诺尔玛、萨弗的形象，以便维阿尔多夫人能更深入理解她所扮演的角色。

回忆她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几年的表演时，屠格涅夫高兴地指出：如果说，以前她是为特等人物演出的，而且“要体会她表演的精采，本人应该多少是个演员”，那么如今，当女演员的技艺炉火纯青的时候，她的表演对所有的观众变得明白易懂了。

维阿尔多夫人在旅外演出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夺取新的巨大胜利！”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兴奋地写道，“德累斯顿，汉堡，柏林……并向大不列颠进军！……”

当维阿尔多夫人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而屠格涅夫孤零零地住在她的庄园或巴黎时，他在思想上处处跟随着她，详细地回忆铭刻在他脑海里的她所扮演的这个或者那个角色。“您的母亲坐在壁炉旁，叫我大声读您的信……为什么今天我不在柏林呢？唉，为什么，为什么？……”或者写道：“我们打这儿看见，一束束鲜花落到您脚前，并且听见观众高呼：‘好！’”

屠格涅夫甚至在成熟时期还象年轻人一样激动地欣赏优秀的女歌唱家的出色表演。

屠格涅夫在法国蜗居了——如果不算他在毗邻的比利时的短期旅行——三年，对他来说，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是罕见的卓有成效的三年。他从来没有构思过这么多的作品。他把这些构思比作不知打哪儿熙熙攘攘地涌进小城市的一家旅馆来的大批旅客。老板激动万分，手足无措——他不知道把这些来客安置在什么地方，怎样安置他们。

伊菲姬尼娅：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歌剧《伊菲姬尼娅在奥利德》、《伊菲姬尼娅在特洛伊》中的主人公。

诺尔玛：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中的主人公。

萨弗：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萨弗》中的主人公。

甚至在每天早晨紧张地写作之后在杜伊勒利宫散步的时候，他也喜欢考虑，明天将写什么作品。这些散步使他神志清醒，心境宁静。玫瑰色的阳光透过高大的栗子树枝叶上的罅隙投到地上，他喜欢在阳光下观看正在嬉戏的儿童，观赏雕像和深灰色的巍峨的宫殿。

有时，他充满强烈的莫名的喜悦，不禁要高呼：“太阳万岁！对大家都好的一切事物万岁！”

他常常把一包包稿件从巴黎寄往彼得堡《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这些稿件证明，作家正在进行紧张的创作。

如今，在创作中，他改变了顺手拈来，不加琢磨的态度。“写作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他在那个时期的一封信中写道。

每当他写作了一段时期，把某一部作品顺利结束之后，总是感到轻松和愉快。

过了几天，屠格涅夫又写了一篇新的小说。场面一个接一个更换着，俄国农村和外省贵族的生活，以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描绘的故乡景色便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家满怀热爱和同情塑造了农奴制现实扼杀不了其崇高的精神、道德品质的农民的各种典型。相貌很象苏格拉底的聪明的霍尔，幻想家卡里内奇，寻求真理的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勇敢无畏的马克西姆……这些人体现了俄罗斯性格的优秀特征。与他们相对立的，是野蛮的草原地主的形象，他们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使农民遭受奴役，陷于饥饿、破产。

赫尔岑把《猎人笔记》称为对农奴制的控诉书，他说：“地主家庭的内幕生活从来还没有以这种普遍受到嘲弄、仇恨和厌恶的样子被暴露出来。”

随着构思好的一组短篇小说的增加和扩大，作者对这些小说的最终目标和任务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表明：“在俄罗斯人身上，孕育着未来的伟大事业、民族的伟大发展的胚胎”。

屠格涅夫的这些短篇小说引起了果戈理的注意。《死魂灵》的作者对他颇感兴趣，于一八四七年九月七日给安年科夫写信道：“请给我描述一下……青年屠格涅夫的相貌，好使我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我对于他这个作家已经有一些了解：就我所读过的作品判断，他具有杰出的才能，将来是大有作为的。”

《猎人笔记》的每一篇小说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作者和他的朋友们懂得，如果这些小说结集出版，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和说服力。一八四七年夏，屠格涅夫在萨尔茨勃伦居留时，曾在《总管》的草稿上为未来的《猎人笔记》的版本的扉页画了一幅草图；几个月后，涅克拉索夫通知屠格涅夫，他打算出版《俄国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笔记、游记丛书》时，也提出了出版这本书的想法。

“第一册是《谁之罪？》”诗人写道，“第二册是《平凡的故事》，我想，随后是《猎人笔记》……您的小说写得这么好，产生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不应当让它们在杂志中湮没。”

但是又过了整整五年，这本出色的书才问世。自然，作者有关《猎人笔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谁之罪？》：赫尔岑的中篇小说。

《平凡的故事》：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

记》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他的一些构思仍然未能得到体现，因为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明白，这些作品反正不可能得到书刊审查机关的通过。

诸如《俄罗斯的德国人和改革者》、《食地兽》这样的没有完成的小说证明，屠格涅夫曾力求深入地开掘农民反对地主的奴役这一主题。

在第一篇小说里“描写了两个地主，一个是俄国人。他在自己村子里老是发号施令，建立秩序——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农民，强迫他们照他的程序吃、喝、办事；他夜间起身，走进农民的屋子，把他们叫醒，老是监视他们。另一个是德国人，明白事理，办事有条不紊，但他们俩手下的农民都生活得很糟。”

据屠格涅夫说，俄国地主的相貌酷似尼古拉一世，所以根本休想能发表这样的小说。

第二篇小说——《食地兽》的情节以一个真人真事为依据。食地兽是一个村子的农民给地主起的绰号，这个地主年复一年地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好象“吃”土地一样。

有一次，屠格涅夫简略地对纳·亚·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叙述了农民惩治食地兽的经过。

“当我是个大学生时（可想而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夏天我到农村去打猎。领我去打猎的是邻近庄园的一个老仆。有一回，我们在树林里转悠，累了，便坐下休息。只见我的仆人老是东张西望，连连摇头。这终于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道：‘你怎么啦？’他说：‘我知道这个地方。’便对我讲了从前农民在这个地方打死地主的经过。

“这个地主很残酷。他弄得家奴尤其不堪忍受，因为他和他们的关系比农民近。于是家奴们约好夜里把他从屋里拖到一个较远的地方，把他弄死。我的仆人那时还是个小孩。他偶然偷听到这次谈话，便在那天夜里跟踪这些预谋者，——看见他们裹住地主的嘴巴，使他无法叫喊，把他拖走（孩子跟随这帮人，在旁边跑）。庄稼人到了树林里之后，孩子躲在灌木丛后面，打那儿看见了一切。详细情形是十分可怕的。譬如，一个厨子把地主的嘴塞满了污泥（那天下雨），一面说，叫他品尝美味佳肴。”

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旅居法国期间，除了《猎人笔记》之外，屠格涅夫完成了他的几乎全部主要戏剧作品。

四十年代初期，他就曾用这个体裁试写过一些作品（《圣安东尼的诱惑》、《疏忽大意》和《两姐妹》），如今，他对这个体裁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屠格涅夫以前的戏剧习作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方向和创作上的独立性，他整个儿还在探索、徬徨，这些不够成熟的作品带有缺乏信心和学究气的痕迹。《圣安东尼的诱惑》和《两姐妹》结果没有写完。这些早期的戏剧作品的主题无的放矢，脱离当代生活的现实问题；屠格涅夫四十年代下半期的剧本《身无分文》、《麻绳爱在细处断》、《食客》、《单身汉》、《贵族长的早宴》和这些作品不同，充满生活气息和现实主义精神。

即使将最早的三个剧本的剧情和以后创作的剧本的剧情加以简单的对比，也可以看出，自从作家站在果戈理学派一边并深刻领悟了别林斯基制定的美学原则之后，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哪些根本的、良好的变化，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就拥护建立人民的戏剧，并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整个俄罗斯，连同它的善与恶、崇高与可笑”。

继果戈理之后，俄国作家们为建立独具风格的民族戏剧及其现实主义原

则，为祖国戏剧艺术深入探讨现代的重大主题，为承认戏剧的伟大的社会作用而斗争，在这一斗争的历史中，屠格涅夫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评论斯·盖杰奥诺夫的剧本《利亚普诺夫之死》（1846）的文章中，屠格涅夫写道：“我们的戏剧已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因为俄罗斯人——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产生了深思自己的生活的需要；但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为我国的剧院写出具有必要的广度和完美的剧本的天才。”

当时屠格涅夫已经懂得，青年剧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扬果戈理的传统。他说，创立新流派的条件已经具备。果戈理“做了第一个创始人、孤独的天才作家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开辟并指出了我国戏剧文学今后应走的道路；但戏剧是整个社会、整个生活的产物，然而天才人物却仍然只有一个。果戈理播下的种子现在正在许多人的智慧和才能中默默地成熟着（我们深信这个点）：时候一到，孤独的橡树旁将长出一片幼林……《钦差大臣》发表已经十年了，诚然，这段时间我们在俄国舞台上还没有看到一部可以认为是果戈理学派的作品（虽然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果戈理的影响），但从那时起我们的思想和需要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屠格涅夫自己首先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他后来承认，他于一九三六年观看的《钦差大臣》的首次演出，当时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果戈理的喜剧的意义并不理解。

屠格涅夫四十年代末期的戏剧习作表明，由与《钦差大臣》几乎写于同时的浪漫主义剧本《斯捷诺》，至《食客》和《贵族长的早宴》：他走过了多么复杂而漫长的道路。

这三个早期剧本都以“外国生活”为素材，剧情并不是取材于俄国生活，然而屠格涅夫稍后在库尔塔弗内尔和巴黎写就的剧本则描绘俄国外省贵族和京都小官吏（《单身汉》）的生活和风俗。

两部优秀喜剧——《食客》和《贵族长的早宴》的主题直接与《猎人笔记》的主题相呼应。在第一个剧本中逐渐沦为有钱地主家中的玩偶的破落贵族库佐弗金的形象，与小说《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我的邻人拉季洛夫》中的同类人物相近。

小说《独院小地主奥弗西亚尼科夫》中，以无比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小地主“和睦地”划分地界的情景，这篇小说的一个情节已经含有喜剧《贵族长的早宴》的剧情的萌芽。

这样为寡妇卡乌罗娃和她的弟弟分地的企图受到了糊涂而顽固不化的卡乌罗娃的阻挠，这一企图构成了喜剧《贵族长的早宴》的基础。

草原地主的生活和风俗习惯描写得如此生动，暴露得如此淋漓尽致，致使这个剧本象与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同时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阅读的作品《食客》一样，被书刊审查机关禁止出版，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

这个小组被摧毁之前不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诗人阿·普列谢耶夫在给自己的同志谢·杜罗夫的信中写道，在“大为风行”的手抄本的书籍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大雷雨之前》和屠格涅夫的喜剧《食客》特别受欢迎。

屠格涅夫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他的戏剧才能。他们对他的剧本的评论雄

阿·尼·普列谢耶夫（1825—1893）：接近革命民主派的诗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流放。

谢·费·杜罗夫（1816—1896）：俄国诗人。他的诗表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民主主义情绪。

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譬如，一八五一年果戈理在敖德萨市列普宁家里听了喜剧《贵族长的早宴》，呆头呆脑而又爱争吵的女地主卡乌罗娃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精采，恰巧和他笔下的科罗鲍奇卡相似，因而特别引起他的注意。“这个女人写得好！”果戈理听完朗诵之后说。

涅克拉索夫对屠格涅夫独具风格的戏剧作品也大加赞赏。《麻绳爱在细处断》（一八四八年）完成后不久，他听了这部喜剧的朗诵之后说，“在当前的俄罗斯文学中，大概找不到比这更优美、艺术性更高的作品了。构思得好，朗读得也好，——直到最后一个词都很精采”。

次年，诗人在刊物上高度赞许在彼得堡剧院演出的喜剧《单身汉》，这是屠格涅夫得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毫无疑问，屠格涅夫先生之善于写喜剧，正如他善于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一样。”涅克拉索夫写道，“如果他决定写喜剧，而不是写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这倒是不无好处的：俄国在小说方面尚有若干天才，而好的喜剧，如所周知，在我国却很罕见。”

一八四八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给赫尔岑念了尚未完成的《食客》，后者给莫斯科朋友写信道：“请告诉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屠格涅夫正在写的剧本简直是脍炙人口的佳章。”

奥加廖夫对喜剧《麻绳爱在细处断》的评论也是意味深长的：“他的观察是如此精细，他才华横溢，文采优雅，我深信，这个人有远大的前程，他必将为罗斯创作出杰出来”。

俄国杰出的演员马尔蒂诺夫、舒姆斯基、萨莫依洛夫，稍后萨维娜、达维多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卡恰洛夫曾热情洋溢地为实现屠格涅夫的戏剧构思而努力，他们的热情表明，在俄国戏剧史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然而，这些剧本的作者深信自己具有戏剧才能的时间并不长。过了不久，他趋向于认为，他写的剧本更适合于朗读。

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的剧本《村居一月》（这个剧本一八四八年就构思了，以后又重新构思了好几次，直至彻底完成），好象是他的这一体裁的创作结束。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和这个充满浓郁的抒情性的喜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剧作不仅都是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俄国现实的矛盾，而且其艺术手法相近：剧情不复杂，不追求舞台效果，把外部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深化人物的纯心理描写，——这一切使他们的剧本非常近似。

因而，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作演出《村居一月》的准备工作时，采用了演出契诃夫的剧本的那些导演手法。他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写道，由于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这个剧本，他的“长期实验工作”的成果破天荒第一次被发现并得到好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懂得，屠格涅夫的剧本的基础是“内部活动”，因此摒弃了通常的表演手法，力求透彻了解每一个角色的心理画面。

他出色地扮演了拉基廷的角色，给剧院的舞台带来新的、非同寻常的表

科罗鲍奇卡：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女地主。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的教名和父称。

安·巴·契诃夫（1860—1904）：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优秀的剧作家。

演风格，从而使自己的新方法得到了承认。

在创作的余暇，屠格涅夫在巴黎学习西班牙语。他还特地为此聘请了一位教师——卡斯捷利亚尔先生。“我们每天晚上围坐在西班牙火盆旁，用西班牙语会话。”他写信给维阿尔多夫人说。

为了提高这门外语的水平，屠格涅夫把《曼侬·雷斯戈》由法语译成西班牙语，并依照卡斯捷利亚尔的建议同他的另一位学生通信。

不久，屠格涅夫已开始阅读卡尔德隆的戏剧作品——《十字架的祈祷》、《人生若梦》、《神奇的魔术师》的原著，随后又深入钻研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在这方面，波琳娜·维阿尔多的丈夫——不久前还将这部长篇小说译成法语的路易·维阿尔多给了他不少帮助。

卡尔德隆的戏剧作品之所以引起屠格涅夫的注意，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本国人民和时代的本质。“阅读这些优秀的作品时，你会感到，它们植根于优良、坚实的土壤：它们的风格和情致质朴，这里丝毫没有所谓的文学佐料。在西班牙，戏剧是纯朴的天主教教义和按照这种教义建立的社会的最初、最好的表现。”

但过了不久，屠格涅夫对卡尔德隆的创作的评价就开始出现矛盾。在这里，作为诗人的屠格涅夫与作为哲学家的屠格涅夫似乎是有分歧的。诗人赞赏西班牙剧作家的卓越的艺术，但卡尔德隆的剧本过于明显地流露出神秘主义者和宗教狂信者的主张，其思想基础实际上对屠格涅夫是格格不入的：当时，他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巨大影响，认为后者是当代最有才华、最富于独创性的哲学家。在屠格涅夫关于卡尔德隆的论述中，可以见到和费尔巴哈相似的论点。在评价剧本《十字架的祈祷》时，他谈到“理智的胜利”，这种理智把“自认为是神的玩物的人”升华到“幻想的神”的高度，“这些神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屠格涅夫的说明是以论战的形式结束的：“即使我是沧海的一粟，我也是自己的主宰；我要的是真理，而不是什么灵魂的超度，我期待着从理智得到真理，而不需要什么恩赐”。

起初，屠格涅夫醉心于卡尔德隆的艺术创作的技巧，认为 he 可以和莎士比亚、歌德媲美，塞西蒙多（《人生如梦》）可以和哈姆雷特王子并驾齐驱，又把剧本《神奇的魔术师》称为西班牙的《浮士德》。但过不多时，研究了塞万提斯的创作之后，他确信，《唐·吉珂德》才是西班牙和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而卡尔德隆的作品却逊色三分。

屠格涅夫后来从中为自己的长篇论文《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汲取了丰富素材的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从此成了屠格涅夫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建议将来把它译成俄语。

“火盆”：原文系西班牙语。

《曼侬·雷斯戈》：法国作家普莱沃（1697—1763）的长篇小说。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杰出的剧作家。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一个传说中的丹麦王子。

第十六章

在一八四八年严峻的日子里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底，侨居巴黎的革命者象通常那样济济一堂，举行宴会，纪念一八三一年波兰革命纪念日。在这个会上，米哈伊尔·巴枯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看到公开向波兰人伸出兄弟般的手，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与彼得堡政府脱离关系的俄国人。”赫尔岑说，“他的演说影响很大。”当局认为，巴枯宁的演说非常危险，因而命令他离开法国。他迁至布鲁塞尔。

一八四八年初，屠格涅夫也到了那里，他此行可能是为了同老朋友相会，这位朋友将照老习惯继续把与革命工作有关的意图和计划告诉他。

在比利时首都，两位朋友获悉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消息。

许多年后，屠格涅夫在特写《戴灰眼镜的人》中讲述了这些日子。

这些篇页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充沛的精力和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浓厚兴趣。这位我们习惯于想象成老成持重，从容不迫的作者，在这里却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屠格涅夫正在旅馆里。突然，外面的大门敞开了，有人高声叫道：“法国成为共和政体了！”

他霍地跳下床，奔出房间，看见一位侍役在走廊里急速奔跑，挨个儿打开房门，老是叫喊这一句话。

半小时后，屠格涅夫已穿好衣裳，收拾好东西，赶忙去车站。当天，他大概和巴枯宁一同到了巴黎，后者也是一听到革命的消息就离开巴黎的。

“国境线上的铁轨被拆除了；我和旅伴乘出租马车，费了好大的劲到了杜埃，向晚时候到达蓬图瓦兹……”屠格涅夫回忆道，“巴黎附近的铁轨也被拆除了……记得，在一个车站上，一个挂着一节头等车厢的火车头打我们跟前轰隆隆飞速驰过：乘坐这辆专车的是共和国‘特别委员’安东尼·德莱；同车的人们挥舞三色旗，高声叫喊。车站职员默不作声，愕然目送身躯高大的委员的身影。他从窗口探身车外，高举一只手……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自然而然地又浮现脑际。记得列车快要驶达蓬图瓦兹时，我们的列车同一辆迎面开来的列车相撞。有人受伤了，但谁也没有留意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马上产生同一个念头：列车可以继续往前开吗？我们的列车刚一重新启动，大家立刻和先前一样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只有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例外，他打杜埃一上车就躲到车厢角落里，不停地嗫嚅道：‘全完啦！全完啦！’”

当火车开进巴黎市区，屠格涅夫见了到处显得五彩缤纷的三色帽徽、正在拆除街垒的武装的穿短衫的人们时，顿时感到异常激动。

在巴黎逗留的第一天，是在弥漫的硝烟中度过的。

撰写关于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回忆录的人早已放弃了一些青年时代的信念和希冀。这里的每一个字眼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和深思熟虑的。涉及自传性的细节时，作家非常谨慎和克制，他不想引起书刊审查机关对俄国读者所不习惯的题材的注意，因而有时作附带说明：“这里不是报导我所感受到的

雅各宾党人实行革命专政的年代。

穿短衫的人：法国十九世纪的工人和手工业者。

一切的机会……”，“我不打算大谈特谈我的感受……”等等。

以后，屠格涅夫亲眼目睹了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看见了工人反对所谓“熊皮帽”，即国民自卫军被取消特权的精锐骑兵的示威。

临时政府拒绝支援波兰人民在克拉科夫和波兹南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起义之后，五月十五日，示威群众以圣马德莱娜教堂附近经过，冲击制宪议会大厦。屠格涅夫观看了这一斗争场面。

“尚在可怕的六月之前，五月十五日就象一把镰刀割掉了第二茬希望的幼苗……”赫尔岑写道，“这天，没有流一滴血；这是晴空中的一声霹雳。雷声过后，可以嗅到可怕的暴风雨的气息。”

这期间，在屠格涅夫年长的朋友们的命运中，发生了动荡和惨祸。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别林斯基与世长辞。

不久，巴枯宁被迫长期脱离了生活。

赫尔岑的家庭生活中正酝酿着严重的悲剧，他后来在《往事与随想》中叙述了这件事。

当时，屠格涅夫在和平大街和意大利路拐角处的公寓里租了一套房子。乔治·海尔维格住在和他同一层楼的邻近处。他们常常互相串门，吐露胸怀。

海尔维格是德国侨民在巴黎的俱乐部主席，一八四八年四月，在法国二月革命鼓舞下，他率领武装工人去巴登支援革命。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获悉队伍失败的消息后，给维阿尔多夫人写信道：“我的朋友海尔维格的远征一败涂地：这些不幸的工人惨遭毒打。第二位领导人伯恩施太德被杀害；至于海尔维格，据说他和妻子回到了斯特拉斯堡。如果他到这儿来，我一定建议他再读一遍《李耳王》，特别是国王、爱德伽和侍从丑角在森林里的那一场。可怜的人啊！他当该这样：要么不去做事，要么和其他人一同流血牺牲。”

与此同时，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日子日益逼近。

从某一时期起，可以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工人们同临时政府之间的最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空气中散发着火药的气味。

“熊皮帽”是临时政府的武装——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连队，因官兵戴熊皮帽，故名。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六日，“熊皮帽”举行示威，反对取消他们的特权。次日，工人们针对“熊皮帽”的示威也举行了示威。

“可怕的六月”、“可怕的暴风雨”：均指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法国资产阶级镇压了这次起义。据估计，在六月起义中，大约有一万一千人被杀，二万五千人被监禁。

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十五万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被资产阶级垄断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府立刻派军队驱散示威群众，逮捕工人阶级组成的革命政府成员。

“可怕的六月”、“可怕的暴风雨”：均指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法国资产阶级镇压了这次起义。据估计，在六月起义中，大约有一万一千人被杀，二万五千人被监禁。

他由巴黎移居德国，一八四九年春在德累斯顿领导起义。那里，他遭到失败，随后被投入监狱，引渡给沙皇政府，投入彼得保罗要塞监狱，流放西伯利亚。数年后，他逃往美国，一八六一年再度来到欧洲。——原注。

原文如此，应是德意志民主协会主席。

据悉，卡尔·马克思懂得，海尔维格的这一主意必然失败，因而事先谴责了这一徒劳无益的举动。海尔维格果然狼狈回到巴黎。——原注。

六月二十三日晨，召集国民自卫军的鼓声，宣告不幸的时刻已经到来。

“开始了！”一位送衣服来的洗衣女工对伊凡·谢尔盖那维奇说。

她亲自看见，工人怎样在圣德尼门附近栏街构筑巨大的街垒。

屠格涅夫急忙到街上去。这里，一切似乎照常进行，和往时一样，开了门的咖啡馆和商店前聚集着人群，轻便马车和出租马车穿梭来往，高声的谈话和呼喊清晰可闻。

他越往前走，市容的变化就越明显。马车和迎面走来的行人越来越稀少，咖啡馆和商店匆匆关门。街上已可以感到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寂静，但这寂静还没有渗入房屋的敞开的窗户。

他在把风暴的开始和日常生活隔开的短促的间隙中看到的情景，永远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在这些窗口以及门槛上拥挤着许多人，多半是妇女、孩子、女仆和保姆，——这些人在聊天，嬉笑，不叫嚷，却互相呼唤，环顾四周，挥手仿佛在准备观看一个奇景；这群人好象充满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好奇心。五颜六色的绿带、头巾、包发帽和白的、粉红的、天蓝的衣裳混成一团，在夏天灿烂的阳光显得五彩缤纷，如同四周种植的杨树——“自由树”上的叶子，在夏日的微风中扬起，飒飒作响”。

“难道五分钟、十分钟后这里将发生搏斗和流血吗？”他问自己，“不可能！”

他同样清晰地记得工人们拦街构筑的高耸而参差不齐的街垒，和在街垒中央迎风飘动的尖角小红旗。

当一队手持闪亮刺刀的国民自卫军在距街垒二百步光景的街道左边出现时，他正站在起义者占据的茹维安手套厂墙边。军队到达并占据了街道的对面，排成队列展开，向街垒逼近。

起义者从工厂楼上的百叶窗发出的齐射，宣布了悲惨事件的开始……以后三天，屠格涅夫没有离开过自己在四楼的寓所，仅派人送便条给赫尔岑，但便条很难送到。

根据卡芬雅克 市内禁止通行的命令，国民自卫军的哨兵强行把企图违反这一命令的人统统送回家。房屋的窗户必须敞

开，以防埋伏。

这期间，巴黎市郊正在进行激烈的殊死战斗。从外面传来远处排炮的轰鸣声，杂乱的枪声，鼓声，炮兵连驰过死寂的街道时发出的沉重的辘辘声，拖长的警报声。夜里也不停息……第四天，起义者的抵抗遭受挫折。只有在圣安东尼区近郊，工人还继续战斗。

早晨，屠格涅夫正在海尔维格家里闲坐，这时一位侍役向诗人通报，有一位工人找他。不一会儿，他领进来一位老人，他身着破烂的短衫，有些驼背，两眼红肿，脸上满布皱纹。

“这儿哪一位是公民海尔维格？”他问道。

“我是海尔维格，”德国诗人答道。

“您是不是正在等待从柏林来的儿子和他的保姆？”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一八四八年任陆军部长时曾残酷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

作家后来把革命事件的这个悲惨结局的一个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罗亨》的尾声。屠格涅夫第一次在俄罗斯文学中描绘了先进的俄国人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在街垒牺牲的情景。——原注。

“是的，确实……您怎么知道的？他应该四日到达……但我认为……”

“您的儿子是昨天到达的；但由于在圣德尼的火车站掌握在我们手里，无法把他送到这儿来，所以把他领到我们的一位妇女那儿——这件公文上写着他的地址，我们的人叫我来找您，以便使您放心。保姆也和他在一起，房子挺好，有人管他们的饮食，没有危险，等事儿都结束了，您可以持这件公文去领他。

再见吧，公民……”

老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起义者的宿营地来到这里，他那奋不顾身的行为使海尔维格大为惊讶，他表示愿意给他报酬。但工人断然拒绝了金钱。

“那么吃点东西，喝杯酒吧。”

“这个我倒不拒绝。可以说，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喝酒时，老人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

“二月，我们向临时政府许诺，我们将等待三个月：如今这几个月过去了，生活仍旧那么困难，甚至比以前更困难了。临时政府欺骗了我们：许诺了许多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兑现。没有为工人们办什么事。我们把自己的钱都吃光了，什么工作都没有，工作停顿了。瞧，这就是共和国！喏，我们已横下一条心干下去，反正没有出路！”

工人要走时，海尔维格对他说：

“至少请您把大名告诉我吧！我希望知道，给我帮了大忙的人叫什么名字。”

“您根本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老实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您，而是执行我们的人的命令。再见……”

“探访过海尔维格的老人的名字仍旧不得而知。”屠格涅夫写道，“但他的行为，他完成这一举动时所怀的无意识的、几乎是庄严的质朴，却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显然，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作了自我牺牲。在殊死的战斗的紧张时刻和混乱中，竟有人想起和他们素不相识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忧虑，设法使他放心，因而派他来，这些人也不能不令人敬佩。”

在这个艰难、紧张的时期，在旅居巴黎的同胞中，除了安年科夫外，同屠格涅夫最亲近的是赫尔岑一家和杜契科夫一家。这两家人住同一幢房子，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每大都到他们那儿去串门。

革命的失败深深震撼了赫尔岑的心灵，在他的一生中划了一条界限，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永远不能忘记“血染”巴黎的情景。

“六月二十六日傍晚，我们听见了……整齐的、间歇不长的齐鸣的枪声……”他回忆道，“‘这是在枪毙起义者哪。’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为这些时刻，人们要仇恨十年，报仇一辈子。叫宽恕这些时刻的人倒霉去吧！”

“持续了四个昼夜的大屠杀之后，特别戒严状态的寂静和安宁到来了……目空一切的国民自卫军的官兵脸上露出穷凶极恶和呆板的神情，用刺刀和枪托威胁，保护自己的店铺……资产阶级得意扬扬。圣安托尼区近郊的房屋还在冒烟……不让走近遭到炮弹破坏的先圣祠，街上搭满了帐篷，马儿啃啮香榭丽舍大街幸存的树木，在协和广场上，到处堆满稻草和胸甲骑兵的

“协和广场”：原文系法语。

铠甲；杜伊勒利宫花园里，士兵们在栅栏旁熬汤……“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旧观；街道上又出现了游手好闲的人群，衣冠楚楚的太太们坐在四轮马车和两轮轻便马车上，观看残垣断壁和殊死战斗的痕迹……”

和屠格涅夫首次见面对，杜契科夫的幼女娜塔丽雅（后来成了奥加廖夫的妻子）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姑娘。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常去杜契科夫家作客，便跟她成了朋友，乐意给她朗诵诗歌，或者叙述自己未来的作品的提要。

有一次，屠格涅夫向她详细地描述了剧本《娱乐晚会》的构思，一时兴奋起来，便娴熟地按角色表演了整个剧本。

在朋友的圈子里朗读了当时刚完成的喜剧《麻绳爱在细处断》之后，屠格涅夫把它献给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芙娜·杜契科娃。

在七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伊·谢尔盖耶维奇和一些青年人坐在通向花园的台阶上，问杜契科娃道：

“娜塔莉，你宁愿嫁给我们之中的哪一个人？”他朝安年科夫点了点头。

“我谁也不嫁。”姑娘含笑回答。

“假如两个人都不能拒绝呢？”他说。

“为什么不能拒绝？”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芙娜提出异议，“那我就投河自尽。”

“要是没有河呢？”屠格涅夫问道。

“那我就嫁给你。”姑娘莞尔一笑，答道。

“啊！我要的就是这个嘛，你还是宁愿嫁给我，也不嫁给安年科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嘴角上挂着得意的微笑，瞧了瞧自己的朋友。

“当然，假如没有河的话。”娜塔莉补充说。

大伙儿都笑起来了……可是，过了不久，这个不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开始愈来愈少。秋天，杜契科夫一家离开巴黎回国。和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芙娜告别时，屠格涅夫赠给她一个小记事本作为留念，本子里写道：希望她在看到这些字句并想起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她之前，永远不要作任何重大的决定。

杜契科夫一家走后，安年科夫随即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侨居国外的俄国人要推迟回国越来越困难，因为尼古拉一世政府将法国视为经常发生革命骚动的危险策源地。

安年科夫动身前不久，赫尔岑问他：

“那末，您决定回国啦？”

“决定啦。”

“在俄国您会感到非常可怕的。”

“有什么法子呢？我必须走……要知道，如今这里并不是多么好，您留下可别后悔。”

“不，我没有别的扶择。我必须留下，假如我会后悔，那就是后悔：当一个工人在莫贝尔广场的街垒后面递给我一支枪时，我没有收下它。倘若我偶然饮弹阵亡，我就能再带二、三个信仰到坟墓里去了……”

每一个由动乱的法国返回俄国的人都受到怀疑，杜契科夫回国后不久，

娜塔莉：即娜塔丽雅。

“莫贝尔广场”：原文系法语。

在家里和基谢廖夫公爵进行了这样的谈话：

“哎呀，亲爱的杜契科夫，我真不知道，您的名字是入了红册、还是入了白册，不过，您的名字进了黑名单，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您解释清楚。一句话，一俄里之外就可以打您身上闻到街垒的气味。的确，我的朋友，六月里您不该留在巴黎……”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早就再三催促儿子回家，对他拖延归期感到非常不安，便照例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不给儿子寄钱。

贫困使屠格涅夫受到非同小可的威胁。稿费无论如何是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有一回，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收到了《现代人》的编辑汇来的三百卢布之后，给他写信道，这些钱救了他，使他不致饿死。

他犹豫了一段时间：他是否回国。

次年春天，巴黎流行霍乱。病死的人比比皆是。医院里的床位和灵车都不够用。

屠格涅夫的寓所的租期快到了。他打算离开巴黎，所以没有重订合同。五月底，屠格涅夫到赫尔岑家去投宿。午饭后，他开始抱怨，阴天的闷热使他觉得苦闷。傍晚，他照赫尔岑的建议去洗澡。回来后，觉得不好受，喝了点掺葡萄酒和糖的苏打水，便去睡觉。夜里，他叫醒了赫尔岑。

“我好不了啦，我得了霍乱。”他对朋友说。

第二天，赫尔岑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巴黎近郊维尔达弗莱村，和患病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留在寓所里，护理了他十天。

一八五五年夏，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终于给儿子寄来了回国的路费，但提出条件：必须立即回去。哥哥打算和他一同要求母亲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独立，所以也邀他回国。

五月中旬，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向库尔塔弗内尔的田野和树林告别。

随后，他回到巴黎，打算和赫尔岑会晤，但没有碰见他，“亲爱的亚历山大，我是在你启程一小时后由乡间到达的；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懊丧；倘若临回国前能再见你一面，我是多么高兴啊。是的，老兄，我要回去了，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后天就离开巴黎……你可以相信，你的全部书信和文稿我将完好无损地送到……”

看来，屠格涅夫又承担了“外交信使”的义务，并且象一八四一年从柏林携带巴枯宁的文稿那样，现在正满足赫尔岑的要求。

由于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约定了特殊的联络方法。“天晓得我什么时候能再给你写信，天晓得在俄国等待我的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情况时，你可以在康市的路易·莫里塞先生主编的《论战报》上刊登启事通知我，等等。我将读这种杂志，便能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离开法国时，屠格涅夫和他的年长的朋友这样约定。

巴·德·基谢廖夫（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出任俄国驻巴黎大使。

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教名。

“康市的路易·莫里塞先生主编的《论战报》”：原文系法语。

屠格涅夫把这个法文词误为“杂志”。

第十七章

返回祖国——母亲逝世——在果戈理家作客

六月末，一艘由斯德丁开往彼得堡的班轮把屠格涅夫送回祖国……屠格涅夫的朋友和熟人们发现，他的外表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他还未滿三十六岁，却已两鬓斑白了。

他没有在彼得堡滞留，赶紧前往莫斯科，因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正在那儿等待他。和母亲的会见，起初使他对商谈的有利结果寄予希望，但这个希望有如昙花一现，很快就化成泡影了。

儿子们以最尊敬的方式要求为他们规定一笔哪怕不大的收入，以免有一点小事就去麻烦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含糊其词地答应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但一切依然如故。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刚愎自用，终于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失去了耐性。他尤其为哥哥抱屈，便坦率地对母亲说，作弄一个有家室的人，并使他和妻子、孩子受穷，这未免太狠心了。

这一果断的声明引起了争吵，于是他从家里搬进了旅馆。随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到屠格涅沃庄园去，这个庄园原先属父亲所有，规模不大，与斯巴斯科耶相邻。他的母亲则随即返回斯巴斯科耶。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由农村发往巴黎的第一封信中极其笼统地谈了自己和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的恋爱经过。他感到有必要作这一番忏悔，因为他亲眼看到，他那被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交给洗衣女仆照料的八岁的女儿彼拉盖雅的处境是多么卑贱和可怜。

全村人都幸灾乐祸地管波丽雅叫小姐，马车夫却叫她提水。

有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命令给女孩子穿上干净的衣裳，领到客厅来；在那里，“祖母”不顾儿子在场，对周围的人说：

“你们仔细瞧瞧这个女孩子吧。她长得象谁？”

被问的人窘住了，不知如何对答。

“怎么，你们没看出相似的地方吗？这张脸和咱们伊凡的脸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不是你的女儿吗？”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笑着问他。

“这些都使我不得不考虑女儿的前途，没有维阿尔多夫人的意见，对生活中的任何重大事情，我是不能事先作出决定的。所以我毫无隐瞒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这位女子。”嗣后，屠格涅夫对费特承认说，“维阿尔多夫人说得对，在俄国，任何教育都不能使女孩子摆脱暧昧的处境，建议我把女孩子送到她家去住，让她和她的孩子一起受教育。”

十月底，波丽雅由去巴黎的法国女人罗戴尔陪同出国；她在途中时，屠格涅夫紧跟着给维阿尔多夫人写信道，他决心今后为女儿做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结果，五年多以后父女才在巴黎相会；这期间，女儿已把俄语忘光了。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刚把女儿送走，就在彼得堡获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病危的消息。他当天就赶到莫斯科，但母亲已经病故。母亲出殡那天，他很晚才到达，这时亲戚们已从顿河修道院墓地回来了。

波丽雅是彼拉盖雅的法国名字波琳娜的小称。

甚至在弥留之际备受折磨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仍然不甘心让儿子们摆脱她的约束。“她临终前的那几天，情况十分凄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给波琳娜·维阿尔多写信说，“她只想竭力麻醉自己。她在临终前一天，喉头已发出嘶嘶的喘息声，而一个乐队却奉她的命令在隔壁房间里演奏波罗乃兹舞曲。”

过去，她只想一桩事——如何使儿子破产。在写给斯巴斯科耶庄园主管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命令把庄园廉价卖掉，或者干脆把它烧光。

“尽管如此，这些全都应该忘掉。”屠格涅夫在信的结尾写道，“如今，当您，接受我的忏悔的人，知道一切之后，我一定真心实意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她是轻而易举就能使我们爱她，并为她感到惋惜的。”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病故后发现的日记，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大为震惊。他一口气读完了这部日记，一面思考她的命运、性格和行为，竟彻夜不能成眠。

“怎样的女人啊！……愿上帝原有她的所作所为吧！但这是怎样的一生啊！”

分遗产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哥哥作了很大让步，他仅提出一个愿望：一定把斯巴斯科耶分给他。

他在自己的庄园里“立即让奴仆们获得自由，照农民的愿望改为佃租办法，千方百计促进农奴的全面解放，赎地时一律减少五分之一赎金，庄园里的那部分土地不收赎金，这算起来是一大笔钱。”

七十年代，青年文学史学家谢·阿·温格罗夫向屠格涅夫提出一个问题：他为自己的农民做了些什么。当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屠格涅夫又补充说：“如果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许还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做得更快；但我答应过要说真话，所以我就照实说出来。这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我认为，这也不会使我丢脸。”

以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专横跋扈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落到倨傲的乞丐的境地。据他的朋友们说，虽然他有时也承认自己处境困难，但从让人们看出他穷困到什么地步。所以他们连想都想不到，他有时竟难以口。

如今，屠格涅夫在经济上已不再拮据了。他过起舒适的生活来，雇了一名厨子。他生性好客，喜欢请朋友和熟人们吃饭。朋友们缺钱时，他乐于解囊相助。

到屠格涅夫家里来参加晚会的，有文学家、演员、科学家和音乐家。常客是安年科夫，波隆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克萨科夫兄弟，鲍特金，格拉诺夫斯基，扎别林，米·谢普金，普罗夫·萨多夫斯基，谢·舒姆斯基。

这些晚会的参加者记得，主人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时常就当时使知识界分为两大阵营——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

伊·叶·扎别林（1820—1908）：俄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普·米·萨多夫斯基（1818—1872）：俄国著名演员。

西欧派：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认为，俄国的发展基本上要走西欧发展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西欧派把西欧的资产阶级制度扣文化理想化了，他们拥护民主立宪制，主张与沙皇制度妥协用改良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一样惧怕革命，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敌人。

他们记得，著名演员萨多夫斯基表演了取材于民间生活的幽默场面，大家合唱了魏尔斯托夫斯基的《阿斯科利德之墓》选段。

一八五 年底和次年初，屠格涅夫为在两个首都 的剧院上演他的剧本奔忙。

这些剧本在审查中遇到许多麻烦，而要在杂志上发表也非易事。有的剧本遭到歪曲，有的剧本则被禁演。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是屠格涅夫的戏剧作品的热情宣传者。他在朋友和熟人们家里朗诵这些剧本，并试图在家庭剧场演出书刊审查机关禁演的喜剧。喜剧《食客》中库佐弗金这一角色曾特别长久地在他的脑际萦回。

在这段时间里，屠格涅夫对自己从事戏剧创作的天赋还充满信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单身汉》和《外省女人》演出的成功促成的。

看过令人厌烦的法国轻松喜剧之后，观众、演员和记者对演出好的俄国喜剧都感到高兴。

“作者观看自己创作的剧本的演出是很有教益的！”屠格涅夫从上演《单身汉》的剧院回来后写道，“不管怎么说，你在那里成了观众，每一处冗赘，每一个虚假的效果，都立刻使你象遭雷击一般感到惊讶。第二幕无疑是写得成功的，所以我认为，观众太宽宏大量了。但我毕竟是非常满意的。这个习作对我表明，我有戏剧天赋，将来能写出好的剧本来。”

《外省女人》取得更大的成功。喧闹的、要求谢幕的喝彩使屠格涅夫激动、发窘，他便赶紧躲藏起来。谢普金走上舞台，宣布作者不在剧院以后，要求谢幕的喝彩声方告停止。

这位曾和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交好的伟大演员非常喜欢伊凡·谢尔盖耶维奇。

有一天，屠格涅夫对谢普金说，他想和《死魂灵》的作者认识。他对果戈理的天才感到极大兴趣，几乎背熟了他的作品。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回答说：

“既然您愿意，咱们一块儿去见他吧！”

但屠格涅夫提出异议，说，事先不打个招呼，看来是不合适的——果戈理会以为他是强人之难。

“啊呀！我的天哪，先生您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拘泥细节呢？”米哈伊尔·谢普金高声说。

但他还是很快就到果戈理家去了一趟，问他：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一位俄国作家想和您相识，不知道您是否愿意？”

“这个是人谁啊？”

“这个人相当有名·您大概听到过他：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从某个时期起，果戈理就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屠格涅夫才能的发展。不久前，在一个人家里谈论青年作家时，他就曾说：“在今天的整个文学界，屠格涅夫是最有才华的人。”

阿·尼·魏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俄国作曲家和戏剧活动家，十九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歌剧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阿斯科利德之墓》是他的一部最负盛誉的歌剧。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

果戈理欣然同意谢普金的要求。这甚至使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他知道，如今果戈理不爱与人结交了。

其实，在这以前屠格涅夫就见过他好几回——三十年代在彼得堡大学的讲台上，四十年代初在莫斯科叶拉金家里——，如今才有机会和敬爱的作家相识。

这几次见面之间相隔的年代，是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中的几个不同时期。登上彼得堡大学的讲台时，他还刚刚步入文坛；在叶拉金家里，屠格涅夫与这位指引俄罗斯文学沿着崭新的道路前行的著名作家似乎也有过一面之缘。现在他将要与之相会的人，却因《与友人书信节选》的失败而正处于深刻的内心危机时期。

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先进思想界极其明确地指出，作家陷入了神秘主义和说教的泥坑，走上了歧途。

果戈理了解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亲密关系，因而想在会见中对屠格涅夫谈谈他读了赫尔岑指摘他的最后一本书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之后的感受；他在接受对他的《书信节选》的批评时，感到非常痛苦。

谢普金和屠格涅夫是在白天到他家里去的，他马上接待了他们。当时他住在尼基塔路塔雷辛公寓亚·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

他们一走进室内，就看见了果戈理。他站在斜面的长写字台跟前，手里拿着笔，身上穿着深色大衣、绿丝绒坎肩和肉桂色裤子。

这次访问前不久，屠格涅夫在上演《钦差大臣》的戏院里见过他。果戈理仿佛是为了躲避观众，坐在包厢里座，伸长脖子向舞台张望，看样子对演员的表演不大满意十年前屠格涅夫碰见他以来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使屠格涅夫大为惊讶。“在他那素来敏锐的面部表情中，掺杂着一种隐秘的痛苦和忧虑，一种郁闷和焦躁……”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谢普金和屠格涅夫，握了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手，说道：

“咱们早就该认识啦……”他邀他们就座。

屠格涅夫端详果戈理的面孔。“他那象哥萨克一样通常从鬓角直披下来的金发还保持着青春的色泽，但是已经明显地稀疏了；他的微斜的、光滑白皙的前额依旧令人深深地感到他的才智。一对不大的深棕色眼珠有时闪烁着愉快——正是愉快，而不是嘲笑——的神色；不过目光总是显得有些疲倦”。

一谈论起文学，作家的使命，对自己的作品应持的态度，以及创作过程，果戈理就明显地活跃起来。

“您是有天才的，”他对屠格涅夫说，“对它要珍惜……我们在文学上是贫困的，使它丰富起来吧。主要的是，不要急于发表作品，要深思熟虑。把小说先在脑子里酝酿成熟，那时才动笔，要多加修改而不要感到难为情。普希金曾无情地修改自己的诗作。他的手稿涂改得很厉害，以致谁也无法辨认。”

听到屠格涅夫说，《外套》和他的其他一些作品被译成法语，在巴黎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果戈理感到非常高兴。他知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曾给译者出主意，给予很大帮助。但他仿佛想起了什么，脸色骤然大变，焦躁、气忿地问道：

“为什么赫尔岑竟敢在外国杂志上肆意侮辱我？”

“赫尔岑当然不想触犯您本人，他只是感到痛心，您，一位先进的人，在他看来，离开了自己的道路。”屠格涅夫答道。

“我很遗憾，朋友们给我抹上了政治色彩。”果戈理说，“我想用《书信节选》表明，我并非那么个人，由于一时受到诱惑，便离了谱儿。确实，我听信了周围的人，是有过错的……假如说出的话能够收回，我可真要销毁我的《书信节选》。我真想要烧掉它。”

进一步谈到《书信节选》时，果戈理试图证明，他一向坚持同样的政治、宗教观点。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甚至从刊登在《小品集》中早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论通史教学》里挑了几段，念起来。

“你们看，”果戈理反复说，“以前我经常所想的，我所表示的信念，也跟现在一样！为什么骂我变节、背叛？……为什么骂我？……”

这时，屠格涅夫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和果戈理的世界观之间，隔着一道多么深的鸿沟啊。

“这就是曾经上演过的最富于否定精神的喜剧之一——《钦差大臣》的作者说的话！我和谢普金噤口不语。最后，果戈理把书往桌上一扔，重新谈起艺术和戏剧来，说他对于《钦差大臣》的演员的表演仍旧不满意，说他们‘失去了那种情调’，他准备把整个剧本从头到尾给他们朗读一遍。谢普金抓住这句话，立刻同他谈妥了朗诵的地点和时间……’由于谈话取得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屠格涅夫有幸听到果戈理亲自朗诵《钦差大臣》。这对于他是真正的“盛宴和佳节”

十一月五日，一些作家和演员还是聚集在亚·彼·托尔斯泰的寓所里；除了谢普金和屠格涅夫之外，到这里来的有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舍维廖夫，尼·贝尔格，普·萨多夫斯基，舒姆斯基等人。

果戈理那非常质朴、含蓄的朗读风格，使屠格涅夫大为惊异。他似乎“只关心怎样深入体会对他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主题，以及如何更正确地表现他自己的感受。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念到滑稽、幽默之处的时候……我这才了解，通常演《钦差大臣》的人演得多么不真实和肤浅，他们一心只想快点逗人发笑”。

听众都大为赞赏，虽然念得精疲力竭的果戈理说，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暗示、一幅草图罢了。

在穿堂里和果戈理分手时，屠格涅夫没有料到，他再也见不到他了……

赫尔岑的文章《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最初于一八五一年用德文在杂志上发表。

尼·瓦·贝尔格（1823—1884）：俄国诗人，翻译家。

第十八章

流放——《猎人笔记》

一八五二年二月，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获悉伟大作家果戈理逝世的噩耗。这一事件使他深受震惊——仿佛雷电突然在他眼前击倒了参天的橡树……“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给伊凡·阿克萨科夫写信道，“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比果戈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的了。”

他于二月二十一日致波琳娜·维阿尔多的信是用这些话开头的：“发生了巨大的不幸。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您简直难以想象，这一如此令人悲伤、震撼天地的损失是多么巨大。在这个沉痛的时刻里，没有一个俄国人不为之悲痛欲绝。对我们来说，失去的不只是一位作家：他使我们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处境。对我们来说，他在一定意义上是彼得大帝的继承者……只有俄国人才会对他有真切的体会……”使他感到不快和惊讶的是，人们谈论果戈理之死好象只是顺便提及而已，而且颇为冷淡。他佩带黑纱，故意引人注意；拜访熟人时，他强烈谴责上流社会的丑类们的冷漠。为了阐明这一损失的社会意义，屠格涅夫写了一篇悼文，投寄给《彼得堡新闻》编辑部。他向朋友们承认说，他写这篇悼文时曾失声痛哭。“果戈理逝世了！……哪一个俄国人的心灵能不被这句话所震撼呢？我们的损失是那样惨重，那样出乎意外，以致我们至今仍然不愿相信它……是的，他逝世了，我们现在有权利，有死亡给予我们的可悲的权利，称他为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以自己的名字标志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我们把他作为我们的无上荣光而引以自豪！”但尼古拉王朝的宪兵和尼古拉一世本人对《死魂灵》的作者却持另一种态度。书刊审查委员会禁止发表屠格涅夫的文章；该处认为，文章的语气，特别是称果戈理为伟大的人物，都是大逆不道的。屠格涅夫在街上碰到那家杂志的发行人，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气候，”那人隐晦地说，“连想也不要想啦……”

“可是这篇文章是无可厚非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无可厚非，根本不准提起果戈里的名字”

于是，屠格涅夫向莫斯科朋友瓦·彼·鲍特金和叶·米·费奥克季斯托夫了解，他在此以前寄给他们的悼文是否可以试一试不署名在《莫斯科新闻》以彼得堡来信的形式发表。

“我想挽回住在这里的正直的人们的名誉。难道这件事就这样过去，而我们对你只字不提吗？！……穆辛—普希金禁止它发表，甚至胆敢把果戈里称为奴才作家，这实在令人发指。”他告诉鲍特金。

由于鲍特金和费奥克季斯托夫的努力，这一尝试成功了屠格涅夫的文章经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检查后，于三月十三日登载在《莫斯科新闻》第三十二期上，署名：屠……夫。

叶·米·费奥克季斯托夫（1828—1896）：俄国国事活动家，文学家，回忆录作者，曾担任出版总署署长。

指果戈理。——原注。

米·尼·穆辛—普希金（1795—1862）：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彼得堡区督学兼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

沙皇政府立即着手审讯与此案有关的人员。第三厅 厅长列·瓦杜别利特上书沙皇，提议严厉训斥屠格涅夫这个“火爆的、不易于制服的人”。宪兵司令阿·费·奥尔洛夫则建议布置秘密警察监视作家。

但是沙皇觉得这样的处置还不够严厉，他在奥尔洛夫的报告上批示：“吾意此法过宽，为治其公然违抗命令之罪，应予拘留一月，然后遣返原籍，予以监视。”

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六日，屠格涅夫被捕，关进拘留所。

屠格涅夫被拘留的最初几天，许多朋友和熟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他，因而当局认为必须完全禁止这种探视。

启程前往斯巴斯科耶前，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远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屠格涅夫的住宅里，对一小部分彼得堡朋友朗读了他在拘留期间写就的中篇小说《木木》。

听过朗读的安年科夫写道：“无论就内容而言，还是就虽则忧郁、然而平静的叙述语调而言，他的这篇在拘留所写成的小说给人留下了非常动人的印象。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继续他就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开始进行的积极的文学宣传，以此回敬他所遭到的惩罚。”

屠格涅夫是沿他被流放前不久建成的铁路由彼得堡前往莫斯科的。彼得堡警察局长命令作家前往奥廖尔省，沿途不得停留，但屠格涅夫稍许延长了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在那里和许多熟人相会，并且和青年历史学家、熟悉古代莫斯科的优秀行家扎别林游览了克里姆林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到达斯巴斯科耶之后，住在住宅的一所厢房里。最初几个月，他醉心于读书、休息和打猎，享受恬静、安宁和隐居的乐趣。

这桩事情并没有使他不快。他对阿克萨科夫兄弟说，他感谢命运给予他在拘留所蹲了一个月的机会：

“那里，我得以从迄今所不太熟悉的角度观察俄罗斯人民。”

在乡间，他通读了果戈理的作品，着手阅读俄国史、俄罗斯史诗方面的书籍，研究编年史、歌谣、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力求深入了解祖国人民的民族性格、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觉得，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祖国人民是最难以猜测、最令人惊叹的。

有一段时间，屠格涅夫根本没有动笔，没有试写任何作品，因为以前的写作风格再也不能使他满足了。过不多久，他应该很快地由小品、特写、短篇小说和剧本向大型作品过渡，向当前社会生活的概括性画卷过渡。但这种过渡却无法迅速实现。

被捕前一个月，他就对朋友们说，《猎人笔记》至此结束。“应该走另一条道路，”现在他给安年科夫写信道，“应当找到这条道路，永远放弃原先的风格。我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努力从人们的性格中提取精华，然后把它装入一些小瓶子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写出什么大部头的平静的作品呢？我能成功地写出一部线条清晰明朗的作品吗？”

鲍特金曾设法说服屠格涅夫，他的每一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如同杰里尼的金质制品，都可资鉴赏，并且希望他尽可能长久地采用他从农村生活中幸运地找到的半是小说、半是特写的形式，但是自费力气。屠格涅夫本人的看

第三厅：沙皇尼古拉一世于一八二六年七月建立的一个专为迫害进步的政治活动家的机构。

杰里尼（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首饰匠和徽章雕刻制作者，作有优美的精细雕刻品和装饰品。

法则不同，认为这是已经走过的阶段，他不能返回去。

他想用《猎人笔记》单行本总结自己的早期创作。出版这本书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屠格涅夫被逮捕、流放之前，它就顺利地通过了书刊审查。屠格涅夫和他授予出版权的凯特切尔把《猎人笔记》的印刷延宕了一些时间，最后决定于一八五二年要出版这本书。

这本书的问世，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真正的大事。《猎人笔记》刚刚发表时，同时代人就感到了它的反农奴制的性质，这些数年间散见各期杂志中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之后，他们尤其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

伊凡·阿克萨科夫读了这些小说的单行本后，对屠格涅夫表示惊奇，为什么这种书能得到各级书刊审查机关的批准，没有受到阻挠，“因为这是对地主生活的一系列猛烈的袭击，一阵密集的炮火”。

《猎人笔记》对读者的所谓不良影响，使官方人员惊惶不安，于是他们秘密调查单行本出版的情况。教育部大臣上书沙皇说，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

批准出版这本书的书刊审查官李沃夫被革职，负责调查的官员则厚颜无耻而又直言不讳地质问：“向我国识字的人们证明，作者所加以美化的我国独院小地主和农民遭受压迫，地主行为不端，无法无天，村中的神父们对地主卑躬屈节，县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接受贿赂，或者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后生活得更自由自在和美好，这样做有何裨益？”

在创作中，屠格涅夫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不采用过分生硬的语言，不是用说明，而是用白描手法巧妙地突出主题思想，因而加强了小说赋予人的印象。艺术家应该以自己的笔力、自己的手段取胜这一信念，是他的创作方法的基础。他坚决主张，作家的任务是塑造形象，力戒解释，力戒把自己的意见和结论强加于读者。说教总是和技巧的拙劣互相联系的，它是作家不成熟的特征。这是粗糙的作品。只有当作者自己感到他不能以形象取胜时，才匆匆忙忙地去解释，他的形象应该意味着什么。

屠格涅夫的一位同时代人丘特切夫立刻感觉到了并指出他的创作方法的这一特点。《猎人笔记》问世不久，他就读了这些小说。“这些小说充满强大的生命力量和卓越的才华。”他写道，“两个难以结合的因素——对人类的同情和艺术家的感情——如此高超、如此均衡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人类现实生活的底蕴和对饶有诗意的大自然的深刻理解也结合得非常出色。”

丘特切夫这里谈到的均衡的秘密，恰恰蕴蓄于屠格涅夫的创作方法之中。在他的小说里，没有反对农奴制的悲剧的愤怒言词，但不易察觉和不受拘束地写进小说的详情细节却使读者非常强烈地感到：农民的奴隶地位是多么悲惨，他们在精神上比压迫者优越。

“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屠格涅夫自己说，“我觉得，它是我对俄罗斯文学宝库所作出的一个贡献。”

精明的艺术家在书中满有把握地塑造了人物群像，并探求了真正的技巧的奥秘。

尼·赫·凯特切尔（1809—1886）：俄国作家和翻译家。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保守主义者。

书中广泛地描写了当时俄国的一个省份中从显贵的老爷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各个社会阶层。有家道富裕的地主，中等资财的地主，沦为有钱人的食客和玩物的破产的庄园主，独院小地主，农奴和家仆，管家，总管，村长，地保，守林人，包工头，事务员，医生，小商人，贩子，县警察局长，区警察局长，巡视员，酒保，茶房，马车夫，近侍，听差。

屠格涅夫的这本书问世之前，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过如此丰富多采的“典型”。以往的小说家极少描写农妇和农家孩子。屠格涅夫以《幽会》、《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白净草原》、《活尸首》等小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猎人笔记》中小说的题材仅仅在表面上和行猎有联系。其中一些小说——《独院小地主奥弗西亚尼科夫》、《塔季雅娜·鲍利索芙娜和她的侄儿》、《歌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中，对行猎只字不提。在其他小说中，作者只用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用以展开情节。“我打猎回来”，“我们出去射猎求雌的山鹬”等等。只有一篇随笔（《森林与草原》）通篇讲述猎事。

书名根本不概括全书丰富多采而深刻的内容，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他的一位年长的同时代人——谢·季·阿克萨科夫所写的一本书加以比较，则书名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

由于偶然的巧合，这两本书几乎同时问世。但这两本书既不互相排斥，又不互为补充，也不进行竞争。这两本书内容迥然不同，其中，阿克萨科夫的《奥连堡省一个带枪猎人的笔记》就其题材的高度明确性而言，才是名副其实的猎人笔记。

自屠格涅夫来到农村后的第一天起，他的书案上就一直放着这本书。他打算为《现代人》杂志撰写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所以慢腾腾地、津津有味地逐段逐页地反复阅读这本书。

然而，带枪的行猎，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俄里外的邻省的长途旅行——时而去科泽利斯克和日兹德拉打松鸡，时而去卡拉切夫和叶皮凡猎沼泽地带的野禽——老是使他把文章搁下。

对打猎的嗜好使屠格涅夫和老人阿克萨科夫接近。诚然，阿克萨科夫几乎四分之一世纪前就停止打猎了，但他对与打猎有关的一切事情仍旧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谁也不如他了解狩猎的全部奥妙！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屠格涅夫非常高兴地告诉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他在一年中“用自己的枪”打了多少只山鹬、松鸡、大鹬、鹧鸪、鹌鹑、秧鸡、野鸭和小鹬。

工作和娱乐，各有其时……当初冬突然降临，使猎事猝然中断，屠格涅夫便专心致志地搞创作，首先着手写文章。为了使文章象一个猎人同另一个猎人谈话那样酣畅和毫不拘束，他便以《给〈现代人〉杂志的一体发行人的信》这一形式来写这篇文章。这位发行人乃是诗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也经常把自己打猎所取得的成绩告诉他。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今年夏天您不止一次地提醒，我曾答应过在您的杂志上更详细地谈谈谢·阿克萨科夫写的一本好书，但我至今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作为一个真正的猎人——身心都是猎人——我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手不离猎枪，压根儿没有提过笔。

“然而，如今我们这儿已是冬天；十月二日，第一场严寒突然降临，十

月三日，一大早就刮起了暴风雪，至今没有停息；骤然间，田野银装素裹；打猎的时间不长了；野外——用俄国歌词来说——风雪呼啸，刮得天昏地暗，叫人睁不开眼睛；一个礼拜前，每次我还能打到几十只山鹑，如今要猎二、三只都很费劲：用猎人的话说，这场凛冽的初寒把它们‘赶跑’了……“当我坐在自己的斗室里时，才想起了自己的许诺：我虽然无法打猎，但猎事仍然在脑际萦回；于是我兴致勃勃地提起笔，为《现代人》杂志写评论《奥连堡一个带枪猎人的笔记》一文。”

“这本书写得多么好啊！”屠格涅夫赞叹道，“它的格调多么清新，文笔多么优美，观察力多么敏锐，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爱又是多么深刻、热烈啊！”阿克萨科夫的观察是何等朴素、自然、准确、细腻，他记述的技巧又是何等精湛。

“这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语言，浑厚而爽快，灵活而机巧。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既不紧张，也不松弛——用语流畅准确，一切恰到好处。”作者在文章结尾处表示希望，“无论是在宽阔的俄罗斯河流两岸的我们的祖先，还是在欢乐、葱翠的古英吉利橡树林中的民间叙事诗的英雄——射手罗宾汗和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曾借以娱乐的狩猎业，在我们的祖国还能蒸蒸日上，经久不衰……”客人偶而的来访，调剂了枯燥的孤独的村居生活。屠格涅夫不大过问家事。庄园的事务由他的彼得堡朋友尼·丘特切夫料理，他是应屠格涅夫的请求带着全家迁来斯巴斯科耶的。

当时，在基拉西尔团服役的诗人阿·费特正在距姆岑斯克不远处的诺沃谢尔卡庄园度假。由于对诗歌和猎事的共同爱好，过了不久，屠格涅夫就和他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唉，同他结识纯粹是多余的！”父亲得知费特打算去斯巴斯科耶之后，对他说，“要知道，他是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并受警察监视的人。这多不体面啊。”

邻近庄园的一位年轻的地主瓦西里·卡拉塔耶夫时常来探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他二十五岁，为人十分热情，酷爱文学和音乐，生性幽默、直爽。由于他有自由思想，言语尖刻，其他邻人都不喜欢他，但屠格涅夫却很高兴和他一起消磨时间，下象棋，玩台球，长时间在公园里边散步，边交谈。

有一次，米·谢·谢普金访问了斯巴斯科耶。他带来了奥斯特罗夫斯基新写的喜剧《安分守己》，并且念给屠格涅夫听，这个剧本不久前曾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

煎来探访的还有斯拉夫主义者伊凡·阿克萨科夫，俄罗斯民歌的行家和热心的搜集者彼得·基列耶夫斯基。

从遥远的库尔塔弗内尔时常来信，屠格涅夫总是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等待这些书信。

亲爱的善心的朋友，我恳求您时常给我写信……我被监禁在农村里，期限不定……既没有音乐，也没有朋友——真要命！连可以在一起消磨时间的邻居都没有。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创作和回忆。但是为了使创作进行得轻松，回忆稍减辛酸，我需要您来信谈谈幸福的、朝气蓬勃的生活，给我带来太阳和诗歌的芳香……”

罗宾汗：中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民间叙事诗中反封建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传奇式的英雄。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283——1886）：伟大的俄国剧作家。

过了不久，大概为了满足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请求，波琳娜·维阿尔多决定来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于是屠格涅夫无视不得进入首都的禁令，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下旬秘密动身去莫斯科。

许多年后，当屠格涅夫回忆起这次旅行时，对熟人们讲了一件他在莫斯科遇到的一桩可笑的事情。

“当我被流放到农村去时，冬天，有一回我无论如何得去一趟莫斯科……怎么办呢？我冒用一个商人的名义弄到了一张假身份证便出发了。我在莫斯科一个孀居的女商人那儿租了一个房间。我当然不待在家里，只回去过夜。有一次，我从剧院回来，准备就寝。突然，我的女房东领着儿子走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扬声说：‘老爷，你把我的格利什卡收下，教给他本事吧！’”她又推儿子，说：‘傻瓜，快跪下！……老爷，收下吧，教会他怎样生活，怎样办事。我把支配他的全权交给你！只要教给他本事，打他、叫他挨饿都行！’”她又下跪，儿子也下跪。小伙子个头挺大，肥胖，面孔呆板。什么缘故呢？原来她观察我已经多时：我是个什么样的商人？我明明什么事也不干，不待在家里，没人来找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买卖，和其他商人不同。她以为我是世界上的头号大骗子。她的儿子是个头脑简单的小孩。于是乎她灵机一动，决定把他交给我管教。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她……”

四月一日，屠格涅夫又回到了斯巴斯科耶……维阿尔多夫人由俄国抵达伦敦后，亲口对赫尔岑讲了他的朋友这一秘密的首都之行。

屠格涅夫不因村居生活而感苦恼。他越来越专心致志地搞创作，逐渐广泛地观察省里的贵族、官吏和农民。这些新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使他开始熟悉现代生活和人民，觉察到他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忽略的俄国生活的那些方面。

这里，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篇小说《客店》、《两个朋友》和没有结束的长篇小说《两代人》的第一部。

流放前，这部长篇小说已构思就绪，但一八五二年末，屠格涅夫才开始执笔。

他把《两代人》的手稿寄给文学界的朋友——安年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和鲍特金。他们认为，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是成功的，但对整部小说不表赞许。作者同意他们的评价。后来，屠格涅夫以《领主办事处》为题，仅发表了长篇小说中的一章。

屠格涅夫掌握新的创作方法并非容易，这可不是信手拈来的。他的作品不仅体裁改变了，而且题材也改变了。这一时期，屠格涅夫和康·阿克萨科夫恰好在关于今后作品的题材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有趣的争论。如果说，鲍特金“不愿舍弃……屠格涅夫以前的风格”，那么恰恰相反，阿克萨科夫则赞成他放弃《猎人笔记》，但他认为，屠格涅夫应当深入研究农民题材。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向屠格涅夫发挥了这一思想：唯有农民才可能是，而且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创作对象。阿克萨科夫说，失去独创性的、只配受人嘲笑的“有文化的社会阶层”——这些模仿他人的人，是没有任何真正的生活的。“精神力量完全寓于独立精神之中；当前，在我们的生活中，唯独农民才具

二月十七日，鲍特金从莫斯科来信告诉屠格涅夫：“此间谣传，维阿尔多夫人要到农村去见你。我有些不信，但为你考虑，我非常希望确有此事。”——原注。

有这种精神力量。”因而，阿克萨科夫认为，《木木》和《客店》是屠格涅夫在过渡阶段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所以他力图说服屠格涅夫相信他，认为这将为他开辟广阔的天地，也许那时屠格涅夫能按照斯拉夫派所期望的面貌创造出农民的雄伟形象来。但斯拉夫派对文学的任务的理解对于屠格涅夫是格格不入的。他给阿克萨科夫写信道：“我不能赞同您关于模仿他人的人的意见。爱模仿他人的人是自愿的，而且主要的是，是洋洋自得的。——是这样的。但我既不能否定历史，也不能否定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们对俄罗斯生活和艺术的分歧正在于此：在您发现史诗的慰藉和荫庇之所的地方，我看到的却是民族的悲惨命运，巨大的社会悲剧。”

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在我看来，您回避人民（不仅是我国人民，而且是各国人民）生活的悲惨的一面，然而我们的民歌却放声歌唱这种生活。”

阿克萨科夫还不知道，这时屠格涅夫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农村题材。“在文学中，庄稼人使我们烦恼透了。”他给安年科夫写信道，“这倒无所谓，但我开始意料，虽然我们如此频繁地描写他们，却对他们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切开始带有牧歌的色彩。”

屠格涅夫懂得，第一，对农民的生活缺乏了解，第二，无法更广泛而详尽地描写农奴制度的弊端，——这两个原因妨碍作家全面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现俄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决不愿意把这种生活理想化。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论据无法说服作家。他选择社会中“有文化阶层”的人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同后面几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很难说，《两代人》失败的原因何在。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所表示的忧虑可能不无原由：“主要的是，我是否写得合乎长篇小说的情调。局部——个别的场面无法使整个作品免于失败，——长篇小说并不象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拉长的中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没有完成。但，过不了多久，屠格涅夫将向读者呈献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在这些小说中，他——按照他自己的决定——力求“认真、公正地描写莎士比亚称之为时代的形象和压力”的东西和有文化阶层的俄国人（作家的主要观察对象）迅速变化的面貌，并用适当的典型把它们体现出来。

即书刊审查制度的限制。——原注。

“时代的形象和压力”：原文系英语。2

第十九章

《现代人》周围的作家——与涅克拉索夫的友谊

自一八五三年中期起，俄国逐渐卷入与土耳其的军事冲突，随后爆发了同欧洲列强联盟的战争。这一战争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将沙皇统治的腐朽和无能暴露无遗。

根据报纸上发表的少量官方消息，很难判断战争的进程。传到县里偏僻地区的自相矛盾的谣言和纷乱的议论，丝毫无助于弄清情况。

当同土耳其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时候，十一月二十三日，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接到宪兵司令奥尔洛夫关于解除流放、准许进入首都的通知。

当天，他派信差去见叔父，要求他负责管理田庄，并且打点行装，准备启程，预感到同朋友们相会的欢乐。

十二月十三日，《现代人》周围的文学家们设午宴庆祝《猎人笔记》的作者光临，宴会上热闹非常，大家愉快地碰杯痛饮，致祝词，即兴赋诗。

冬天是在首都和朋友们的频繁会见中度过的，这些朋友是：涅克拉索夫，格利戈罗维奇，巴纳耶夫，安年科夫，鲍特金，还有自奥廖尔省的偏僻地区不期而来的费特。他奉命调至乌兰禁卫团，因而如今常常到彼得堡来。他们是老相识了，所以费特几乎每天早晨都到他那所座落在大科纽申街的公寓来。

有一天，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到费特下榻的旅馆去，碰见他正伏案写作：诗人刚刚写完《在春汛期间的第聂伯河上》一诗的最后几行。屠格涅夫听了这首诗后说道：

“我曾担心您的才华已经枯竭，但它的脉搏在您身上跳动得更加激烈了。写吧！写吧！”

在诗人的命运中，他和屠格涅夫的友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把他引进《现代人》的圈子，精心校订他的诗作，帮助他锤炼作品，孜孜不倦地使创作技巧益臻完美。为出版费特的第三本诗集的准备工作，他作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五月底，屠格涅夫搬到一所别墅去，与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为邻，这所别墅在彼得戈夫附近，一个移民的不大的宅子里。

屠格涅夫常常对朋友们表示遗憾：他至今还没有给自己筑个窝。有时，他觉得，得到这个窝的愿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流放归来之后，屠格涅夫遇到了一个好象向他预示新的生活的机缘。一八五四年夏，他爱上了一位远亲的女儿奥丽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屠格涅娃。一八五二年，他曾在这位亲戚的住宅里朗读中篇小说《木木》。

她十八岁，具有罕见的善良、妩媚、聪颖和音乐天赋。

屠格涅夫曾想向她求婚，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但后来“这些计划都落空了……”

看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波琳娜·维阿尔多的多年的、深沉的眷恋毕竟超过他对奥丽加·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感情。

关于命中终归没有注定成为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伴侣的奥丽加·屠格涅娃，保存下来的材料很少，且很零碎。据悉，和屠格涅夫断绝关系使她感到痛苦。后来，她嫁给谢·尼·索莫夫，和他在国外时，曾在巴黎和伊凡·谢

尔盖耶维奇见面。从一切迹象看来，他对他们相识的初期始终保留着最幸福的、富有诗意的回忆。

屠格涅夫生平和创作的研究家们推测，在长篇小说《烟》中，他在李特维诺夫的未婚妻塔季雅娜·彼得罗芙娜身上描写了奥丽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假若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李特维诺夫和未婚妻断绝关系前在巴登相会的场面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烟》的作者本人的心境。“油然而生的怜悯紧箝着他的心：这位诚实而坦率的人的恬静表情在他心中引起令人痛楚的责备。‘可怜的姑娘，你到这儿来了。’他想，‘你，我所急切等待和呼唤的，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姑娘，你来了，你信赖我……但我……但我……’”

一八七二年，屠格涅夫将奥丽加·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死讯告知安年科夫时，写道：“世界上少了一位美好、纯洁的人。我忆起了许多往事，回忆使我黯然神伤。幢幢黑影向生活袭来，不仅落在今天和未来，而且落在往昔上。”

夏天，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出现，并向喀琅施塔得逼近，这一消息使首都居民惶惶不安。他们担心这个前哨会遭到炮击。

涅克拉索夫在《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一诗中写道：

如今我们成了伟大的景象
和举世瞩目的命运的见证人……
战火笼罩了半个世界……——

这几天，诗人同屠格涅夫和巴纳耶夫正好到红山去，远眺英国舰队。装备着四十门大炮的三桅战船扬帆驶来，活象在万顷波涛之上展翅翱翔的一头猛禽。

……庞大的军舰缓缓地
悄然无声地向我们驶来，
耀武扬威地预言我们的死亡，
它们终于逼近了，停泊在
固若金汤的俄国堡垒前方……

英国和法国政府向俄国宣战一个月之后，一八五四年四月，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巴黎问世，书名被任意改为《俄国地主的回忆，或俄国某省贵族和农民的现状的画面》。

尽管译文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却奠定了屠格涅夫誉满欧洲的开端。

起初，法国资产阶级记者只是试图利用他的作品来满足当前的需要。其实，他们无论对俄罗斯文学，还是对这本书及其作者，都并非真正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不过是把它视为一种披露性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上层贵族罪恶累累、农民牢骚满腹的国家是不巩固的，摇摇欲坠的。记者们宣称，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一八五四年七月，法国著名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在《两世界评论》

杂志发表了评论《猎人笔记》的文章《文学和俄国的农奴制》，对该书作了详尽、全面的评价。

虽然梅里美对这些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优点作了应有的肯定，并指出屠格涅夫的创作手法的特点，但这篇文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争情绪。

“这二十二幅装上几乎相同的框子的风俗画，其特点是结构和叙述语气精巧而丰富多采。它们经过了细心的加工，有些地方甚至精雕细琢，因而全面、准确地说明了俄国的社会状况，”梅里美写道，“我认为，我无幸亲自会晤的屠格涅夫是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猎人笔记》不过是更为重大的、更为可观的作品的序奏。”

嗣后，当屠格涅夫的声誉排除了文学之外的一切因素的干扰而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的时候，俄国侨民——赫尔岑的朋友尼·萨佐诺夫在为法国读者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猎人笔记》的第一个译本。

“在法国，屠格涅夫最早为人所知，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冲突期间……起初，法国人读他的书是因为听信了一些宣传，希望从他的书中了解“所揭露的俄国秘密”——在狂妄到竟胆敢与英、法联军抗衡的野蛮国家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尔后，人们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在描写不开化的、但充满精神力量和天生的智慧的人民的风俗中的惊人的真实性，看到了农奴主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的情景的再现，看到了为期不远的解放。原来估计这本书必将有利于同俄国作战，但由于它清清楚楚地描述了这个国家，表现了人们至今所不知晓的事物和至今对之还只有肤浅认识的俄国人民，反而使法国人民喜爱这个国家。屠格涅夫以此为祖国立了一次大功。”

屠格涅夫的声誉蒸蒸日上。如今在文学界中，人们把他看作最有才华、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果戈理的继承人，是不足为奇的。

涅克拉索夫把他看作杂志的主要依靠。他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支持《现代人》，这些要求表明，屠格涅夫的名字对广大读者也是珍贵的：“我恳求你为第一期或第二期写一篇小说，即使篇幅不大也可以，或者随你的意写，只要有你的名字就行。否则我们拿什么给今年的杂志开头呢？”

《现代人》编辑部器重他，不仅因为他是影响最大的小说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回忆道，那个时期，屠格涅夫在那里“对诸如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诗歌和小说这些问题有很大影响”。

不但如此，一八五五年，涅克拉索夫打算去国外治病时，曾想把杂志出版事宜交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料理。“屠格涅夫能胜任我在《现代人》中的职务。”他告诉列夫·托尔斯泰。

当时，把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联系在一起的，不单是对文学的兴趣。他们的关系是真诚而亲密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请求朋友对他开诚布公，什么也不要对他隐瞒：“我对你的爱戴和信赖达到了肝胆相照的程度。希望你也这样待我。”涅克拉索夫和他见面时，给他朗诵自己写的每一首新诗；如果他们异地别居，诗人就把作品寄给屠格涅夫评判。

《两世界评论》：原文系法语。是一八三一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刊物

不久，屠格涅夫到了巴黎，与普罗斯佩·梅里美相识，并成了朋友。——原注。

尼·伊·萨佐诺夫（1815—1862）：俄国政论家，社会活动家。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一八五四年九月至一八五五年八月，俄军与英、法等国联军在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激战。

“我知道，你对这些作品是颇具慧眼的……”“除了你之外，我谁也不信任。”

屠格涅夫曾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一八四七年，他朗诵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一诗后说，这首诗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他日夜反复吟诵这一绝妙的佳作，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他认为，涅克拉索夫的一些诗“写得象普希金那样优美”。出自屠格涅夫之口的这些话，对他乃是最高的赞扬。

一八五六年出版的涅克拉索夫诗集的编辑工作，当然有屠格涅夫参加。

他再三建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撰写自传：“你的生平应该写出来，因为它有许多东西能深深引起无数俄国人的共鸣”。

一八五四年秋，屠格涅夫要去斯巴斯科耶时，劝说涅克拉索夫与他同行。他希望诗人抛开缠扰他的忧郁的思绪——当时涅克拉索夫因患喉病，声音逐渐瘖哑。在他的诗作中，愈来愈明显地流露出悲伤的调子。屠格涅夫担心，如果涅克拉索夫到自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村子去休息，并在那里过孤独的生活，一定会感到寂寞和忧郁。

“咱们到斯巴斯科耶去打猎，别垂头丧气，你会活得比好些老头子还长呢。”屠格涅夫对他说。

朋友们准备了干粮和火药，每天清晨一同从斯巴斯科耶出发去打猎，涅克拉索夫带着象狐狸一样狡猾的猎狗卡什坦，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则带着自己心爱的季安卡。

他们久久地在秋季寂静的树林里游荡，沿着林边搜索山鹑。

在一个这样的日子里，打猎时，涅克拉索夫用病态的、低沉的嗓门吃力地对屠格涅夫朗读了诗体小说的开头：

山鹑在荒凉的原野上呻吟，
如同母亲俯在儿子的坟墓上哭泣，

是庄稼人在远方唱起了歌儿吧，
悠扬的歌声激动着人的心扉；

森林由此展开一片白杨和苍松……
故乡的画面啊，看来你并无欢乐！

我的愤怒的头脑为什么保持沉默？……
稔熟的森林的喧响啊，听起来多么甜蜜！

看着熟悉的田野我赏心悦目，
我要让善良的激情奔放不已。

而且我要把所有的热泪，
尽情地挥洒在故乡的土地！

我的心不再怀着愤恨——
虽然愤恨中有极少欢乐，许多真理……

屠格涅夫很喜欢这段诗。这是长诗《萨沙》的序曲，这首长诗和作家已构思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精神和思想上非常相近。

长诗的主人公阿加林具有使他和德米特里·罗亭 近似的特点：

一切崇高、理智、自由的东西，

最接近、最合乎他的心灵，

只给人以力量和权力的热情，

在言行上对他则格格不入，毫不相称！

他爱得深，恨得更深，

有时连蚊子也不敢欺凌！

据说，更能激动他的

不是热血，而是爱情……

孤癖的萨沙对阿加林的爱情，她的心上人的热情洋溢的言词所激起她对他的无限信赖，以及她那随之破灭的希望，和娜塔丽雅·拉松斯卡娅对罗亭的感情的发展颇为相似。

当涅克拉索夫在休息地点对屠格涅夫低声朗诵这部长诗的草稿时，它和《罗亭》一样，还远远没有完成。过了几乎半年之后，这两部作品才同时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而且，涅克拉索夫的长诗是献给屠格涅夫的。

和往时一样，卡拉捷耶夫常常到斯巴斯科耶来。晚上，他涅克拉索夫和房子的主人聚集在客厅里，热烈地谈论战事。战场上不断传来令人惶恐不安的坏消息。尽管俄国士兵表现了惊人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战争的败局却日益明朗，日益迫近的失败的原因也昭然若揭：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

不久，卡拉捷耶夫被迫奔赴克里米亚。姆岑斯克县的贵族厌恶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商量好了把他撵走，于是把他选为奥廖尔省义勇军军官，虽然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明明不宜担任军职。

卡拉捷耶夫一得知这个任命，就去拜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他开口便说：

“您知道，我很快就要走了；我打那儿是回不来的，我受不了这场折磨，我会死在那儿的。”

屠格涅夫劝慰他说，这些悲观的预感是没有根据的，过不了一年，他们一定会重逢的。但卡拉捷耶夫什么话也不愿意听。他们到花园去散步，回来后，卡拉捷耶夫突然对屠格涅夫说：

“我有一事相求。您知道，上大学时，我在莫斯科住过几年。我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想把它写出来——既给自己，也给别人。我试过这样做，可是我确信自己毫无文学才能。请收下这个小本子吧。尽管您总是友爱地安慰我，但我相信，我从克里米亚是回不来的，所以，劳驾您利用这些草稿写点什么，

免得它象我似的无影无踪地失掉！不要让这些材料泯灭！”

这天晚上，卡拉捷耶夫走后，屠格涅夫读了他留下的笔记本，对里面描写的自传体故事非常感兴趣。

卡拉捷耶夫的预感成为现实。他染上斑疹伤寒，死在亚速夫海附近的营地上，奥廖尔省义勇军就驻扎在那儿的土窑里，整个战争期间，虽然没见过敌军的一兵一卒，人员却因染上各种流行病而损失大半。

但卡拉捷耶夫的小说并没有销声匿迹。几年后，屠格涅夫把年青的亡友留给他的笔记本里写得文笔欠佳的“真实事件”作为长篇小说《前夜》的情节的基础。

在斯巴斯科耶商讨《现代人》杂志的事务时，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常常想起在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童年》。作者是初露头角的一位新的撰稿人。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从军中寄来了这部小说，隐去了姓名，署名是缩写字列·尼。

当时，涅克拉索夫就提醒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注意中篇小说的作者，他说：“这是个新出现的天才，看来是可靠的。”

“你催促他写作吧。”屠格涅夫答道，“请告诉他，我欢迎他，向他致意，为他鼓掌，如果他对此感兴趣的话。”

这位青年作家熟悉屠格涅夫的作品，对他的赞扬当然颇为得意。列夫·托尔斯泰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不知道为什么，读了他的作品之后就很难动笔了。”

屠格涅夫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处女作深感兴趣，因此打听起《童年》的作者的情况来。他得知，在离斯巴斯科耶二十俄里处的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住着托尔斯泰家的一些人。这就是嫁给远亲瓦列利扬·托尔斯泰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亲妹妹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家庭。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列夫·托尔斯泰的姑姑塔·叶尔戈丽斯卡娅给他写信道：“你的处女作在瓦列利扬的邻人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和激动：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新作家是谁。对此最感兴趣的是《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他到处打听，玛丽雅是不是有一位弟弟在高加索，搞创作，并且说，如果这个年青人象开头这样继续写下去，他的前程是远大的。”

不久，涅克拉索夫告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列夫·托尔斯泰打算把自己的中篇小说《砍伐森林》献给他。“这些特写的形式和你的形式完全相同，甚至连用语、譬喻也和《猎人笔记》相似。有一位军官简直是穿军装的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但这一切远不是只抓住外表的摹仿。”

如今，在斯巴斯科耶，他们谈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寄给《现代人》杂志的中篇小说《少年》。它将在该杂志第十期上发表。接近编辑部的文学家们已经读过这部小说，并一致赞赏它，认为它是有独创性的诗意葱茏的作品。

涅克拉索夫声称，《少年》中诸如夏天的道路的描写，雷雨的画面，关于受处罚的小男孩的心情的描写，——这些地方表明，托尔斯泰的这部中篇小说注定将永垂文学史册。

离开斯巴斯科耶时，诗人答应当即给屠格涅夫寄一份刊载《少年》的《现

代人》杂志。

屠格涅夫再三请求涅克拉索夫来信告诉他有关战争的消息：

“要知道，信件毕竟比报纸早到两天啊。”他说。

过不多时，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瓦列利扬·托尔斯泰从波克罗夫斯科耶来同屠格涅夫相识，随后屠格涅夫去回访他。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他给涅克拉索夫写信道：“我将带卡拉捷耶夫（你在我这儿见过他）的中篇小说去，小说篇幅不大，但写得相当不错。我和托尔斯泰相识了。我的邻居托尔斯泰伯爵的夫人——《少年》的作者妹妹是个非常可爱、聪明、善良、十分迷人的女子。我了解到她的哥哥的许多详情细节……我看见了她的画像。面庞虽不算漂亮，但聪颖、出众……”

在克里米亚军中的列夫·托尔斯泰从亲人的来信中得知屠格涅夫来过波克罗夫斯科耶之后，有说不出的高兴，请他们转告屠格涅夫，虽然他只能根据小说来了解他，但感到需要和他谈许多事情……

一八五五年来临了……全国国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遥远的塞瓦斯托波尔上，那里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英勇战斗。

社会公众对官方战报的虚假、军队应有装备的缺乏、靠军需供应大发横财的高官显宦和地主的贪婪，公开表示愤慨。如今，无论人民作出何种牺牲，也无法挽回祖国的败局了，因而甚至保持守观点的人也起来反对使俄国陷于困境的沙皇政府。

二月十八日，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正酣之际，尼古拉一世突然驾崩的消息传遍了首都，国内全体进步人士将此视为专制农奴制度必然崩溃的征兆。

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无不欢腾雀跃，满怀希望。出现了解放运动的新高潮。反动势力乱了阵脚——以前令人处处感到备受限制的书刊审查，如今明显地放松了。

表现受奴役人民的利益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终于登上了社会斗争的舞台。

一八五五年春，在彼得堡大学举行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公开答辩，这场答辩曾受到阻挠长达将近两年之久。

这篇论文仿佛为迅速划清文学中的阶级力量的界限奠定了开端。历史愈尖锐地提出使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的任务，这一界限就划分得愈清楚。

在“黑暗的七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五年）中，反动阵营力图一笔勾销别林斯基的遗教和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使文学脱离人民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纯艺术理论与之相对抗。

那时，涅克拉索夫所主持的《现代人》曾竭尽全力对反动的批评家行进抵制，但是不得不谨慎、隐蔽地同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论战，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发生之后，在刊物上甚至禁止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

屠格涅夫在利用卡拉捷耶夫的故事写长篇小说《前夜》之前，曾试图在杂志上发表它，未成。——原注。

均指瓦列利扬·托尔斯泰。

一八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列·尼·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收到了玛莎（玛丽娅的小称——译者）的一封信，她在信中描写了她和屠格涅夫相识的情景。这封亲切、可爱的信提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声望，并且激发我从事文学活动。”——原注。

这一来，实际上仅仅否定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思想的人才有了行动自由，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中反驳斯拉夫派批评家阿波隆·格利戈里耶夫时，就曾含蓄地指出这个不平等现象，后者“深知，想要为他所攻击的人鸣不平的那些人手中并没有相等的武器”。

情况之所以变得复杂，还因为涅克拉索夫不能作为一个批评家，更谈不到作为一个理论家，经常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因为他的使命在另一方面。

而《现代人》杂志撰稿人中那些妄想得到理论家称号的人（安年科夫，鲍特金，德鲁日宁）却不是别林斯基的拥护者。恰恰相反，他们逐渐同反动的文学、艺术流派的鼓吹者沆瀣一气。车尔尼雪夫斯基来《现代人》主持批评与书报介绍栏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别林斯基的传统。深知这些传统的重要性的涅克拉索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同他一起工作之前是孤单的。

听取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学位论文答辩的彼得堡大学的青年学生，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它。这篇论文在俄罗斯哲学和文学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论文的作者断言，美的概念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成不变的，也并非对一切阶级、一切阶层都是一致的，并且极力强调艺术的改造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揭露了关于艺术和现实的唯心主义观念的反动实质，宣告了渊源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充满革命热情的新的艺术观点。

无论在学位论文答辩中，还是在批评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反对脱离人民生活的艺术，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去再现丰富多采的现实。有对于时代的最迫切需要的答案，是一切重大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画，长篇小说，雕像，还是长诗）的必需条件。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生活所产生的问题不能不使他激动，于是他的作品中一定会表现出评价和活生生地评定所描写的现实的渴望。

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头几篇文章，涅克拉索夫以其特有的洞察力预料到，俄罗斯文学有了以他为代表的别林斯基事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诗人给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友好接待和信任，既对《现代人》的工作和俄罗斯进步文学，也对这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前途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他的批评才能得到了迅速、充分的发挥。涅克拉索夫使他越来越能够决定杂志的方向。

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事评论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祖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遇到了杜勃罗留波夫这位可靠的继承人之后，自一八五七年起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就少得多了，而把精力主要用于研究政论、经济和哲学。

自从在《现代人》杂志工作之日起，他就着手深入研究使广大读者激动的问题，捍卫现实主义和人民性原则，并对文学和艺术提出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的要求。

阿·亚·格利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批评家和诗人，曾激烈反对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阵营。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评论家和小说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极力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但在主持杂志之前，他必须克服聚集在《现代人》周围的一些著名作家的抵制。

青年批评家的鲜明的社会政治立场，他的美学观点的明确的倾向性，不仅使敌对营垒中的文学家，而且使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杂志的一些自由主义撰稿人愤慨。

他们看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日益增长，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不久就开始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使“杂志和全体撰稿人吵架”。对《现代人》杂志新的撰稿人发表的评论文章的直爽、坚定信念和战斗精神最为不满的是德鲁日宁，他正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责难的。

起初，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怀有好感，并且在格里戈罗维奇和德鲁日宁面前维护他。但他激烈否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能正确评价唯物主义美学中的这一新的见解。

屠格涅夫没有直接参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同贵族自由主义批评家之间在杂志上开展的关于文学中普希金和果戈理派的著名论战。但他在和朋友们的通讯中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过意见。如果以为他加入了纯艺术理论的辩护士阵营的话，是不对的。屠格涅夫持中间派立场，摇摆不定，对问题一直持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他拒绝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似乎没有忽略六十年代运动的历史正义性。他在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烈反对者德鲁日宁的信中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当代生活的现实的需要……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有益的；时间将证明，我的意见是否正确”。

但与此同时，他时常对“农民民主主义者”采取不公正的、偏颇的态度。在这一毕竟倾向于否定的骑墙态度中，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他在否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时，犯了极其严重的历史错误。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比，他的政治观点是落后的。他不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卓越的批评家，因为他们是为农民革命民主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坚强战士。

身为编辑的涅克拉索夫的处境日益困难。长期以来，他和如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断增长的影响表示不满的那些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诗人看到，历史正义性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但与此同时，诸如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参加杂志工作的问题，对他来说是远非无关重要的。

他懂得，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在杂志的评论与政论部分实现他们所不赞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则同他们的决裂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说：“涅克拉索夫本人是软弱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编辑部希望巩固《现代人》与上述作家的关系，因此和他们签订了关于他们专为这家杂志撰稿的义务合同。但合同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几年后，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思想矛盾以他们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见《列宁全集》俄文本，集四版，第十八卷，第二八七页。——原注。

第二十章

《罗亭》——同列夫·托尔斯泰的相识和接近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度过了一八五五年的秋天和夏天。和往时一样，天气刚刚转暖，他就抑制不住想离开首都到农村去的心情。他向往打那儿去捷斯纳河、奥卡河、日兹德拉河畔打猎，作长途旅行。在这样的旅游之后，创作就比通常顺利得多，成效也大得多。

同大自然和大地接触，重游故里，总是激起他从事创作的旺盛精力。他常常对朋友们说，离开喧嚣的城市生活时，他感到心境宁静，在大自然之中，人的真正的、优秀的品质总是表露得更为清楚、充分。

这里，更宜于工作和思考。

他的嗜好——打猎，是他对大自然的爱，对生活的纯诗意方面的爱的特殊表现形式。

只消回味一番《森林与草原》这篇特写的开头，就可以感觉到大自然对艺术大师的这一魅力，感觉到万物中生命的欢乐的搏动：

您知道吧，比如说，在春天的黎明前出发是多么愉快的享受？您向台阶走去……在深灰色的天空中，一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湿润的风不时象微波一样飘来……这时有人把一张毯子放到大车上，把装茶炊的箱子放在踏脚边，两匹拉梢的马瑟缩着，打着响鼻，神气地替换着蹄子站着……于是您坐上车；马儿一齐举步，四轮大车发出隆隆的响声……您乘看马车，经过教堂旁边，下了山坡向右拐，穿过一条土坝……池塘上面刚刚升起薄雾，您感到有点寒意，就用大衣领子遮位脸，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马蹄踏着水洼，发出很响的溅水声。马车夫吹着口哨……空气变得清新，路看得更清楚了，天空明亮起来，一块块云层呈现着白色，田野里露出青绿。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红色的火光，门外边听得见刚醒过来的人声。而同一时刻，朝霞正旺，天空中已经泛起一道道拖得长长的金色光带，沟沟壑壑上面缭绕着水气；百灵鸟嘹亮地唱着歌，吹起了黎明前的晨风——接着，徐徐地浮起深红色的太阳，阳光简直象不息的川流倾泻而出；您的心就象鸟儿一般振奋起来。清新，愉快而可爱！周围很远都看得见了……一条河流蜿蜒而去，约有十俄里长。在烟雾中微呈蓝色，河流后边是绿油油的草地，草地后边是微微起伏的山岗；远处，有几只凤头野鸡叫着，在沼泽上空飞来飞去，透过散布在湿润的空气中的灿烂阳光，可以清楚地看到很远的地方……不象夏天那样。胸膛多么自由地呼吸，四肢多么快捷地活动，全身被春天的清新气息笼罩着，感到多么壮健……

这回，在捷斯纳河畔旅行了约莫十天，五月中旬，一伙吵闹的文学家——鲍特金、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到屠格涅夫的斯巴斯科耶庄园作客来了。

他们作客的时间很长，叫主人着实劳累了一番。

他们划船，午饭后乘长轻便马车到树林里去兜风，骑马散步，打台球，打地球，下象棋，喝酒，无休无止地争论文学问题，直至天明；最后，演起家庭戏剧来，为此他们一块儿写了题名为《好客之道》的喜剧和摹拟奥捷罗夫的剧本《奥狄浦斯》的讽刺作品。

喜剧写的是一个地主的厄运，他轻率地邀请了许多客人到庄园里来，这些客人确信，他所描写的农村生活的乐趣原来是空话。他继承的庄园已完全衰败、破产、荒芜了。喜剧以火灾结束，失火时这个心地善良的地主（这个

角色指定由屠格涅夫扮演)必须惊呼:“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是母亲的独生子!”

和在真正的剧院里一样,演剧时使用了布景和帷幕。观众是来自邻近庄园的地主,他们未必能猜出喜剧中各种各样文学上的影射的涵义。

其实,《好客之道》是贵族自由主义作家敌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新生力量的最初表现。在这出丑剧里,他被描写成“爱发火的文学家”。

自由主义阵营的作家们试图开个玩笑就把重要的问题敷衍过去,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微不足道的人身攻击。

客人走后,斯巴斯科耶——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就极其寂静,几乎象修道院里那样寂静了。

他对此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他心里已经准备创作《罗亭》

这些娱乐,“极端愚蠢的滑稽剧”的演出,欢腾,画漫画,玩笑——这一切和瘟疫期间的欢宴有些相似:附近的地区闹旱

灾,牧草干死,庄稼枯焦,霍乱由南方蔓延而至,人们心惊胆战地预料,会出现荒年。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忧郁的时期。”屠格涅夫给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写信说:“战争在不断扩大——不知何日才告结束。优秀的人物(如可怜的纳希莫夫)在牺牲——

疾病,歉收,牛马象苍蝇一样大批死去……前头还看不见一线光明。应当忍耐。就象纤夫说的那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也许,我们会得到大大超额的补偿。

“您读过《现代人》杂志上托尔斯泰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吗?我已经读过了,我不禁高呼‘乌拉!’并且为他的健康干了杯……”

如果再想一想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骚动,以及俄国社会各阶层中革命情绪的增长,那么这封信中所描绘的画面就将更完整了。

尼古拉一世之死——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使人民的希望和力量大大增强。书刊审查放松了,使作家能更广泛地反映俄国的生活。

虽然已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但已逝的四十年代却仍然等待着艺术大师去反映它。文学必须填补这个重要的空白,这个空白是复杂的历史条件,主要是一八四八年之后反动势力大大加剧的压迫所造成的,结果,作家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被压缩了。

屠格涅夫对社会思潮的特殊的敏感,他那猜度时代需要的能力暗示他,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与祖国的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的已逝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候来到了。

因而,在克里米亚战争正酣时,屠格涅夫着手创作描写四十年代人物的长篇小说《罗亭》。

起初,他打算把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天才的性格》。

他仔细考虑好了小说的结构之后,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破天荒第一次事先拟定了小说的详细提纲。虽然由于朋友们提了几次意见,作家后来不得不几易其稿,但小说最初的结构几乎没有更动。修改小说时,他把全部努力用于更鲜明地刻划主人公的性格和活动、社会作用以及他和周围的人的相互关

巴·斯·纳希莫夫(1802—1855):俄国卓越的海军统帅,曾为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在该战役中战死。

系上。

屠格涅夫以前写的许多短篇小说，由《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和《多余人的日记》，至《书简》和《雅科夫·巴生科夫》，好象是用作这部未来的大作品的草稿。在这些小说里，屠格涅夫描绘了“多余的人”的形象和演化，他们在农奴制度下的生活的可怜的一面，或者悲惨的一面。

照作者的想法，罗亭应该是四十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最成熟的典型，他具有这种人的性格的全部优点和弱点。

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象屠格涅夫那样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不仅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巴枯宁的名字在其中大放异彩的那个思想运动的细心的目击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

这一切仿佛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但许多事情已成陈迹，有的人已与世长辞，有的人则离他甚为遥远……斯坦凯维奇和别林斯基不在人世，赫尔岑在流亡中，巴枯宁在什利谢尔堡的单人监禁室里，格拉诺夫斯基在《罗亭》竣稿之年溘然长逝。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艰难条件下，格拉诺夫斯基终生保持了独立不羁的思想方法、不屈不挠的坦率和正直、对先进思想的忠诚。“他勉励大家要做正直的人——这就是他的功绩！他的影响非常深远。”涅克拉索夫说。

“现在我只想握你的手，象在战场上，当霰弹夺去优秀的将士的生命时，一位同志握另一位同志的手那样。”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写信道。他们俩都为这位对当代人有“巨大而极为良好的影响”的优秀人物的逝世感到震惊。

这个圈子里还健在的人们和那些接他们的班的人们，都念念不忘这逝去不久的往昔，力求向现代人描写他与俄国解放运动中正在到来的新阶段的关系。

五十年代中期，《现代人》杂志上将几乎同时刊载三部描写这个时代的巨著：屠格涅夫的《罗亭》，涅克拉索夫的《萨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著作的一个部分中叙述了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小组的历史，这部著作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的一些章节直接相呼应。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概观》的第五章的结尾处建议读者读一读这一作品，并非出于偶然。

“倘若有人想对他们那个高尚的团体作几分钟的回顾，那么让他重读一遍《罗亭》中列日涅夫关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叙述，

以及屠格涅夫先生的中篇小说 的惊人的尾声。”他写道。

《罗亭》的作者谙熟波科尔斯基 哲学小组的气氛，罗亭在这个小组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形成了他的内心世界，奠定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屠格涅夫说：“当我描写波科尔斯基的时候，斯坦凯维奇的形象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在近旁，出现了另一个形象——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形象，作家想在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写于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六年，当时《罗亭》还是一部中篇小说。

指《罗亭》一八五六年版的尾声。在一八六一年版的尾声中，屠格涅夫补充了一个情节：一八四八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亭在巴黎街垒战中牺牲。

波科尔斯基：《罗亭》中的人物。

一形象中表现他青年时代的朋友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外貌和内心世界的许多特点。

屠格涅夫和他一起度过的岁月，通过其全部矛盾向他展示了这一卓越人物的复杂性格，因而他不仅了解他的性格的优点，而且了解他的性格的缺点。

“我在罗亭身上相当真实地展现了他的形象。”屠格涅夫后来指出。他的确出色地表现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外貌、言谈举止和习惯。但他的形象不可能是充分和完整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描写革命家巴枯宁，不能描写他的行动，甚至含糊其词地暗示他的革命活动也是危险的。

许多内容必须言犹未尽，或者闪烁其词，弄成面目全非。

所以他有意识地撇开巴枯宁的政治活动，把罗亭描写成理想主义者、启蒙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注定饱受煎熬而无所作为。

由于罗亭的形象被作者加进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其他活动家的特征，失去了和巴枯宁在传记上的相同之处，因而具有典型性。（“要知道……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有一部分还是屠格涅夫自己，这些人物并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宗绝好的遗产。”马克西姆·高尔基指出。）

屠格涅夫将长篇小说视为生活的艺术，认为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历史，因而在自己的创作中只能利用生活作为出发点。他说：“我从来不凭空臆造。为了塑造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可资作为我的主导线索的活生生的人。”

屠格涅夫的这一自述和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所写的内容惊人地相符：“我从来不臆造什么，并且没有这种习惯。只有我从现实中撷取来的东西我才写得好。”

但艺术大师对通过敏锐的观察得到的粗糙的素材进行了创造性的筛选，摒弃了多余的东西，吸取了塑造完美的形象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巧妙地加工生活素材方面，屠格涅夫表现了圆熟的技巧。他并不是盲目地在原型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自如而大胆地用许多个别的因素塑造新的形象。

这不是一般的“真实”，而是“作家赖以塑造典型的从现实中撷取的形象”这种意义上的艺术的真实。

“诗学的真实性的胜利在于典型化。”屠格涅夫常常说。

因而，他塑造的人物的名字变成了某类人物的通称，而且罗亭和奥涅金、毕巧林一样，进入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形象画廊。

他标志着社会发展中一个即将到来的阶段。“他身上的一切——从他的思想到他的行动，从他的性格到他的习惯——都是新颖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罗亭的精神生活远比他的前辈的内心世界复杂、丰富得多。他很有教养，有高度的美学修养，他从当代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中汲取了营养，胸怀当前社会的重大利益。他对科学的信念，对必须掌握渊博的知识的信念，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使他胜人一筹。

他具有出色的口才，具备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周围的人们和以崇高的思想吸引他们的能力。“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激动，还会把你向前推动，他不让你停滞不前，而使你彻底翻转过来，使你燃烧起来！”平民大学生，罗亭的

马·阿·高尔基（1868—1936）：俄国伟大的革命作家，苏联文学创始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

毕巧林：莱蒙托夫所著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狂热的崇拜者巴西斯托夫这样评论他。

和罗亭的交往使娜塔丽雅·拉松斯卡娅看清了她周围的社会空虚，看清了外省贵族耽溺于其中的因循守旧。

偏见和成见的势力开始使她感到苦恼。她爱上罗亭，信赖罗亭，一心等待着他的召唤，以便和他手携手走上新的道路。但她的英雄原来是个胆小的爱说空话的人。

罗亭的根本志向同农奴制王国是敌对的。但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主张，况且他的主张并不完全明确。

他的优异的禀赋、智慧、才能和知识落空了。他不善于正确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善于斗争。

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假如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罗亭这样的人物，那就说来话长了。”长篇小说中写道。

他们是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罗亭这类人物的不幸在于：他们脱离了备受奴役和贫困摧残的人民。

但他们毕竟起了良好的作用。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这部长篇小说时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幻想家罗亭是个比实干家和活动家更为有益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够干出什么来呢？”

屠格涅夫在致朋友们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对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象对《罗亭》那样花了这么多的劳动，费了这么多的心血，那样“喜爱它，那样缜密地考虑它”。

这部长篇小说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成果，却是用非常短的时间——七个星期写完的。

有一次——已经是在七十年代了——有人问屠格涅夫，据说乔治·桑写作异常轻松，一挥而就，不必打稿，是否确有其事。他答道：

“是的，但她在自己脑子里酝酿作品的时间是很长的……”

有典型意义的是，他立即想起了《罗亭》的创作经历：

“每个作家有自己的写作方法。我的写作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多半是形象纠缠着我，而我却长久不能掌握住它。奇怪的是，我往往首先弄清一个次要人物，然后才弄清主要人物。譬如，在《罗亭》中，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毕加索夫，接着浮现出，他如何开始同罗亭争论，罗亭如何把他批驳，——在这之后，罗亭就在我面前显露出来了……”

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的最早听众是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托尔斯泰娅和她的丈夫。《罗亭》写完几天之后，屠格涅夫携带手稿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探访他们。

长篇小说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也很喜欢屠格涅夫的朗读风格，它是那样质朴，那样深沉，仿佛在和听众娓娓而谈。屠格涅夫依照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建议，对小说的第十一章作了更动。达丽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和罗亭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及她教训女儿的场面作了修改。

“涉及到爱情时，妇女是公正无误的法官，我们男人应该听从她们……”当时，屠格涅夫对她说道。

秋天，屠格涅夫由斯巴斯科耶前往首都时，又顺便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那天，那里收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的来信，信中写道，他可能从军中来度假。这个消息使屠格涅夫不胜欣喜，他当即决定给托尔斯泰写信：

“我早就打算哪怕通过书信和您相识……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当我即将离开您妹妹的家，动身去彼得堡时，我想实现有之已久的心愿……您的妹妹大概已写信告诉您，我是多么赞赏您的才能，并且对您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最近我格外经常想到您。想到您在什么地方，我就感到可怕。虽然，另一方面，我又为您能获得这一切新的感受和考验而感到高兴，但万事总有个分寸——不可让命运误入迷津……倘若您能离开克里米亚，那是非常好的——您已充分证明，您不是懦夫，但戎马生涯毕竟不是您的职业，您的使命是当文学家、思想和语言大师……您的工具是笔杆子，而不是马刀……关于您本人和您的作品，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这一切容后面谈……”

《现代人》的朋友们焦急地等待着屠格涅夫的到来。他们已经得知，他利用夏季隐居的机会，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所以迫切希望听他朗诵作品。

《罗亭》在编辑部朗诵之后（朗诵于屠格涅夫到达彼得堡后的头几天里就举行了），大家一致认为，《罗亭》是他在创作中迈出的新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涅克拉索夫和其他文学家对长篇小说的潜台词，对在其中展开情节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作为作者的原型的那些人物的活动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

长篇小说的问世可望成为真正的社会事件，因此屠格涅夫的朋友们希望更清楚地突出描述主人公的历史作用。

友好的劝告帮助屠格涅夫弄清了许多问题。他一如既往，“丝毫没有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神情”，接受了这些劝告。作家极端严格要求自己并随时愿意检验自己的精神，尤其表现在：未听取他所信赖的人们的意见之前，他很少拿作品去发表。

他首先着手修改描写列日涅夫和罗亭的大学时代的部分，随后修改小说的尾声。创作使他入迷，并且重新唤起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他不时向涅克拉索夫朗读重写的章节，博得他的热烈称赞：“屠格涅夫正在出色地修改《罗亭》，”涅克拉索夫给朋友们写信道，“他一定会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来的。”

十一月里的一天，当屠格涅夫正在专心致志地写这部长篇小说时，突然，刚刚来自军中的列夫·托尔斯泰径直从车站到他的寓所来。他们高兴地拥抱，“马上使劲地接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屠格涅夫家里住下之后，当天就要求介绍他和涅克拉索夫认识，于是他们一同去拜访他。他们在涅克拉索夫那里度过了这一天剩下的全部时间，共进午餐，然后下了几个钟头象棋。那次，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下了三盘象棋，二胜一负。

“他是个多么可爱，又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啊！”诗人在这次与托尔斯泰会晤的影响下给鲍特金写信道，“我愉快地告诉你，他径直从车站到了屠格涅夫家之后说，他还想见我。于是，那天我们是在一块儿度过的，而且谈了个够！一只可爱的、精力充沛的、气度高雅的小鹰……也许还是一只雄鹰呢……他只来逗留一个月，但是有希望把他永远留在这儿。他不算漂亮，但他的脸非常令人喜爱，神采奕奕，而且温文尔雅：看上一眼，使人感到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欢他。”

这一天，这位二十七岁的炮兵军官对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讲了许多他在克里米亚经历和目睹过的事情。

“感受很多，真不知道从何谈起，而且未必能把每天亲眼看见的哪怕是一小部分东西表达出来。”

他谈到了俄国士兵完成史无前例的功勋时所持的质朴。

“即令在古希腊时代也没有过这样的英雄气概。科尔尼洛夫 巡视军队时，不是说：‘弟兄们，你们好！’而是问：‘决死的时刻到了，弟兄们，你们敢死吗？’战士们高呼：‘我们敢，乌拉！’这不是故作姿态，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确实会履行自己的诺言……几万人果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一位几乎奄奄一息的伤兵告诉我，他们怎样攻占一个法国炮垒，可是没有给他们支援；他放声大哭。一个水兵连差点儿哗变，因为上级要把他们从炮垒撤换下来，在敌人的炮火下，他们在这个炮垒里坚持了三十天。妇女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士兵往棱堡送水，有一个旅最后只剩下一百六十名伤员，但他们不下火线……”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做呢？这是俄罗斯人身上很少表现出来的羞怯的、但蕴蓄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我们力量单薄，只有刺刀，同人数众多、拥有配备三千门大炮的舰队的敌人作战。在俄国，人们将永远铭记这段伟大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英雄乃是俄罗斯人民……”

列夫·托尔斯泰当时便答应涅克拉索夫，马上为《现代人》杂志写一篇描述被围的要塞的最后几天的特写，作为自己的塞瓦斯托波尔特写的续篇。

要知道，他亲自看见过在冲天的火光中缓缓沉入海中的军舰的桅杆，看见过许多个月的严酷战斗之后突然变得空无一人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群。

“在新近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稀松的地面上，到处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击毁的炮架，压在炮架下的俄罗斯人和敌人的尸体，被可怕的力量抛进弹坑的半陷在土中的永远沉寂的重型大炮，炸弹，圆形炮弹；又是许多尸体，弹坑，木头和掩蔽部的碎块；又是穿灰色和蓝色军大衣的尸体……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犹如在暴风后的黑夜里的大海，汇集着，扩展着，结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港口的浮桥上，在北岸上惊惶不安地颤抖着，摆动着，在茫茫的黑暗中缓缓地离开浸透它的鲜血的地方——抗击过比它强大一倍的敌人达十一个月之久的地方。”

随后，列夫·托尔斯泰给他们念了自己的《青年》和《哥萨克》的开头，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指出了这些作品中的许多精采的篇页。

年青的军官在这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舒畅而自在。优秀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把他看作平等的一员，对他的才气和独特的风格表示赞赏。

托尔斯泰的文学声誉，尚在他到彼得堡来之前，在他的最初几部自传体中篇小说和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发表之后，就立即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涅克拉索夫坦率地告诉青年作家，他把他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

“我不想说，我对……您的才气的发展方向和一向使这种才气如此有力和新颖的因素作出多么高的评价。真实，自从果戈理逝世后在俄罗斯文学中所剩无几的真实，正是俄国社会当前所需要的……你以那种形式给我国文学带来

费·阿·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一八五四年指挥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同年在该处牺牲。

的这一真实，在我国是一种崭新的东西。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一个作家能这样令人喜爱他，这样热烈支持他……我担心，时代和龌龊的现实，周围人们的麻木不仁将象侵蚀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那样侵蚀您：扼杀您的精力，而没有这种精力，至少就不能成俄国当前需要的那种作家。”

屠格涅夫也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列夫·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中将独占鳌头，“他有资格获得这个地位，这个位子有待他去占据。”

托尔斯泰到达彼得堡几天之后，费特从杰尔普特附近来看望屠格涅夫。嗣后，费特回忆这一天时写道：

“当扎哈尔 给我打开前厅的门时，我看见角落里有一把佩有安娜勋章的绶带的短马刀。

“‘这马刀是怎么回事？’我问道，一面向客厅的门走去。”“‘请往这边来，’扎哈尔低声说道，一面朝左边指着过道，‘这是托尔斯泰伯爵的马刀，他住在我们客厅里。现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书房里喝茶。’“我在屠格涅夫家度过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压低嗓门说话，生怕吵醒在门外睡觉的伯爵。

“‘老是这个样子，’屠格涅夫冷笑着讲道，‘他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炮垒回来，住在我这儿，便吃喝嫖赌起来。通宵狂饮，看吉卜赛杂技团的演出，打牌；深夜两点钟才就寝，睡得象死人一样。我竭力劝阻过他，可是现在我不管了……，’”

自相识之日起，屠格涅夫几乎怀着慈父般的柔情喜欢上了托尔斯泰，对朋友们热烈地夸奖他，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称作亲爱的、出色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有时一同去出席文艺晚会，有时一同去象棋俱乐部进餐，有时一同去观看歌剧，有时一同去听业余音乐会。

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引进彼得堡文学家和记者的圈子里，介绍他和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马伊科夫、波隆斯基、鲍特金、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相识。

年底，他们和诗人奥加廖夫见面格外频繁，当时他是到彼得堡来为自己和娘家姓图契科娃的续弦（屠格涅夫于一八四八年在巴黎就和她成了朋友）办理出国护照的。申请出国护照时，奥加廖夫提出，他需要去温泉治病。屠格涅夫是赫尔岑的朋友，可能知道或者猜出，奥加廖夫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渴望和赫尔岑联合起来，后者邀他去伦敦进行在国外创办自由的俄文刊物这一共同的革命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在屠格涅夫家里举行的文学晚会上，奥加廖夫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冬天的道路》和一些短诗，诗中流露出抗议的情绪。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以前听过奥加廖夫朗诵这部长诗，它每次都给他们留下强烈的印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把《冬天的道路》称为真正的杰作；诗中，作者“把他的全部诗意、整个他本人和他的全部美妙的沉思融汇在一起。我和托尔斯泰陶醉于这一玉液琼浆已经三次了”。

这样，屠格涅夫把自己年轻的朋友介绍给当时俄国的优秀的、先进的作

扎哈尔：屠格涅夫的仆人的名字。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0—1881）：俄国作家和剧作家。

一八五六年初春，奥加廖夫一家去伦敦，屠格涅夫也去那儿，见到了他们。——原注。

家。他对《童年》和《少年》的作者在精神上的影响还表现在：不久，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他以前所瞧不起的别林斯基的文章。

屠格涅夫使托尔斯泰对斯坦凯维奇的命运也很感兴趣。有两封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一封信是一八五七年春屠格涅夫写给安年科夫的：“看在上帝份上，请您赶快出版这些书信吧。我已答应让托尔斯泰读到这些书信，我敢担保，他将从这些书信中得到极大的享受。”

安年科夫实现了屠格涅夫的要求，于是斯坦凯维奇的书信不久就刊登在他的传记的附录里。当时列夫·托尔斯泰给鲍·契切林写信道：“你读过斯坦凯维奇的书简吗？这些信写得多么好啊！这是个我会象爱自己那样爱他的人。你可相信，现在我两眼噙满了泪水——我刚刚读完了他的书简，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考虑……这又何苦呢？这样可爱，这样奇妙的人一会儿痛苦，一会儿欢乐，一会儿又抱着徒劳无益的希望，这又何苦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屠格涅夫还唤起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创作和他本人的浓厚兴趣。

这些事实表明，在年青的托尔斯泰的一生中，他和屠格涅夫的友谊是多么重要。

诚然，他们见面、愉快而毫不拘束地握手和接吻时所怀的欢乐的激动，不久就被某种戒心代替了。有一种东西妨碍他们亲密无间，虽然他们俩好象都力求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之间怎么也无法建立完全真挚的肝胆相照的关系。

不久，他们就确信，尽管他们彼此深怀好感，但不可能亲密相处，他们是“用不同的泥巴捏成的”，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

这里既表现出观点上的不同，也表现出年龄上的差别和表现得极为强烈的性格上的迥异那个时期，托尔斯泰尚未固定的信念矛盾百出，他否定一切传统，对这些或那些社会现象的评价似是而非，使周围的人感到惊讶。再者，那时他身上还明显存在“贵族和军官的影响”的烙印，涅克拉索夫曾指出这一点，并表示担心，这些烙印会妨碍托尔斯泰的才干的增长。

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懂得，普通的酒变成陈酿需要时间，“古怪的念头会消失”，古怪的行动会绝迹。

托尔斯泰还没有成熟，他的内心正发生急剧的转变，在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的观点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不久，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间开始发生争论、误会和口角，这些口角有时为时不长，不严重，有时则造成深深的裂痕。

然而，即使发生了齟齬之后，他们还彼此挂牵，并未失去亲睦的希望，所以重又恢复了原先的关系。

这种情况延续到一八六一年，那一年，严重的口角差点儿发展到决斗，使他们多年失掉联系。

纵然发生了这种差点儿导致决斗的冲突，他们也没有断绝关系。过了一个时候，列·尼·托尔斯泰明白了，他们的友谊中有着多少美好的东西啊。

“我记得，我的文学声誉应该归功于您，”一八七八年，他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信道，“同时，我记得，您曾多么喜爱我的拙作和我本人。您可能

即斯坦凯维奇的书信。——原注。

鲍·尼·契切林（1828—1904）：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也会找到同样的关于我的回忆，因为有一个时期我曾诚挚地喜爱您。”

《现代人》一八五六年第一、二期刊载了《罗亭》，这部小说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和争论。

《祖国纪事》的批评家杜蒂什金认为，罗亭充其量不过是俄罗斯文学以前的主人公——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的平淡无奇的翻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撰文反驳他，指出，屠格涅夫善于通过罗亭的形象描写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的人。他指出，罗亭是个完全忘我、胸怀共同利益的热情的人。把罗亭和别尔托夫、毕巧林加以比较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这是“不同时代、性格不同的人——彼此迥然相异的人。”

涅克拉索夫是最早对这部长篇小说作出反应者之一。他在简短而有趣的评论中阐明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优秀的人物，“不久前，他们还站在思想运动和生活运动的前列……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留下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纵然他们都有弱点和可笑之处，但不能不令人尊敬。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是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的人。这一部分是由于充分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成熟，与其说是借助于为他们的观点和感情只提供消极因素的生活，毋宁说是借助于抽象的思维，他们确实主要是按想象生活的……屠格涅夫先生充分而出色地描写了这一缺点，但是他没有这样明确而充分地把罗亭这类人的优点写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涅克拉索夫知道，屠格涅夫在塑造长篇小说的中心主人公时，必须绕过什么样的暗礁。因为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罗亭》创作过程的最后阶段的目睹者。他在自己的评论中使读者明白，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作者的愿望的。

涅克拉索夫推测，长篇小说的作者“意识到自己非常强烈地同情自己的主人公，因而担心对他过分入迷，把他过分理想化，结果有时强迫自己竭力对他持怀疑态度。因此罗亭的性格确实表现得不够明确……但是它不明晰的程度并不如此严重，以致读者会难以猜出罗亭的那些仍然有些模糊不清的特点”。

这里，涅克拉索夫指的是长篇小说的结尾部分：罗亭的各种计划和打算——破灭之后，他以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姿态出现。他受到当局的怀疑，被遣返原籍，但他为之遭到驱逐的过失被有意掩盖了，读者仍然不完全清楚。

“我们并不是对他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同样熟悉；然而，他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这个虽有种种弱点而仍不失为强大有力、虽有种种缺点而仍不失为令人神往的人物的出现，给读者留下极其强烈、有益的印象，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一部俄国小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了”。

涅克拉索夫在评论的结尾表示相信，屠格涅夫“已经开始了创作活动的新时期，他的才华获得了新的力量，他必将为我们创作出比那些他赖以在读者心目中赢得在果戈理逝世后的我国新文学中的首位的作品更为可观的作品来”。

确实，《罗亭》为一系列优秀的社会长篇小说奠定了开端，在这些小说中，屠格涅夫成了俄国生活的漫长时期的编年史家。

斯·谢·杜蒂什金（1821—1866）：俄国记者，文学批评家。

别尔托夫：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主人公。

这部小说再现了作者关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青年时期的回忆，随着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他的青年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第二十一章

巴黎——罗马——中篇小说

几乎和《罗亭》在杂志上发表的同时，屠格涅夫构思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但他长时间没有动手写《贵族之家》，而是考虑小说的整个提纲和细节。

和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样，准备阶段占去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要长得多。

由于种种原因，屠格涅夫构思好《贵族之家》之后，过了两年半才开始认真创作。

递交要求签发出国护照的申请之后，一八五六年五月初，屠格涅夫前往斯巴斯科耶。动身前，他邀请朋友们来参加告别宴会。会上，列夫·托尔斯泰和他发生了口角，一时性起，对主人和客人说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话。

诚然，他立刻就对自己的暴躁感到懊悔——他的日记中关于这件事的纪录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屠格涅夫走了。我感到忧伤……”

月底，列夫·托尔斯泰到了屠格涅夫的庄园，适逢屠格涅夫在家园小住。于是，他们又相遇了。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自己家里，然后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妹妹那里稍事逗留之后，打那儿策马来到屠格涅夫的庄园斯巴斯科耶。

虽说口角当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而且每次都对他们以后的关系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和解了。

“他的家使我看到了他的根底，并且说明了许多情况，因此使我与他和解了。”当时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在托尔斯泰六月十二日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写得更清楚：“应当让人们看看他在乡间的情形。他在那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使我觉得更亲近、更好。”

次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送屠格涅夫从斯巴斯科耶到妹妹家里去作客。

从最初相识的时候起，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就深切、真挚地爱慕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他对她的不幸婚姻有所了解。

就在这年夏天，屠格涅夫完成了短篇小说《浮士德》，这篇小说的写作是由与玛·尼·托尔斯泰娅的结识勾起的，薇拉·叶丽佐娃的形象中描写了她的一些特征。

一年后，回忆创作这篇小说的情况时，屠格涅夫承认说：“《浮士德》是在生活发生巨变——整个心灵骤然迸发出回忆、希冀、春青的火花时写成的……”

涅克拉索夫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篇充满柔情的小说。他说，在屠格涅夫的《浮士德》中，激荡着雄壮、馥郁、醉人的诗意的海洋……”

不久，屠格涅夫从彼得堡获悉，已给他签发了出国护照。

他作这次旅行的准备时，为忧郁的思绪所烦恼：他眼看就四十岁了，此行又注定他将去过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些情绪，也反映在屠格涅夫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和书信中。“准许出国使我高兴……但与此同时，我不能不承认，我最好不出国……”

雅斯纳雅·波良纳：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的名称。

指屠格涅夫。——原注。

涅克拉索夫看出他犹豫不决，所以在这几天里给他写信道：“咱们出国吧，但想到你时，不知为什么就想起下面的诗句来：

船下涌过清澈的碧流，
船上洒满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宁静就在风暴中蕴藏。——

“哎，老兄，你受到的挫折还少吗？此行又将如何呢？……”

屠格涅夫心中交织着两种感情，是由于他对波琳娜·维阿阿多的缠绵的眷恋和永不衰竭的爱情吸引他，使他按捺不住地要到法国去，但另一方面，离乡背井又使他感到痛苦。

他不知道，久别之后，他和心爱的女儿的关系将如何，他在巴黎将如何生活。

如今他的女儿已满十四岁，在维阿阿多家里受教育。应该为她的前途操心啦。

屠格涅夫顶购了七月二十一日的船票。这个日期到来前几天，他回到彼得堡；那里，在他启程前夕，朋友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为他饯行。在这个宴会上，一位参加者（究竟是谁，至今不详）致了简短的祝酒词：“为已故的和缺席的人干杯。”后面虽然没有作任何说明，全体客人却都明白，一方面，指的是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另一方面，指的是赫尔岑……七月二十一日，朋友们送他到喀琅施塔得。屠格涅夫乘轮船抵斯德丁，继而搭火车到达柏林，打那儿去巴黎和库尔塔弗内尔。

可能在俄国有有人委托屠格涅夫到赫尔岑那儿去办什么事情，所以他在库尔塔弗内尔逗留的时间不长，便匆匆去伦敦，以便在阔别之后和赫尔岑会面，重新和他建立密切的联系。

几个晚上，他对赫尔岑讲述了俄国的生活、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长时间交谈和争论的话题是西方和东方的命运，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最主要的是日益逼近的农奴解放，愈来愈明显，这一解放是不可避免的。

赫尔岑后来在《北极星》发表的文章——致“亲爱的朋友”的《旧话重提》，就是对这些谈话的反应。在原稿中，这位朋友的名字被隐去，署上缩写词伊·谢。但出于谨慎，为了不使屠格涅夫的名誉无意中受到损害，后来发表时连这些缩写词也删去了。

赫尔岑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咱们别争论道路问题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咱们尽一切努力去拆除妨碍人民力量自由发展的藩篱吧……我想用下面的话结束给你的这封长信：去创作，去劳动，——去为造福于同样地为咱们做了许多工作的俄国人民而劳动吧！”

这回，屠格涅夫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光景。一天晚上，他对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朗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浮士德》。

涅克拉索夫原打算与屠格涅夫一同出国，但因病延宕了若干时日。——原注。

《北极星》：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九年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在伦敦出版，并在俄国秘密传播的定期文集，其宗旨是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而斗争。

伊·谢：屠格涅夫的教名和父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缩与。

九月八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启程赴巴黎那天，赫尔岑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他告诉了我们许多有趣的事情，还顺便提到，热情的彼得堡青年对我怀着极大的热情……”

从伦敦回来后，屠格涅夫又在库尔塔弗内尔居住了一段时间，打算入冬前迁居巴黎，在那里创作长篇小说《贵族之家》。

起初，他在这一环境中感到幸福和满意：“我在这里很愉快。”九月二十五日，他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信道，“我和我所钟爱，并且爱我的人在一起。”

每一天都仿佛是馈赠给他的礼品，他为这丰富多采的礼物感到欢乐。准备演出家庭戏剧，当屠格涅夫听到他的女儿富有表情地朗诵拉辛的悲剧《伊菲姬尼娅》或者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音节铿锵的诗句时，他那做父亲的心喜不自胜。只有一点不好：由于和维阿尔多的女儿们一起受教育，她把祖国语言忘光了。

金秋时节到库尔达弗内尔来看望屠格涅夫的费特，听见他问女儿：

“波琳娜，难道你一个俄文词都不记得啦？喏，‘水’俄语怎么说？”

“不记得啦。”

“那么‘面包’呢？”

“不知道。”

“这可真奇怪！……”

在有两排窗户的高大而宽敞的客厅里，时常响彻着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奏鸣曲——这是波琳娜·维阿尔多在弹钢琴。

到了晚上，宾主们围坐在圆桌前，兴致勃勃地玩“肖像”游戏：一个人（屠格涅夫居多）画几幅侧面像，游戏的每一个参加者在肖像下面写对它的说明，给画中人作评语。

“一句话，我们很快乐，就象当阳光照耀在水面上，透过水波的时候，在清澈见底的小溪里嬉戏的鲢鱼一样。——你看见波的时候的鱼儿吗？那时它们是快乐的——我相信这一点。”屠格涅夫对鲍特金这样讲述在库尔塔弗内尔飞逝而去的这个秋天。

虽然由于野禽少，打猎十分单调无味，他有时还试图借此消遣。都是鹧鸪和野兔！根本无法和在祖国的猎事相比！……他从伦敦带来了第二集《北极星》，这个集子里刊载了《往事与随想》的开头几章。

“我读完了你的回忆录……”九月二十二日，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写信道，“写得好极了……你一定要把这些小说继续写下去，因为小说中有大胆而朴素的真实，而且似乎无意地冲破小说凄怆的音响，迸发出欢愉的朝气。这一切都使我非常喜欢，——我再说一遍自己的请求：一定要把它们继续写下去……怪哉！在俄国，我劝说老头子阿克萨科夫继续写回忆录；而在这里，我又劝说你，这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互相对立。他的回忆录和你的回忆录，都是俄国生活的真实图景，所不同的只是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观点描写生活。我们的祖国伟大、富饶，而且辽阔，它包罗许多好象彼此格格不入的东西！”

屠格涅夫和女儿一同搬到巴黎去过冬之后，为她聘请了一位上了点年纪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指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的英国女人当家庭教师。他打算在这里从事创作，希望在明年初以前不仅完成开头几个场面已打好草稿的《贵族之家》，而且完成长篇论文《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

屠格涅夫一口应承巴纳耶夫积极撰稿，支持《现代人》杂志，告知他新的西欧文学作品，并寻找供翻译的新作。他还负责劝说托尔斯泰和格里戈罗维奇关心杂志，他们都同该刊编辑部签订了“义务合同”。

但这一饱满的情绪和兢兢业业的精神保持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两种情况似乎使屠格涅夫消沉，心境失去平静。他患神经痛，而且仿佛故意为难似的，那年冬天法国气候酷寒，这使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

住宅里的壁炉烧得不暖。有一回，费特去看望屠格涅夫，碰见他穿着好几件衣服和大衣在伏案写作。

“我真不明白，穿着这样的铠甲怎么能搞脑力劳动……”诗人说。

再者，从某时起，屠格涅夫和波琳娜·维阿尔多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他无心写作。

屠格涅夫当时发往祖国的每一封信里，几乎都流露出对俄罗斯的无限思念之情。

在异国，他更强烈地感到，俄罗斯的一切对他是多么珍贵。“在法国的侨居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一般。”他给谢·季·阿克萨科夫写信道，“我的所见所闻，不知怎地使我和俄罗斯贴得更紧，祖国的一切对我变得倍加珍贵——倘若不是由于确实不取决于我的特殊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回家去了。”

他在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还从来没有觉得巴黎这样平淡无奇……”

于是，他忆起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便补充道：“我在别的时刻看见过它——那时它比较使我喜欢。”

“和一个家庭的长期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我的女儿（她是个可爱、聪颖的姑娘，我非常喜爱她）把我留在这里……”

女儿和他久别重逢，是多么欣喜啊！

他没有把自己到达巴黎的消息事先告知她，径直来到波琳娜不久前被送到那儿上学的阿兰克女士办的寄宿学校。

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走进学校时，波琳娜正在弹钢琴。她一听见脚步声，便迅速扭过头去，马上认出了父亲。

五年间，波琳娜变化很大，长大了。

父亲还在俄国时就给他写信道：“我象对孩子那样同你说话……（虽然波琳娜已超过了儿童的年龄——她快十五岁了，但他在给女儿的每封信的结尾都嘱咐女儿好好学习，听话，懂事，有耐心。）维阿尔多夫人在信里告诉我，你差不多和她一样高了……你无法想象，听到你弹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时，我会多么高兴……”

和朋友、同胞们的会面稍许冲淡了对祖国的强烈思念：费特几乎和屠格涅夫同时出国；过了一些时候，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鲍特金和安年科夫也出国了。

正当屠格涅夫在巴黎遭受疾病折磨，感到痛苦和寂寞时，涅克拉索夫和费特在罗马相遇后，再三邀他前出。“你要是能知道，我和费特正在多么焦急地等待你，那该多好啊！我们一谈话就说起你……”涅克拉索夫给他写信道。

由于没有等到屠格涅夫，他于一八五七年一月来到巴黎。

此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相互的好感。他们在谈论个人的经历时，是非常坦率的。

屠格涅夫陪同涅克拉索夫游览法国首都，终日形影不离。

不久，收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发自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准备到巴黎来，春天去意大利。

这个消息使屠格涅夫不胜欣喜。他想早日在这里见到托尔斯泰。“请您告诉他，如果他想碰见我，就赶快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请求德鲁日宁道，“根据来信，我看出，他正在发生最喜人的变化，我‘象老保姆那样’对此感到高兴。”

他们的关系还无法正常。如果他们常在一起，彼此之间便总是发生争执和磨擦，通常闹到面红耳赤。但他们一旦离别，便又设法相会，希望恢复丧失的良好关系。

屠格涅夫在从国外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分析过自己和他的关系。“您是我与之发生误会的唯一的人。”他在发自库尔塔弗内尔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发生这种事情，正是由于我不愿和您只限于一般的友好关系——我想再作努力，把关系发展得更深一些；但我做得不谨慎，触犯、扰乱了您，并且在发现了自己的过错之后，也许退缩得过于仓促；这一来，我们之间便出现了这条‘鸿沟’……”

屠格涅夫表示怀疑，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喜爱另一个人，为对方的成就感到高兴——当您平静下来，停止冲动时，我深信，我们会象我在彼得堡第一次见到您那天一样，愉快而随便地彼此伸出手来。”他补充道。

列夫·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七年一月底出国。他乘邮车出发，途经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前往华沙。

他自华沙打电报询问屠格涅夫，他是否将在巴黎长住，几个小时后，便得到了答复：屠格涅夫告知，他不打算在最近离开巴黎，涅克拉索夫也在那里，和他在一起。

二月九日，列夫·托尔斯泰抵达巴黎后，遇上他们俩心绪不佳。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因考虑今后如何安排私生活而苦恼。“他们俩都在黑暗中徬徨，忧愁，抱怨生活。”托尔斯泰给德鲁日宁写信道。

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去罗马。他启程前夕，他们三人一同去观看了星期六晚谢肉节 在巴黎大剧院 举行的假面舞会。

如今，屠格涅夫成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向导。他们每天见面，一起在巴黎街头漫步，浏览古城的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画廊，看戏，听音乐会。

“托尔斯泰在这里看什么都一语不发，眼睛睁得大大的。”屠格涅夫给鲍特金写信道，“他变得非常聪明，但他仍不自然，因此别人和他在一起也不很舒适。不过我看着他时，心里高兴：老实说；他是我国文学的唯一希望……”

过了许多年，列夫·托尔斯泰回忆，当他在巴黎的时候，有一回他和屠

谢肉节：东正教节日，大斋前的一星期。

“巴黎大剧院”：原文系法语。

格涅夫一起看戏回来时，谈起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当时托尔斯泰认为，每一位艺术大师都应当创造自己的形式。屠格涅夫赞同他的见解。他们回忆起俄罗斯散文的典范来，诸如《当代英雄》，《死魂灵》；往下，托尔斯泰说了《猎人笔记》，屠格涅夫则提到了《童年》他们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些作品的形式都具有高度的独创性。

那时，屠格涅夫曾打算介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同赫尔岑相识：他们打算一同去伦敦探访他。二月中旬，他给赫尔岑写信道：“我只有离开巴黎才能把病治好。一个月后我就离开它，迅速前往英国伦敦，到你那儿去。打那儿回俄国，在那儿待一辈子……托尔斯泰也将去英国；你会喜爱他的，我希望，他也会喜爱你。”

“我非常、非常高兴和托尔斯泰相识。”赫尔岑在回信中写道，“请代我——他的天才的真挚的崇拜者问候他。我读过他的《童年》，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对它深为赞赏……如果他喜欢我的《笔记》，我将在这里对你们朗读关于维亚特卡河一章和关于格拉诺夫斯基、凯特切尔一章。”

赫尔岑的欢迎使托尔斯泰不胜欣喜。他“吩咐我告诉你，他早就希望你认识，并且在这以前就象喜爱你的作品那样喜爱你（虽然他——注意——远非红色人物）”。

三月初，屠格涅夫建议托尔斯泰去一趟位于巴黎东南的城市迪戎。托尔斯泰为得以幽居独处，以便继续写中篇小说《阿尔伯特》而感到高兴，便欣然同意了。

他们于三月九日凌晨出发。途中，他们参观了枫丹白露附近的大禁林。

他们下榻的旅馆很冷，他们——照屠格涅夫的说法——不得不坐在烈火熊熊的壁炉旁。尽管如此，托尔斯泰专心致志地创作，写了一页又一页。“看着他在写作，我感到高兴。”屠格涅夫给安年科夫写信道。

这期间，他写《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一文和特写《波列西耶之行》。他心情忧郁，写作时常中辍。他觉得这篇特写枯燥无味，对它很不满意。

在那个时期，屠格涅夫对自己的创作能力缺乏信心。这种状况，看来和他同波琳娜·维阿尔多的私人关系中出现的危机所引起的痛苦心情有密切关系，虽然他们失和的原因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他向朋友们抱怨说，他心绪不宁，感到自己不幸，心灰意冷，准备抛弃一切，连同文学活动。

“我永远不会停止赞许诗歌，因为我的生命即寓于诗歌之中，但不知为什么我奇怪地想，总有一天我会提笔写作。现在这一切离我却甚为遥远……”

当列夫·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小说念给屠格涅夫听之后，他觉得，《阿尔伯特》似乎没有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留下什么印象。但他搞错了：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书信中对这篇小说大为赞赏，他指出，它稍加修改便将成为一篇极其优秀的作品。

几天后，两位朋友回到巴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打算在那里至少再住两个月的光景他继续尽情地欣赏各种艺术品，参观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在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听讲演。可是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

但列夫·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一年第二次出国期间才到赫尔岑那去里。——原注。

《笔记》：指《往事与随想》。

“注意”：原文系拉丁语的缩写词。

全部计划。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使托尔斯泰铭记终生。这一天，他亲眼目睹了在断头台当众执行死刑的情景。

这个景象使列夫·托尔斯泰深受震惊，他决定火速离开法国。他对屠格涅夫说：断头台不断地在他眼前浮现，他在梦中看见它，他梦见自己被处死刑。

四月八日，他离开巴黎那天，在日记中写道：“我到屠格涅夫那儿去了，我两次和他告别，离开他时，不知为什么都哭了。我非常喜欢他。他使我成为，并正在使我成为另一个人。”

他自日内瓦给屠格涅夫写信道，他时刻思念他。在巴黎居留的一个半月里，列夫·托尔斯泰清楚地感到，屠格涅夫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痛苦。“他同维阿尔多夫人的不幸关系和他的女儿，使他留在这里，留在对他有害的气候里，叫人看了觉得真可怜。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爱得这么深。”列夫·托尔斯泰给塔·亚·叶尔戈丽斯卡娅写信道。

屠格涅夫本人那时也对波隆斯基老实说，他各方面——“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很糟糕，这次的巴黎之行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从五月到回国这整整一年中，屠格涅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伦敦，巴黎，柏林，津齐格，巴登巴登，布伦，巴黎，马赛，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维也纳，德累斯顿，莱比锡，巴黎，伦敦……屠格涅夫以前就曾多次周游世界，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旅行最为频繁的一年。

不知他是设法忘却痛苦的思绪，还是想用改变环境和气候的办法减轻疾病和恢复心境的平静。

他愉快地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于一八五七年夏启程前往位于莱茵河东岸，离波恩不远的德国小城市——津齐格矿泉；他希望在那里隐居，能把创作和治疗结合起来。

到达津齐格一个星期之后，他的书案上果然出现了新的中篇小说《阿霞》的开头几页。

“我对自己能在几乎长达一年之久的无所事事之后提笔写作觉得奇怪——起初感到困难，后来开始容易一些。”屠格涅夫在致巴纳耶夫的信中承认道。

作者把津齐格和林茨选为《阿霞》情节发生的地点，以四十五岁的人的身份进行叙述，回忆遥远的青年时代。

在向读者叙述小说的主人公与阿霞邂逅以及描写她的初恋之前，屠格涅夫描绘了色彩令人惊异的城市夜景：“月亮升上古老房屋的尖顶，街道上的小石子在宁静的月光下显得很清楚”。

梦幻般的薄雾笼罩着的德国古老的小城，在中篇小说中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叙述的口吻和沐浴在月光中的城市夜景，令人油然忆起《三次会见》中这样的意大利夜景。将这两个充满感人至深的抒情意味的描写加以对比，我们便可以看出，屠格涅夫是多么认真地对待涅克拉索夫在他临去津齐格旅行之前提出的建议。

“不久前我读了你的一些中篇小说。”一八五七年四月七日，涅克拉索夫自罗马给屠格涅夫写信道。“《浮士德》写得真好。我还喜欢整个《雅可夫·巴先科夫》、《三次会见》的许多篇页。这些小说的情调充满强烈而深

沉的哀愁，令人惊异不已。”

好象是为了号召屠格涅夫继续创作并使《三次会见》这类抒情中篇小说写得更为深刻，涅克拉索夫请他重新阅读这一作品，深入体察自己，体察“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爱情，不明确的、因狂热而显得可爱的青年时代的激情，这一没有忧愁的忧愁”，以这种格调写出作品来。

“你自己都不知道，”涅克拉索夫感慨道，“当你一旦得以用爱情、痛苦和一切理想的东西触动象你这样感受丰富的心弦时，会发出多么美好的音响来……”

屠格涅夫响应了涅克拉索夫的号召：《阿霞》就是靠诗人信中所说的秘诀写就的。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打算早日完成这部中篇小说，并携带它返回祖国。他极其不愿意“空手”而归。他知道，《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和读者是多么急不可耐地等待他的新作。

但他仍然未能在津齐格完成《阿霞》，而在罗马才写完这部中篇小说。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他为了朋友突然和鲍特金一道到那儿去，推迟了几个月才回俄国。

八月，屠格涅夫来到库尔塔弗内尔。“你瞧，我在这儿啦，也就是说，我做了正是你告诫我不要去做的那件蠢事。”他给涅克拉索夫写信道，“但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件蠢事大概会造成一个结果：我将比原先的打算早些回到彼得堡。不，确实，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在别人的窝边呆腻了。既然没有自己的窝，就什么窝也别要。”

那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常去巴黎。八月间，有一天到巴黎来举行婚礼的费特在那里找到了他。费特的未婚妻——瓦·彼·鲍特金的妹妹当时在法国。诗人想请屠格涅夫在他的婚礼上当傧相。“我决定碰碰运气，在阿尔卡德大街寻找屠格涅夫。”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看门人对我怯生生的询问答道：‘屠格涅夫先生不在家。’“‘那么他在哪儿呢？’“‘他上咖啡馆喝咖啡去了。’“‘上哪个咖啡馆去了？’“‘他老是到一个咖啡馆去。’看门人给了我咖啡馆的地址。进了咖啡馆，我没见到一个顾客。但在第二个房间里的桌前看见一个被大张报纸挡住的长着浓密的白发的脑袋。“‘先生，对不起。’我走近他，问道。“‘我的天哪，谁来啦！！’屠格涅夫高呼道，跑过来拥抱我。“我们到他在阿尔卡德大街的住处去，讲好了这天共进午餐。“‘通常认为诗人是疯子；最后看着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他们并不象人们所意料的那样疯狂。’屠格涅夫说。”

费特在布拉基尔旅馆为自己、未婚妻和她的亲戚租了房间后，便进行结婚的准备工作。婚礼定于八月十六日在使馆教堂举行。那天，一辆马车飞速驶到大门前，车上套着两匹灰色骏马，坐着身穿一色制服的仆人和马车夫。

费特和屠格涅夫坐上马车，向教堂驰去。诗人虽然早已退役，但因舍不得花钱做燕尾服，那天穿的是全套乌兰团军装。

在饭馆里订的喜筵进行得热闹而愉快。有很多美酒，其中有香槟。喜筵将散时，屠格涅夫高声叫道：“我醉得那么厉害，眼看就要坐到地上大哭啦！”

“阿尔卡德大街”：原文系法语。

“先生，对不起”：原文系法语。

“阿尔卡德大街”：原文系法语。

朋友们在费特的婚礼上饮酒作乐那天，刚刚在马利恩巴德矿泉结束了疗程的伊·亚·冈察洛夫乘快车前来巴黎。他到这儿来，是因为希望见到屠格涅夫，并就他在马利恩巴德以顽强的意志完成的《奥勃洛摩夫》向屠格涅夫请教。

冈察洛夫自己常说，他总是怀疑自己，不相信自己，老是想“征求他人的意见和印象”，尤其重视屠格涅夫的建议。

冈察洛夫把手提箱留在布拉基尔旅馆后，晚上九点钟便穿着灰色的旅行常礼服坐在意大利大街托尔托尼露天咖啡馆里，心不在焉地观看在街头闲逛的巴黎市民熙熙攘攘的人流。

他回到旅馆后，从待役那儿打听到，这里有许多俄国人，其中有费特和鲍特金，他们住在下一层楼。第二天，他见了他们后，约定于八月十九日给他们和屠格涅夫朗读《奥勃洛摩夫》。

“我给他们读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冈察洛夫后来写信告诉同事和朋友伊·伊·利霍弗斯基，“小说未经锤炼，芜杂，粗糙。尽管如此，屠格涅夫热烈地赞扬了一些场面，对其他场面则怒气冲冲地尖声说道：‘冗长，冗长，有一个场面写得缺乏热情。’——一如此等等。”

次日，朗读继续进行。但朗读颇为困难，因为天气炎热，不大的房间里令人窒闷难耐。冈察洛夫发现，一会儿鲍特金，一会儿费特昏昏欲睡。“鲍特金打起瞌睡来，但听到充满热情的场面时，便猛地醒过来，高声叫喊：‘稀有的佳作！稀有的佳作！’……”信中写道。

屠格涅夫在谈论读完的小说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但建议冈察洛夫对小说的一些章节作删节——他觉得，一些对话似乎略嫌冗长。

《奥勃洛摩夫》的作者说，他自己也看出，小说还要下很大功夫修改：“我要去德累斯顿，我将在那里幽居独处，完成它返回库尔塔弗内尔前和冈察洛夫分手时，屠格涅夫和他约定于十月上旬在华沙相会，以便打那儿一起回俄国。

但一个星期后，屠格涅夫的计划彻底改变了，他突然决定不去彼得堡，而和鲍特金一同去罗马。

如今屠格涅夫非常希望隐居，动手写作。“我经受了种种焦虑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在巴黎度过可怕的冬天之后，罗马寂静的、终日安心写作的冬天简直具有超度灵魂的作用。”临去意大利时，他给安年科夫写信道，“我的朋友们，在彼得堡和你们大家在一块儿当然很愉快，可是就甭想创作啦：现在，在长期无所事事之后，我必须要么完全、彻底抛弃文学，要么试一试：能否再一次振作精神？起初，我对（鲍特金的）建议感到惊讶，后来就贪婪地抓住不放，现在我连做梦也梦见自己在罗马。”

他们决定途经马赛和尼察，再沿海岸去热那亚。鲍特金后来谈到这次旅行的印象时说：“我们曾由不同的方向到意大利去，但它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没有象从山区这个方向那样呈现出如此旖旎的风光……既有棕榈树林，又有高大的夹竹桃；既有橙树园，又有这些树木旁边的湛蓝的大海。有的地方令人心醉神迷，留连忘返……”

时序正值异常温暖、晴朗的金秋季节。虽说已届十月末梢，却玫瑰怒放，橡树和松树一片葱绿。

“每天，空中和地上都欢度佳节。每天清晨，当我一觉醒来，蔚蓝的曙

色便朝我的窗棂露出笑靥。”屠格涅夫自罗马写信道。

这里，他心中的焦虑逐渐消失。诚然，他的书信中仍然不时闪露出抱怨命运的情绪，但已不象往常那样令人感到他束手无策，而是流露出心境平静的调子：“罗马是一个最易于只身独居之所。假若你想环顾四周，等待着你的不是空虚的娱乐，而是伟大生活的伟大痕迹，这些痕迹不会使你因感到自己的渺小而沮丧，恰恰相反，使你昂扬，使你产生虽有几分忧愁，却是崇高而饱满的情绪”。

“在这个天穹下，连荒芜也带有雅致、优美的痕迹；这里，你能理解‘我的悲伤是快乐的’这一诗句的涵义。”

“这是多么好的城市啊！昨天我在皇宫的废墟上徜徉了一个多钟头，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庄严的感情之中……”

他又如同青年时代一样，在永恒之城的街头漫步，参观博物馆、庙宇、宫殿、梵蒂冈宫的大厅、著名的别墅——鲍哥兹，阿尔巴尼，法尔涅津纳，多利阿……有一回，他信步来到果戈理曾在那儿的一二六号住宅居留的费利切街。打那时起，这里的一切全都变了：主人更换了，没有人能讲讲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情况。

屠格涅夫时常在希腊咖啡馆同旅居罗马的俄国画家相会，最常见面的是名画《耶稣出现在人民面前》的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为这幅画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这幅画，他以中世纪苦行僧的顽强的毅力画了二十五年多。故而被人们起绰号叫作维科洛·德尔·万达日奥（他的画室所在的胡同的名称）画室隐士。

伊凡诺夫是果戈理的朋友，起初和《与友人书信节选》的作者一样，受宗教世界观的影响。但后来伊凡诺夫在精神上发生深刻的转变，从而改变了他对生活和艺术的作用的见解。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就已为这一转变奠定了开端，但要使画家彻底抛弃宗教偏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在罗马，由于常常和亚历山大·伊凡诺夫见面，屠格涅夫对他深有好感。

他马上发现，在伊凡诺夫身上，非凡的睿智是和儿童般的天真结合在一起的。这位画家素性温和，心地十分善良，害怕粗暴，当他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富有感染力地、真挚地大笑。

在他身上，心地的纯洁和诚恳同多疑奇怪地融为一体，屠格涅夫认为，他的多疑是长期离群索居造成的。

用作家的话来说，他的整个外貌，善良而带倦意的眼睛，宽肩膀，矮小敦实的身材，甚至步态，都有许多纯俄罗斯的气质。“他全身散发着俄罗斯的气息”。

伊凡诺夫为屠格涅夫和鲍特金开放了几天画室，使他们能细心了解他的画和这幅画的草图。

在致波琳娜·维阿尔多的信中，屠格涅夫谈到了伊凡诺夫的画，认为它是伟大而高尚的艺术作品，虽然他对纯绘画的优点没有作完全正确的评价。

有一天，伊凡诺夫领着屠格涅夫和鲍特金去参观梵蒂冈宫的艺术瑰宝。他心情很好，兴致勃勃地畅谈了他深入而详尽地研究过的意大利不同的绘画流派。

次日，他们三人乘旧的出租马车，沿公路向阿尔巴诺 驶去。一路上，车窗上的玻璃眶唧作响。“空气清新而柔和，阳光灿烂，但不灼热，微风扑入敞开的车窗，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已不年轻的脸庞——我们驱车向前，沐浴着喜气洋洋的秋日的光辉，心中充满幸福的、如同秋天一般的感情……”后来，屠格涅夫这样描写了同伊凡诺夫和鲍特金结伴同游罗马郊区的情景。

在悼念伟大的画家的随笔里，他也回忆了几个月后，六月的一个刮风天里在彼得堡冬宫广场同他的最后一次相遇。伊凡诺夫刚刚走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海风卷起他的燕尾服后襟；他眯缝眼睛，用两个指头按着帽子。他的画已在彼得堡引起不良的议论……”

他们站着交谈了不久，便分手了。后来屠格涅夫匆匆前往斯巴斯科耶，约莫两个星期后在那里获悉了伊凡诺夫早夭的消息……朋友和同行们邀屠格涅夫回国。费特这段时间在致他的诗札中写道：

……幻想有如吉祥的云霞，
将把你带到白桦的浓荫下，
将把你带到故园的小溪旁，
万物盛情地欢迎你的来访：
犁沟闪烁着黑油油的光辉，
绒毯般的草原也更加翠绿，
夜莺由衷地感到心旷神怡，
在春日里大胆地放声鸣啼，
歌声是那样热情，那样甜蜜。

屠格涅夫在给同乡诗人的回信中写道：“您说，您常常渴望今年咱们能一块儿在乡间居住……即使在这里，雄伟的废墟中间，梵蒂冈宫长长的大理石大厅里，我也怀着同样的憧憬。无怪乎命运使我们这些人——您、托尔斯泰和我住在彼此相距不远的地方啊！”

列夫·托尔斯泰也邀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回国，不隐瞒自己对屠格涅夫留在意大利过冬感到不快。“如果您相信我对您的情谊，那就请您尽可能坦率地来信告知：您在干什么？想什么？您为什么要留在那儿？这些问题使我非常苦恼……”十二月，屠格涅夫把中篇小说《阿霞》寄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不久就收到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来信。为此他俩都热烈感谢他，并且告诉他，大家都非常喜欢它。“它洋溢着动人的青春活力，通篇小说充满纯金般的诗意。这整个美好的环境同诗意盎然的情节水乳交融，所以产生了我国空前优美、精致的作品。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衷心赞赏这部中篇小说。”涅克拉索夫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信道。当屠格涅夫新近创作的中篇小说在《现代人》杂志第一期发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了《约会中的俄国人》（副标题是《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读后感》）一文，对它作了评论。

这篇文章是革命的政论性批评文章的最光辉典范之一，是对列宁的这句话的最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善于用经过审查的文章教育真正的革命者。

萎靡不振、软弱无能和犹豫不决的性格，缺乏采取果断的行动的能力——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的主人公恩·恩所具有的这些弱点，使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无情地评论俄国贵族自由主义派在政治上的懦怯和性格上的软弱。

文章写于农奴问题“成为人人思考和谈论的唯一内容”之时。它是一种政治宣言，是对奢谈爱好自由，实际上却是农奴主的帮凶的人们的强烈谴责。

车尔尼雪夫斯基准确无误地预言，在殊死的阶级搏斗之日自由主义者将如何行动。

同时，批评家号召这位作家成为与农奴主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同盟者。

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列宁在批判新的发展阶段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行动时，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俄国激进派的悲剧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盼望群众大会，盼望自由，狂热地（口头上）向往自由，可是一遇到群众大会，一看到比他们自己的更左的情绪，就发愁了，说什么‘难以判断’、‘不超过十分之一’、‘先生们，要谨慎些！’这完全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逃避阿霞的狂热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人写为：‘约会中的俄国人’。”

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一八五九年）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八六一年）这些文章中，发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章中阐述的思想，并深刻地分析了贵族文学的人物和典型特征。

第二十二章

《贵族之家》

一八五八年六月，屠格涅夫回到祖国。他离开祖国两年了；这期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了明显的和非常重大的进展。还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专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就明显地表现出崩溃的征候，战争的结局极其鲜明地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衰弱。五十年代中期，产生了革命形势的先决条件，继而在—八五九至—八六一年间，这一形势完全明朗化了。

农奴制度的深重危机日益急剧发展，使国内局势非常紧张。人民公开表示不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达数百次之多。列宁在描述这一历史阶段时写道，连“最谨慎、冷静的政治家也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

—八五六年，《巴黎和约》签订后，俄军总司令戈尔恰科夫禀告亚历山大二世：“我们签订和约乃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无力继续作战。和约使我们能够处理国内事务，应该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应当解放农奴，因为这是一切祸害的症结。”

解放农奴的问题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解放农奴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途径是农奴主所制定的、并且为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途径，——这是以保存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革命消灭农奴制，推翻君主专制。指出这条途径的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号召人民举起农民革命的旗帜。

为了防止革命的爆发，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于—八五六年决定“明智而逐步地”、“谨慎、温和地”在完全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着手废除农奴制的准备工作。自由主义者同农奴主这一靠损害“被解放的”无地农民的利益进行的交易，激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愤慨，他揭露了这一改良的真正含义，把它称之为“龌龊的勾当”。

革命民主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始终不渝地捍卫千百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的利益。

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在—八五八年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奏章中写道，农奴“期待彻底改变其处境，因而蠢蠢欲动，极易由于某种外因而激怒”。

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社会上激昂情绪的浪潮把这一问题从政府机关推到报刊杂志上来。

这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这里和整个俄国一样，所有的人只议论消灭农奴制的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战友的革命思想使贵族作家感到格格不入，斗争的逻辑后来不能不导致文学界各种力量的彻底分化。

—八五八年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地位彻底巩固了。在全部工作中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影响。现在已有好几位和他志同道合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联军之间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结果俄国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五卷，第二十七页。——原注。

指彼得堡。——原注。

的人——杜勃罗留波夫、米海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谢甫琴科等经常为杂志撰稿。

涅克拉索夫回国要比屠格涅夫早得多，立即在新的条件下兴致勃勃地致力于编辑工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杜勃罗留波夫成了他的最亲密的助手。

诗人刚刚认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时，就要求他尽可能经常为杂志撰稿，并且立即赞赏青年批评家杰出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

如今，由他们三人共同拟定每一期杂志的内容。自一八五八年起，批评与书报介绍栏完全由杜勃罗留波夫主持，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从事研究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根据新的任务，酝酿成熟了改组《现代人》杂志的计划。

为该杂志撰稿的自由主义作家指摘涅克拉索夫过分信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屠格涅夫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说：

“不过，《现代人》杂志眼看就要完全变成正教中学的杂志了；不管什么文章，作者总是正教中学学生！”

“只要文章言之成理，谁写的不都是一样吗？”涅克拉索夫说。

“对，对！但是，这些正教中学学生是从哪里和怎么样来到文学界的呢？”安年科夫参加了谈话。

“各位，你们应该怨别林斯基，是他使得你们的贵族尊严受到了损害，使得你们不能不和正教中学学生一起为杂志写稿。”阿芙多季娅·雅可夫列芙娜·巴纳耶娃语含讥讽地说，她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总是庇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不让他们受到自由主义派作家的非难。“你们可以看到，别林斯基的活动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的：社会上其他的阶级，毕竟也在智能方面得到发展了”。

“各位，这就是这儿的人对我们的意见。”屠格涅夫露出苦笑，说道。

尽管自由主义派作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却不得不时常承认，他们智力过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

“在《现代人》杂志的撰稿者当中，”阿·巴纳耶娃写道，“屠格涅夫无可争辩地是读书最多的人，但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出现之后，他看到，这两位比他更熟悉外国文学。屠格涅夫自己在跟杜勃罗留波夫谈话后，对涅克拉索夫说过：

“‘我觉得奇怪，杜勃罗留波夫才离开学校不久，怎么能对外国优秀著作了解得这样透彻！而且他的记忆力多么了不起！’“‘我对你说过，他是一个奇才！’涅克拉索夫回答，‘人家还以为他在智力发展和教养上是经过名师指点的哩！老兄，这是一个俄国式的自学成材的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它表明俄国人具有多么广博的才智，虽然社会生活条件是那么不利。再经过十年文学活动，杜勃罗留波夫对俄国文学的意义就会象别林斯基一样了。’

“屠格涅夫开怀大笑，高声说：

米·拉·米海伊洛夫（1829—1865）：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小说家，政论家和翻译家。

西·谢拉科夫斯基（1826—1863）：波兰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塔·格·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画家。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的教名和父称。

“ ‘ 我认为，你对《现代人》杂志的每一个新撰稿人的前途作了可笑的预测！ ’ “ ‘ 你等着瞧吧。 ’ 涅克拉索夫说。

“ ‘ 我觉得奇怪， ’ 屠格涅夫反驳道， ‘ 你怎么看不出杜勃罗留波夫有个大缺点，决不能把他跟别林斯基相比！别林斯基在对艺术性的理解上有一种天才，他对一切美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鉴别力，杜勃罗留波夫却处处表现出冷淡和偏颇！……我跟杜勃罗留波夫谈话的时候，甚至对他暗示过他有这个缺点，我相信他会注意到的。 ’ “ ‘ 屠格涅夫，你忘了现在并不是别林斯基那个时代。现在需要向读者说明社会问题，而且我完全不赞成你认为杜勃罗留波夫不懂诗歌这个意见；如果说他在文章中过于强调社会的道德方面的话，那么，你自己也该承认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方面太薄弱，很不稳固，连我们这些代表人物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群众了。 ’ ”

《现代人》编辑部里愈来愈频繁地发生诸如此类的辩论。

贵族文学家们曾企图劝说涅克拉索夫拒绝同“否定派政论家”合作，但是无济于事，——涅克拉索夫并不向他们让步。他是完全同情为杂志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立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

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决裂日益迫近，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屠格涅夫对《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出现的新情况还不完全了解，因为他很快就离开彼得堡，动身到斯巴斯科耶去了。

在国外，《贵族之家》的创作进行得缓慢而困难，虽然小说的情节和结构已经仔细考虑好了。

在斯巴斯科耶，创作马上有了进展。小说在开始“制作”，所以屠格涅夫有信心在入冬之前把它写完。“我怀着惊人的平静在写作，”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但愿这不致影响我的作品。因为冷淡乃是平庸。”

尽管《贵族之家》的情节和《罗亭》的情节一样，都是发生在四十年代，但屠格涅夫在拉弗列茨基赴故乡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归途的描写上，留下了他回到祖国后所产生的尚未淡薄的鲜明印象的痕迹。

谈到这一描写时，我们会感到，这一描写乃出自在长期离别之后，体验到重返故园的且带三分忧郁的欢乐者之手。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祖国的炽热的爱。

据费特证实，《贵族之家》中描写得如此富有诗意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是以屠格涅夫家在奥廖尔省小阿尔罕格尔斯克县的庄园托普基为“蓝本”的。一八五八年夏，诗人曾和屠格涅夫到这里来打猎。

《贵族之家》中如此热情而关切地提到的老仆安东是个真人：在托普基，他穿灰色的常礼服，戴白色的编结手套，侍候屠格涅夫和费特。小说中保留了他的真实姓名，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连安东用土布缝制的常礼服和编结手套也没有淡忘。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都没有象《贵族之家》这样带有如此明显的自传性。屠格涅夫对此也并不隐讳。譬如，几年后，他在祝贺安年科夫结婚的信中写道：“我有时所憧憬的事情，以及我在描绘拉弗列茨基的形象时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情景，在你身上实现了……”这部长篇小说好像是短篇小说《浮士德》和中篇小说《阿霞》的续篇，这两篇小说是当作家处于激变时期，他的心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迸发出回忆、希冀和青春的最后火花……”时写就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情绪相同，有些情节相似，互为联系。屠格涅夫引用歌德的一句话作为短篇小说《浮士德》的题词：过

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句话也可用作长篇小说《贵族之家》的开场白。

连长篇小说的题名在某种程度上也和短篇小说《浮士德》的开头几句——“我又回到我的老家了，说起来真是可怕，我已经长达九年没有到这里来了。”——相近似。

拉弗列茨基和丽莎的命运与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和薇拉的命运有共同之处：在《浮士德》中，生活的悲剧以女主人公之死告终；在《贵族之家》中，以女主人公遁入修道院，即与生活隔绝结束。

在《贵族之家》和《浮士德》中，都不可能有幸福的结局，因为这些恋人的自由受到当时社会上不可抗拒的陈规陋习和长期偏见的束缚。

有夫之妇薇拉爱上了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唤醒了她的心灵”。但她认识到这种感情是非法的，因而完全绝望，结果染病而死。与此相同，丽莎·卡里金娜感到对已有妻室的拉弗列茨基的感情是一种“罪孽”，因而被迫离开家庭，隐居修道院。

这两部作品的情节和结局似乎迥异，但其冲突的实质是相同的。选取一定类型的人物所特有的共同典型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在罗亭身上，不仅表现了巴枯宁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和他的外貌，而且表现了作者本人的特征和那个时期许多其他活动家的特征。

再者，在塑造这种概括的形象时，屠格涅夫必须有一个“基地”，一个逐渐“融合与积聚各种适当的要素”的“活生生的人”。

屠格涅夫在撷取各种人物的典型特征并精细地加以综合时，力求达到最大的生活说服力和典型性。屠格涅夫的草稿、提要、主人公的鉴定表和一些书信表明，他在塑造作品里的中心形象——罗亭、巴扎罗夫、涅日达诺夫时，利用了巴枯宁、杜勃罗留波夫、皮萨烈夫这类人的某些特征。但与此同时，这些历史人物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认为是某一形象的直接和唯一的原型。据一些研究家的观察，屠格涅夫多半是把各个不同的“模特儿”的特征融成一体。

拉弗列茨基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复杂的概括；在这一形象中，自传性的情节和屠格涅夫的同时代人的特征交错在一起，而照我们看来，在某些方面，作为“基地”的，是尼·普·奥加廖夫。

在描绘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外貌时，屠格涅夫添上了许多能使拉弗列茨基和奥加廖夫的外貌相似的特征，虽则这一只要读一读屠格涅夫那时写的书信，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感到这两篇小说和《贵族之家》的构思产主的气氛。

在这些书信中，他经常谈到自己无家可归、孤独、命该终生漂泊无依的处境。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原文系法语，引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最后一幕《地狱》。

丽莎：《贵族之家》中的女主人公。

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浮士德》中的男主人公。

薇拉：《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巴扎罗夫：《父与子》中的男主人公。

涅日达诺夫：《处女地》中的男主人公。

季·伊·皮萨烈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政论家。

“我没有享受到美满的幸福——没有为自己筑成安乐窝，就逐渐衰老了，我感到辛酸。我的心曾充满青春的活力，曾憧憬、苦闷……但如今一切都变了……我对此全然不屑一顾。一切都归于沉寂了，激动消失了，自咎停息了——我何必去吹拨灰烬呢？反正吹不起火苗来……”

这一切和《贵族之家》的主人公在他所憧憬的个人幸福破灭时的心境有些近似。

拉弗列茨基关于热爱祖国、同胞和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的故乡大自然的情思，和屠格涅夫本人的这类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回国前不久写道：“春天一到，我就奔回祖国去，那里生活还充满青春的活力和希冀。呵！看到我们的半草原地区时，我将是多么高兴啊！”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时，屠格涅夫总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他只能从生活出发，在描写人物时，他必须经常和人物原型“打交道”，“提取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我不单需要人物，他们的过去和全部情况，而且需要生活细节。”他说，“我一向是这样写作的，我现在所有的相当不坏的东西，都是生活赏赐的……”

屠格涅夫断言，塑造典型形象的成功，取决于善于并充分点不过是次要的。

“他那典型的俄国式的脸孔，宽大而白皙的额头，稍微肥大的鼻子，端正的大嘴唇，使人感到他有草原一般的健康和强悍的、无穷的精力。他的身体魁伟结实，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如同小伙子的一样。只有他那天蓝色的、微微暴出而略嫌呆滞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那也许是沉思，也可能是疲倦，并且他的嗓音有点过于平稳……”

熟知奥加廖夫的同时代人在描述其外貌时说，他高个儿，宽肩膀，眼睛露出沉思的神色，头发浓密而卷曲，嗓音平稳而柔和，给人留下一种特殊的印象。

奥加廖夫所特有的品质——性格内向，襟怀坦白，自然，沉静，稳重——在拉弗列茨基性格的描绘中得到了表现。但问题并不局限于这一已不是外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相似。

《贵族之家》是在屠格涅夫经常和奥加廖夫见面，并且对与赫尔岑的朋友的私生活相联系的事件记忆犹新的时期构思和开始创作的。艺术家别具匠心，将这些事件作了更动，正如我们所以为的那样，作为长篇小说情节的基础。《贵族之家》第二十二至二十六章中所描写的构成长篇小说的开端的情节，同奥加廖夫和玛丽雅·利沃芙娜·罗斯拉芙廖娃的不幸婚姻的经过有许多相似之处。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叙述他的朋友的婚事时写道：“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大为吃惊；这一切发生得有点太快、太突然了。我所得知的关于她的妻子的传闻，对她不完全有利。”奥加廖夫的仅次于赫尔岑的密友萨京在谈到他的婚事时说：“不消说，那方面设下了种种圈套，这些圈套都不无成效。”

赫尔岑被捕后第一次和奥加廖夫会面是在一八三九年，他的朋友偕同妻子到弗拉基米尔来看望他的时候。“当时我顾不上去了解她，因此仅记得一

即奥加廖夫。

指奥加廖夫的妻子一方。

开头她的声音就使我心里感到不快”。

在简短的、只有一页篇幅的《贵族之家》第十四章里，叙述了拉弗列茨基为时不长的、不甚复杂的求婚经过，当时他并没有发现未婚妻所设置的圈套。这一章里还写道，“她那迂缓而又甜蜜的声音，使人感到一种诱人的魅力，好象幽香般地微妙而不可捉摸，既温柔娴静，又娇怯慵懒，似乎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然而却刺激人的想象，勾引人的心灵，——当然，所勾引起来的决不是胆怯一类的感觉”。

奥加廖夫的未婚妻是受贿、侵吞公款的平扎省省长的一个穷亲戚，他力图把自己的外甥女早日甩给豪富的未婚夫。

拉弗列茨基的未婚妻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科罗宾娜的父亲是退职将军，想出了一种侵吞公款的方法，事情败露后勉勉强强把自己开脱了。几乎在拉弗列茨基初次拜访的前一天，他就问米哈列维奇，他的朋友有多少个农奴。“就说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吧，在那年轻人求爱的整个时期，甚至在他求婚的时候，她的确保持着她那惯常的平静和温柔。然而，就是这位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她的未婚夫是个有钱人”。

在《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五章里，也提到了玛丽雅·利沃芙娜与此毫无二致的慎重的冷静和淡漠的矜持。

但那时奥加廖夫目眩神迷。“的确，”赫尔岑写道，“这是充满激情和个人幸福的时光。丝毫没有想到叵测的居心，全然没有预料到险恶的用意，只有青春、友好、爱情和充沛的精力……”

“彼得堡和二、三个贵族客厅冲昏了她的头脑。”赫尔岑接着描述玛丽雅·利沃芙娜道，“她追求表面的豪华，纸醉金迷……如此截然相反的志趣可能导致许多不幸。但金钱、彼得堡和沙龙都使她觉得新鲜……她硬把奥加廖夫拉进使他感到窒闷的空虚的世界。”

所有这些和长篇小说中情节的发展十分相似。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带拉弗列茨基到了彼得堡，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冬天，“住在华丽、光线充足、陈设考究的寓所里，结交了许多中层社会的、甚至上流社会的朋友，时常出外交际，也时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举行最奇妙的音乐晚会和舞会。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吸引着客人，如同灯焰吸引着飞蛾一般。然而，这种放荡的生活并不完全符合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趣味……”

为了摆脱沙龙的苦闷，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书，过着幽居的生活。

后来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为拉弗列茨基生了一个儿子，这使他非常高兴，“然而那可怜的孩子却并不长命：春天，他死了；入夏以后，依照医生的劝告，拉弗列茨基就和妻子出国，到温泉区去。在那样的不幸之后，散散心对于她是必要的……他们在德国和瑞士度过了夏天和秋天，到了冬天，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他们就到了巴黎。在巴黎，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出落得好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她跟在彼得堡一样迅速而又巧妙地为自己筑了一个舒适的小巢……”

玛丽雅·利沃芙娜的境况虽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几年来，她出入于豪华的疗养区，过着牝狮的极其放荡的生活，随后迁居巴黎。

奥加廖夫是在国外和妻子断绝关系的。拉弗列茨基也是在国外和瓦尔瓦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弗列茨基的教名和父称。

牝师：指最善于交际、最受人注意和赞美的女人。

拉·巴甫洛夫娜脱离关系的。他发现妻子不贞之后，便离弃了她，为她规定了为数相当可观的赡养费，和拨给玛丽雅·利沃芙娜赡养金一样。

巴·瓦·安年科夫在《三十年代理想主义者》一文中写道：奥加廖夫和妻子彻底断绝关系后在国外又滞留了一年，“把这段时间用于使自己以崭新的面貌重返俄国，埋葬浪漫主义的旧我，借助于科学向实际的生活和活动迈进，从幻想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脱出来，作为一个焕然一新、目标明确的人在祖国出现。一八四六年，他确实以新的姿态回到家里，这虽然不是他所追求的，却赋予了他一种保持终生的特殊的、典型的风貌。

他独自在屋里踱来踱去，
脑海里萦绕着缕缕思绪，
要想在世上干一番事业，
该下决心之时岂能犹豫：
要着手启迪教化农民们，
要精心改良他们的风尚，
要把智慧、文明的种子，
撒到那遥远的穷乡僻壤。
下定决心——踏上漫漫征途，
返回自己那悲凉凄苦的故乡。

在个人的悲剧发生之后，奥加廖夫这样把自己的思想和心境凝炼在诗歌里。

饶有趣味的是，在屠格涅夫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干一番事业”这个用语。“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我把最好的时光耗费光了！”拉弗列茨基继续沉思着，“愿这儿的单调生活使我清醒，把我抚慰，使我也能学会不慌不忙地‘干一番事业。’”

在长篇小说的尾声中，拉弗列茨基暗自又对青年一代说：“你们应当干一番事业。”

拉弗列茨基大学时期的朋友，正直而热情的平民知识分子米哈列维奇曾向他提醒先进的人们对人民的义务。在米哈列维奇和拉弗列茨基的最后一次谈话的描写中，也有在这里引用的诗歌片断中可以见到的“智慧和文明的传播者”的形象。“‘这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啊，可是我们却想把自己变成游惰汉！……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在现在！在俄国！当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对上帝，对人民，对自己都负有一种义务的时候！我们在睡觉，时间却溜过去了……’“临走时，米哈列维奇还和拉弗列茨基交谈了许久……恳求他关心农民的生活……甚至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还一直发表关于俄罗斯的命运的见解，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黝黑的手，好象在播撒未来幸福的种子……”

他的话语落在肥沃的土地上。“虽然拉弗列茨基和他争论，这些话却不可抗拒地沁入他的心田”。

拉弗列茨基和他的朋友懂得，“干一番事业”指的恰恰是奥加廖夫的诗歌片断中所说的意思。从长篇小说的尾声中我们可以得知，拉弗列茨基终于

“从幻想中”：原文系法语。

完成了骤变，“这骤变是许多人所不曾经历过的，然而如果不经历这样的骤变，就不能自始至终做一个正派的人……他没有失去对善良的信仰，对意志的坚贞，对现实的酷爱……真正成为一位好的主人，真正学会了耕种土地，而且，他劳动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不遗余力地保证而且改善着他的农民的生活”。

作者对这一点没有作任何更详细的说明，但粗略地提及这个问题之后，作了必要而清楚的说明：“不遗余力。”

一八四六年底，奥加廖夫着手重整家业，试图实现自己早先的想法，采用工厂里实行的自由雇工的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但（由于他所固有的完全不会做实际工作的弱点）结果一事无成。

因而，这里也可以说，《贵族之家》的主人公和尼·普·奥加廖夫尽管政治观点、以后参与的活动和命运迥异，他们的志向却有某些共同之处。

拉弗列茨基从报上获悉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死讯以后，在一段短的时间里，他有了获得新生和个人幸福的可能。长篇小说中描写的生活悲剧，是建立在这一误传的消息上的。

当拉弗列茨基又产生了爱情，艰难地克服着令人痛苦的疑惑，已经开始相信内心的和谐和新的幸福将成为可能的时候，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拉弗列茨基确信他爱上了丽莎时，起初并没有感到任何欢乐。“莫非我到了三十五岁的年龄，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是把我的心灵再一次交到一个女人的手里吗？可是，丽莎不同于那个女人：她不会要求我去作屈辱的牺牲；她不会使我荒废自己的事业；她自己就会鼓舞我去从事诚实而严肃的劳动，所以我们俩会并肩携手，向着美好的目标前进的……”他想道。

一八四八年，当杜契科夫一家从法国回到祖国时，奥加廖夫心中燃起了一线获得新生的希望。他们住在奥加廖夫邻近的庄园里。奥加廖夫住在自己古老的阿克希诺庄园时，经常到雅杭托沃去看望他们。他和阿列克谢伊·阿列克谢耶维奇·杜契科夫结下了多年的友谊，他的女儿叶莲娜和娜塔丽雅，尤其是幼女娜塔丽雅，对奥加廖夫爱慕不已。

早先，奥加廖夫就打动了娜塔丽雅·杜契科娃的心。在雅杭托沃，这位当时二十三岁的青年有时半逗趣地和七岁的女孩子下象棋，有时参加演出家庭戏剧，很乐意地和姐妹们一同散步，逗她们开心，和她们开玩笑。

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消声匿迹了——这就是他到国外去旅行的那个时期。随后杜契科夫一家也到国外去旅行。

当他们在故乡重逢时，奥加廖夫三十五岁，娜塔丽雅十九岁。这正是拉弗列茨基和丽莎·卡里金娜的年龄。

杜契科娃时常听人谈论奥加廖夫的不幸婚姻，说不定当时她已经对他深怀同情，后来，同情不知不觉地转变为爱情。

杜契科夫一家和赫尔岑一家一起住在巴黎时，也时常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后来娜·阿·杜契科娃——奥加廖娃坦率地写道：“和娜塔丽雅·赫尔岑谈起奥加廖夫之后，和她一起读了他的诗歌之后，我的心充满了对他的思念……当我们从国外回来时，奥加廖夫已经在乡间了。他一听说我们回来，便马上来了，但他闷闷不乐，眼神有些忧虑……”

奥加廖夫确实可以象拉弗列茨基那样说，他所眷恋的世界完全幻灭了。

我的道路是多么悲凉，那未来的激荡的海洋
预示给我的是辛苦的劳作，是痛苦和悲伤……

打那时起，诗人开始频繁地到雅杭托沃去。过不多时，一切了然。一八四九年二月初，奥加廖夫和娜塔丽雅·杜契科娃在给赫尔岑一家的信中承认，他们在相爱。“这是您所希望的，我的达塔。”杜契科娃给娜塔丽雅·赫尔岑写信道。

其实，他们的朋友自己也已猜到了这一点。“我还要为您猜测出我爱奥加廖夫而向您道谢。”后来娜·杜契科娃给娜塔丽雅·赫尔岑写信道，“我曾想，您知道这件事了，我没有隐瞒，但也没有讲过……我之所以没有讲，是因为我们在罗马见面（一八四七年）后不久，您问过我这件事，也许您还记得，当时我很难为情。其次，我不愿受到任何感情的羁绊，所以我力图培养纯洁、牢固的友谊，但事与愿违……”

丽莎·卡里金娜的遭遇与此完全相同：友好的同情发展成为爱情。

在巴黎，不单娜塔丽雅·亚历山德罗芙娜·赫尔岑，而且屠格涅夫也是娜塔丽雅·杜契科娃的知心朋友。她信中涉及他的附言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您要是见到屠格涅夫，请告诉他，我紧紧地握他的手，并已希望见到他，因为我是幸福的，我心中所怀的爱情比他认识我时更加强烈。我铭记他对我的温馨的同情……”

尔后的附言就更清楚了：“替我握屠格涅夫的手。请告诉他，我的幻想终于成为现实，我既记得我们的谈话，也打开了他馈赠的小本子……”

这一来就明白了：一八四八年完成于巴黎，同年刊载在《现代人》杂志上的献给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杜契科娃的喜剧《麻绳爱从细处断》的作者在同她交谈的时曾指出，她爱奥加廖夫的幻想是无法实现的。

如今杜契科娃对他提出异议，并且要人转告他，她是幸福的，她心中所怀的（对奥加廖夫的）爱情更加强烈了，而且这已不是幻想，而是现实。她已作出了决定，下定了决心，因而可以心安理得地看屠格涅夫一八四八年在巴黎临别时赠给她的小记事本了，他在这本子里请求她在看到“这些字句并且想起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她之前……”，不要作出任何有关终身大事的决定。

尽管如此，看来娜塔丽雅·杜契科娃和丽莎·卡里金娜很少有相似之处。她只能是她的截然相反的“原型。”而且只能如此，因为屠格涅夫当然不想让她们最终成为真正相同的人物。

丽莎·卡里金娜自幼沉溺于宗教观念和传说之中，无怪乎玛尔法·季莫费耶芙娜管她的屋子叫修道室，也无怪乎她的音乐教师为她谱写了宗教颂歌。一切不知何故都使人不知不觉地感到，她将离弃家庭，进入修道院。她爱上拉弗列茨基之后，暗暗希望“引导他皈依上帝”。

恰恰相反，无神论者奥加廖夫希望引导娜塔丽雅·杜契科娃树立唯物主

达塔：娜塔丽雅·赫尔岑的昵称。

指一八四八年在巴黎的会晤。——原注。

玛尔法季莫费耶芙娜：《贵族之家》中的人物，丽莎的姑姥姥。

义世界观，并且做到了这一点。

同奥加廖夫接近期间，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结婚仪式视为无关重要的东西，认为它无法使她和奥加廖夫摆脱社会和当局的压迫。

不久，他们就强烈地感到了这些压迫。

一八五五年夏，屠格涅夫离开巴黎，要和赫尔岑久别时，答应代表他拥抱他在俄国的所有朋友。他说：“我将经常和他们谈及你，并且尽力设法把关于奥加廖夫和其他人的消息告诉你。”

他大概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关于奥加廖夫和杜契科夫一家的大量消息，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和熟人（安年科夫，萨京，凯特切尔，鲍特金）。

但这些消息并不能使赫尔岑高兴。

我们准备彻底弄清，哪些传记性的因素能够为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的情节提供素材，并且提供了多少素材（譬如，娜塔丽雅·杜契科娃的家庭女教师，法国女人莫洛在长篇小说里成了丽莎的家庭女教师，名字也叫莫洛。著名作曲家弗·李斯特曾造访过玛丽雅·利沃芙娜·奥加廖娃的沙龙。长篇小说中写了这个细节：“李斯特在她家里表演过两次，并且他是那么可亲，那么自然——简直迷人！”）。

这一切可写成专著。这里，另一个问题是饶有兴味的：拉弗列茨基和丽莎的个人悲剧与奥加廖夫和杜契科娃一八五六年赴伦敦之前的遭际有什么相似之处。

杜契科娃本人认为，当时产生的悲剧的实质是“不能合法结婚”。由于玛丽雅·利沃芙娜不同意离婚，彼此相爱的奥加廖夫和杜契科娃的感情受到极其严重的考验。奥加廖夫要求娜塔丽雅·赫尔岑就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同玛丽雅·利沃芙娜斡旋”。

唯有这个女人的死才能使他们摆脱，并且使他们摆脱了令人痛苦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长篇小说中被写成曾瞬间诱惑过拉弗列茨基和丽莎的无法实现的个人幸福的幻景。但幻景迅速消失了——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的死讯原属误传。

生活中也发生了差错，但却是另一种性质的差错。奥加廖夫不知道妻子于一八五三年在巴黎去世，所以请求他所托付的人提出和她离婚。九月，他才获悉，玛丽雅·利沃芙娜去世了。

在长篇小说里，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活着，却以为她死了。而在生活中，玛丽雅·利沃芙娜死了，却仍然以为她活着。

《贵族之家》内容的新颖之处，首先在于拉弗列茨基同当时社会的虚伪道德的悲剧性冲突。

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破天荒第一次在《贵族之家》里提出了宗教束缚婚姻这一极其重要而尖锐的问题。但作者做得这样巧妙和隐秘，竟没有立刻被猜测出来。只有皮萨烈夫，随后杜勃罗留波夫才以其特有的洞察力看出了《贵族之家》潜在的含意。但由于无法从这个角度详尽地分析这部长篇小说，他们只限于隐晦地指出这一情况。他们的评论是恰到好处的。

第二十三章

和冈察洛夫的冲突——《前夜》——与《现代人》断绝关系

长篇小说脱稿后，屠格涅夫打点行装，准备去彼得堡。

十月三十日，他给那时已到莫斯科来过冬的费特写信：“给您写这封短信，为的是：第一，请求允许我把马车在您的院子里停放几天；第二，预先通知您，我将于十一月五日或六日以后到达莫斯科。回头见。”

“果然，十一月五日，我们还没来得及喝完咖啡，一辆我所熟悉的旅行马车便辘辘地驶到我家的台阶前。在前室门口，我迎接了踏着楼梯走上来的屠格涅夫。”费特回忆道，“他走进供他用的书房时说，理妆后就到女主人那儿去喝茶。

“喝茶时，他觉得精力旺盛，神情快活。他说，今天他哪儿也不去，而要坐下来写信，并且在家里用午餐，晚上才出去一趟。过了一会儿，我到他那儿去时，竟认不出自己的办公桌了。

“‘这么凌乱，您怎么能搞创作呢？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一面说，一面把文稿、书籍，连同文具摆放得整整齐齐。

“他在我家度过的三天里，除了因重病缠身不能外出的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而外，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到这儿来的。”

当时，在莫斯科，《俄国导报》的发行人米·尼·卡特科夫要求屠格涅夫把《贵族之家》交给他发表。但屠格涅夫不想违背对涅克拉索夫许下的诺言，因而拒绝了卡特科夫的建议。

到了彼得堡之后，他仍然对长篇小说作最后的润色。最后，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平日交往甚密的作家中间朗读《贵族之家》。

但屠格涅夫无法亲自朗读，因为他感冒得很厉害，嗓子哑了。他请安年科夫替他朗读，后者欣然同意了。

前来听朗读小说的有涅克拉索夫，德鲁日宁，皮谢姆斯基，巴纳耶夫，鲍特金，尼基坚科，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几位非作家的朋友：伊·马斯洛夫，尼·丘特切夫，米·亚兹科夫。

朗诵在异常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占去两个晚上。在座的人一致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新近获得的巨大成功。

彼得堡作家听了《贵族之家》的朗诵后，时而聚集在冈察洛夫家里的文学聚餐会上（一八五九年除夕），时而聚集在涅克拉索夫家里的文学聚餐会上（一月二日），继续详细、热烈地讨论新的长篇小说。

许多作家向屠格涅夫预言，他将引起读者的轰动，但谁也无法预见，杂志出版后，轰动是什么性质的。

后来，屠格涅夫在几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中指出，《贵族之家》是他所曾获得的最大成就。

在随后发表的大量评论中，皮萨烈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意见引起颇大的兴趣。

《俄国导报》：1856年至1906年间在莫斯科、彼得堡出版的政治和文学杂志，最初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变成了反动派的机关刊物。

皮萨烈夫写评论《贵族之家》的文章时年方十九，但他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论却具有罕见的成熟性、思想的独创性、分析的深刻和高超技巧等特点。

他指出，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显示出对俄国生活的深刻、全面的了解，而且这一了解不是抽象的，而是从现实中得到的。皮萨烈夫把《贵族之家》称为屠格涅夫最严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批评家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这种了解表现得尤为突出。

皮萨烈夫指出，“在主要人物的处境和长篇小说的开头中，有着许多辛酸的生活真理”，所以《贵族之家》的主题不能不在先进读者的思想中激起对社会中传统的、为时代所尊崇的观念的抗议。

批评家在这篇早期论文中就已指出，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的主要特点是，他千方百计避免采用铺陈无遗的艺术手法和粗线条地解决创作课题的方法。

皮萨烈夫在总结对长篇小说的评论时写道：“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屠格涅夫不可能，也不应该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他在丽莎这一人物性格中揭示了当代妇女教育的缺点，但他在许多最具有特征的人物中采撷自己的范例，把选择的人物以能产生最佳效果的色调呈现出来。因而作者的思想不直接引人注目。这一思想必须去探索，去深思，但它对读者的影响却更为有力，更为深远。”

大概由于上述原因，杜勃罗留波夫对《贵族之家》没有发表详尽的评论。他没有分析长篇小说，只是顺便对它发表了意见而已，和皮萨烈夫一样，他指出，“拉弗烈茨基的处境本身，屠格涅夫所选择的、在俄国生活中如此熟悉的冲突本身，应当引起每一位读者对支配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套观念的作用有许多看法。”

杜勃罗留波夫没有说透他所指的一大套观念是什么。但毋庸置疑，他说的是当时社会的宗教、道德准则。

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致认为，《贵族之家》在思想上有巨大的意义，在艺术上有特殊的优点。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读了这样的作品之后，觉得呼吸舒畅，真实可信，心里感到温暖。

丽莎光辉、纯洁的形象，皮萨烈夫称之为“祖国人民的儿子”的拉弗烈茨是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无比瑰丽的描写——这一切使批评界能够无保留地把《贵族之家》列入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之林。

一件预料之外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长篇小说的成功，并给屠格涅夫带来了不悦。这件事应归咎于冈察洛夫。

长期以来，他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和构思告诉伊凡·谢尔盖那维奇。由于器重屠格涅夫的批评家的敏感，信赖他的文学鉴别力，他喜欢对屠格涅夫朗读自己的作品，有时是整部作品，如《奥勃洛摩夫》；有时是作品的片断，如《悬崖》。当时《悬崖》几乎全部尚在构思之中，连书名都没有最后确定——起初，冈察洛夫想把它定名为《画家》。

有时，在交谈中，冈察洛夫津津有味地向屠格涅夫叙述他虑好的一些场面，情节和章节，好象是交给精明的行家和文学大师检验似的。

他描绘薇拉 和沃洛霍夫 月夜在谷底和花园里的幽会，她和拉伊斯基散步、谈心的场面……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每每为呈现在眼前的故乡的伏尔加河和杂草丛生的峭壁的美丽景色所陶醉，说话激动、急促、时断时续。

冈察洛夫构思的形成一向费时很长，很复杂。他自己承认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酝酿缓慢而艰难，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写得非常慢，每部作品相隔长达十年之久。

冈察洛夫的这一特点成为他在创作上多疑的原因之一。《贵族之家》朗诵之后，他的疑心就立即第一次公开发作了。

朗读刚刚结束，听众从四面八方纷纷向作者表示赞扬时，冈察洛夫却心急如焚。

在他的心目中，屠格涅夫原先不过是个再好不过的善于讲故事的人，小型作品和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的作者，如今却突然间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竟以凯旋者的姿态登上了长篇小说家的舞台。

冈察洛夫觉得，在《贵族之家》和他那部他曾多次同屠格涅夫交谈过的未来的长篇小说的提纲中，有许多相似的情景和人物，有几个相符的情节，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正是以他的口述为基础，简练地写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中的精采之处的。

等到客人四散而去，冈察洛夫便开始解释，对屠格涅夫声言，他觉得朗读过的小小说好象是长篇小说《悬崖》的仿制品，这使屠格涅夫惊讶不已。

接着，冈察洛夫固执地坚持说，在《贵族之家》和在《悬崖》的提纲中，有一些细节是相似的。

于是，屠格涅夫怀着他所特有的温厚和谦让，甚至同意从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删去冈察洛夫觉得和《悬崖》中外祖母开导薇拉的情节相似的玛尔法·季莫费耶芙娜第二次开导丽莎的场面。

但是屠格涅夫错了，他虽然暂时消除了冈察洛夫的激怒，但与此同时却使他有理由认为，毫无根据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尽管发生了龃龉，冈察洛夫照旧和屠格涅夫会面，虽然他们的关系明显地变得比较冷淡、拘谨了。

冈察洛夫有时回到这个使他深感苦恼的话题上来。屠格涅夫希望了结这件事情，因此建议把问题提交仲裁会 解决。但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 却一味回避，推托说，这件事情只能由两颗良心来评判，这里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人。

一八五九年春，当屠格涅夫临出国前去斯巴斯科那小住时，冈察洛夫送他去车站，连在这里他们也还继续前一天开始的话题。

“我希望，哪怕现在您终于信服，您是不对的。”和冈察洛夫道别，登上车厢的踏板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说，“请问安年科夫，要知道，我

、
、

薇拉、沃洛霍夫、拉伊斯基：均为长篇小说《悬崖》的主人公。

冈察洛夫的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时间是：《平凡的故事》（一八四七年），《奥勃洛摩夫》（一八五九年），《悬崖》（一八六九年）。

仲裁会：双方发生争执时，由彼此同意的第三者出面审议和裁决。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的教名和父称。

曾对他讲过我的长篇小说的提纲……”

火车启动了……过了几天，冈察洛夫紧跟着往斯巴斯科耶寄出一封长信，在信中执意继续说服收信人，他的错误在于不了解自己的特性，无论他再写多少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也决超不过自己的《伊利阿达》和《猎人笔记》，在这些作品里没有谬误，一切是那样质朴，崇高，精采，辉煌。

他号召屠格涅夫走自己的道路，弄清、确定自己的特性、力量和手段。

“我……在生活中如牛负重，艰苦耕耘，因为我的天性和我的教养所赋予我的是别的一些特征……我们俩都喜爱艺术，都——我敢说——懂得艺术，都爱慕荣誉；此外，您在自己的志向中也不乏热情……由于性格更为严整，由于受到的是另一种教养，还有……我不知道因为什么，——由于懒惰，大概也由于命中注定的谦虚，我没有您这种热情。我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我早已注定要辛勤劳作。我象一头拉车的牛，兢兢业业地为艺术服务，而您却象越障赛马那样，想获得锦标”。

冈察洛夫再三劝说屠格涅夫：“您可以画出几张真实的素描，您可以奏出几个悦耳的音符，而您却竭力想构筑高楼大厦或者马戏院……而搞建筑需要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平静客观的观察、持之以恒的劳作和耐心，而这一切，在您的性格中，因而，在您的才能中都是没有的……”

冈察洛夫虽然已经确信，《贵族之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下子使作者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在这封信中仍然这样写道：

“《贵族之家》……关于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想谈谈一位先生最近在一个社交场合中发表的意见。小说曾令这位先生心醉神迷，但他顺便说，一旦印象消失，在脑海里留下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人物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许多人物是多余的，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叙述太太（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的身世，但显而易见，作者感兴趣的并不是她，而是小画面、剪影、隐约显现的充满生活气息的轮廓，而不是本质、联系和所描写的生活范围的完整性；但德国人演奏的爱情赞歌，马车旁的夜晚，两位朋友的夜谈，写得尽善尽美，正是这几个情节赋予小说以全部情趣，令人心驰神往，但要知道，完全可以不必搞得这么卷帙浩繁，写一篇特写也就行了，这一来就能给人留下更强烈的印象，而不致因这种不必要的间歇令人兴味索然……”我把这位教师的评论（他是教师）告诉您，并非由于它是绝对正确的，而是由于它哪怕多多少少证实了我对您的作品的看法……”

屠格涅夫又竭力安慰激动、多疑的记者：“我要毫不故作谦逊地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教师’关于我的《贵族之家》的意见。但您要吩咐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写《猎人笔记》啊。可是我又不愿意放弃写作，所以只好写这样的小说。这里，我既不奢望严整，也不奢望写出坚强的性格来和深刻、全面地洞察生活，我只求能够把自己头脑里产生的思想说出来……”临去斯巴斯科耶时，屠格涅夫对冈察洛夫叙述了自己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应该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少女，她离开家园，和他爱上的保加利亚人一同到他的祖国去，为的是把它从土耳其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越障赛马”：原文系法语。

记者：指冈察洛夫。

“没完没了地”：原文系拉丁语。

冈察洛夫却认为，“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家，它的续篇，即一个情节分成两部小说，再加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在《现代人》杂志二月号上评论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养女》时，杜勃罗留波夫简略地提到了《贵族之家》。他写道：“……所有的读者当然早已分享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所感受到的崇高而纯真的享受了；同时，毫无疑问，大家会同意，一部这样的作品就已足于使今年的文学事业有个良好的开端了。”

但这个开端并不是仅仅以《贵族之家》的发表为标志的。与此同时，在另一家杂志——《祖国纪事》里刊载了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

这两部作品都按自己的方式表明，“多余的人”这一主题已告彻底结束。

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的发表，不久引起了刊登在《现代人》杂志的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家顺便也腾出篇幅来，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塑造的典型作了对比分析。

杜勃罗留波夫以一系列文学实例说明，生活的要求与贵族文学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割裂是怎样出现，并令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的。他通过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楚尔卡图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的形象，系统研究并指出“奥勃洛摩夫型的天生的特征”。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约会中的俄国人》一样，在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对当代作家，特别是对屠格涅夫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今后创作道路的问题。

对社会思潮极其敏感的屠格涅夫没有漠视先进批评界的号召。看来，他非常认真地读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

无论《贵族之家》在读者中获得的成功是何等巨大，屠格涅夫深深懂得，他以后的作品的主人公应该是与罗亭和拉弗列茨基、娜塔丽雅和丽莎不同的人。

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拥有“巨大的决心”和“高尚的冒险精神”，力图为社会献身的人们去接替他们。文学还没有塑造出这些新人的形象。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是这类形象的第一次尝试。

刊载《贵族之家》的《现代人》杂志刚刚送达订户，屠格涅夫就着手拟定新的长篇小说的提纲了；在草稿中，起初他按主人公的名字把长篇小说定名为《英沙罗夫》，后来取消了这个书名，换上了象征性的意味深长的书名——《前夜》。

“我给小说起了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发表的时间……那时，在俄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象叶莲娜和英沙罗夫这样的人物，便是这种新生活的先驱者。”屠格涅夫写道。

几年来，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在作家的脑海里逐渐酝酿成熟，但只有现在，《罗亭》和《贵族之家》完成之后，他才感到，可以动手写作这部小说了。

屠格涅夫每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向当代最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迈进了一步。他想依照时间顺序，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展示改革前时期俄国社会的生活，描写贵族社会的最优秀部分的代表——“多余的人”的典型，讲述

楚尔卡图林：屠格涅夫所著《多余的人日记》中的主人公。

改革：指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

他们的期望和志向，此后才转而描写提出新的活动家和新的任务的下一个历史时期。

“我的小说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为了把事业向前推进……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他在致伊·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

如今，庄园的邻居瓦西里·卡拉捷耶夫许久前交给他的笔记本终于派上了用场。因为尚在一八五四年，屠格涅夫读了它之后就激动地大声说道：“这就是我所寻找的主人公！”

但那时，体现这一构思的时间看样子尚未到来。

在卡拉捷耶夫的笔记本里，草草地勾勒了一个轮廓，后来这个轮廓构成了长篇小说《前夜》的内容。

“不过，小说没有写完就突然中断了。”屠格涅夫写道，“卡拉捷耶夫住在莫斯科的时候，爱过一位姑娘，他对她也以爱相酬；可是当她结识了一位名叫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人以后（我后来才得知，此人一度颇为闻名，在他的祖国，至今没有被忘怀），就爱上了他，并且跟他一起到保加利亚去了；不久之后，他在那里故世。这个爱情故事写得虽然缺乏技巧，但颇为真挚。卡拉捷耶夫的确没有文学禀赋。只有察里津郊游那一场写得相当生动——我在自己的小说里保留了这一部分的主要特色。”

屠格涅夫对朋友们朗读了定名为《莫斯科一家》的卡拉捷耶夫的这篇小说手稿。大家都觉得，小说写得很差，不足重视。但作家继续深入考虑它，因为他模糊地感到，卡拉捷耶夫的小说的内容梗概对他解决新的长篇小说中提出的任务还会有用处。

在创作巨著的过程中，屠格涅夫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确立自己的准则和技巧、自己的风格和方法。

在描述这一切时，研究他的创作的法国学者马宗说：“屠格涅夫是个有精明的鉴赏力、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他把创作安排得从容不迫，既不急躁，也不匆忙。他创作量很大，但沉静而有节奏。”

有一回，屠格涅夫对一位熟人——阿·波洛弗采夫谈到，他的创作过程的最初阶段通常是怎样进行的：

“起初，未来的一个人物开始在我们脑际萦绕，这些人物几乎总是以真人为基础的。”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罗亭和拉弗列茨基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回想一下《初恋》、《普宁和巴布林》和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的原型。

“使我感兴趣的常常不是主要人物，而是次要人物中的一个；但是，没有这个次要人物，也就没有主要人物。”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最先出现毕加索夫的体态，此后才显露罗亭的面容。

“当你思考他的性格、出身和教养的时候，其他人物便渐渐地聚集在一个人物的周围。”

屠格涅夫认为，“当模糊不清的形象在脑际萦绕，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时”的准备时期是艺术家最愉快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阶段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就象下盲棋似的，因为纸上还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一切都

安德列·马宗（1881—1967）：教授，斯拉夫语文学家，俄国文学史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35年）。在巴黎研究屠格涅夫手稿，贡献颇大。

“下盲棋”：原文系法语。

得装在脑子里。”

一八五九年三月底，屠格涅夫给叶·拉姆别尔特伯爵夫人写信说：“现在我正忙于草拟新小说的提纲。这项工作相当累人，何况它不留下任何看得见的痕迹：躺在沙发上也好，在房间里踱步也好，老是翻来复去考虑人物的性格和处境。”当长篇小说的提纲已经大致构思好，全体人物已经确定（屠格涅夫通常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之为自己的人员）时，他就备一个专用的笔记本，写上标题：“新小说人物鉴定表”。

他把他们的“履历”中的主要事实记入笔记本里，给他们作简要的评价，记下他们的心理特点，他们的脾气、习惯等等。饶有兴味的是，在长篇小说里头我们可以碰到这个术语——在十二章里舒宾说道：“……请听：英沙罗夫先生的鉴定表……”——往下，就对他作了评价。一八五九年夏，屠格涅夫在维希认真地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使他如此专心致志和入迷，以致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见面，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有时，他把自己比作一名战士，虽然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沙场，却不知道自己是胜利了还是吃了败仗。有时，他把自己比作一个石匠——四周尘土飞扬，他却用镐头工作到精疲力尽。

“我不停地和我的人物打交道，连睡觉都梦见他们。”一八五九年七月，他给叶·拉姆别尔特伯爵夫人写信道。

英沙罗夫是在没有活生生的人作为原型的情况下塑造的。这给作者带来不少困难。然而屠格涅夫绘出了主人公的令人难忘的肖像。

无怪乎在民意党人的一份传单中写道，《前夜》的主人公是“活生生的、掇取自生活的形象……”，“是青年效法的、创造过生活的典型……”

一八五九年暮秋，回到斯巴斯科耶之后，屠格涅夫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前夜》极其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描写平民出身的英雄、为人民的福祉献身的革命英雄的长篇小说。

屠格涅夫当代的批评界立即指出他的作品的巨大社会意义，以及作者在发展俄国社会政治小说这一事业中的杰出作用。

《前夜》震撼了俄国广大读者，他们正在寻找关于俄罗斯的未来、妇女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新型的政治活动家等问题的答案。

《前夜》中描写的情节发生在那一时期：当时，“东方的事件迅速发展，俄国军队对诸公国的占领激动人心；风雷激荡，已经可以感觉到，战争迫在眉睫，必然爆发。烽火四起，谁也无法预料，战火将向何处蔓延，在何处平息；昔日的屈辱，早年的希冀——一切都沸腾起来……”这时，保加利亚爱国者尼科拉·菲利波夫斯基在德尔诺沃准备起义，保加利亚革命家格·拉科夫斯基打算把他所招募的义勇军与俄国军队联合。

不仅在土耳其人的后方，昔日的屈辱和早年的希冀苏醒了。在俄国，痛恨暴政并期待人民揭竿而起，反对“内部的土耳其人”——专制政府的人们也准备投入斗争。

长篇小说中描写的事件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开

民意党：在一八七九年从民粹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出来的一个秘密团体，一八八一年三月他们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被沙皇政府摧毁。

格奥尔吉·拉科夫斯基（1821—1867）：保加利亚杰出的革命家和政论家，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之一。

始有关，但小说中鲜明地反映了六十年代革命形势形成前夕，即恰好在屠格涅夫的这部作品创作的时期俄国在社会中产生的思想和情绪。

在这五年期间，俄国有了巨大的进展。人们都预感到一种社会制度将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在人民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青年中，革命情绪日益增长。农奴强烈地期望得到自由；在他们之中，不满情绪日益加剧，不断发生暴动和起义。

生活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今后发展道路问题。如何解放农奴？通过革命的途径还是通过改良？俄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将如何形成？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如火如荼的争论，报刊杂志上进行了辩论。

开始了俄国革命解放运动的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在同反动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受到锻炼，这股力量在大声呐喊，宣称自己有权利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生活中起领导作用。

屠格涅夫——据杜勃罗留波夫断定——迅速猜度到深入社会意识中的新要求和新思想，试图最先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激变。

他大胆地将来自平民阶层的人物置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的中心，并直截了当地将英沙罗夫同温顺的别尔森涅夫和无忧无虑、娇生惯养的舒宾加以对比。

英沙罗夫体现了同祖国的奴役者进行斗争的百折不回的意志。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必将取得成功。英沙罗夫有“现实生活给予的真正的理想”。他素来埋头苦干，坚韧不拔，为人坦率，讲求准确，处事果断，履行诺言从不拖拉。“他知道，他为了什么准备去抛头颅、洒热血，知道同什么和同谁去作斗争”。

这一切便引起虽然模糊，但强烈地渴望自由的叶莲娜对英沙罗夫的迷恋。“啊，要是有人能对我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该多好啊！存好心，——这还不够；要做好事……是的，这才是人生中的大事。可是，要怎样做好事呢？啊，要是我能知道怎样控制自己就好啦！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常常想到英沙罗夫先生……”

叶莲娜被誉为出众的孩子的时候，父亲曾为她感到骄傲，及至她成长起来，他却渐渐地害怕她了，甚至说，她是“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天晓得她是学谁的样”。

在叶莲娜身上，“鲜明地反映出——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说——俄国现代生活的最美好的志向”。和英沙罗夫一样，叶莲娜性格坚强，果断，无畏——为了把一生献给伟大的理想，她大胆地同培育过她的阶级决裂。

在屠格涅夫以前的长篇小说里，也曾提出过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没有这样明确。

屠格涅夫的头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也曾议论对祖国的爱和人民。罗亭在拉松斯卡娅的沙龙里回击毕加索夫的攻讦，捍卫了“知识、科学和对科学的信心”，他说，人“……不能单靠官感来生活；他们要是害怕思想，不信任它，那就大错特错了”。“人要是没有他所信赖的坚强的原则，没有他所坚持的立场，他又怎么能够清楚了解自己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呢？他又怎么能够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列日涅夫 说：

“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却不可以没有俄国！离开了民族性，就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

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中也表明，拉弗列茨基对祖国的感情是何等深沉、炽烈，他对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的真理是多么向往。难怪在拉弗列茨基的脉管里流动着农民的血。

在同潘辛的辩论中，他热烈而诚挚地谈到俄国的青春和独立性，为新人，为他们的信仰和抱负辩护，要求尊重人民的真理，并对这真理持谦逊态度。

潘辛问他：

“您已经回到俄国来啦，那么您打算做什么呢？”

“耕种土地，”拉弗列茨基说，“并且把土地尽可能耕种得好一些……”

在屠格涅夫新的长篇小说里，关于祖国的话听起来却不同，要有力、热情得多。

小说的书名本身就表明，俄国正处于出现英沙罗夫型的人物的前夕，因为“在社会中产生了真正事业的需要”。（杜勃罗留波夫语）

长篇小说中所描写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是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斗争的前夜。根据英沙罗夫的信念，只有决心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证明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沙罗夫对祖国的爱不是在理智中，不是在心灵中，不是在想象中，”杜勃罗留波夫写道，“它存在于他的整个机体之中……因而他比舒宾和别尔森涅夫崇高得无可比拟。”

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一文中分析贵族文学的主人公的行为时写道，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这些先进的人物总是单枪匹马的，不善于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不善于“为了防卫敌对环境的压迫结成紧密的联盟”。

批评家所说的“敌对环境”，指的是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

屠格涅夫牢牢记住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这些话，于是，也

许由于这个缘故，让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考虑当时的优秀人物的孤独处境。

别尔森涅夫在和舒宾交谈时说：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可是‘幸福’这个字眼，是一个能使我们团结、给我们鼓舞、让我们互相携起手来的字眼呢？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字眼，我是说，一个使人分裂的字眼呢？”

“你知道那些使人们团结的字眼吗？”

“是的，这种字眼并不少；这些字眼你也知道。”

“那么这些字眼是什么呢？”

“起码有艺术……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在创作长篇小说《前夜》期间，屠格涅夫同时考虑用比较法分析世界文学中的两个典型的长篇论文《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

一八六一年一月，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写完这篇文章后，在为文学基金

列日涅夫：《罗亭》中的人物。

拉弗列茨基的母亲出身农奴。

会捐款而在巴萨日举办的晚会上朗诵了它，获得巨大的成功。

屠格涅夫当代的批评界立刻觉察出长篇小说《前夜》与这篇在许多方面评论长篇小说的文章之间的直接联系。

《俄国言论》杂志的批评家写道，英沙罗夫乃是屠格涅夫不久前在《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一文中将其与哈姆雷特对比的唐·吉珂德。

屠格涅夫的朗诵之所以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是因为他展示了唐·吉珂德这一英雄人物和为自由而斗争、反抗“与人类敌对的势力……即压迫者”的自我牺牲的战士的形象。

“当这样的人物一旦绝迹，就永远合上史籍吧！书中没有值得一读的东西了。”随笔《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中写道。

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前夜》的论文中写道，屠格涅夫尽管如此透彻地研究过“我国社会的最优秀部分”，终不能使俄国人成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批评家写道，这是由于，最重要的一这原因并不取决于屠格涅夫，因而他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屠格涅夫未能向读者充分展示“英沙罗夫的思想的伟大和美”，并非仅仅由于书刊审查制度的限制——就中也反映了作家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局限性。

《前夜》问世后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罗要塞监狱单人囚室完成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回答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提出的、在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中分析的问题。

尽管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观点和创作方法大相径庭，《前夜》在一些方面乃是通向《怎么办？》的阶梯。

英沙罗夫身上有一些与拉赫美托夫近似的特征。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拉赫美托夫被称为“特殊人物”。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英沙罗夫是“非同凡响的人物”。

叶莲娜向别尔森涅夫询问英沙罗夫的情况：

“他一定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吧？”

此人回答：

“是的，他是个钢铁般的人。”

而且，他丝毫不矫揉造作，搔首弄姿。他不以英雄自居，他的英雄气概是谦逊、质朴的。

叶莲娜并不“想崇拜他，而是向他伸出友谊的手，于是她迷惘了，因为对于英沙罗夫这样的人，对于‘英雄们’，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这样”。

薇拉·巴甫洛夫娜原以为拉赫美托夫是个“忧郁的怪物”，及至确信他其实是个纯朴、亲切、有时甚至快活的人以后，便也同样感到惊异了。

英沙罗夫几乎被描写成禁欲主义者。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中，更加

《俄国言论》杂志：激进民主派的文学、政治月刊。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六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对进步青年发生很大影响。一八六六年德·弗·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案发生后被沙皇政府查封。

指书刊审查制度的限制。——原注。

拉赫美托夫：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

薇拉·巴甫洛夫娜，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

着重指出拉赫美托夫的斯巴达 式的行为 ,突出描写他如何抑制自己的一切任性要求 ,如何扑灭自己的爱火情焰 ,如何自觉地放弃个人幸福。

和长篇小说《怎么办?》的男主人公一样,英沙罗夫的特点是了解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把“应当”和“愿意”,把公和私割裂开来,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

他不为私事操心,而一心考虑共同的事业,首先是“整个民族的公仇”。

在长篇小说中,关于拉赫美托夫也写道:他这一类的人“和共同的事业融为一体,它是贯穿在他们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甚至代替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周围的人非常、完全信赖英沙罗夫和拉赫美托夫:大家总是推举他们评判重要的事情,排解纠纷。

叶莲娜也有与长篇小说《怎么办?》的女主人公近似的特征。她们俩都是为了新的生活,为了斗争毅然离别家园,她俩都有强烈的感情——善于爱和恨。

屠格涅夫借以描写叶莲娜对德米特里·英沙罗夫的爱情发展过程的方法,我们在长篇小说《怎么办?》中也可以发现。

“这可是奇怪的事!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岁了,我还从来没有爱过谁!”叶莲娜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德(我要叫他德,我喜欢德米特里这个名字)其所以能有那么纯洁的心灵,就是由于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

从那部日记里,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理想是什么。当英沙罗夫谈到祖国的解放,他“好象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立刻容光焕发了,声音也变得象纯钢了,好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低下头去。他并不单是说——而且实际干,将来还要继续干……当他初次来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竟能这样快就亲近起来。”

现在来看看薇拉·巴甫洛夫娜的“日记”。其中有一些话,初看起来和叶莲娜的日记惊人地吻合:“……今天我第一次同德谈话,并且爱上他。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谁说过这样崇高的、令人欣慰的话呢。他多么同情一切需要同情的人,多么愿意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啊。他深信:人们的幸福是可能,而且是应该实现的;邪恶和苦痛不会永存;新的、光明的生活不久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

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恰恰想用这一外表的“相符”强调他对所描写的现象的态度的重要得多的内在区别呢?须知,薇拉·巴甫洛夫娜的“日记”完全是一种假定、象征。她只有在梦中才出声地朗读她所想象的日记中那些预言她的另一种真正爱情的字句。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阿霞》的主人公在一生的艰难、重要时刻张惶失措地问自己和别人:他们该怎么办?却又找不到答案。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柳鲍芙·克鲁齐费尔斯卡娅 在日记中写道。克鲁波夫 也绝望地问别尔托夫:

在古希腊,斯巴达人崇尚坚毅勇敢,刻苦耐劳。斯巴达人此处喻禁欲主义

、
均系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的人物。

“那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别尔托夫回答。

同样，当娜塔丽雅·拉松斯卡娅在紧要关头询问罗亭：“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罗亭除了建议娜塔丽雅向命运屈服外，没有找到更好的回答，又补充说：“还能怎么办呢？”

在长篇小说《前夜》中，叶莲娜甚至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也声言，她不能回俄国，因为她不知道，她在俄国该怎么办。

杜勃罗留波夫在自己的纲领性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中强烈谴责贵族文学的主人公优柔寡断和意志薄弱。

“我们需要象英沙罗夫这样的人——但应该是俄国的英沙罗夫。”他写道。杜勃罗留波夫仿佛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创作出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来，他慨叹道：“我们都在探索，渴望，期待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办？”

能够圆满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罗亭们和别尔托夫们，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选作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那些“新人们”。《怎么办？》的作者曾扎根于俄国现实生活的深处，对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了如指掌。他亲眼看见了在农奴制度压迫下奄奄一息的人民。他相信人民，号召他们觉醒起来，然而屠格涅夫是地主、贵族阶级的一分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民主主义”。

屠格涅夫感到，他逐渐失去自己原先在编辑部的影响。如今，他已不再隐讳，他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判性评价的直爽和彻底性。

他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日益疏远。《贵族之家》是他在该刊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把以后写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交给其他杂志发表。

在《现代人》杂志一八六一年一月号上发表《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一文之后，屠格涅夫就同这个杂志彻底、永远地断绝了一切联系。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在杂志上发表之前，涅克拉索夫让屠格涅夫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它恰恰成了导致断绝关系的一个因由。

杜勃罗留波夫的结论把《前夜》解释为迫在眉睫的俄国革命的预兆，论文气势磅礴的结尾隐晦地号召革命，这些都使屠格涅夫不安和恼怒。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在《现代人》杂志发表这篇论文，并提出最后通牒：“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但是，涅克拉索夫拒绝了他的最后通牒。

格里戈罗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比屠格涅夫更早与这家杂志脱离关系。这些作家签订的关于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义务合同生效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失去了意义。

五十年代后期在该刊中遵循的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彻底性，必然导致，并且导致了编辑部的分裂。但这并动摇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坚持杂志的方向的决心。在关于一八六二年出版《现代人》杂志的声明中写道，编辑部虽然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和奥斯特罗夫斯基与杂志脱离关系感到惋惜，但编辑部不能为了同他们继续合作而放弃“编辑部认为正确和正当的办刊的基本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先进杂志所树立的声誉已经如此巩固，致使甚至上述大名鼎鼎的作家退出编辑部之举也不能动摇这一声誉。一

些不择手段的反动新闻记者为这一决裂而兴高采烈，但枉费心机——杂志的影响继续不断增长。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战之美》一文中对屠格涅夫脱离杂志一事作了这样的说明：“屠格涅夫先生完全弄清了我们的思想方式，所以不再赞同它。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的最后几部小说不象从前，当我们还不十分明了他的意向，他也不十分明了我们的观点时那样完全符合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分道扬镳了。”

《前夜》问世之后，读者和批评界不再象对《贵族之家》那样持一致意见。恰恰相反，在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价上，读者好象分成了两个营垒：《前夜》受到一个营垒的热烈赞许，另一个营垒对它则感到惊恐不安和困惑莫解。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对长篇小说表示欢迎，但在上流社会的沙龙和客厅里对它则十分冷淡，对“作者的情绪”感到惊讶，因为他在农奴改革前夕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关于人民的权利的可怕问题……”

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阿·普列谢耶夫在指出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针锋相对的态度时写道，有不少落后的指摘者，但“全体青年和有头脑的人们”都站在长篇小说的作者一边。

屠格涅夫觉得，热心者比不满者要少得多，但长篇小说引起的争论是件好事，因为“假如沉默，那就更糟了”。

第二十四章

《父与子》

在彼得堡，屠格涅夫给为数不多的听众作了两次关于普希金的讲演，并在为贫寒文学家、学者救援会募款而举办的第一次大众朗诵会上作了朗诵，之后又在莫斯科朗诵了一次，在那里——据普列谢耶夫证实——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些朗诵奠定了为文学基金会募款而举办朗诵会的开端，参加朗诵会的有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作家。

屠格涅夫照旧和冈察洛夫继续会面，并且有时互相朗读自己的作品，交流自己的构思。

二月二十二日，屠格涅夫自彼得堡告知费特，冈察洛夫给他和安年科夫念了类似《奥勃洛摩夫之梦》的极其精采的作品片断。这大概是不久后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悬崖》第七章至十一章。

屠格涅夫完成了《初恋》之后，决定向由奥斯特罗夫斯基、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安年科夫、德鲁日宁和马伊科夫组成的“评判会”朗读这部中篇小说。

但受到邀请的冈察洛夫在朗读开始五分钟后才到。

刊载《前夜》的《俄国导报》杂志第一期出版后，屠格涅夫将长篇小说的杂志单印本送给冈察洛夫，请他读完赐教。

单印本很快就被随信退回，从来信中可以看出，冈察洛夫原先的怀疑并没有消除。他在信中写道，小说他总共读了四十页左右，其余的留待“以后什么时候”读完。

显然，长篇小说中描写画家舒宾的开头部分，立刻使冈察洛夫产生一个念头：这个人物与《悬崖》中的拉伊斯基雷同。

一天，冈察洛夫在涅瓦大街碰见批评家杜蒂什金，并且得知他是去屠格涅夫家就餐后，便匆匆开了个不谨慎的粗鲁的玩笑：

“你们吃饭花的是我的钱哩。”他说，指的是屠格涅夫为长篇小说领取的稿费。

“告诉他吗？”杜蒂什金冷笑着问道。

“告诉他吧，告诉他吧！”冈察洛夫笑了笑，大概没有料到，他那用玩笑表示的愿望会得到实现。

杜蒂什金无法自制，便把冈察洛夫的话转告屠格涅夫，这就使他忍无可忍了。他给冈察洛夫发了一封信，说他的声言是污蔑，并且要求举行仲裁会或者决斗。

根据双方的协议，安年科夫、德鲁日宁、杜蒂什金和尼基坚科被选为评判人。据安年科夫说，“这些人同样同情双方，只希望消除破坏双方之间良好关系的借口，他们具有威望的姓名都同样有权利受到尊重。”

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仲裁会在冈察洛夫的寓所举行。尼基坚科在自己的日记里描述这一事件时写道，屠格涅夫虽很激动，但仍从容不迫，“没有丝毫的激愤。冈察洛夫的回答有点含糊，不能令人满意。他所举出的小说

《奥勃洛摩夫之梦》是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一部分，发表于一八四九年。

《前夜》和他的提纲的雷同之处缺少于他有利的说服力，因而屠格涅夫一方显然取得了胜利，原来冈察洛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性格过于多疑，所以夸大了事实。”

安年科夫在记述仲裁会的结论时写道：“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产生在同一块俄国土地上，因而必然会有若干相同的论点，必然会在一些思想和用语上偶然巧合，这证明双方都是对的，而且都是可以原谅的。

“冈察洛夫对仲裁人的这一决定似乎是满意的。但屠格涅夫却不同。他脸色惨白，坐到另一把扶手椅上，用激动得颤抖的嗓音说了下面一席话：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和您的纠纷结束了，但恕我再说几句。我们的友好关系自此刻结束。我们之间发生的纠纷向我清楚表明，友好地交换思想和纯朴的、相互信赖的关系会造成多么危险的后果。我仍然是您的才华的崇拜者，而且说不定将不止一次和别人一起赞赏它，但从今天起，我们之间原先的衷心的赏识和真挚的坦率已不能存在。’他向大家点了一下头，便走出了房间。”

一八六一年春，正当对长篇小说《前夜》展开热烈争论的时候，屠格涅夫因喉病加剧，遵医嘱去国外矿泉区治疗。

在这段时间里，俄国杂志上仍然继续发表评论他的长篇小说的论文和书评。“这是一种类似流行病的东西。不要再去管这玩意儿啦。”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

每当屠格涅夫越过国境，就急忙同赫尔岑建立通讯联系，或者到伦敦去看望他（因为他从俄国给他带来许多重要新闻和常常可用作《钟声》报的材料的各种文稿），而通常从赫尔岑那里了解到欧洲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

这回，他也打算赶紧和朋友相会。“我有许多事情要和你谈。”五月二十一日，他自巴黎给赫尔岑写信道。

在那封信里，他还感谢赫尔岑给他寄来第七十一期《钟声》报，在里面的一篇评论中，赫尔岑高度赞扬了他翻译的玛尔科·沃弗乔克的乌克兰短篇小说（据屠格涅夫本人认为），这些小说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农奴制。

“这些小说使我们注意译者的名字，”赫尔岑写道，“读了这些小说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当代最伟大的俄国艺术家伊·屠格涅夫翻译它们。”

“我感到惭愧，”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信中写道，“这件事我不能信以为真，但我感到愉快。”

到了国外后，他还是没有机会立即与赫尔岑相会。八月，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索登温泉区治疗后，他们才会面。

屠格涅夫对不久前同《现代人》杂志的决裂记忆犹新，因此他这次到了赫尔岑那里后肯定曾不止一次和他讨论过发生冲突的原因。因为这对他们俩来说，是关于《多余的人和爱发脾气的人》、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活动家、两代人、父与子……的迫切问题。

一年前，赫尔岑曾开始同《现代人》杂志展开辩论，在《钟声》报发表了《很危险!!!》一文，旨在反对《现代人》杂志，因此这些问题也深深

玛尔科·沃弗乔克（1834—1907）：乌克兰著名作家。

《多余的人和爱发脾气的人》是赫尔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很危险!!!》：原文系英语。

使他焦灼不安。

赫尔岑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何在？曾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超过如此巨大作用的伦敦流亡者怎么会起来反对最进步的俄国杂志呢？

这是赫尔岑的自由主义一时动摇的结果。在准备进行农奴改革的年代，他不赞同《现代人》杂志领导人的革命策略。那时，他对可以靠沙皇和贵族发善心来改善俄国人民的生活还抱有幻想。诚然，不久后他意识到这些幻想是毫无根据的，但在这段时期他并没有明确的、一贯的主张。

诸如此类的幻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是格格不入的。在主要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其他局部性的分歧。

赫尔岑的上述文章发表前不久，《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在杂志里新辟了讽刺副刊《口哨》。

杜勃罗留波夫在《口哨》以及自己的批评文章里嘲笑了当时风靡一时的“暴露”文学，这种文学无非是“上头”所允许的对区区小事的批评。它不仅不能动摇专制制度和地主政权的基础，而且恰恰相反，转移读者对事情实质的注意力，因为这种讽刺“不愿看到，有的人力求改善的那个机构已经彻底腐朽”。这种于政权全然无害的文学的蔓延，造成了言论自由的假象，刊物自由参预国家社会生活的假象。

赫尔岑不善于识别《口哨》的讽刺的革命方针。他指摘《现代人》编辑部破坏在俄国刚刚产生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在辩论中，他出于一时激怒，竟将妄图摧残国内言论自由的反动派同抨击自由主义空谈家的《现代人》杂志作者混为一谈。

获悉赫尔岑发表指摘性的文章时，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先进人物都好吗？以前，无论革命的号召是在哪里听到的，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他们都能凭嗅觉感到，如今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嗅觉，脑子里装满了法律荫庇下的、由上头提出来的和平演进思想……”

赫尔岑的文章的主旨是袒护自由主义的暴露。但有根据可以推测：他之被刺痛，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暴露方针受到嘲笑，不如说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文章中对四十年代的人们作了全面的重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六年发表的对奥加廖夫的《诗歌》的评论中，就提出了六十年代的革命一代应如何看待贵族的革命性问题。

“奥涅金为毕巧林所代替，毕巧林又为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我们听见罗亭本人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还没有给我们指出任何能够代替他的人来，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很快就等到他的继承者。我们等待的是在童年就习惯于真理，不是胆战心惊、神魂颠倒地，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戴之情看待我们的继承者；我们等待的是这样的继承者和他那朝气蓬勃而又平静、果断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的不是理论对生活的胆怯，而是理智能够支配生活和人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信念统一的证明。”

在《约会中的俄国人》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明确、直爽地说出了类似的思想。贵族文学的心爱的人物，在自己圈子里被认为是“优秀分子”的所谓“多余的人”，绝不能是准备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殊死搏斗的“新人”的典范。

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新人”同过了时的，而且如今只能妨碍社会前进的温情的、无所作为的空想家的对比占有重要的地位。杜勃

罗留波夫仿佛预测到几年后反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新人的肖像，他着重指出，“新人”是坚定、镇静、果断的。他们同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格格不入，敌视一切爱说空话和自我欣赏的恶习，同周围的生活保持着牢固的联系。

由于书刊审查制度，《现代人》杂志无法同赫尔岑公开论战，使他认清他所持立场的错误，特别是他这篇文章的错误。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去伦敦，以便与赫尔岑亲自交换意见。

那里，他逗留了几天。会晤没有给他带来满意的结果，因为他明白，对方仍然受自由主义幻想的迷惑。

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敦之行并非徒劳无益。不久，赫尔岑在《钟声》报的一篇评论里多多少少承认了自己反对“同行们”的错误。

事隔半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位同道者，也许就是他本人，寄给赫尔岑一封署名为“俄国人”的《外省来鸿》，要求在《钟声》报发表。信中写道，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良愿望”，因为无论是历史还是国内的现实，都没有证明这种信心是正确的。

作者在信的结尾对赫尔岑呼吁：

“您已经做过您所能做的一切，来促成问题的和平解决了还是改变论调，让您的《钟声》报不要通知人们去祈祷，而是警策人们吧！请号召俄罗斯拿起斧头来吧！”

赫尔岑对《外省来鸿》的答复再一次表明，那时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有不用斧头就能获得行动自由的一线可喜的希望，他拒绝号召‘拿起斧头——被压迫者的这个最后的办法’”。

沙皇政府对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实现后蓬勃兴起的农民暴动的残酷镇压，才使赫尔岑看清了事态，于是他抛弃了动摇，坚定地站到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

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访问赫尔岑之行颇感兴趣。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亲爱的朋友，我明天要去俄国……我特地给你写信，为的是了解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确实访问过你，他访问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他怎么样？……”

如今，一年后，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又提起这些重要的话题来。

也许在这些谈话中，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脑海里就已经模糊地呈现出他未来的长篇小说的形象了。

的确，他刚和赫尔岑分手并移居在怀特岛的文特诺尔镇，就已经产生了撰写《父与子》的念头。

几天后到这里来的安年科夫后来说，屠格涅夫和他一连几个晚上都谈论同《现代人》决裂一事，并谈到应该怎样消除和缓和出现的分歧。

“这些谈话并非徒然：在争论和解释中，既形成了新的长篇小说的提纲，也酝酿好了主人公的形象。”安年科夫补充道。

过了两个月光景，长篇小说的详细情节已经形成，全部素材业已准备就绪，“但使一切逐渐燃烧起来的火花还没有迸发出来……”

“最后的办法”：原文系拉丁语。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的教名和父称。

和以前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样，屠格涅夫塑造主人公的形象，是从一个“逐渐融合与积聚了各种适当的要素的”活生生的人出发的。这就是说，作家把同类气质的其他人的特点加在确定的原型上，巧妙地把这些特点结合起来，力求赋予这种概括的形象以最大的表现力和典型性。

作家究竟把谁作为巴扎洛夫的原型呢？屠格涅夫的一些当代人认为，是杜勃罗留波夫。

譬如，皮萨烈夫就持这种见解。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给屠格涅夫留下的强烈印象使他最先思考巴扎洛夫的性格。

亚·佩平 虽然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其他说法，但他断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屠格涅夫在塑造巴扎洛夫时把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点注入了这一形象（虽然据云他说的是另一个活人）：屠格涅夫本人认为，巴扎洛夫几乎是个英勇、严峻、正直、坚强的人。

屠格涅夫在《关于 父与子 》一文中指出，主要人物巴扎洛夫所依据的，根本不是杜勃罗留波夫，而是一个叫他大为惊异的年轻外省医生（他于一八六一年去世）的个性。“照我看来，这位杰出的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的因素，这种因素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这个人物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不能透彻了解它……”

巴扎洛夫的形象是生活本身向作家提示的，因而他力求在他身上体现六十年代先进平民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典型特征。巴扎洛夫在哲学、美学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见解，是以在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论文中发挥的思想为基础的。

为了更深入地“体验”所塑造的典型，屠格涅夫在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记巴扎洛夫的假想“日记”，记录自己的主人公关于一些当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想法和见解。

大概和往常一样，还事先制定了长篇小说的人物的“鉴定表”，其中有履历、简短的评价、札记和观察记录。

由文特诺尔返回巴黎后，长篇小说的创作长期进展缓慢，因此未能象原先预料的那样在春天前完成。

列夫·托尔斯泰表示，希望听听《父与子》的一些章节，一八六一年三月，屠格涅夫在给他的信中答应有可能时照办，但总是埋怨说，他在巴黎写作不顺手，长篇小说写到一半就停滞了。“我希望到农村去，到安静、寂寞的农村去，那里最能切实保证我们这些喜欢自由散漫和缺乏恒心的斯拉夫人进行劳动。”他补充道。

屠格涅夫这时急于返回俄国，不单是由于渴望重又见到故乡斯巴斯科耶、朋友和乡亲们，也不单是由于希望在那里完成《父与子》，而是由于迫切希望亲眼看看在祖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旧的事物还从来没有这样迅速地瓦解过。”他在这段时间写道。

屠格涅夫怀着高度的激动和热情经历了可憎的农奴制的崩溃。但他无法立刻透彻了解这一事件的真正性质和先决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远离祖国。

亚·尼·佩平（1833—1904）：俄国文学史家，科学院院士。

当时托尔斯泰正第二次在国外旅行。——原注。

一八六一年五月，屠格涅夫才回到俄国。他在向赫尔岑解释自己延宕归期的原因，并且好象替自己辩解时写道：“我得料理女儿的婚事，所以不得不待在巴黎，我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全部心思，我的一切都在俄国……”

和以往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他对祖国，对纵然不算好看、但极其熟悉而珍贵的草原地区充满特别强烈的爱。

“谁能讲清我从维谢尔山之颠眺望姆岑斯克时每每充满的欢欣心情呢？这里的风景没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但我感到愉快。这就是乡情嘛”。

邻近的同乡（列夫·托尔斯泰、费特、鲍里索夫）的来信给他在异国带来无可比拟的喜悦，因为“这些书信散发着”翻耕过的带微凉意的土地、刚刚栽种的灌木林、谷物干燥室、炊烟、粮食的气息，使他仿佛“听见村长的皮靴在前室橐橐的响声，闻到他的粗呢外衣的强烈的气味……”

屠格涅夫回到斯巴斯科耶之后，长篇小说的创作在乡间的宁静中进行得很顺利。诚然，有一回，平平静静地进行的创作被突然打断了。

五月末，列夫·托尔斯泰到他这里来，他们便一同到离斯巴斯科耶约七十俄里的费特的田庄斯捷潘诺夫卡去。

客人在热烈、友好的交谈中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天早晨，他们聚集在餐室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口角，费特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描述。

屠格涅夫坐在女主人右边，托尔斯泰坐在左边，她问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他对教育她女儿的家庭教师是否满意。

屠格涅夫极口称赞起家庭教师来，又说，她非常认真地要求他确定一笔可供女儿捐献给慈善事业的钱。

“现在英国家庭教师要求我的波琳娜去收穷人的破衣服，亲自缝补好了之后送还原主。”

“您认为这样做好吗？”托尔斯泰问道。

“当然；这使慈善家可以接触到目前的贫苦生活。”

“但我却认为，衣着华贵的小姐在膝上放着又脏又臭的破烂，是在表演一幕不真实的舞台闹剧。”

“请您不要这样讲话！”屠格涅夫高声叫道。

“为什么我不该讲我所深信不疑的事呢？”托尔斯泰回答。

屠格涅夫失去了自制力，激动得脸色苍白，高声叫道：

“您话辱人，我要您住嘴！”

“话音未落，他就在桌前一跃而起，”费特叙述道，“双手抱着脑袋，激动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不一会，他回来对我的妻子说，‘上帝保佑，请原谅我的不成体统的行为，我对此深感懊悔。’话音未落，他又离开了。”

屠格涅夫当即返回斯巴斯科耶，托尔斯泰则到鲍里索夫的田庄诺沃谢尔斯基去。

在他们争吵当天，屠格涅夫在寄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再一次向他认错，并请他原谅。

这场差点儿以决斗告终的争吵，使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联系中断了整整十七年。

仲夏时节，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三十日，星期天。约莫一个半钟头以前，我的长篇小说终于脱稿了。我不知道效果如何。《现代人》杂志大概会因为巴扎洛夫的原故把我说得一文不值，并且不相信我在

整个写作期间都对他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吧。”

象英沙罗夫和巴扎洛夫这样的人物，能引起作者的尊敬，但不能引起在描写拉夫列茨基和罗亭时可以明显地感到的亲切之情。

屠格涅夫刚刚写完《父与子》，关于他写了新作品的消息以及对长篇小说的内容的种种猜测便在刊物上传开了。长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之前，一八六一年秋，他刚开始对朋友们朗读长篇小说的手稿时，作者就听到了许多对《父与子》的自相矛盾的评价。屠格涅夫善于心平气和地倾听朋友们的真心话，因此不怕向他们介绍自己还“在绣架上的”新作。

这次，要猜测出谁喜欢这部长篇小说，谁则恰恰相反，反对它，是特别困难的。情况果然如此：有的读者劝屠格涅夫立刻把手稿付之一炬，有的读者则认为《父与子》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

屠格涅夫决定把长篇小说交给《俄国导报》发表，他无疑是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当时，在先进读者的心目中，这家杂志是反动刊物，声名日益狼藉。

这个杂志的编辑卡特科夫收到长篇小说的手稿后大为惊讶，因为他认为巴扎洛夫是“《现代人》杂志所祀奉的神明”。

“屠格涅夫在激进派面前降下了旗子，对他们敬礼，就象向战功卓著的军人敬礼一样，怎么不感到害臊呢。”卡特科夫说。

卡特科夫对作者在其压力下所作的修改仍不满足，又擅自对主人公的描写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后来，在准备出版单行本时，屠格涅夫把这些修改删去了。

屠格涅夫曾一度甚至想长期推迟长篇小说的发表——他打算重新考虑整个作品，并且把它“再耕耘一遍”。

作家懂得，在反动势力开始转入反攻的严重关头，发表作者的态度不够明确的作品是有危险的。

关于《父与子》的自相矛盾的意见使屠格涅夫感到为难，所以他着手修改自己的作品。长篇小说在竣稿半年后才在《俄国导报》一八六二年二月号上发表。

在此期间，国内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改革丝毫没有满足期望享有人身自由、获得土地而无须偿付赎金的农奴的要求，他们实际上又重新陷于依附地主的地位，现在被迫根据“法令”按劳役制向地主租种土地。

新的暴动浪潮是受骗的农奴对改革所作的回答。俄国欧洲部分的四十七个省份中，有四十五个省份民变蜂起。改革所引起的风潮也波及青年学生，他们不断举行示威游行，使政府大伤脑筋。

国内出现的革命形势已经相当明显，连统治集团的人都承认，俄国正面临“普加乔夫起义”的时刻。

人们对压迫者的愤慨，有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趋势，这一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当局准备对革命运动进行反扑，并正在策划迫害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周围的人们的阴谋。

一八六一年，革命阵营遭到严重损失：谢甫琴科和杜勃罗留波夫逝世，

指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政府颁布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

米·米哈伊洛夫和弗·奥勃鲁切夫 被捕。

政府关闭星期日学校、人民阅览室，禁止出版报刊杂志。《现代人》杂志被勒令停刊八个月。

屠格涅夫在这段时间写道：“当我读到勒令《现代人》杂志停刊的消息时，我那颗年迈的文学家的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忆起了这个杂志的创办、别林斯基等许多往事……”

作家在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前夜》也不例外）中，都没有这样贴切地去解决现代生活提出的迫切问题。

《父与子》的情节发生于一八五九年。这部长篇小说是在社会风潮不断高涨的氛围中创作的，反映了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情景。

长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争论。一些读者指摘作者讥笑曾诚实地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活动过的“父辈”，而盲目地美化接替他们的青年。

另一些读者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长篇小说恶毒地讽刺了青年一代而赞扬了父辈。

这一回，读者的反应异常强烈。文坛实际上爆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争吵。

长篇小说的作者收到大量来信，一些读者在信中写道，他们因他侮辱了青年一代而“带着轻蔑的笑声”烧掉了他的照片，另一些读者则愤怒地指摘他曲意奉承这青年一代。

在杂志的批评界和文学界中，对长篇小说的反应也是这样针锋相对，而且有时是完全出人意外的。

按照卡特科夫的意见，长篇小说中的巴扎洛夫“不知何故偶然被捧得很高。他确实压倒了周围的一切。他跟前的一切不是腐朽的，就是渺小而幼稚的东西。”

“应该希望造成这样的印象吗？”反动政论家质问作者道。

马·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发表了充满愤慨的文章《当代的阿斯莫德》，他在文中把长篇小说解释为对“父辈”的过分颂扬，对“儿辈”的诽谤，对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抨击，巴扎洛夫的形象则是对民主主义青年的讽刺：“他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简直是恶魔，或者是——用更为富有诗意的话来说——阿斯莫德”。

安东诺维奇以为，作者对主人公怀有“一种私人的仇恨和敌意”，作家对巴扎洛夫的偏颇的描写，是他对民主主义青年的代表人物的独出心裁的报复。

相反，民主阵营的另一位批评家皮萨烈夫认为，屠格涅夫在描绘巴扎洛夫这个平民知识分子时，“对这个典型作过深入的思

考，他对它的理解之正确，是我国任何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及的”。

弗·亚·奥勃鲁切夫（1836—1912）：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1861年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星期日学校：成年人每逢星期日接受初级教育的学校，创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马·阿·安东诺维奇（1835—1918）：俄国进步评论家，唯物主人哲学家。

阿斯莫德：古希伯来经卷中的鬼王。

皮萨烈夫认为，屠格涅夫的功绩在于：他善于历史地、忠实地再现当今时代的色彩，巧妙地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并且使读者相信，未来是属于新人，而不是属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的。

“谁要是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领略了这个卓越的思想，他便不能不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正直的俄罗斯公民表示深深的、热烈的感激”。

皮萨烈夫懂得，作家往往很难摆脱个人的爱好和阶级偏见。

“屠格涅夫不喜欢无情的否定，但是无情的否定者的个性却是坚强的个性，它引起每一个读者不由自主的尊敬。屠格涅夫倾向于理想主义，但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描写的理想主义者当中，无论就其思维能力和坚强性格，都没有一个能同巴扎洛相比”。

在这部作品里，屠格涅夫的才华已臻成熟，而且充满了力量。《父与子》具有充分根据被认为是他的创作的顶峰，具有充分的根据被列为俄国最优秀的社会小说。

这里，深刻的内容、心理分析的精湛技巧和新颖的主题、鲜明的色调融为一体。

他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阶级的胜利（用作者的话来说），在表现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方面，巴扎洛夫的形象是一个新的重大的突破。

屠格涅夫完全有理由说，他的作品“切合我国生活的时宜，就象油泼在火上一样，似乎是故意使它指小说赶上火候”。

但屠格涅夫终未能在巴扎洛夫的形象中体现革命活动家的典型特征，当时俄国民主主义青年曾迫切期待作家这样做。

这一形象的内在的自相矛盾决定于：屠格涅夫的政治理想比他的同时代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理想落后。

在同浪漫主义诗歌的矫揉造作以及斯拉夫派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屠格涅夫所捍卫的创作的客观态度无疑起了好的作用，但这种创作态度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目标坚定的美学发生冲突时，也能起相反的作用。

对于艺术的发展及其任务的辩证理解，屠格涅夫当然并不完全陌生，作家写道：“常有这样的时代：文学不可能仅仅是艺术，而是比艺术创作的利益还要崇高的利益。在人民生活中，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作家经常检验自己的作品，将他写的作品同时代对文学和艺术家提出的共同任务加以比较。正因为如此，他比其他的同时代人更透彻了解自己的创作目的，并且力求阐明自己的文学观点，确定自己的创作方法。

屠格涅夫在给弗里德连杰尔的信中写道：“我是现实主义者和时代的产儿。”——这不是空洞的漂亮话，而是他在完成了主要作品之后对自己的艺术经验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关于“父与子”》《长篇小说集自序》这些长篇的自我评论文章中，

屠格涅夫的这个词所指的是革命家。屠格涅夫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俄国诗人，批评家）的信中列举他所认识的“真正的否定者”时，说出了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社勃罗留波夫、斯彼什涅夫（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主张用暴力推翻沙皇制度，把土地和重要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提倡无神论。一八四九年被捕，判处十年苦役）的名字。他强调，这些人的活动根本不是由什么个人委屈和愤慨，而仅仅是由对人民生活的要求的深切关心决定的。——原注。

他更详尽地发挥了这一主题。

在第一篇文章中，屠格涅夫把读者引进了自己的创作实验室，并且用实例向他们表明，他的创作思想怎样由形象向思想发展，生活怎样迫使他接受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在作者的心中，他的个人喜爱、信念、倾向怎样和生活真实的逻辑发生冲突；如果艺术家是诚实的、有才华的，并且把忠实于真实看作自己的唯一目的，这个逻辑归根结底必然取得胜利。——“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和生活的实现，是文学家的最大幸福，即令这个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一致”。

上述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艺术家不应该由事先定出的主题或提纲到形象，而应该由活生生的人，由形象到思想，到主题。

作家应当塑造形象，而不是说教。违背了这个规则，作家就会受到束缚，并且被导致失败。但摈弃说教并不等于摈弃政论性。恰恰相反，屠格涅夫认为，政论家和诗人的任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完全在于手段的不同。

屠格涅夫在对比（乔治·桑的和狄更斯的）社会小说和（瓦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更喜欢不回避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家，并且指摘回避当前最迫切的题材的作家。

“我以为，”屠格涅夫写道，“我国作家的主要缺点——我的

屠格涅夫在给弗里德连杰尔的信中写道：“我是现实主义者和时代的产儿。”——这不是空洞的漂亮话，而是他在完成了主要作品之后对自己的艺术经验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关于“父与子”》《长篇小说集自序》这些长篇的自我评论文章中，他更详尽地发挥了这一主题。

在第一篇文章中，屠格涅夫把读者引进了自己的创作实验室，并且用实例向他们表明，他的创作思想怎样由形象向思想发展，生活怎样迫使他接受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在作者的心中，他的个人喜爱、信念、倾向怎样和生活真实的逻辑发生冲突；如果艺术家是诚实的、有才华的，并且把忠实于真实看作自己的唯一目的，这个逻辑归根结底必然取得胜利。——“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和生活的实现，是文学家的最大幸福，即令这个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一致”。

上述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艺术家不应该由事先定出的主题或提纲到形象，而应该由活生生的人，由形象到思想，到主题。

作家应当塑造形象，而不是说教。违背了这个规则，作家就会受到束缚，并且被导致失败。但摈弃说教并不等于摈弃政论性。恰恰相反，屠格涅夫认为，政论家和诗人的任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完全在于手段的不同。

屠格涅夫在对比（乔治·桑的和狄更斯的）社会小说和（瓦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更喜欢不回避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家，并且指摘回避当前最迫切的题材的作家。

“我以为，”屠格涅夫写道，“我国作家的主要缺点——我的缺点也多半如此——是，我们很少接触现实生活，即活生生的人……”

顺便说说，屠格涅夫对《父与子》的自我评论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还由于这些评论有力地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见解：“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我们说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

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如何，也会显露出来的。”

屠格涅夫指出，在塑造长篇小说中的形象时，他个人的倾向是毫无意义的。他引用《贵族之家》和《父与子》中的人物作为例子。

屠格涅夫问道，“我是斯拉夫派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什么在潘辛身上写出了西欧派的一切可笑的和庸俗的方面，使拉弗列茨基在所有的论点上都打败了他呢？因为，照我的理解，在这种场合，生活正是这个样子的，而我首先就想做一个忠诚老实的人”。

巴扎洛夫的情况也是如此：“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经验又告诉我……我正应该这样刻划他的形象。”

恩格斯论证巴尔扎克的观点是王朝正统主义者。但作为艺术家，他却违背自己的阶级爱好和政治偏见。恩格斯以此作为例子，证实自己的论点。恩格斯将巴尔扎克“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点视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

屠格涅夫在分析《父与子》中描写的侧重点时得出结论：长篇小说是“反对贵族阶级为进步阶级的”，正直、诚实的巴扎洛夫这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压倒了长篇小说中的所有其他人物。

屠格涅夫认为，他在巴扎洛夫身上塑造了革命者的典型，——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这样直截了当地称呼自己的人物，巴扎洛夫的形象的出现对作家本人始终是莫明其妙的：“这里有……一种注定的命运，一种比作者本人更厉害的东西，一种不以他为转移的东西。”屠格涅夫给萨蒂科夫—谢德林写信道。

难道还不清楚，这个法定的命运的名字叫做现实主义吗？

因为对于屠格涅夫所说的生活的真实对作者的个人倾向、癖好和偏见的胜利，只能下这样的定义。

作家内心的斗争瞒不了同时代人。屠格涅夫作说明之前，皮萨烈夫就在长篇小说问世后不久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艺术家正直、纯真的天性发生了作用，摧毁了理论上的重重藩篱，战胜了思想的迷误，用自己的本能弥补了一切……在精雕细琢巴扎洛夫时，屠格涅夫这个人 and 艺术家就在我们眼前逐渐成长一直成长到，他对自己塑造的典型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

《父与子》的作者认为，在评价这部作品的所有批评家当中，皮萨烈夫对他的评价最正确、最精辟；而在作家当中，最深刻了解他的任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八六二年三月，屠格涅夫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谈对《父与子》的意见，并且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这封信研究家们不得而知，但从屠格涅夫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父与子》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最优秀的作品，就其意义而言，这部长篇小说堪与果戈理的《死魂灵》媲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分析了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形象，认为屠格涅夫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原注。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伟大作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八卷，第二十八页。——原注。

“这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所信赖的人……郑重地劝我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就在前几天，皮谢姆斯基……还写信告诉我，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写得很不成功。”屠格涅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道，“这怎能不叫我疑惑和糊涂呢？作者很难立即感觉到，他的思想体现了多少——它是否正确，他是否掌握了它，如此等等。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象在森林里一样。您自己大概不止一次有过这种体会。因此，我再一次感谢您。您这样充分而敏锐地了解我想通过巴扎洛夫表现的东西，真叫我惊讶和高兴得张开双手。您好象钻进了我的心里，而且连我认为没有必要说出来的东西都感觉到了。

“愿上帝保佑，这里不止表现了艺术大师的富有同情心的满腔热忱，而且表现了读者的一般理解——也就是说，愿上帝保佑大家哪怕看到您所看到的一部分东西！现在我对我的小说的命运可以放心了：它起了自己的作用——因而我没什么可懊悔的啦。”

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谈到屠格涅夫因其长篇小说受到批评界的攻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因为尽管满脑子虚无主义却又激荡不安和忧心忡忡的巴扎洛夫（伟大心灵的象征），他挨了一顿整。”

在稍后发表的作家关于《父与子》的评论中，特别饶有兴味的是契诃夫的评论，他在这里别开生面地、意味深长地，并且象向来那样，简练地谈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契诃夫也认为《父与子》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品：“我的天哪！”他在一封信里感叹道，“《父与子》写得多么精采啊！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巴扎洛夫的病写得那样出色，以致我身体虚弱了，并且说得我传染上了他的疾病。而巴扎洛夫的死、两位老人和库克希娜呢，天晓得是怎样写出来的。太绝了！”

契诃夫当然不止一次阅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的第二十七章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蹦蹦跳跳的女人》（一八九一年末）中描写迪莫夫的病和死的一些细节，可能是由以其非同凡响的现实主义使契诃夫叹为观止的《父与子》的最后一章勾起来的。

安·巴·契诃夫（1860—1904）：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优秀的剧作家。

库克希娜：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

第二十五章

《三十二人案》——巴登巴登 ——《烟》——赫尔岑逝世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收到寄自旧金山的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朋友们！我成功逃离西伯利亚，长期在阿穆尔河、鞑靼海峡一带漂泊之后经日本到达旧金山。”

这封信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寄来的，他在信中请求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给他往纽约汇五百美元，并设法告知他的弟弟们，他已顺利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正前往纽约，预计十二月中旬到达伦敦。

信中简略地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坐了三年牢，于一八五四年战争初期被转押到什利谢里堡要塞监狱，在那儿又坐了三年牢。我害了坏血病，牙齿都掉光了。

“终身监禁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度日如年，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乐趣……但我没有气馁……我只有一个愿望：不妥协……始终保持神圣的反抗精神……”

一八五七年，巴枯宁被从什利谢里堡要塞监狱释放，流放西伯利亚。起初，规定他移居托姆斯克省涅柳宾州。必须遵守“为移居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制定的”规章，但巴枯宁推托身体不好，请求允许移居托姆斯克，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巴枯宁在托姆斯克住了两年左右。这里，他认识了任采金企业官员的波兰人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一家。巴枯宁担任他的两个女儿的法语教师。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住在离城一俄里的村中的一幢小屋里。

巴枯宁几乎每天去他们家，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幼女安东尼娅尤为亲近。他爱上了这位姑娘，并向她求婚。她的父亲虽然好长时间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求婚还是被接受了。

一八五九年春，巴枯宁依仗一个亲戚——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权势，由托姆斯克调至伊尔库茨克。他在该处一个金矿老板那里供职，因而得到通行全境的自由，这就使他日后能够实现策划已久的逃跑计划。

一八六一年夏，巴枯宁利用商人萨巴什尼科夫委托他办理商务的机会，离开了伊尔库茨克，顺阿穆尔河而下，到达尼古扑耶夫斯克港，匿名由《射手号》船改乘美国三桅快船，治鞑靼海峡和日本海岸航行了一段时间，直到在横滨遇到另一艘开往旧金山的美国船只。

巴枯宁的妻子知道他的计划。他建议她在他逃走后不要在西伯利亚久留，而到普列穆欣诺他的家人那儿去，在那里等待他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二日，赫尔岑在《钟声》报上刊载了第一则简短的通知：巴枯宁成功逃离西伯利亚流放地，现在正打算由美国前来英国。“我们怀着狂喜将此事告知巴枯宁的全体朋友。”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十月十五日。——原注。

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赫尔岑发信给这时住在巴黎的屠格涅夫，把他们共同的朋友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他，并且请他考虑是否能在朋友和熟人中募款资助巴枯宁。

屠格涅夫答应照办，并且“十分乐意地”承担“每年资助巴枯宁一千五百法郎的义务”。

不久，巴枯宁抵达英国首都。

几天后，《钟声》报刊登了赫尔岑的文章：“巴枯宁到伦敦来了！巴枯宁曾埋没于囚室，消失在东西伯利亚，如今朝气蓬勃、神采奕奕地来到我们中间……巴枯宁怀着对俄国人民的加倍爱戴、坚定不移的希冀和充沛的精力到我们这里来了。

“既然老相识自太平洋彼岸飞来，可见春天已经为期不远

“随着巴枯宁的到来，眼前不由地重现如火如荼的年代的许许多多遗迹和情景……”赫尔岑写道，忆起了后来被反动势力的狂风吹散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理想。

在伦敦，朋友们这样迎接“饱经十四年的磨难、身上还带着镣铐留下的累累痕迹、如今又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米哈伊尔·巴枯宁。

须知，在由伊尔库茨克到泰晤士河岸的历时半年的旅途中，他跋涉了三万俄里。

倘若在青年时代，屠格涅夫大概会立刻赶去迎接来自大洋彼岸的朋友的。

但如今不是那个时候了……一八六二年一月底，他告诉赫尔岑说，他病了，连上街都不敢。“这又推迟了我那肯定开始带上神话色彩的伦敦之行的时间，但我并没有丧失希望”。

这个希望毕竟实现了，但几乎是在半年之后；那时，赫尔岑已完全不再相信能很快同屠格涅夫相会，诙谐地管巴枯宁和奥加廖夫叫“幻想家”，因为他们还相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许诺。

事情竟闹到这个地步：巴枯宁委托这时由伦敦去巴黎的亚美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学生米哈伊尔·纳尔班多夫（准确些是：米卡埃尔·纳尔班多夫）说服屠格涅夫火速前来。“请您一定把他推出巴黎，”巴枯宁坚决要求说，“我非常渴望和他相会，同时我希望他和我们起码待一个星期。”

巴枯宁之所以催促屠格涅夫，除了想同他相会之外，还另有原因。他在伊尔库茨克和妻子分手时，曾和她约好在伦敦团聚，所以现在他决定委托米哈伊尔·纳尔班多夫和屠格涅夫为她的迁移作准备工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她必须分两步走：先从西伯利亚迁至普列穆欣诺，然后由俄国到国外去。

朋友们认为，他应该进一步熟悉环境，使物质生活哪怕多少能得到保证，不致使妻子生活无着，所以不赞同巴枯宁的这个计划，但他什么话都不愿意听。

一八六二年五月，屠格涅夫终于在动身去俄国之前到伦敦来逗留了几天，这时巴枯宁以他特有的幻想力再三请求屠格涅夫，终于说服了他和纳尔班多夫一起承担不寻常的任务。

这就是说，他们应该设法筹款，和安东尼娅·克维亚特科夫斯卡娅建立联系，千方百计地为她奔走。

到达彼得堡之后，屠格涅夫必须刻不容缓地会见巴枯宁的弟弟尼古拉和阿列克谢伊，并且运用自己对他们的威信，使他们给予嫂嫂力所能及的帮助。

巴枯宁叫纳尔班多夫和屠格涅夫带上给弟弟们的信，给这个和那个弟弟写了他们应遵照行动的特别“指令”，制定了密码，规定了供通讯用的各种暗号。譬如，他建议在信中管他叫列昂季·勃雷卡洛夫，管家庭全体成员叫巴巴雷金，管屠格涅夫叫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管他的妻子叫玛丽雅·奥西波娃，管纳尔班多夫叫楚里科夫，管赫尔岑叫季津加乌津男爵，管奥加廖夫叫科斯捷罗夫等等。

他委托纳尔班多夫千方百计催促屠格涅夫。他说：“我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对您则寄予更大的希望”；又说：“他是个沉静好思、叫人愉快的人。您是个活动能力强的人。”

老朋友们——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在一起只待了三、四天。在这些时间里，他们主要是无休止地争论俄国和西欧未来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艺术、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问题，争论最多的是当时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激动的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伦敦流亡者认为是有名无实的农奴解放问题，必须召开全俄缙绅会议问题，最后是起义逐渐酝酿成熟、爱国示威游行日益频繁的波兰问题。

五月末，屠格涅夫离别朋友们，前往俄国，这一来他们争论的许多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愈来愈明显。屠格涅夫否定俄国发展的革命道路，他认为，可以通过在人民中间逐步普及知识和文化获得进步和自由。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屠格涅夫写信给赫尔岑说：“唉，老朋友，请相信：生气勃勃的革命宣传的唯一支点，乃是俄国有教养阶级当中的少数人，亦即巴枯宁称之为腐朽的、脱离祖国土壤的那些叛徒。”

虽然侨居伦敦的人仍然认为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即便不是同盟者，也是同路人，但决不是政治人物，然而尖锐的政治形势使他们日益疏远。

“在来自敌对阵营的人们中间，只有你一个人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只能和你一个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巴枯宁对他说，“好在你在西欧有自己人和朋友，你在西欧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了个人的天地。我想，在俄国，在你现在的同道者和“中间派”中间，你会觉得很可怕的……”

当屠格涅夫和朋友们分手后登程返回俄国，抵达斯巴斯科耶时，《钟声》报开始发表赫尔岑以《结束与开始》为总标题的书简形式的文章。这些书简的收信人是屠格涅夫。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根据间接的特征很容易猜出这一点。

在这些文章里，赫尔岑回到同屠格涅夫在伦敦的争论和谈话上来。《结束与开始》通常称为他和屠格涅夫之间的论战，尽管其实并没有发生过论战，因为收信人不可能在刊物上答复这些冗长的文章，只限于在私人信件中，而不是在“文学”通讯中发表个别的意见。

赫尔岑在第一封信中就清楚地写道，已经出现了分歧，屠格涅夫只是个同路人而已，他们必然分道扬镳。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决不会再往前走，在漫长的酷夏之后，你渴望的是在秋季茂盛的庄稼地和树叶懒洋洋地摇曳着的绿荫婆娑的公园里小憩……你不担忧白天变短，山峰盖满白雪，有时袭来可怕的冷风，你更害怕春季难行的道路，没膝的泥泞，河水的暴涨，雪中裸露的土地，总的来说，你害怕我们对未来收成的希望，在我们和这个收成之间，隔着狂风、冰雹、暴雨、干旱和我们还没有付出的全部艰苦劳动……这有什么，上帝保佑吧，

让我们象亲密的同路人那样友爱和睦地分手吧……你余下的路程不远了。你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有明亮的住宅、清澈的小河、花园，既有余暇，手头也有书读。我却象一匹被驱赶着的负重前行的驿站老马，卸了又套上，直到在两个驿站之间的什么地方咕咚一声栽倒为止……”

前往斯巴斯科耶之前，屠格涅夫得顺路到彼得堡去。那里和各地一样动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首都时，城里发生了大火灾。阿普拉克辛商场，大奥赫塔街和小奥赫塔街，座落在料贝里斯克街和利戈弗卡街之间，从伊凡·普列德捷恰教堂到格拉佐夫桥的方形地区，都燃烧着熊熊烈火。

大火烧毁了特罗依茨街和阿普拉克辛商场之间的许多房屋。许多街区被烧得精光。成千上万倾家荡产的人们背着包袱在广场和街头流浪，大门和台阶都上了锁。

屠格涅夫路过烈火笼罩的内务部时，“在废物堆和灰烬中看见了烧坏的关于发给他出国护照的卷宗”。

城里流传着关于纵火犯的挑衅性谣言：警察局的侦探指控革命青年纵火，实际上纵火的是他们。

使屠格涅夫大为惊讶的是，从他的长篇小说中抽出来的“虚无主义者”一词，现在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

“瞧，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坏事！他们竟焚烧彼得堡！”在涅瓦大街上最先碰见他的一个熟人这样大声说道。

在致女作家玛尔科·沃弗乔克的信中，屠格涅夫答应在什么时候谈谈他这次在俄国居留期间所得到的印象，谈谈他“想握的手”怎样打他，而他打算退避三舍的手怎样“爱抚”他。

那时，作家感到十分烦恼。意气相投的人的冷淡和反动分子的“欢迎”向他表明，看来他在长篇小说中犯了错误，起码有千方百计诽谤解放运动的反动分子企图利用的模糊不清的东西。

“我愿意承认，”屠格涅夫后来说，“我没有权利使我国的反动家伙能够利用绰号，利用名字大做文章；作为作家的我应当为作为公民的我作出这种牺牲，因此我认为，青年同我疏远以及对我的一切责难是正确的。”

屠格涅夫意识到，由于这个错误，他的名誉“蒙上了阴影”。完成伦敦朋友的委托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首先必须弄清，巴枯宁的弟弟和姐妹是否愿意把危险的逃亡者的妻子接到家里来。为此他必须会见巴枯宁的两位弟弟，但是，原来他们都身陷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在这以前不久，他们在十三个特维尔省贵族和解中间人呈递亚历山大二世的请愿书上署了名，公然提出，政府虽然实行了改革，却无力符合社会的要求，因而被捕。

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同巴枯宁的弟弟相会，须经彼得堡总督苏沃罗夫批准，总督要求屠格涅夫保证和囚徒只谈家事。

可以设想，这些老相识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的拱顶下的会见是多么耐人寻味，他们的哥哥巴枯宁也曾在这里度过不少时日。

屠格涅夫用不着劝说巴枯宁的两位弟弟：他们立刻表示同意把嫂嫂接到普列穆欣诺来，因为他们不久即将获释。

屠格涅夫把打纳尔班多夫那儿收到的钱跟自己交的钱合在一起，交给巴

和解中间人：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从贵族中间选出所谓“和解中间人”，来调解旧农奴和贵族之间的纠纷。

枯宁的一位亲戚，让她汇往伊尔库茨克，便以为自己的任务业已结束了。

在这段时间，他列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书店去了两次，给他送去从赫尔岑那里带来的一包重要文稿，同他洽谈了关于出版一本儿童读物一事。

在书店里，他在以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名义提出的赈济火灾难民的募款单上捐了一笔款。

那时，屠格涅夫还访问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出版的新杂志《时代》编辑部。屠格涅夫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的朋友及撰稿人——批评家斯特拉霍夫一起到他下榻的克列雅旅馆共进午餐。

尼·尼·斯特拉霍夫后来回忆在旅馆的餐厅同《父与子》的作者的这次会面时提到，那天屠格涅夫心情兴奋。

“向他袭来的暴风雨显然使他不安。午餐时，他谈得很热烈、精采，主要话题是外国人对侨居的俄国人的态度。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外国人怎样耍狡猾、卑鄙的花招，诈骗俄国人，把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使遗嘱对自己有利等等。”

斯特拉霍夫感到惋惜，作家没有把这些敏锐地观察到的事物写成小说，在报刊上发表。

几天后，屠格涅夫动身去斯巴斯科耶。在赴莫斯科途中他正巧和涅克拉索夫乘同一节车厢。

一年前，诗人曾试图和老朋友和解。那时他给屠格涅夫写信道：“亲爱的屠格涅夫，想听到你的话语，给你写信的愿望终于使我烦恼透了。我之所以没有写信，起初是因为不愿意，后来是因为我想你会生气，再后是因为担心你会以为我写信是想把友谊强加于你，等等。”

“不，这个你大可不必害怕——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把事情弄清毕竟不是一件坏事，这一来我好认为问题已得到解决，要不然我就会不断地想起你来，而且尴尬的处境总是阻挠我给你写信。”

涅克拉索夫在这封信里提及，一八六一年四月屠格涅夫临出国时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抽出时间来和他告别。

“起初，我认为这件事是出于偶然，后来我想，是因为你生气了。你为什么生气呢？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现在也不反对。而且不可能反对你，除非你想起过去我对你的爱曾闹到发火和对你态度粗暴。”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对这个好象是明白的。我不能认为，你生我的气，是因为《现代人》发表了你会不喜欢的文章。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文章里与你本人有关的东西——我深信，即使关于你本人的更尖锐的文章也不会使你离开《现代人》杂志。但你可能为朋友，也许有时为原则生气，——恕我直言，这种感情可能受到一些朋友的支持和助长，——好啦，你也许是对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过错；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就会看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人（无论你看如何，无论他们有时出过什么差错，他们毕竟是正直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你也会这样做的，

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1834—1866）：俄国革命家，政论家。

《时代》杂志，文学、政治月刊，1861年至1863年在彼得堡出版。这家杂志是“土壤派”的机关刊物，曾同革命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进行激烈斗争。

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哲学家，政论家，文艺批评家。

也就是说，你会让他们畅所欲言，文责自负。

“因此，我以为，你也不是因为这件事和我断绝关系的。请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现代人》杂志张罗，我是想为它搞到你的小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我是想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还要再说一遍：我写这封信，是迫于对你的绵绵思念。这也许会使你感到可笑，但我最近好几夜都梦见你。为了不使你难为情，我建议：假如这封信发出后一个月我没有接到你的回信，那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想了。祝你健康。你的涅克拉索夫。”

后来，收到了回信。诚然，这封信谁都不得而知。但后来屠格涅夫写道，他在致涅克拉索夫的这封信里拒绝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在此之后，涅克拉索夫又写了一封不长的信，这已是最后一封信了，他在信中援引了屠格涅夫的话，写道：“‘什么事都不要看得太重’，——你是对的。就此搁笔，我仍然喜爱你，为许多事情感激你。”

如今，他们同车前往莫斯科。一路上，他们谈笑风生，但用屠格涅夫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斯巴斯科耶居留的时间不长。六月，他和费特一起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猫，猎事很不顺利。

这回，他在这里破例地什么也没有写，只研究了夏波夫的著作《地方自治与分裂运动》；屠格涅夫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在伦敦时奥加廖夫和赫尔岑曾多次跟他谈论地方自治在俄国的意义。

七月中旬，他在斯巴斯科耶获悉车尔尼雪夫斯基、尼·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和皮萨烈夫被捕的消息。这件事是鲍特金往诺沃谢尔基写信告诉费特的。

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借口是赫尔岑的书信，信中谈到，《现代人》杂志可迁往国外出版。

巴·阿·维托什尼科夫进入俄国国境时被拘留，这封信是搜查他时截获的。维托什尼科夫是从伦敦回来的。那里，他认识了赫尔岑、奥加廖夫和巴枯宁，负责把他们的大量信件带回俄国，送交各种人。

屠格涅夫自然没有料到，在维托什尼科夫那里截获的文件中常常提到他的名字。获悉在纳希契凡的米哈伊尔·纳尔班多夫被捕的消息后，他才预料到会发生这类事情。这件事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被捕后一个星期发生的。纳尔班多夫被由纳希契凡押解至彼得堡，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在那里囚禁了三年。

搜查纳尔班多夫时，截获了巴枯宁的“指令”、密码和文稿，侦查委员会会根据同赫尔岑、奥加廖夫有来往之被告者的材料得知，屠格涅夫就是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他负责为米哈伊尔巴·枯宁筹款，协助逃离西伯利亚的革命者的妻子迁居国外。

侦查委员会还获悉，他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受托人，他返回俄国时接受了他们的各种委托。

这一切很快就使屠格涅夫受到了“三十二人《同伦敦宣传者发生联系之被告）案》”的株连。

这次回国，屠格涅夫逗留的时间不长。八月间，他已经又在国外了。同

阿·普·夏波夫（1830—1876）：俄国历史学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夏波夫的世界观起了很大影响。他对革命民粹派的观点颇表同情。

年年底，他在那里得消息：最近将召他回彼得堡向枢密院提出供词。

起初，屠格涅夫以为这一消息是不足为信的，但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原来，侦查委员会主席阿·费·戈利增公爵确实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应当召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瓦·伊·克利西耶夫、伊·谢·屠格涅夫及其他许多人回国受审。沙皇批准了这一建议。

政府采取的这一举动使屠格涅夫焦灼不安。他邀哥哥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到巴黎来，商议变卖田庄一事，因为田庄很快就有被没收的危险。

“在《父与子》发表之后，在青年一代写文章骂我之后，当我已彻底、几乎公开与伦敦流亡者，即他们的思想方式决裂的时候——恰好现在召我受审，这是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事……”

一八六三年一月初，屠格涅夫给安年科夫写信说。

一八六三年一月，屠格涅夫通过俄国驻巴黎公使接到官方传票后，又给安年科夫写信说：“我无法想象，我究竟有什么罪。

我总不能认为，他们生我的气，是因为我和青年时代的同志有来往吧，他们正在流亡，我在政治信仰方面早已和他们彻底决裂。再说，我算得上什么政治人物啊？我是个作家，一个独立的、忠诚的、温和的作家。只此而已……”

屠格涅夫依照公使的劝告，写信给亚历山大二世，保证自己信仰上的“温和”，“完全独立但又很忠诚”。

从屠格涅夫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担心由于如下的原因受到迫害：和建立俄国大学生阅览室并从事政治宣传的海德尔堡大学生会见，还参与起草呈交亚历山大二世的“请愿书”，要求召开全俄缙绅会议，“请愿书”的作者们把这个会议看作挽救俄国的唯一手段。

如今，为了赢得时间并弄清发生的“案件”的实质，屠格涅夫要求将“审讯条款”寄来巴黎，说明他提出请求的理由是因病无法立即回到俄国。

屠格涅夫的要求得到批准。他从寄来的审讯条款中看出，说的主要是他与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的关系，顺便提及与纳尔班多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相识的问题。

侦查委员会对屠格涅夫的书面答复并不满意，指出这些答复和其他被告人的供词有若干矛盾。

一八六三年秋，再度发来传票，但这回屠格涅夫也以种种借口拖延回国“你也许回国为好，”赫尔岑这段时间给屠格涅夫写信道，“由于此事对你的迫害会给傻瓜、胆小鬼和恶棍政府带来可怕的打击。”

接到第一次传票一年之后，屠格涅夫才坚信，“案件”于他必将圆满结束，便于一八六四年一月回国，在枢密院提出供词。

一月七日，他去那里出庭，聆听了将他提交法院惩办的“圣旨”。随后对他宣读了他以前的供词，他一一证实无误。

审讯前，令他具结不离开彼得堡。起初，表面上事事看来气势汹汹。

但第二次审讯后，被告人就开始明白，“圣旨”也好，具结也好，都不过是对形式主义的不得已的迁就。

“我的六个法官宁愿和我闲聊……”一月十三日，他给波琳娜·维阿多

瓦·伊·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国社会活动家，曾与赫尔岑、奥加廖夫交往，故受到“三十二人室”的株连。1862年拒绝回国受审，被判处驱逐出国。1867年向政府忏悔，受到赦免。

尔写信道，“明天我又要去枢密院——我想，这是最后一次啦。”

赫尔岑得知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后，强烈谴责他的这一行径。一八六四年一月，《钟声》报发表了赫尔岑关于屠格涅夫的忏悔的辛辣评论。评论中顺便写道：“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大林（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食无甘味，惶惶不安，白发和牙齿都掉光了，焦虑皇上尚不知道她诚心忏悔，为了表示悔过，她‘同青年时代的朋友断绝了一切联系。’”这篇评论就成了他们持续数年的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一月二十一日，屠格涅夫在斯摩棱斯克墓地参加了德鲁日宁的葬礼，聚集在这里的有涅克拉索夫、费特、冈察洛夫、安年科夫、鲍特金等其他许多文学家。

这里，他同冈察洛夫和解了。安年科夫依照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请求，走到冈察洛夫身边说，屠格涅夫想和他握手言和。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非常高兴，这一会面结束了他们的龃龉。

同年春天，屠格涅夫自巴黎寄给冈察洛夫的信中写道，“由于有共同的往昔，志向相同以及许多其他原因”，他们重归于好，他对此感到高兴。

屠格涅夫想必此刻忆起了列日涅夫对罗亭说的话：

“老兄，须知咱们的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须知我跟你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哪！在以往，当咱们还来日方长的时候，咱们尽可以各行其是，甚至仇视，但是现在，咱们圈子里的人渐渐稀少了……咱们应当同舟共济才是啊。”

屠格涅夫在给冈察洛夫的信中写道，“须知我和您也有点象‘最后的莫希干人’了。我再说一遍，我衷心高兴，我在我的手里又感到您的手啦。”

“三十二人案”结束前好久，根据枢密院一月二十八日作出的特别裁决，屠格涅夫获准出国；夏天，当他已经在巴登时，就此案对他不予起诉。

和《现代人》的决裂，同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的绝交，“三十二人案”的株连，刊物对《父与子》的猛烈攻击——这一切在作家心中引起了痛苦。

赫尔岑所说的艰难时期到来了。“彼得堡笼罩着最危险、最荒谬的恐怖……《白天》、《现代人》和《俄国言论》被勒令停刊，星期日学校被关闭，规定赈济贫寒学生的经费被收回，印刷厂受到双重的监视，公开演说须经两个部和第三厅的批准，逮捕不断进行，军官、御前侍从武官身陷囹圄……看来，尼古拉反动统治还阴魂未散，如今正身穿白色制服验衣，扣好了全部钮扣，从地下站将起来”。

在屠格涅夫这个时期的信札中，明显地流露出疲倦、失望、有时甚至深沉的悲观和绝望的调子。

尤其使作家伤心的是青年对他的冷漠，他们不能原谅他毫无热情地、冷漠地（在他们看来）描写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这个人物。

有时，他想完全放弃文学生涯，或者在以后的作品中无论如何不涉及重大的、迫切的社会问题。

作家对现代生活特别敏锐，一贯强烈地对社会意识中刚刚产生的新思想

马利亚·马格方林是一个妓女，后来改邪归正。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

美国小说家库柏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写美国印第安人的莫希干族衰亡的故事，此语后来一般用来喻某种人物的残余。

《白天》：伊·谢·阿克萨科夫主办的斯拉夫派周报，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在莫斯科出版。

作出反应，所以如今他尤其清楚地感觉到日益猖獗的反动思潮——这使他感到窒闷。

“我未必能很快又受到批评界和公众的评论，《父与子》引起的轩然大波真把我折腾得够呛。”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女作家玛尔科·沃弗希克吐露了自己的疑惑。

确实，他的产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急剧下降。以前，在短期内——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一年，且不说大量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仅长篇小说就创作了四部：《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如今，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七年，仅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烟》。

这些充满深沉的悲观情绪的作品，清楚地说明屠格涅夫在那个时期所经受的思想危机。

作者自己也感到了自己以前的优秀作品和新写的，诸如《幻影》、《够了》这样的短篇小说之间的明显差别。他鄙夷地把这些小说称之为胡说或他在心情痛苦的时期臆造出来的神话，所以不敢立即拿去发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他主办的杂志需要稿件，多次要求屠格涅夫把《幻影》交给《时代》发表，但他考虑、斟酌了很久：向习惯于读他那对于大家都是重要的宏篇巨著的读者发表这种无足轻重的作品是否适宜。

他的生活、创作道路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

同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凯维奇的友谊……同别林斯基的密切关系……《猎人笔记》……他的长篇小说所取得的空前成功……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中的工作……赫尔岑主编的《钟声》报……如今，已没有亲密的同仁，没有其利益象从前的《现代人》杂志的利益对他同样珍贵的刊物了。因为他对发表他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的《俄国导报》的方向实际上是感到格格不入、漠不关心的。在这个编辑部里，他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来客而已。

如今，他仍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文学家大大稀少了，居首要地位的是安年科夫、鲍特金、费特。他对这些人的许多社会政治观点不满意，费特或者鲍特金偏狭的保守观点有时甚至使他讨厌，所以他在思想上和他们逐渐疏远。

他从远处深入观察在改革后时期的俄国发生的事件，看到的却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片混乱，社会关系的迅速崩溃，反动势力的嚣张。屠格涅夫后来描述这一时期时写道：“新事物没有扎根，旧事物完全失去了力量……整个被动摇的生活象泥淖一般激烈动荡。”

正如革命民粹主义者拉弗罗夫正确地指出那样，在这一时期，由于作家同俄国隔绝，无法“发现保留下来并增强了的朝气蓬勃的社会力量和正破土而出的社会幼芽”。

屠格涅夫脱离了民主阵营，和进步活动家绝交，想与世隔绝，沉溺于自我，不问政治，听天由命……“我的好友，你对我的鼓励是白费的。”他给一位同乡写信道，“我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生活是如此平静，很少有什么惋惜和忧虑，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愿星期三妈妈象星期二，正如星期二爸爸象星期一样。如果你们——所有凶恶的蟑螂、疾病、眼瞎、耳聋、残废不出来骚扰人的话，那就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我们为什么要斗争和毁坏树木呢！”

彼·拉·拉弗罗夫（1823—1900）：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中拥护唯心主义主观方法，反对马克思主义。

幸而美感尚未枯竭——一八六四年春，波琳娜·维阿尔多最后一次在巴黎剧院的舞台上扮演了格鲁克的歌剧中的奥尔菲。她已失去了昔日歌喉的魅力。由于觉察到这一点，她打算放弃舞台生涯，献身于教育活动。

维阿尔多夫妇极端憎恨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因而决定离开库尔塔弗内尔和巴黎，移居德国，以便在巴登巴登开办声乐学校。他们在这个风景幽美的小城的郊区购置了别墅。

从这时起，屠格涅夫也在那里居住。他在维阿尔多的别墅隔壁也买了一块地皮，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

这段时间，在费特家里作客的鲍特金顺便到斯巴斯科耶去了。他打那儿往巴登给屠格涅夫写信道：“当我起了床，走进你的书房时，我忧郁地看了你那挂在搁架上的猎袋。四周的一切都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阒然无声。清晨，我在花园里漫步，还到彼特罗弗斯科耶去了一趟。林荫道盖满黄叶，小径杂草丛生，一切都留下了安详、缓慢的荒芜的痕印……但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看这些地方的，虽然愉快中夹杂着哀愁。一切都令人想起你。你的生命的一页曾在相对吹来的风之间晃动，终于翻过去了——在它的远景中，已经看不见你和这些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有任何共同之处。”

屠格涅夫感谢鲍特金给他写了这封信，尽管它带着淡淡的哀愁：“它使我活龙活现地想象到那个我在那儿度过许多年头，而如今未必能回去的遥远的村庄……”

屠格涅夫为女儿和她的上了年纪的外国教师在巴黎租了一处不大的寓所，他来看望女儿时也在这里小住。

不久，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一八六五年二月，波琳娜·屠格涅娃同加斯东·布吕埃尔结婚。后者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玻璃厂的年青厂主，该厂距巴黎一百二十公里。

根据屠格涅夫的意见，他是个忠厚、干练的好人。他说：“他有教养，出身望族，主要的是，我的女儿很喜欢他。”所以他以为，他的女儿是会幸福的。

但是，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亲和女儿。最沉重的考验落到了他们身上。过了几年，当屠格涅夫已有了外孙时，布吕埃尔家的富裕生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一八七二年九月，屠格涅夫家生了个孙女（让娜）。不久，他收到了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自莫斯科的来信：“致我的恩人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敬祝您贵体安康，吻您的手。我想打听您和我的女儿波琳卡以及女婿的健康。敬请赐恩；几年来，我每四个月收到您赡养金二十五卢布，现在四个月过去了，却没有收到钱，我给您的管家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信，但没有得到回音，这件事使我怀疑您贵体欠安。我见到您时，曾请求将我安置在村中（斯巴斯科耶），如蒙允许，不胜感激之至。再一次祝您万事如意，恳请告知您的健康情况。永远尊敬您的阿芙多季雅·卡卢金娜。”

不晓得屠格涅夫是怎样回信的，但关于女儿，他无法告诉她任何令人欣慰的消息。战后，布吕埃尔的生意每况愈下，终于完全凋敝。

七十年代末，屠格涅夫给哥哥尼古拉写信说：“我的女婿把我女儿的嫁

奥尔菲：歌剧《奥尔菲与艾弗里迪卡》中的男主角。

波琳卡：波琳娜的小称。

妆花得精光，大概很快就将被迫宣告破产，这一来我的女儿和她全家就要由我赡养了。”

屠格涅夫逝世前一年，他的女儿离开了丈夫，和孩子们一同暂时搬到父亲家里来。必须离婚。“已经忙着在跟律师和诉讼代理人等办交涉了。”屠格涅夫告诉朋友们，“诉讼程序可能持续一年多，她和孩子们得躲藏起来；她有过的这一切，如今永远失掉了。——说不定她甚至只得永远逃离法国呢……”

由于害怕丈夫跟踪，波琳娜·布吕埃尔果然离开了法国，和孩子们迁居瑞士。

情况对她非常不利，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她竟无法来同他诀别。

屠格涅夫不能长久无所事事。他也不能满足于写“神话”，而且象《幻影》、《够了》这种主观性很强的抽象哲理性的“神话”。

这回，在作家身上，继续从事认真编纂俄国社会发展编年史工作的强烈愿望也占了上风。无怪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说明作为胸怀社会利益的艺术家的屠格涅夫的特点时说，他从来离不开“全人类的理想的土壤”。

一八六五年，屠格涅夫着手创作新的长篇小说《烟》，这部小说起初定名为《两个生命》。

绝情十年之后，季特维诺夫在巴登巴登遇见伊丽娜，并且第二次对她产生爱情，在他匆匆离开这里的场面中，着重指出了可能采用这一题名的含义。

伊丽娜来到车站，曾痛苦万分地犹豫了片刻：她是否跟季特维诺夫一起逃走。“还来得及的。只要迈出一步，做一个动作，这两个生命便永远结合在一起，驰向无人知晓的远方”。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伊丽娜没有力量和决心同她为之牺牲了青春、美丽和自尊心的上流社会决裂。

她认识到，她不得不在死木偶中间生活，她也许正在失掉开始过新生活的最后机会。但环境战胜了她那昙花一现的激情：“我曾希望把以前的一切抹掉，把过去的一切投进火里焚毁……但是，看来我无法自拔了；看来我中毒太深；看来我在这种气氛里呼吸了许多年，不能不受感染”。

在创作过程中，屠格涅夫更换了长篇小说的题名，因为新的题名——《烟》具有更广的象征意义。

小说描写了季特维诺夫在火车载他离开“那里还留下他的许多生活”的巴登巴登这一时刻的心境。其实，在这一描写中，明显地流露出作者本人当时的情绪。

因为，甚至这里带着重号的引自长篇小说的句子，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八六一年屠格涅夫寄自库尔塔弗内尔的一封信中的隐秘的承认：“……如今我在十五年前来到那里、并且那里还留下我的许多生活的住宅里……”

季特维诺夫望着窗外，风朝着火车迎面吹来，在飞驰中的火车两旁卷起团团黑烟，骤然间，他在单调、匆忙、乏味的游戏后面，看见了另一种东西。

“烟，烟，”他重复了好几遍，忽然觉得他的生活，俄罗斯的生活，人类的一切，尤其是俄罗斯的一切都只是烟。他想，一切都只是烟和蒸汽，一切都似乎在不断地变化，一幅图景代替另一幅图景，各种现象接踵而来，层出不穷，然而事实上，一切依然如故，保持原样，一切都在急速驶过，一切都急于朝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飞奔，可是，一切都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掉，

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风向一转，一切都朝相反的方向奔去，然后又不停地在那儿重新开始同样狂热而无毫无结果的游戏……”

季特维诺夫的这些思想是多么悲观，充满多么巨大的痛苦啊！

一八六二年夏，屠格涅夫到达巴登以后，即逐步为这部长篇小说积累素材。由于事件迅速变换，流传着令人不安的谣言，到处进行搜捕，反动势力大肆反扑，他不知所措，晕头转向，在祖国居留的时间比原定计划短得多，便匆匆出国了。

我国的这伙人是轻浮的，他们为数不多，脱离了故土，象羽毛、泡沫一样旋转；现在他们准备离开不久前还在那儿兜圈子的地方，涌到或者飞向非常遥远的地方去；至于这期间人民能否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是迟缓的、部分的，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将等待和密切注视着这一切。”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但由于屠格涅夫没有扎根于俄国的生活，密切注视那里发生的事件是很困难的。

因而新的长篇小说的情节被移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能够直接观察的环境里。

《烟》是以指明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句子开始的：“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登巴登著名的‘寒喧厅’前面，麇集着很多人……”

这些“人”是豪华的疗养地的浮沫，这里混杂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右派和左派人物，贵族仕女和巴黎的卖笑女人，有爵位的赌棍和家财万贯的包税商，外交家和中等资财的草原地主，上流社会的雄狮和轮盘赌迷，年青的将军（未来的社会栋梁）和毫无根据地以革命者自诩的侨民。

这些面目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群仿佛作为季特维诺夫和伊丽娜的个人悲剧发生的背景。

起初，作家在巴登避免同显贵的同胞们交往。“这里很好：满月葱笼，阳光和煦，空气新鲜，风景幽美。”他对短篇小说的作者玛尔科·沃弗乔克倾谈自己的印象道，“俄国人很多，但都是身居要津的人物，所以我这个身份低微的人回避他们……”

但当《烟》的构思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之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便开始留心观察俄国贵族和军事、官僚上层分子的侨居生活。

这些持续了至少三年的观察，为他的纯谢德林式的手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与屠格涅夫以前所有的长篇小说不同，《烟》在颇大的程度上是一部讽刺作品。有些地方甚至是一篇檄文，其矛头不仅指向俄国反动阵营，而且指向政治侨民。作者认为，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讥讽的口吻称之为“军人”的贵族近卫军军人反动集团也好，谷柏廖夫侨民团体也好，其特点都是同祖国和人民隔绝，不了解其需要和利益。在屠格涅夫的心目中，这些和那些人都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和进展的艰难时期离开俄国人民生活的中心，飞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的浑浊的泡沫。在反动势力大举反扑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对俄国的革命改造的可能性更加缺乏信心，这种情绪按自己的方式反映在长篇小说《烟》里。作者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矛盾，决定了他在描写那个时代的社

“寒喧厅”：原文系英语。

会政治斗争上的片面性。屠格涅夫有力地揭露了来自上流社会的顽固的农奴主在道德和智力上的渺小，但不可自制地对俄国革命侨民的活动也作了讽刺性的描写。在他们中间，屠格涅夫没有看到一个象他的前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优秀、坚毅的人物。

人们对屠格涅夫作为塑造《烟》中的人物的原型作过许多猜测，——其实，许多猜测是不正确的。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作者塑造伊丽娜·拉特米罗娃时把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阿·谢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夫家姓阿利别金斯卡娅）作为原型，在伊丽娜的丈夫瓦列里扬·拉特米罗夫的形象中描绘了极端残酷的、因镇压白俄罗斯农民而臭名远扬的将军衔副官阿利别金斯基的肖像。关于奥加廖夫有几分是谷柏廖夫的原型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屠格涅夫曾坦率地对赫尔岑声言，他深深尊敬奥加廖夫，但并不隐瞒，他不同意奥加廖夫的政治观点，因此毫无疑问，那些认为屠格涅夫不至于粗暴地讽刺奥加廖夫的人是对的。在描写谷柏廖夫的外貌时，屠格涅夫可能写入了奥加廖夫的外表和举止的二、三个确实存在的特点，但只限于此。

长篇小说脱稿后，屠格涅夫于一八六七年初将手稿带到莫斯科，交给《俄国导报》编辑卡特科夫。但在将手稿交付排印之前，他照例在彼得堡对少数朋友朗读了长篇小说。

此行，屠格涅夫认识了德·伊·皮萨烈夫，后者曾两次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那里暂住的鲍特金的寓所来探访他。

卓越的青年批评家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被囚禁了四年多，不久前才获释。他的质朴、智慧和非同凡俗的纯正的思想，给屠格涅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屠格涅夫一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皮萨烈夫的文章，虽然 he 不能同意文中的许多观点。批评家在其评论普希金的《叶弗盖尼·奥涅金》和抒情诗的文章里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当时对诗歌的否定态度，尤其受到他的反对。屠格涅夫看到，跟他交谈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完全开诚布公，便决定坦率地对皮萨烈夫说出了这个意见。

“顺便说说，您诋毁了普希金的一首最动人的诗。”他对皮萨烈夫说，“您要使人相信，诗人只是劝朋友借酒浇愁。您的审美感未免太活跃了：您不能严肃认真地谈论这一点，——您是故意地、有某种用意谈论这一点的。让咱们看看，这个用意是否证明您是正确的。我对夸张是能理解的，我允许讽刺，——但夸张应当是真实的，讽刺应当持之有理，符合现代思潮。假如现在我国青年光是写诗，象在搞文集那个幸福时代，我是能理解的，我也许甚至会证明您的气势汹汹的责难、嘲笑是正确的，我会认为：虽然不公允，但还是有益的！”

“然而，请饶恕我吧，您这是在向谁开火呢？纯粹是用大炮打麻雀！我们总共才有三、四个练习写诗的人，都是年近半百或年逾半百的老人，值得对他们大动肝火吗？您，作为一位记者，有责任最先去感受迫切的、需要的、刻不容缓的事物，难道没有其他成千上万个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应当由您去引起公众的重视吗？您居然在一八六六年对诗人大张挞伐！这是一种古玩商的行径，是一种迂腐风气！别林斯基任何时候也不会去碰这种钉子的！”

皮萨烈夫默不作声地听完了这番话，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屠格涅夫得

出印象：批评家不同意他的意见。

屠格涅夫第二次同皮萨烈夫见面时，鲍特金在座。后者毫无礼貌地参与了谈话，给皮萨烈夫扣上诸如“虚无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种种令人不快的帽子。

恰恰相反，在争论时，“虚无主义者”非常沉着，彬彬有礼，象个“正人君子”，这更加提高了他在屠格涅夫心目中的威望。

这次会晤之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就去莫斯科了，从此再也没有和皮萨烈夫见面。

屠格涅夫回到巴登巴登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从莫斯科归来途中没有再和他见面一事表示遗憾。他再次说明，他很器重他的才华，尊敬他的性格。

屠格涅夫清楚记得皮萨烈夫关于《父与子》的饶有情趣而内容丰富的文章，便请求他也对《烟》谈谈自己的意见。

使作家特别感兴趣的是，皮萨烈夫对谷柏廖夫侨民团体的描写持什么态度。

“您对在古柏廖夫家的那些场面感到气愤吗？对您来说，这些场面是否抹煞了整个小说的意义？”他询问批评家道。

皮萨烈夫在回信中坦白地说，现在他不能在刊物上发表关于《烟》的文章，因为首先，他主编的杂志《事业》带有书刊审查的烙印，而为了讲清这部长篇小说所引起的想法，写这样的文章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其次，皮萨烈夫认为，关于屠格涅夫的文章“必须写好，写得引人入胜，否则干脆不写。大约半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能象以往在关闭的笼子里那样工作了。出狱使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到震动，我至今仍未能恢复常态。您一定能看出来，这封信写得多么缺乏条理，我的手在发抖。过些时候，等到我心情较平静，身体较健壮时，才写关于《烟》的文章。但现在我尽可能将对您的小说的主要看法告诉您。从这一概要中，您当能看出，我为什么确实需要自由。”

接着，皮萨烈夫在信中象扼要地写关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的论文提纲似的，以他素有的直率和正确评论了这部作品。

“在谷柏廖夫家的那些场面丝毫没有使我不快和恼怒。有一句俄国谚语：在祭坛上打傻瓜。您按照这句谚语行动，我这方面对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我自己深恨一切傻瓜，尤其深恨装作我的朋友、同道者和同盟者的那些傻瓜。其次，我看到并且懂得，在谷柏廖夫家的场面是小说的一个插曲，它与小说联系得不太紧密。作者既已用尽全身力气向右一击，那么，描写这些场面大概是使他不至于完全失去平衡，不至于突然落到不合乎其本性的红色民主主义者那一伙人中间去。拉特米罗夫们自己也明白，这一下是打在右边而不是打在左边的，即打在拉特米罗夫身上，而不是打在谷柏廖夫身上的。

“尽管如此，我对《烟》并不满意。我觉得它是对《父与子》的奇怪而不祥的注释。我产生一个和著名的问题：‘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事业》杂志：民主派的科学和文学月刊，1866年至1888年在彼得堡出版，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的进步刊物之一。

源出圣经故事：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出于嫉妒杀害了弟弟亚伯。上帝得悉此事后便责问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

相似的问题。我想问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您把巴扎洛夫弄到哪里去了？

“您用李特维诺夫的眼光看待俄国生活的各种事物。您根据他的观点作结论。您使他成为长篇小说的中心和主人公。可是，须知李特维诺夫就是巴扎洛夫曾徒劳无益地请求他不要说漂亮话的那个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您竟站到低矮而松软的蚁穴上去观察，去辨别方向，然而，您却有真正的了望台，它是您自己发现并描写过的。可是，这个了望台而今在哪里呢？它被弄到哪里去了？……难道您以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巴扎洛夫真的于一八五九年因手指割破死去了吗？

“或者，难道他自一八五九年已借着宾达索夫的身体起死回生了吗？如果他还活着，并依然故我（这是不容怀疑的），那么您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呢？因为这等于没有注意到大象啊……但是，如果您注意到他，并且在作结论的时候故意撇开他，那么，不言而喻，您自己就使这些结论丧失了一切重要的意义。皮萨烈夫想用这个评论使《父与子》的作者明白，先进读者期待他深入挖掘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形象。

“您对我提到巴扎洛夫，”屠格涅夫在回信中写道，“并且向我呼吁：‘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但您没有想到这一层，那就是，如果巴扎洛夫还活着（我对此并不怀疑），那也不能在文学作品中提到他：对他持批判态度是不应该的，对他持另一种态度则是不妥当的；最后，如今他只能自我亮相——那他才称得上是巴扎洛夫；只要他不自我亮相，谈论他或者通过他的口去谈论，那就纯粹是一种奇想，甚至是虚假的……”

长篇小说刚刚在《俄国导报》第三期发表，屠格涅夫就把它寄给那时已不在伦敦，而在日内瓦居住的赫尔岑。

了解赫尔岑关于《烟》的意见，对屠格涅夫是尤其重要和有趣的，因为长篇小说反映了他们经常就一般政治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因为屠格涅夫通过波图金的口说出了自己藏在心中的关于俄国、西欧、村社和民粹社会主义等等的想法，实际上对赫尔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其实，屠格涅夫在这里回到《钟声》报的发行人在《结束与开始》这组文章里所揭开的论战上来了。

邮寄长篇小说一事，是恢复屠格涅夫和赫尔岑之间以前的友好关系的适当借口。本来是可以更早和解的，因为他们都不暗中怀恨对方，而且每个人都继续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对方的活动。屠格涅夫连同小说给赫尔岑发了一封信，在信中首先又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兹寄上我的新作一册。”他写道，“据我所知，它在俄国给我树立了敌人——宗教界人士，宫廷人士，斯拉夫主义者和爱国者。”

赫尔岑已知道这部长篇小说。他收到这封信之前就在《钟声》报上接连发表了三篇关于《烟》的评论，在头两篇评论中，实际上只字未提这部作品，但包含对《俄国导报》编辑的抨击。

赫尔岑在第三篇评论中轻轻地“刺”了一下《烟》的作者。这篇评论名为《父亲成了祖父》。赫尔岑在文中写道：“我要说，这个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是世界上所有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中最好的一个，假如他不怕使阿克萨科夫受委屈的话。他也需要把这样的烟一圈一圈地放出来了。

典故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好奇的人》：有一个人去参观博物馆，看见了蝴蝶、甲虫等等小动物，却没有注意到一只大象。

指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原注。

“大自然不是赋予他各种才能吗：他善于描写狩猎，善于用笔去射击栖息在《贵族之家》和《幽静的田园》里的松鸡和鹧鸪。可是他说，不，我还要做一个刻薄、凶恶、爱发脾气的政论家，但他却是一个最善良的人，既不爱发脾气，也不凶恶，丝毫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谢德林式的政治讽刺，对屠格涅夫说来是新的、不习惯的体裁，赫尔岑对这种体裁不表赞同。以前，他也不赞成屠格涅夫在文学作品中在政治上“横生枝蔓”，认为他的磅礴的才气在另一方面。“丢开政治吧……重新做一个独立的作家吧。”一八六四年，他们产生分歧时，他这样劝说屠格涅夫。

赫尔岑觉得，《烟》中波图金冗长的议论是令人厌倦的、多余的、枯燥无味的。

他把屠格涅夫的和解步骤作为“重大的消息”告诉了知己，在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回信中则写道：“我刚刚为《烟》刺了你一下，你就把它寄给我了。”

赫尔岑也不愿重提前嫌，以真挚的友好态度向屠格涅夫伸出手来，提议结算贷方和借方的差额，并在双方同意下把它一笔勾销和忘掉。

“我的诙谐的评论并非出于恶意，——我的愤怒从不超过一个星期，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敌意早已消除。但你支持卡特科夫，我见了感到难过；好象除了卑鄙的告密者你就找不到别的发行人了，连你自己也曾极端厌恶他……”这样一来，咱们就把账算清了，假如你不太生气，而对我的评论哈哈大笑，请写信告诉我。我诚挚地承认，你的波图金叫我讨厌……”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回信中写道，《烟》是在他读了《钟声》报上的评论之后才寄去的，所以他连想都没想过要它为它生气。

屠格涅夫对此事确实不太介意，这在某种程度上的大概是因为他的确意识到，父亲变成了祖父。“你已满五十五岁了，明年我将满五十岁。这是温顺的年头——而且，不管怎么说，由于咱们的过去，由于咱们降世的时间等原因，咱们毕竟比较相近，比年龄不同的人较易于互相了解。

“把账算清对于我是非常容易的。唯有一件事使我苦恼，这就是同卡特科夫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极其一般的。”

屠格涅夫解释道，他不是为卡特科夫的反动报纸《莫斯科新闻》，而是为《俄国导报》杂志撰稿，在他看来，这种杂志实际上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文集。

屠格涅夫不同意赫尔岑对波图金的议论所作的评价，他着重指出，因为他的《烟》，“不论是红的，还是白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所有的人都骂我，要算从旁边的骂得特别厉害”，“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象我那样因为《烟》遭到如此一致的痛骂”。

他丝毫没有言过其词。石头真的是从四面八方飞来的。

作家们附和批评家们的意见，也几乎一致指摘屠格涅夫新写的长篇小说。

指摘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诗人丘特切夫曾高度赞赏屠格涅夫的才华，他读了《烟》之后，尽管承认他描写伊丽娜·拉特米罗娃的技巧，但对它仍然很不满意。他立即在《祖国纪事》三月号上发表了《烟》一诗，对长篇小说的问世作出了反应。诗人在这首诗里“哀悼”屠格涅夫选择的错误道路：

想当年，这里是一片神奇的森林，
繁茂苍劲，浪滚涛鸣，碧波万顷。
呵，这不是森林，而是整个世界，
宅丰富多采，恍若梦幻，恍若仙境。

诗人形象地对屠格涅夫的前期创作下了这样的结论。

多么美好的生活，多么迷人的魅力！
多么丰盛、欢欣的抒发胸怀的筵席！
这来自天外的造物使我们感到惊异，
但这神奇的世界对我们却如此亲密。

我们怀着昔日的深情，
又走近这神秘的森林。
但它在哪儿？是谁降下帷幕，
使天上和人间都失去光明？

这是什么？是魔力还是幻影？
我们在哪儿？怎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只有烟雾，好似第五原素，
茫茫的烟雾无边无际，多么清冷！

不，这是梦！不，会吹来清风，
把烟驱散得无影无踪，
我们那迷人、可爱的森林呵，
又会生机盎然，郁郁葱葱。

冈察洛夫那时在巴黎治病，遇见了屠格涅夫，对《烟》在相当程度上持否定态度。

“我刚刚读了个头就觉得枯燥无味。这些将军们仿佛不是活人，而是装模作样的、象蜡做的人。一大群虚无主义者也是照刻板的公式写出来的。这回，您的笔背叛了您，也背叛了您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应比这更坏。

那年夏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偕妻子在国外旅行，也来到巴登。他怀着靠轮盘赌改善恶劣的经济情况的希望到这个城市来。因为四年前在威斯巴登，他曾在一个钟头内赢了一万两千法郎！

说不定他在这里也会走红运。他生了个诱人的念头：舍掉十个金路易，赢它个——譬如说——两千法郎。因为这就够整整四个月的生活费了……要不然，连回国都成问题——那里，他债台高筑。

起初，一切顺利。在三天内，他非常轻而易举地赢了四千法郎。本该就

古希腊哲学中认为有火、水、气、土四大原素，类似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名和父称。

金路易：法国十七、十八世纪流通的金币。

此罢手。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央求他适可而止，赶紧离开。但他又冒了一次险，结果输了个精光。

只好连一些衣服也送去典当，并搬到一处铁匠铺上头的破旧的寓所，这里从早到晚响彻铁锤丁丁当当的响声。

焦灼不安和神经质的痉挛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痛苦，这时他来访屠格涅夫。顺便说说，他已有好几年怎么也无法还清所负的一笔不大的债务——也是在大输一场之后处境困难时所借的一百五十马克银币。

他遇见屠格涅夫时，后者正因自己最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受到各个方面的责难而大为恼火。

他在屠格涅夫家里待了约一个半钟头，当谈话突然涉及《烟》里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俄国和西欧问题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急躁地开始向屠格涅夫证明，他的主题思想是错误的。

正当争论激烈时，他看见桌上的一本长篇小说《烟》，便冲动地抓起它，挥动书本，大声说道：

“这本书应当由刽子手亲自烧掉！”

这次争吵之后，这两位作家长期绝交，他们之间的通信也猝然中断了。

十年之后，屠格涅夫才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向他介绍法国文学家吉奥朗，当时这位文学家正在准备写俄罗斯作家的批评专著，为此目的前往俄国。

“在这种情况下，您当然居于首位罗。”屠格涅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尽管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结果停止交往，我还是下定决心给您写这封信。我深信，您不会怀疑，这些争执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您的第一流才华和您理应在我国文学中占据的崇高地位的看法。”

屠格涅夫的这番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把他“描写成”卡尔马齐诺夫这一漫画化人物之后写的。

屠格涅夫和赫尔岑已很久没有见面了。一八六九年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寄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赫尔岑一眼就看出，屠格涅夫苍老了，白发盈头，但风雅犹存。

真正的友爱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那年秋天，当赫尔岑的女儿娜塔丽雅发生不幸（因痛苦的个人经历患神经病）时，赫尔岑连忙对屠格涅夫吐露这一痛苦。

“今天我从佛罗伦萨回来，我是因为遭到命运的这种打击到那儿去的，虽说我意志坚强，也深受震惊……命运无情地打击我……唉！老弟，生活比你创作着更加复杂、更加忧郁的小说哪……”

十二月，当女儿的健康略有恢复，身体稍微强壮时，赫尔岑携家眷移居巴黎。

一八七一年一月中旬，屠格涅夫因事由巴登来到这里，立即去会晤赫尔岑，但他不在家。第二天，他们见面了。赫尔岑在信中将这次会面告诉奥加廖夫时写道，屠格涅夫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可笑的事情。

那天，赫尔岑不知为什么也格外活跃，大声谈笑，神采奕奕。

临走时，屠格涅夫问他：“晚上你常在家吗？”常在家。”

“那我明晚来找你。”

但第二天，一月十五日，屠格涅夫到来时，那里的人告诉他，赫尔岑害了肺炎。他走进他的卧室，见他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最不祥的预感使他心如刀绞——预感竟应验了。

这天，屠格涅夫最后一次见到赫尔岑，因为往后，除了家人之外，医生不准任何人去探视生命垂危的病人。

一个星期后，赫尔岑逝世。屠格涅夫突然接到电报，须于一月十九日突然返回巴登，他已到了那里时，从报上获悉这个噩耗。

在这个消息的影响下，屠格涅夫给安年科夫写信道，他不禁潸然泪下。

“无论我们的见解有多么大的分歧，无论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争吵，失去的毕竟是一位老同志，一位老朋友：我们队伍的人愈来愈稀少了！……”

屠格涅夫有时觉得，他和赫尔岑分手七年之后，恰恰在他的朋友即将病逝的那一天和他匆匆相晤，是命运的安排。

后来，在反复阅读赫尔岑的作品时，他总是说，在我国，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敏锐、更聪颖；在描写他所接触的人们的技巧方面，无人与赫尔岑匹敌。

伟大的革命家逝世六周年之际，屠格涅夫给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写信道：“这些天，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描写他的妻子的身世和她的去世等那部分（手稿）的印象老是在我的脑际萦回。这都是用泪和血写成的；它熊熊燃烧，而且使别人燃烧起来……在俄国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善于这样写作。”

第二十六章

七十年代——《处女地》

一八七一年夏，屠格涅夫回俄国稍作逗留。普法战争逐渐逼近。它的不可避免性日益明显。这就迫使屠格涅夫赶紧返回巴登巴登。

途中，他获悉宣战的消息。

起初，巴登巴登非常平静，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十八日，那里甚至开始举行国际象棋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声誉卓著的安德森和未来的第一位世界象棋冠军威廉·斯坦尼茨。

屠格涅夫当选为这次比赛的副主席。国际棋坛不仅熟知他是一位作家，而且熟知他是一位业余棋迷，巴黎莱让斯咖啡馆的经常顾客，那里经常云集最著名的象棋大师，屠格涅夫曾有机会在那里与其中的一些大师比赛。

他是这个独特的象棋俱乐部里有趣的比赛的组织者之一。

巴登巴登的平静持续时间不长，约莫两个星期后，慌乱取代了平静。铁路交通中断。市民们担心法国人由莱茵河对岸入侵，纷纷弃城而逃。

虽然维阿尔多一家保留法国国籍，他们和屠格涅夫还是决定在巴登巴登再住一段时间。

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如此深恶痛绝，以至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竟坚决希望德国人取得胜利，为法国的每一次失败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由于在军事上的崩溃，拿破仑帝国才能随之彻底垮台，而它的存在是和欧洲自由的发展水火不容的。

如今他们处于紧张的期待之中——行李都已收拾停当，以便必要时立即乘马车去维尔巴德。

但法国人后来没有从莱茵河对岸入侵。德国人旋即掌握了主动权。他们集结大量兵力，发动了几次大规模战役，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事在巴登巴登附近进行，城里可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

在战争的头两个月里，《彼得堡新闻》报有时发表屠格涅夫寄自巴登巴登的通讯，他在通讯中不失时机地报导战役的进程。但稍后，十月间，由于编辑部不同意作家对事件的看法，他便停发通讯了。

第一次大战役爆发（在维桑堡附近）那天，在巴登巴登，象棋比赛以安德森的辉煌胜利结束。

第二天早晨，花匠伊奥甘来对屠格涅夫说，一清早就传来猛烈的排炮轰击声。屠格涅夫走到台阶上，听见了轰击和排射的低沉的隆隆声。

过了一个钟头，他雇了一辆马车，朝莱茵河方向驶去，来到座落在黑林山的一座高峰上的伊堡古堡，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整个阿尔萨斯山谷，直至斯特拉斯堡。

排炮轰击声沉寂了，但山颠对面，莱茵河对岸，墨绿色的林带后面升起股股浓烟：这是阿尔萨斯城在燃烧。炮声逐渐微弱。显然，法军被击溃，正在撤退。

“在几乎被遮蔽的柔和的阳光下，在这块寂静的美丽的平原上看见兵燹

阿道夫·安德森（1818—1879）：德国象棋家，十九世纪后半叶初期棋艺最精湛的象棋手。

威廉·斯坦尼茨（1836—1900）：美国象棋手，1886年至1894年的世界象棋冠军，象棋理论家。

留下的满目疮痍的惨状，确令人惧怕和悲痛，所以不能不诅咒战争和丧心病狂、罪行累累的战争祸首。”屠格涅夫回到巴登巴登后写道。

德国人连连取胜，随着他们的每一个胜利，将近二十年间削弱了法国的波拿巴王朝的腐败日益暴露。

有一天，巴登巴登城里，群钟齐鸣，报告法国人在罗赞维尔附近惨败的消息。

屠格涅夫在发自巴登巴登的一篇通讯里写道，他曾有机会亲自听见一位工人一针见血地把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比作巴登巴登市列支敦林荫道上一棵最老的大橡树。一天夜里，这棵橡树倒了。原来，树心完全腐烂了——大树只靠树皮支撑着。

第二天清晨，当屠格涅夫来看橡树时，看见铺展在地上的大树旁有两个德国工人。

“瞧，这就是法国。”其中一个工人含笑对另一个工人说。

“确实，根据从巴黎和法国传来的消息判断，可以认为，‘这个庞然大物是光靠外表支撑的，所以随时可能倒塌。二十年统治的恶果终于暴露无遗。’”屠格涅夫作出结论。

拿破仑三世政府使国家陷于绝境。纵然法国士兵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人民为拯救祖国付出了无数牺牲，也已无法弥补了。

尽管斯特拉斯堡日夜落下千百万发炮弹和手榴弹，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中，市民们却以无与伦比的英勇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卫自己的城市！

一八七一年八月，屠格涅夫自巴登巴登给朋友鲍里索夫写信道：“这儿，每天夜里，轰击斯特拉斯堡的炮声清晰可闻，这个城市已焚毁了一半。即使紧闭窗户，钻进被窝里，仍可听见低沉的隆隆声，感觉到土地在震动。你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极度令人忧郁的性质的哲学、历史、社会遐想之中。铁器时代仍未逝去——我们仍然是野蛮人！……”

以拿破仑三世为首的法军在色当被围、投降之后，帝国遂告灭亡。在屠格涅夫写给画家路德维希·比奇的信中，极其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这已不是事件，而是一记记接连袭来的雷击……皇帝和十万法国人被俘，——还是共和政体好啊！有机会目击这个可鄙的恶棍同自己的集团掉进脏水沟里，真是莫大的幸福。”

但如今，日益咄咄逼人的普鲁士黠武主义的胜利使屠格涅夫忐忑不安。

“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掠夺欲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欣慰的现象”。他写道。

普鲁士军国主义者施加于战败国的暴力损害了它的民族尊严，因而激起了这位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的抗议，因为他真挚地爱戴和尊敬法国人民，认为他们在以往曾起过伟大而光荣的作用，并且毫不怀疑他们在未来的意义。

有一回，屠格涅夫同诗人阿列克谢伊·托尔斯泰争论这个问题时，十分赞许地谈到了“推动法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强大的社会运动。

但如今，战败后落到法国人民身上的考验引起屠格涅夫日益深厚的同情，他希望反抗军国主义的力量不断增强。

战争使波琳娜·维阿尔多无法继续在巴登巴登从事教育工作。她的大家庭陷入困境：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这个家庭甚至几乎濒于破产。

波拿巴：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姓。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和剧作家。

一八七一年深秋，维阿尔多一家移居伦敦。屠格涅夫也跟随他们搬到那里。现在他想，他应该同他们“同舟共济”……他觉得，二十七年的交往是珍贵的宝藏，他必须终身保存……维阿尔多一家不打算在英国长期居留，伦敦对他们来说是临时避难所，他们将在那里等待战争结束，以便将来最后迁居巴黎。

在英国居留期间，屠格涅夫开始一点一点地创作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春潮》，写作进展缓慢，多次长期停顿。

同去年一样，一八七一年二月，他启程回国。每次的祖国之行都赋予他的创作思想以新的力量。

这次在俄国居留期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会见了许多俄国青年艺术家，诸如雕塑家安托科利斯基，作曲家巴拉基列夫，画家马科夫斯基，盖，列宾。他出席了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

抵达彼得堡后的第二天，屠格涅夫参观了格托科利斯基的工作室，之后在《彼得堡新闻》报发表了关于他的文章，着重谈到安托科利斯基不久前完成的伊凡雷帝塑像，它给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家认为，这个充满戏剧性和热情的雕塑品是俄国艺术中杰出的现象。屠格涅夫在描写伊凡雷帝塑像给他留下的印象时写道，“在典型而真实的、疲惫不堪的、但仍然雄伟的面孔的每一根线条中……你可以看出在这个疲倦的心灵中虽然朦胧、却剧烈、悲痛地萌动着的全部感受、全部感情和思想。这里还隐含着对死亡的恐惧，无限的权力所娇纵的病人的激忿，懊悔，对罪孽的认识，宿怨，暴躁，多疑，残酷和对背叛的长期探索……印象非常深刻，以致令人无法摆脱，不能想象，伊凡雷帝不是安托科利斯基的想象力所观察到的那个样子……”

安托科利斯基后来回忆屠格涅夫这次突然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情景时写道，据保存在相册里的照片，他马上认出了伊凡·谢尔盖耶维奇。

屠格涅夫魁梧的身材，他的温柔的面孔，和善的目光和缕缕银丝，使雕塑家想起了沉沉欲睡的雄狮的雕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屠格涅夫都在文学早会上朗诵了《猎人笔记》中的一些小说。在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里有他参加的文艺早会，是为加里波的义勇队募捐而举办的。会上，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总管》。

随后，他在莫斯科又朗诵了这篇小说。

屠格涅夫在俄国居留期间，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建立了工人阶级的名为巴黎公社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存在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八日。

屠格涅夫这次也加速了出国的行程，完全有可能正是由于他希望详细、

马·马·安托科利斯基（1843—1902）：俄国卓越的现实主义雕塑家。

米·亚·巴拉基列夫（1836—1910）：俄国卓越的音乐活动家、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弗·叶·马科夫斯基（1846—1920）：俄国杰出的巡回展览派画家。

尼·尼·盖（1831—1894）：俄国卓越的画家。

伊·叶·列宾（1844—1930）：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

彼·伊·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伟大的作曲家。

加里波得义勇队：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意大利人民英雄加里波的（18170—1182）所领导的反抗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斗争组织。

准确地了解发生的变革和事件的今后发展过程。

屠格涅夫的女儿还留在法国。此外，巴黎还有他的朋友、知己的熟人、他的一位远亲——流亡的著名十二月革命党人尼·伊·屠格涅夫，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同他早已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他的家庭也住在巴黎附近。这些人的命运使屠格涅夫焦灼不安，因为事件时刻可能发生最突然的转折。

四月二日（俄历三月二十二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出国。

屠格涅夫回到伦敦后，加倍努力地继续创作《春潮》。

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二十八章里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大胆的比喻，这无疑是由于思考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而联想到的：“初恋——那是一场革命：单调、正规的生活方式刹那间被摧毁和破坏了；青春站在街垒上，它那鲜艳的旗帜高高地飘扬，不论前面等待着它的是什么——死亡还是新的生活——它向一切都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八七一年底，屠格涅夫和维阿尔多一家迁至巴黎，他在那里完成并誊清了《春潮》。

翌年一月，中篇小说在《欧洲导报》杂志发表，博得读者的高度好评，所以发行人斯塔秀列维奇于月底通知屠格涅夫，一月号杂志只好重印。

但作者本人对这部作品不尽满意，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小说里“没有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现代生活的任何暗示”。

“你老是希望我（在我的作品中）注意现代生活，第一，这很难，因为我住在国外，第二，我已构思好一些这类作品了。”一八七二年，屠格涅夫给诗人波隆斯基写信道。

在写作中篇小说《春潮》之前，屠格涅夫就开始构思长篇小说《处女地》了。一八七一年俄国之行以后，他立即草拟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简短提纲，当时，那里民粹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潮正方兴未艾。

长篇小说的题材和情节酝酿了好几年。读者和朋友们期待他写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大部头作品来，在书中提出与人民休戚相关的重要问题。

“我自己也懂得并感到，我必须写出较大的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来。”短篇小说《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他在这篇小说里又返回到《猎人笔记》的题材）发表后不久，屠格涅夫在致斯·克·布留洛娃的信中写道。他又补充道：“我已准备好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和提纲——因为我绝不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典型已告绝迹，所以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但在构成我的小说的十二个人物当中，有两个人物在原处研究得不够透彻——没有活生生的原型，而我又很不愿意杜撰……”

作家在自己的新作中究竟决定提出什么样的重大的当代问题呢？他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反映所谓“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而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间则大大加强了。

这个运动深深吸引了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形成了宏大的规模。年轻的革命者纷纷到人民群众中去，他们相信，农民会立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作出反应，奋起同专制制度和地主斗争。

他们为崇高的热情所推动，决心为人民造福，了解他们的贫困和需求，

米·马·斯塔秀列维奇（1826—1911）：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论家和历史学家，1866年至1908年主持温和的自由主义杂志《欧洲导报》。

在原处：指在俄国。

分担他们的全部困难。他们痛切地感到，文明的福利是用农民的痛苦换取来的，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福利，打破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离开家庭，走出课堂，自觉地去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并且准备坐牢和流放。

这些人的悲剧在于，他们错误地把农民看作主要的、唯一的革命力量，认为俄国可以通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条件注定这个运动必然遭到失败。

屠格涅夫在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里所要描写的，就是俄国社会生活的这一新阶段。

他只是偶尔回国而已，因此无法深刻、全面地研究所描写的事物的特点，革命家及其典型和性格。但屠格涅夫仍然希望，他能借助与侨居国外的民粹主义者的密切交往和友谊透彻了解这一运动及其活动家，并真实地反映这一社会现象。

那时，巴黎又成为侨民们的避难所。这里，屠格涅夫恢复了与五十年代末在彼得堡就曾会见过的革命民粹派杰出思想家彼·拉·拉弗罗夫的交往，通过他接近盖尔曼·洛帕金、彼·阿·克鲁泡特金及其他当时在国外躲避沙皇政府迫害的革命活动家。屠格涅夫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深深地喜爱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盖尔曼·洛帕金勇敢非凡，精力旺盛，不屈不挠，处事果断，因而博得他的特殊好感。屠格涅夫称他为“聪明人和英雄汉”，“不可摧毁的青年”，“头脑清醒的人”。他对马克思的这位曾走过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艰险道路的青年朋友充满深切的敬意。他说，他，一个老人，对这样的人深为崇敬，因为感到这些人身上蕴藏着力量、才华和智慧。侨民们向他介绍革命文学作品，告诉他许多可供他创作长篇小说《处女地》时作素材的有趣事实。作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向拉弗罗夫详细打听在苏黎世的俄国大学生侨民的生活，他们协助出版《前进》杂志的情况，他想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拉弗罗夫写道：“我发现，他听说有一些姑娘过着隐居的生活，忘我地把自己的时间、劳动、为数不多的钱贡献给她们不过作为排字工人所参加的事业对，深为激动。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知道，我们谈论的是未来的“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她们将使自己的名字载入俄国革命运动的史册。”屠格涅夫热情地给予侨民们各种帮助，协助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他们的文学作品，提供经费，为他们同法国当局斡旋，为募集经费组织文学、音乐早会。在维阿尔多家里举行的一次这种早会上，波琳娜·维阿尔多亲自演唱了费特作词的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曲。出席过这个早会的洛帕金回忆道，虽然女演员已届暮年，她的演唱却充满强烈的感情。屠格涅夫朗诵了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请愿代表》。他力求尽可能生动而有力地表达

盖·亚·洛帕金（1845—1918）：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曾在国外接近马克思，并被选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彼·阿·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方面是唯心主义者，实证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拥护者，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

《前进》杂志：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先后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由彼·拉·拉弗罗夫主编。该刊反映了革命民粹派右翼的思想意识。

“五十人案”：沙皇政府对革命运动参加者所进行的政治审判，于1877年2月至3月间在彼得堡进行。这一案件因被告人所发表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卓越演说而具有重大意义。

格·伊·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卓越的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小说中对白的语气，因而当着作者本人的面多次排练了朗诵。“我听得精疲力尽，不过朗诵得很好。”格·乌斯宾斯基在给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参与下，在巴黎建立了俄国侨民图书馆。“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能在暖和的房间里待上几个钟头，并且相聚一堂，不致于在大城市里意志消沉。”他说。拉弗罗夫向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介绍了出版《前进》杂志的计划之后，他表示愿意每年捐献五百法郎，作为出版杂志的经费。

“这个杂志是抨击政府的，”他说，“所以我愿意竭诚相助。”

屠格涅夫对革命青年深表同情，赞扬他们时刻准备作自我牺牲的决心，因而俄国当局对他们的镇压激起了作家的愤慨。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屡屡谈到俄国的情况，谈到他对政府和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已不寄托任何希望，谈到他的自由主义朋友们的无能和懦弱。”拉弗罗夫回忆道，“对于我们推动俄国社会的尝试能够成功一事，他没有表示过希望；相反，那时，跟后来一样，他认为我们是不可能接近人民，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他们中去的。但是在他的全部言谈中，都表现出对政府压迫的仇恨，以及对反抗这种压迫的一切尝试的同情。”

这里，拉弗罗夫指出了作家在创作《处女地》期间的情绪。创作小说的准备过程——积极观察，积累和选择素材，编写人物的详细的性格评定，各个章节和单个场面的提要——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屠格涅夫说，他创作《处女地》感到特别困难。不过写小说花费的时间很短。一九七六年春天，屠格涅夫认真地创作《处女地》，三个月就把小说写完了。要知道，这是屠格涅夫篇幅最浩大的长篇小说。诚然，他写《处女地》时，不做其他任何事情，从早到晚“象牛一样”，“连腰也不伸地”工作。四分之三的长篇小说是在斯巴斯科耶完成的，作家在一封信中风趣地称它为自己的“海湾”。

屠格涅夫认为，《处女地》将是他的最后一部大作品，他要把整个心灵都注入这部小说中去，因而对它寄予巨大希望。“我只好再说一次：请等待我的长篇小说问世吧。”一八七六年一月，他给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写信道，“为了不荒疏文笔，我正在写一些肤浅的、无足轻重的作品，眼下请您且不要为此而生我的气……天晓得，我或许还注定要把人们的心燃烧起来呢……”

在此期间，屠格涅夫和天才的讽刺作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如果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年轻时还不善于公允地评价他的创作的话，那么他现在则心悦诚服地声言，在讽刺方面，无人能与谢德林匹敌。

一八七一年，屠格涅夫在一家英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一个城市的历史》的文章。文中他对这位俄国讽刺作家的作品作了极高的评价，称它为不仅是俄罗斯文学，而且是世界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一八七三年，屠格涅夫给作者本人写信说：“您在俄国文学中开辟了一个领域，这里您是无容争辩的大师和首屈一指的人。”

有一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同民粹派政论家谢·尼·克里文科谈论谢德林时说：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海湾”：源出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的诗句：“海湾边上有一棵青翠的橡树……”

“您知道吗，我有时觉得，现在他肩负着我国的整个文学。当然，除他以外还有一些优秀的、有才能的人，”但支撑着文学的是他。”

屠格涅夫用这些话强调了谢德林激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艺和政论作品的巨大社会、政治意义。

尚在创作《烟》这一时期，就可以感觉到，屠格涅夫认真地研究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创作手法。而在《处女地》中，谢德林的讽刺的影响则表现得更为强烈。在彼得堡官场“明星”——御前侍从官西皮雅金和待臣卡洛美依采夫的精采刻画中，这一影响尤为明显。

在长篇小说中，这些人物影射屠格涅夫所痛恨的使国家陷于贫困和破产的上层统治阶级。

“俄国有一半人都快饿死了……到处都是侦探，压迫，告密，撒谎，欺骗——我们连一步也动不得……”涅日达诺夫在和革命小组的同志们谈话时愤怒地惊呼道。由于偶然的机缘，涅日达诺夫正巧当上了“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政治家和“绅士”，未来的大臣西皮雅金的家庭教师。标榜自由主义的西皮雅金实质上同残暴的反动分子卡洛美依采夫这个崇拜鞭子和强硬手段、仇恨人民和怀有民主情绪的知识分子的家伙是一丘之貉。

涅日达诺夫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非常矛盾、富于悲剧性的人。他是一个高官显宦的私生子，自幼处境暧昧，因而成为一个异常爱面子、异常神经质、动摇不定的青年。

他虽然暗地里喜爱诗歌，却只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参加了革命小组，准备“到民间去”。在西皮雅金家里，涅日达诺夫遇见了他的外甥女玛利安娜，并立即看出她的心和他是息息相通的；在这些庸俗、虚伪的人们中间，她感到痛苦、孤独。这里的人把她看作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玛利安娜“凭着刚强的个性全力追求自由”。

涅日达诺夫和玛利安娜成了朋友，彼此相爱。这位刚毅、大胆而又温柔、纯洁的少女成为涅日达诺夫的精神支柱，“祖国、幸福、斗争、自由的化身”。

“你以后是我的指路星，我的依靠，我的勇气。”他把玛利安娜看作忠实的朋友，对她说道。

玛利安娜深刻理解他的思想，愿意同他手携手，向共同的目标锐进。

“我们的生命不会白白浪费的，我们要到老百姓中间去……我们可以劳动。”她说。

但是到了应该行动的关键时刻，涅日达诺夫产生怀疑。他热爱人民，但感到不善于同他们打成一片，因为他不了解他们。涅日达诺夫心中的一切——对开创的事业和能够同玛利安娜一起得到幸福的信心——都“破灭了”。于是他毁灭了……在长篇小说中，同这位与屠格涅夫以前的主人公——“多余的人”——相似的正直青年相对立的，是一个气质与他截然不同的人。索洛明是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他同情革命者，但坚信，改造社会制度不应当通过暴力，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逐步的改革。他的政治观点和屠格涅夫本人的观点颇为吻合，所不同的是，索洛明是来自下层的渐进论者。

在屠格涅夫看来，索洛明是正面典型，即他认为当前俄国所需要的活动家。根据作者的性格评定，索洛明“象农民翻地、播种一样，在从容不迫地干着自己的事业”。

长篇小说《处女地》完成之前两年，屠格涅夫在致菲洛索弗娃的信中，依据自己的概念勾勒出现代正面人物的新典型的轮廓，这种主人公与巴扎洛夫毫无相似之处。

“时代变了，现在不需要巴扎洛夫式的人物了。对于当前的社会活动，既不需要特殊的天才，甚至也不需要特殊的智慧——任何有影响的、杰出的、极为个别的智慧，需要的是勤劳、忍耐，需要的是能够不声不响地作自我牺牲，需要的是顺从，不鄙弃细小的、平凡、甚至低贱的工作，——我用“低贱的”这个字眼是指简单、老实、平凡而言。什么还能够比，譬如说，教农民识字、帮助他们开设医院等等更“低贱的”呢？才能，甚至渊博的学问在这儿能派上什么用场呢？只需要一颗能牺牲利己主义的心……所需要的是责任感，美好的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感情，仅此而已。”

屠格涅夫的这番话包含了长篇小说《处女地》的主人公索洛明的全部行动纲领。他那坚定的目的性、意志力和对于他所从事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事业这一信心。使玛利安娜倾倒，于是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联结在一起。

一八七六年秋，屠格涅夫誊清了长篇小说《处女地》，寄给《欧洲导报》编辑部。次年，小说便在该刊元月、二月号上发表了。

刊载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分时，在审查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书刊审查官在报告中写道，他“始终考虑：涅日达诺夫的自杀和使马尔凯洛夫大吃一惊的惩处不会消除‘到民间去’运动的破坏性原则，——这些原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索洛明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之中，他在彼尔姆开设了一家实行合作原则的工厂；这些原则存在于玛利安娜对这一事业的无限忠诚之中……即令长篇小说的上半部已经问世，也未必可以准许刊登它的后半部，因为这部分仅仅指出，‘到民间去’这一运动是为时尚早、不适时的，但没有指出，这一运动根本缺乏条件”。

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坦率地写道：“特别感到苦恼的是，写小说对不得不许多事情避而不提，加以回避；就连目前这种样子的《处女地》也险些被书刊审查委员会付之一炬……我在创作中是不自由的，仅此一桩，就足以破坏创作的欢乐了”。但是，屠格涅夫不能够充分描绘出民粹主义运动的画卷，而仅仅展示了“画卷的一角”，自然并不只是由于书刊审查机关的刁难。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其他因素：屠格涅夫与祖国隔绝，而且他的政治观点落后，这就妨碍他正确地评价民粹主义运动和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前景。

屠格涅夫把长篇小说的校样寄给拉弗罗夫、洛帕金和克鲁泡特金，希望了解他们的意见，并请求他们指正某些细节。在伦敦，拉弗罗夫给克鲁泡特金和《前进》杂志前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念了《处女地》之后，他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虽然克鲁泡特金指出，屠格涅夫对民粹主义运动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认为，在长篇小说中，屠格涅夫以其特有的惊人的嗅觉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的两个特点，即：宣传员不了解农民……，另一方面，他们有哈姆雷特精神，缺乏坚定性……”

洛帕金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他认为，作家对革命者的环境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拉弗罗夫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中着重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

安·巴·菲洛索弗娃（1837—1912）：俄国进步的妇女运动活动家。

“平凡”：原文系法语。

哈姆雷特精神的特点是充满内心矛盾和怀疑，犹豫不决。

意义在于，“他对恶毒谩骂青年的整个文学提出了这些革命青年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崇高的精神原则的唯一代表”。

作者本人在说明长篇小说中提出的任务时说道：“无论如何，青年人不会说，描写他们的人是敌人；相反，他们应该感觉到我心中的同情——即便不是对他们的目的，也是对他们个人的同情。”

不出屠格涅夫所料，围绕他的长篇小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无论是对讥讽高级官僚不满的反动阵营，还是认为小说使革命青年的面貌减色的民主主义批评家，都纷纷指摘他。反动分子的评论当然没有使他不安，他能够平心静气地鄙视他们的意见，——他所同情的那些人的评论却使他伤心。

“不，几乎经常生活在远离俄国的地方，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揭示俄国的本质。”一八七七年，他在给斯塔秀列斯奇的信中写道。

但是后来民主主义批评界对这部在俄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不小意义的长篇小说的形象作了不同的，更为清醒、公允的评价。

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谢·伊·密茨凯维奇在这方面的证明是饶有兴味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处女地》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用密茨凯维奇的话来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帮助他懂得，“革命者正是最优秀的人，他们希望的是启迪农民和工人，发动他们起来革命，反对他们的压迫者”。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处女地》一开头就被评定为不真实的作品，对这一评价必须重新考虑。他称《处女地》的女主人公玛利安娜为“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上一颗最明亮的巨星”，认为《处女地》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并热情地把它推荐给苏联青年，向他们提示，屠格涅夫第一个描写了七十年代革命者的生活。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作主义文化的著名建设者之一，杰出的政论家、艺术家和文学家。

第二十七章

同法国作家的友好联系

侨居国外期间，屠格涅夫时常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许多文学界代表会面。

但和他建立了最密切的创作和友好联系的，是组成亲密的文学团体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爱德蒙·龚古尔、阿尔方斯·都德、爱弥尔·左拉和居依·德·莫泊桑。

七十年代，从巴登巴登迁至巴黎后，屠格涅夫同他们的交往格外频繁。

和这些作家接近之前，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七年就和普罗斯佩·梅里美相识了；正如我们所记得的那样，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梅里美对在巴黎出版的《猎人笔记》单行本曾深表赞许。从那时起，他一直密切注视屠格涅夫的才华的发展。

这位法国作家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一下子就向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敞开的。起初，他觉得梅里美是个过分拘谨，孤僻和严酷无情的人。后来他才逐渐明白，在梅里美冷漠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充满爱意的心。

使屠格涅夫感到格外可贵的是，梅里美对俄罗斯人民及其历史、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真挚地热爱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语言。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梅里美“景仰普希金，深刻而正确地理解、赞赏他的诗歌的美”。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他将普希金推举于十九世纪欧洲整个诗坛的首位。

正是对普希金的爱戴，促使梅里美研究俄语。俄语非凡的丰富使他大为惊异。

普罗斯佩·梅里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在法国最早的译者之一，他的翻译工作经常是和屠格涅夫共同完成的。

梅里美敏锐地把他看作普希金和果戈理传统的继承人，认为他是卓越的现代小说家，并且再三建议朋友们阅读他的作品。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一些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梅里美读了俄文版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后，着手校勘长篇小说的法译本，并为它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指出，这部作品在作者的祖国的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梅里美认为，围绕小说所掀起的热烈议论，批评界自相矛盾的评论以及“读者的狂怒”，都是长篇小说的特殊成就。“不公允的批评也好，诽谤也好，报刊杂志的谩骂也好，无所不用其极，大概就差开除教籍了。”他在前言中辛辣地指出，“正如在世界各国一样，在俄国，向对真理视若罔闻的人们讲真理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

在巴登巴登居留时，屠格涅夫经常和梅里美通信。他们在书信中交流创作构思和计划，并对彼此的创作表示浓厚的兴趣。当《烟》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时，屠格涅夫把这部长篇小说的杂志单行本寄给梅里美。在回信中，普罗斯佩·梅里美详细谈了对这本书的意见，认为它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爱德蒙·龚古尔（1822—1886）：法国资产阶级自然主义派作家。

阿尔方斯·都德（1840—1897）：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倡导者。

居依·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品之一。但他不只限于赞扬，而且作了几点极其重要的批评。譬如，他以为，小说开头在谷柏廖夫家的那个场面会转移读者对情节的自然发展的注意力，因而是多余的。“请您注意，钻进一部长篇小说，如同进入一座迷宫，手拿一根线为好，可是您却一开头就给我一个乱糟糟的线团”。

次年，梅里美在《箴言报》上发表了第二篇论屠格涅夫的文章。他写道，在法国，这位俄国小说家是这样受人欢迎，因此在这里，就象在俄国一样，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他的每一部新作。

评价屠格涅夫——当时在法国已被公认为现实主义派的一位领袖的创作风格时，梅里美强调了俄国作家特有的公正，这位作家“不宣称自己是现代社会的评判人，而且按照他所看到的面貌描绘它”。

梅里美谈到屠格涅夫敏锐的观察力，心理分析的圆熟技巧和对大自然的描写的非凡诗意。

一八七一年九月下旬，屠格涅夫接到梅里美寄自法国的一封短简，他在信中感谢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寄来《特罗普曼的死刑》的校样，并谈了自己对这篇特写的意见。

这封信是普罗斯佩·梅里美在去世前三个小时写的。几天后，屠格涅夫在一张比利时报纸上读到了关于他逝世的消息，便立即给《彼得堡新闻》投寄了一篇悼文，文中对法国作家的活动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他广博的学识，他一向对艺术真实的企求，他的风格的准确和质朴。

十年之后，一八八一年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说中，屠格涅夫回忆了梅里美对伟大诗人始终不渝的爱戴，并且引用了这位法国作家有一次对他——屠格涅夫说的话：“你们的诗歌追求的首先是真实，美便随即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相反，我们的诗人却背道而驰：他们追求的首先是音响效果，俏皮话和表面的光采；而且，除此之外，他们即使没有玷污真实的可能性，大概也会把这个加上去的。”

在老一代的法国作家中间，熟知屠格涅夫的还有乔治·桑。他首次和她会面，是在青年时代，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于四十年代介绍他们认识的，当时在法国，屠格涅夫的名字尚无人知晓。

以后他们至少有二十年左右没有见面。

在此期间，屠格涅夫在欧洲赢得了声誉。乔治·桑开始知道他的一些译成法语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于是，一八六六年底，她在给挚友福楼拜的信中谈到屠格涅夫：“他的作品我知之甚少，但熟读成诵。他多么有才华，他的作品多么富有独创性和表现力啊！”

屠格涅夫的作品内容的质朴、真实和深刻，象使普罗斯佩·梅里美叹为观止一样，使这位法国女作家折服。他将屠格涅夫的作品和自己的同胞们的作品加以比较，说道：“我认为，外国作家写得比我们好。他们不装模作样，而我们则不是扭捏作态，就是肆无忌惮。法国作家没有比较合乎公共利益和比较适于脑力劳动的环境。”

次年春天，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信道，她赞赏屠格涅夫的小说，想恢复和屠格涅夫的结交。她请求福楼拜一结束长篇小说《情感教育》的创作就送屠格涅夫到她的诺甘庄园来。

然而，一八七二年秋，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才首次到诺甘来，而且不是和福楼拜，而是和波琳娜·维阿尔多夫人及她的两位成年的女儿玛丽安娜、克罗蒂结伴前来的。波琳娜·维阿尔多与乔治·桑有三十年的友好交往。

在诺甘的好客的宅邸里，总是有许多年轻人。这里，时间不知不觉地、愉快地在丰富多采的娱乐——音乐、歌唱、舞蹈和儿子桑建立的别开生面的木偶剧院的演出中消逝。

屠格涅夫作这次旅行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他正遭受严重发作的痛风的折磨，这使他有时竟不得不使用拐杖*。

“我作了——用法国人的话来说——超乎人力的努力，”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写道，“到乔治·桑女士的城堡去了，但只能在那里逗留一天，这点时间就足够我去了解这位卓越的女性的殷勤、亲切和善良的好感了……她住在森林地区的一幢古老的法国式宅邸里；和儿子、儿媳及两位极可爱的孙女在一起；她周围的一切是那样安详、朴素和自然……”

这次会晤之后不久，《新时代报》上发表了乔治·桑的随笔《皮埃尔·博尼埃》；女作家把对屠格涅夫说的话作为随笔的开场白：“当我在抽屉里找到这幅亡故多年、无人知晓者的技巧欠佳的肖像素描时，我扪心自问，它值得发表吗？您在《一个俄国地主的回忆》一书中所描绘的人物群像，使我心醉神迷。多么精巧的水彩画啊。你能多么清楚地看到、听见、了解当您描写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解放的所有北方农奴，以及村中所有的地主；同他们的短暂的会面，他们所说的寥寥数语，就足以描绘出鲜明的、呼之欲出的形象了。谁也不能比您写得更好啦……”

深受感动的屠格涅夫在致她的回信中写道：“您能够轻而易举地想象出，我在读昨天的《新时代》报时是思绪万端的。”

读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活尸首》的法译后，乔治·桑称作者为当代作家应当向他学习的大师。

尔后，屠格涅夫既和波琳娜·维阿尔多，也和福楼拜一起，数度到诺甘来造访乔治·桑。

一八七六年春，他收到她寄的故事集《会说话的橡树》，于是他马上忆起，他第一次去诺甘时，曾对乔治·桑的小孙女讲过整整一个傍晚的故事。

两个月后，在赴斯巴斯科耶途中，屠格涅夫在《新时代》报上读到这位法国女作家逝世的消息。随后，他收到波琳娜·维阿尔多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举行乔治·桑的葬仪时，一个农民在她的墓前献了花圈，说：

“这个花圈是代表诺甘的农民，而不是代表穷人奉献的，由于她的恩赐，这里没有穷人。”

“要知道，乔治·桑本人并不富有，她虽然终生操劳，也只勉强维持开支。”波琳娜·维阿尔多又写道。

在一篇纪念乔治·桑的短文中，屠格涅夫回顾了她的头几部长篇小说在俄国出版时所引起的惊喜若狂的情景。

这段时间，他给福楼拜写信道：“乔治·桑女士的逝世使我深为悲恸。我知道，您去诺甘参加了葬礼。我曾想以俄国公众的名义拍个唁电，但由于可笑的谦虚，出于“费加罗式”的胆怯，以及怕被人说成是做广告——这种愚蠢，终使我没有这样做。

“俄国公众曾受到乔治·桑女士的极大影响，这是应该说明的。她，可

痛风病是一种新陈代谢紊乱所致的疾病，其临床特点为高尿酸血症。——编者注

*“超乎人力的努力”：原文系法语。

费加罗：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所著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公。

怜的、亲爱的乔治·桑女士喜爱我们俩，特别是您，这是可以理解的；她有一颗多么可贵的心啊！她丝毫没有琐屑、渺小、虚假的感情！她是多么好的人，多么善良的女性啊！”“您哀悼咱们的朋友是对的。”福楼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她非常喜爱您，她不称呼您别的，就称呼您‘亲爱的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对作为人和作家的乔治·桑，深怀好感，器重、尊敬普罗斯佩·梅里美，对居斯达夫·福楼拜则怀着完全特殊的感情，认为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他无限珍贵的人之一。

福楼拜对他怀着同样的好感。他说，屠格涅夫是他乐于以隐衷相告的独一无二的人。

他们于一八六三年初相识，立即彼此十分投契。屠格涅夫认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最新流派的最优秀的作品”，所以当时就把自己的法文版中、短篇小说选——《俄国生活画卷》一书寄给他。

看来，在和屠格涅夫相识之前，福楼拜就熟知他的一些作品了。福楼拜在给他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亲爱的屠格涅夫先生！蒙赐礼品，不胜感激……您早就是我的良师了。但您的作品我读得愈多，您的才华就愈令我惊异。您热情而又含蓄的创作风格，您对小人物所怀的、并使风景具有丰富思想的同情令我赞叹……如同我读《唐·吉珂德》时滋生出沿着尘上染白的道路策马奔驰，在峭壁的阴影里吃橄榄和生葱的愿望一样，读您的《俄国生活画卷》时，我想乘坐马车，在雪原里颠簸，谛听狼群的嗥叫。您的作品透出一股淡淡的苦涩的幽香，沁人心脾、令人神往的哀愁。您具有多么圆熟的技巧啊！柔情、嘲讽、敏锐的观察力和情调结合得多么巧妙！这一切是多么和谐！您多么善于唤起这一切印象啊！您的神笔何等得心应手！”

“您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又是一个平凡的人。在您的作品里，我发现了多少我感觉和经历过的东西啊！……在《三次会见》中，在《雅科夫·巴先科夫》中，在《多余人的日记》中……处处……两个星期前，我和您相识，和您握手，感到非常幸福。”

他们开始通信和会面。但是，在六十年代，他们通信和会面不象在七十年代屠格涅夫又迁居巴黎后那样频繁。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曾不止一次到卢昂附近福楼拜的克鲁瓦塞庄园去作客，也三番五次邀他一同去斯巴斯科耶消夏。但要使“发狂地”写作的福楼拜离开写字台是办不到的。他连到诺甘乔治·桑那儿去游玩都很难同意，虽然不和她在一起时他感到非常寂寞。

“为什么不能住在一起呢？”

“为什么生活安排得这么糟？！”一八七三年春，和屠格涅夫一同从诺甘回来后，福楼拜给乔治·桑写信说，“由诺甘去戈托拉途中，您的两位朋友……一面在您的两匹疾驰的骏马拉着的马车里愉快地颠簸，一面议论这个话题。”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互相认真听取批评性的意见和劝告，认为谁也不如文学界的同行清楚了解作品的提纲、结构、风格和细节，真正的艺术大师的赞许是对劳动的最好奖赏。“多么好的听众啊！又是多么好的批评家啊！他的见解深刻而明确，使我震惊……无论什么也瞒不过他。”福楼拜这样表达和屠格涅夫谈论剧本《圣安东尼的诱惑》之后产生的印象。福楼拜别《春潮》、《不幸的少女》、《初恋》、《前夜》

和屠格涅夫的其他作品推崇备至：“我的朋友，您了解生活，并且善于叙述您所了解的事物，这是较为罕见的现象。我真想当一名语文教师，以解释您的作品……”

屠格涅夫在信中对的一次这样的评价答道：“我感到，一个艺术大师站在我的面前，看着它，赞许地点点头……”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当福楼拜正在创作《情感教育》时，屠格涅夫第一次到他经常居住的克鲁瓦塞去。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天。福楼拜希望听取熟谙创作技巧的秘诀的行家的意见，便向客人介绍了《情感教育》中的几章。这些章节给屠格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走时，他请求福楼拜把小说的其他章节也寄给他。福楼拜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屠格涅夫给朋友写信说：“如果您的整部长篇小说也和您寄来的那些部分写得一样出色，那么您写出的是一部杰作！”

使福楼拜和屠格涅夫接近的，不仅是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对艺术的热爱和博学多闻，而且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性格。

他们喜欢经常在一起。并且觉得永远也谈不够。相互的好感逐渐发展为亲密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在福楼拜周围团结了一批最有才华的法国青年作家，“巴尔扎克的孙子们”——爱弥儿·左拉，阿尔方斯·都德，居伊·德·莫泊桑。屠格涅夫通过福楼拜和他们相识，并且参加了“五人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作家有时在富有艺术风味的聚餐会上会晤，这些聚餐会时而称为“福楼拜聚餐会”，时而称为“被喝倒采（即曾受批评界和读者激烈攻击）的作者聚餐会”。

阿尔方斯·都德在自己的《巴黎生活三十年》一书中这样描写这些友好会晤的情形：“我们晚上七点钟落座就餐，直至凌晨两点钟还没有散席。我们遣开了佣人（这个预防措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福楼拜一开口，雷鸣般的声音就响彻整幢房子），便谈论起文学来。我们当中总是有人带来刚出版的书。有时是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和《三个故事》，有时是爱德蒙·龚古尔的《少女爱丽莎》，有时是左拉的《莫雷教长》。屠格涅夫带来《活尸首》和《处女地》，我带来《弗罗蒙》《雅克》和《富豪》。我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交谈，既不奉承，又不互相赞美。”

当福楼拜离开克鲁瓦塞，到巴黎来小住时，屠格涅夫每个星期日都去寓所访他。这一天，这里云集首都知识分子的精华：作家，画家，学者，记者，发行人。

据莫泊桑说，屠格涅夫通常来得最早，主人兴高采烈地迎接他时，象吻兄弟那样吻他。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有时随身带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坐到大安乐椅里，便流利地对法国朋友们翻译伟大作家的作品。

在爱德蒙·龚古尔的日记中，描写了其中的一次会晤——他叙述了屠格涅夫朗读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的情景：“翻译时，屠格涅夫力求向我们传达出诞生中的世界的新生活来，在歌德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突突的心跳。听着他的译文，我为他那自然、大胆的用语而大为惊异。”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屠格涅夫尤其积极促进俄罗斯文学同西欧文学

《莫雷教长》：此书的全称应为《莫雷教长的过失》。

《弗罗蒙》：此书的全称应为《小弟弗罗蒙和长兄黎斯雷》。

的接近。在他的协助下，出版了普希金、果戈理、克雷洛夫、莱蒙托夫、萨蒂科夫—谢德林、皮谢姆斯基的作品的法译本、英译本和德译本。为了在国外普及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他为一些译本作序。

另一方面，他竭力向俄国杂志推荐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海涅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他没有指望“用大理石般的文体”写成的福楼拜的小说《厄罗狄亚》和《圣于琏的传说》能出色地被翻译给俄国读者，遂亲自动手翻译这些作品，并极其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他“喜爱的劳动”。

左拉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回忆，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里，正是屠格涅夫把他介绍给俄国读者的。当时，这位法国青年作家正因自己的政论文章《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天》而遭到迫害。

“没有一家杂志发表我的作品，”他说，“我眼看就要饿死，到处受驱逐，就在这时候，他把我引进这个伟大的俄国，自此，我在那里受到人们的热爱。”

在屠格涅夫的协助下，左拉的长篇小说《莫雷教长的过失》和《欧仁·卢贡夫人》的俄文版比法文版发表得早。

由于屠格涅夫的提议，一八七五年，左拉成为《欧洲导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他在那里发表了六十多篇主要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论文和随笔。左拉肯定地说，俄国为他提供了讲坛和朝气蓬勃的、热情的读者，因而使他恢复了信心和力量。后来，爱弥尔·左拉誉满俄国之后，对发行人的建议老是回答说：

“请允许我先同我的老朋友屠格涅夫商量商量：他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所以我已习惯于信赖他，凡是涉及俄文书籍、刊物的事情，没有他的主意，我是不会去做的。”

不仅左拉，而且爱德蒙·龚古尔、都德、莫泊桑都一致证实屠格涅夫对他们的巨大而良好的影响。和他们交谈时，这位俄国作家常常说，必须首先研究活生生的现实，它应该是真正艺术的基础。

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屠格涅夫特别重视的，是同人民的密切关系，“仔细、认真地再现人民的生活”。

“他的文学观点其所以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莫泊桑说，“是因为他不象我们大家那样，从有局限性的、专业的观点简单地表述见解，而是对他所深谙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进行某种对比，这样便扩大了视野，并且把在地球两端发表的、用不同文字写成的两本书加以对比。”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一样，莫泊桑认为，屠格涅夫大大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他对文学任务的先进观点，对这些作家是一种新发现。建立在虚假情节的基础上的长篇小说的旧形式，并不使屠格涅夫感到满足。他经常提示法国朋友，长篇小说的基础应该是现实，而不是臆造的惊险情节。

莫泊桑称自己为屠格涅夫的学生，钦佩这位天才的小说家，他游历了整个世界，认识当代所有的伟大人物，读完了所能读完的一切书，象讲本族语那样流利地讲欧洲的一切语言。

他把屠格涅夫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列入同一行列，并且说，俄国之所以永远深受感谢，应该归功于屠格涅夫，“因为他给它的人民留下了不朽的无价之宝——自己的艺术……象他这样的人，博得世界全体高尚的有

才智的人的爱戴”。

第二十八章

暮年

一连几个冬天，屠格涅夫都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住在杜埃街住宅的二楼。这所房子是他和维阿尔多购置的。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陈设简朴的书房里，有一张堆满书报的大写字台。图书室设在专门的房间里，那里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喜爱的书籍：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果戈理、莎士比亚、席勒、歌德、海涅的文集……夏天，他通常迁居巴黎近郊，维阿尔多的庄园——“雅赛尼”所在的布吉瓦尔。他有一所舒适的不大的别墅，它紧靠庄园，位于景色宜人的花园里，掩映在繁花和翠绿的林木中。一八七二年，波琳娜在巴黎的住宅的一位来访者在她家里和屠格涅夫认识。他写了回忆录，记述了在这里和这位俄国作家会见的情景。描写女演员沙龙里的生活情况时，这位不愿意提名道姓的回忆录作者写道，波琳娜·维阿尔多与卓越的音乐界人士交往频繁。“在欧洲，大概没有一位优秀的演员不认识维阿尔多夫人，并且在到巴黎来时不访问她的。”他写道，“我亲眼看见，世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都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过。”

这位青年对音乐的爱好和研究语言的强烈欲望很合屠格涅夫的心意。

“您一定要研究俄语，”有一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对他说，“我们的语言不大出名，但非常丰富，请相信我吧，您一旦学会它，一定会得到巨大欢乐的。”他又说，“掌握一门新的语言，不啻是获得一个新的心灵。”

这位年青人听从了屠格涅夫的劝告，不久就进了东方现代语学校。四年后，他领到泽员证书。于是屠格涅夫把自己的许多作品赠送给他，这时这位青年已经能够阅读和评价这些作品的原著了。

尔后，回忆录的作者曾有机会也到在布吉瓦尔的“雅赛尼”庄园去。这里，他仔细观察了屠格涅夫，看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他所亲近的家庭里感到愉快，并且颇为幸福，虽然他对任何人也不隐瞒，他时刻思念祖国。

长篇小说《处女地》在杂志上发表后不久，屠格涅夫来到彼得堡，数天后探访了病入沉疴的涅克拉索夫。

以前，他得知诗人患病后，就竭力想给他写一封有意和解的信，但生怕这封信会使涅克拉索夫感到痛苦，并且会使他觉得是报终的信息。但涅克拉索夫本人明白，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了。“我很快就会烂在土里啦……”这些日子里，他在《最后的歌》中写道。涅克拉索夫要求转告屠格涅夫，不见到他，他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一向喜爱他，而且至今仍然喜爱他。”涅克拉索夫说。屠格涅夫在散文诗《最后的会晤》里描写了这次会面：“我们以前是亲密融洽的朋友……可是，一个不幸的时刻降临——于是我们象仇敌一般分手了。”许多年过去了……我来到他住的那个城市，听说他病入膏肓，希望和我见面。“我去他那儿，走进他的卧室……。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天呀！病痛把他折磨成什么样子啊！……”他脸色蜡黄，面容憔悴，头顶全秃了，蓄着一部细长、斑白的胡子，穿着一件故意剪破的衬衫……他连一套最单薄衣服的压力也承受不住了。他痉挛地向我伸出一只瘦得可怕的、好象肉给啃光了的手，吃力地吐出几句听不清的话——究竟是欢迎呢，还是责备，——谁能知道？他深陷的胸膛起伏着——于是，在他炯炯闪光的眼睛的缩小的瞳孔里滚出两小滴痛苦的泪珠。

“我心绪沉重……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而且，面对着那可怕的惨象和不成样子的面容，我不由自主地垂下了眼帘，也伸出了手。可是，我好象觉得，握着我的手的不是他的手。我仿佛觉得，在我们中间坐着一位高大、安详、洁白的女人。她从头到脚裹着一件长长的罩衣……她深邃、苍白的眼睛哪里也不看；她苍白、严肃的嘴唇什么也不说……这个女人把我们的手连结在一起……她使我们永远和解了。

“是呵……死神使我们和解了……”

过了半年，屠格涅夫获悉诗人逝世的噩耗后说道：“我们的大部分往昔和青春，随同涅克拉索夫死去了……”

又过了几个月，屠格涅夫在多年未通音讯之后出乎意外地收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斯他想恢复他们昔日的关系，忘掉很久以前的争吵。

他们重新开始通信。一八七八年八月，屠格涅夫自是莫斯科往雅斯纳雅·波良纳给托尔斯泰写信道：“我想亲自见您……您来图拉，抑或是我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您那儿为好？……”

关于这两位作家随后的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里沃维奇在《往事随笔》中写道：“父亲亲自去图拉接他……屠格涅夫便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我们大家当然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光临。我老早晓得他身材魁梧。但他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觉得他是个巨人……相形之下，我觉得父亲个儿矮小（尽管他身材中等偏高），而且比他原来年轻。当然，屠格涅夫是六十岁的人，而父亲五十岁。但屠格涅夫白发盈头，父亲则满头乌发，双鬓未斑。从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可以感觉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是长辈。父亲待他客客气气热情，微带敬意，屠格涅夫虽是情感外露，但却有点小心翼翼……”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和父亲单独在书房里和散步时谈了许多话，他们的主要话题是文学……“屠格涅夫虽然年已花甲，但却神采奕奕，活泼好动。他和我父亲以及我们一伙年轻人一同散步，对产业（树林和苹果树的栽种、花园和树林里风景幽美的地方很感兴趣……”

八月十四日，回到斯巴斯科耶之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信道：“我不能不再一次告诉您，我对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访问留下了多么愉快、多么美好的印象；同时，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之间发生的争吵消失得无影无踪，竟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非常清楚地感到，使我们变老的生活，对我们也没有白白逝去，您和我——我们俩都比十六年前变得好些了。感到这一点，我殊为欣慰。”

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七十年代末的标志是，他的文学功绩博得俄国和西欧先进社会人士广泛的赞扬。

一八七八年六月，国际博览会期间，欧洲各国文学界代表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文学代表大会，一致推举屠格涅夫为大会副主席。

出席这一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马·科瓦列夫斯基叙述道，屠格涅夫在这个隆重的大会上作了发言，这次大会对他来说是取得辉煌成绩的标志。

屠格涅夫在发言中简要而生动地概述了俄罗斯文学从冯维辛到列夫·托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杰·伊·冯维辛（1745—1792）：俄国优秀作家，剧作家。

尔斯泰的发展情况，并指出，它对人类的文学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作家朴实、自然的发言，博得了一致的掌声。

翌年，在莫斯科大学教室里举行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大会上，屠格涅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雷鸣般的掌声刚刚停息，立刻有一位大学生在敞廊上致词，代表青年学生向《猎人笔记》的作者——人权的维护者致敬。

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青年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欢迎这位作家在晚会上、剧院里和其他公共场所出现的情景。

“青年一代重新向我表示的好感使我非常高兴，而且使我相当激动。”屠格涅夫在那些日子里写道。

在彼得堡文学基金会举办的朗诵会上，他朗诵了《猎人笔记》中的小说《总管》和《孤狼》，获得巨大成功。

作家在两个首都所到之处受到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屠格涅夫亲口对他当时在彼得堡遇见的盖尔曼·洛帕金说，有人明确向他示意，不希望他继续在俄国留居。一八八一年夏，在特维尔街心花园里举行了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

这个节日，作为上个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留在同时代人的脑海里。

起先，纪念像揭幕式定于五月二十六日——普希金诞辰举行，但后来延至六月六日。

屠格涅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及其他文学家被选为参加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文学基金会代表，他积极参加节日的准备工作，制订节日活动计划，和作家、学者、演员洽谈、通信。这个他所不习惯的组织工作使他疲惫不堪。

四月二十四日（公历五月六日），屠格涅夫自莫斯科寄给福楼拜一封短信，在信的开头，他戏谑地告诉福楼拜，他“还平安无事。我象蹬轮子的松鼠似的转圈和跳跃，我在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下星期一去农村，打算在那里待十天，呼吸白桦树的芳香，听听夜莺的嘶叫。”

屠格涅夫力求早日去斯巴斯科耶，以便在那里的静谧和幽居独处中准备好典礼期间应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宣读的论普希金的演说词。

“我们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即将举行时，我将返回莫斯科。”他在那封信里告诉福楼拜，“注意：委员会将寄给您请柬！您当然不会来的，但如果您能拍份电报来，那么将在宴会上热烈的掌声中宣读。”在信的结尾，屠格涅夫表示，希望六月间在巴黎拥抱自己的朋友。

前往斯巴斯科耶途中，他顺便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他想说服列·尼·托尔斯泰参加普希金纪念活动。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天。“阳春三月，鸣禽在花园里啼啭。”谢·里·托尔斯泰回忆道，“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熟谙鸟类，能凭鸣声准确地辨别它们。‘这是鹀鸟，’他说，‘这是红鹇，这是棕鸟。’等等。父亲坦率地说，他对鸟儿没有那么熟悉。当时是山鹑迁徙最频繁的季节。”

屠格涅夫同托尔斯泰及他的几个儿子到沃朗卡河对岸的国营森林去射猎求雌的山鹑。

“注意”：原文系拉丁语缩写词。

和托尔斯泰单独长谈时，屠格涅夫顺便谈到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在法国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托尔斯泰对此已多少知道了一些，因为年初屠格涅夫已从巴黎来信，将福楼拜的热烈称赞转告他了。福楼拜感谢屠格涅夫使他有幸读到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他写道：“这是第一流作品！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大师和心理分析家啊！头两卷妙不可言，但第三卷大为逊色。还是那一套！而且抽象的议论太多！一句话，这里可以看见他本人，作者和俄国人，可是在这以前却只能看见大自然和人。我觉得，有些地方写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好！阅读时，我狂喜得突然叫喊起来……我读了很久！的确，写得好，写得真好！”

但是，对他的长篇小说的评论已不能使列夫·托尔斯泰激动。那个时期，他在精神上正发生深刻的激变，这一变化导致他完全放弃文学创作。

如今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以文学作品，而是以有道德教育意义的著作号召人们去实现道德自我完善，影响人们的思想。

他坚决拒绝屠格涅夫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要求，因为他一向反对隆重的和官方的庆祝会。尽管这一拒绝使屠格涅夫十分不快，但他们分手时是亲热而友好的。

抵达斯巴斯科耶的第二天，屠格涅夫在报上读到福楼拜因极度紧张的文学创作而精力消耗殆尽，突然逝世的噩耗。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因失去莫逆之交而深受震惊，久久无法恢复平静。

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即将举行时，他返回莫斯科。这时，

许多作家已到达这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等。

六月四日下午四点钟，从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里，大部分乘客是前往参加典礼的作家、演员、画家、各种协会和组织的代表。这辆列车的车厢里，自暮色降临至黎明，乘客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后来，诗人雅·波隆斯基和阿·普列谢耶夫向听众朗读了自己献给伟大的导师的诗章。

“庆祝仪式持续了三天，”仪式的一位参加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安·费·科尼写道，“而且，普遍认为，这些庆祝仪式的活跃的主角是屠格涅夫。”

举行纪念像揭幕典礼那天见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人们一致发现，他情绪格外高涨。他后来承认说，他对出席这一庆祝会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在少年时代曾幸运地目睹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苏联作家尼·德·捷列绍夫不久前还健在。我清楚记得德高望重的作家屠格涅夫长满松软白发的漂亮的头，他站在刚刚隆重地揭去灰色盖布的纪念像台座旁。”捷列绍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如海的人群的欢腾，我，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诗人热烈的崇拜者，也立在人海之中。我记得，参加庆祝会的作家还有马伊科夫、波隆斯基、皮谢姆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庆祝仪式上，屠格涅夫说：“‘我们希望，怀着爱戴站在普希金雕像前，并懂得

安·费·科尼(1844—1927)：俄国法律工作者，作家，一八七八年彼得堡法院院长。因正确审判薇拉·扎苏里奇)原为民粹主义者，一八七八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法庭宣告无罪，一八八一年侨居国外，后与普列汉诺夫等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三年起成为孟什维克，)案引起政府和反动集团的愤怒。

这一爱戴的意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子孙，都将以此证明，他和普希金一样，成为更加地道的俄国人，知识更加渊博的、更加自由的人。’”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所作的演说中，屠格涅夫着重谈了普希金为创建俄罗斯文学语言所作的贡献问题。屠格涅夫谈到一八一二年人民战争，谈到普希金在俄国的漂泊，谈到他“对人民语言的潜心钻研”，认为这些事实大大促进了诗人在创作上的独立性和独创性的发展，他说：“无疑，他创造了我们诗歌的、文学的语言，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遵循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就可以了，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中，我们找到了它如此富有生命力的一切条件：在这一壮丽辉煌的语言里，俄国人的创造性和博采众长的美德和谐地融为一体，普希金本人乃是最卓越的俄国艺术大师。”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处女地》之后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是《爱的凯歌》和《死后》（《克拉拉·密里奇》）

头一篇小说是为纪念居斯塔夫·福楼拜而作的。这篇以意大利中世纪神话的格调写成的小说，就其语言的优美、情节的盎然诗意和心理描写的细腻而言，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读了《爱的凯歌》之后，巴·瓦·安年科夫说：“就形式而论……这是一篇小型的杰作。这类技巧在他本人的其他作品中也并不多见。”

尽管短篇小说《死后》（《克拉拉·密里奇》）含有某些虚构的成分，但它是女演员叶·巴·卡德米娜于一八八一年参加演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瓦西丽莎·美莲季耶娃》期间服毒自尽这一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基础的。

诗人雅·波隆斯基的妻子和屠格涅夫的一些其他熟人相当详细了解青年学者弗·德·阿列尼增“死后”迷恋卡德米娜的经过。屠格涅夫在波隆斯基家碰见过阿列尼增，以前则在舞台上见过这位女演员。她的凄惨身世使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产生写一篇小说，以发挥爱情比死亡更有力量这一主题的念头。

自一八七七年起，屠格涅夫开始写《散文诗》，这些作品注定作为这一困难而独特的体裁的最完美的典范而永垂俄罗斯文学的史册。

451 龟

使散文的语言最大限度地接近诗歌语言的愿望，创造在其中得以显现所见事物的画面、对往事的追忆、瞬息即逝的印象和对未来的遐想的抒情日记这一特殊体裁的愿望，提示屠格涅夫选择这一形式。

在这些题材最为丰富多采——有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的草稿中，写到了宇宙的生活、大自然、爱情、死亡、祖国、美、功勋和友谊。

屠格涅夫长期根本没有考虑发表这些散文诗，认为这些作品意义不大，只是把他们看作为未来的作品预备的草稿。他给散文诗起了总标题《迟暮吟》，说，他写散文诗其实并不是为了发表，而不过是偶而给朋友们——雅·彼·波隆斯基、彼·拉·拉弗罗夫、女演员玛·加·萨维娜朗读这首或那首诗。

一天，已经是他临终前不久了，他向到布吉瓦尔来看望他的米·马·斯塔秀列维奇介绍了这些散文诗，于是此人劝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把它们交给他在《欧洲通报》杂志发表。屠格涅夫同意了，于是这组散文诗中的五十一首在该刊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号上发表了。

实际上屠格涅夫写的散文诗要多得多，但其他的散文诗带有过于明显的自传情调，因此他没有发表它们（这部分散文诗——三十一首——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才出版。）

屠格涅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他的“小玩艺”会引起读者极为浓厚的兴趣，得到赞许，不久，它们由波琳娜·维阿尔多译成法语，随后又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

屠格涅夫的一些优秀的散文诗被选入文选，其中的许多词句成了名言。

有些散文诗充满忧郁的，有时甚至悲痛的情绪，因为它们是病入膏肓、饱受折磨的作家在思考不可避免的死期的逼近、心里暗暗地总结自己坎坷而复杂的人生道路时写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歌》是相似的。关于这些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就拿《最后的歌》来说吧。他虽然只是唱到自己，唱到自己的苦难，但它多么有力，多么火热！他感到痛苦，我们也和他一同感到痛苦。”

将《散文诗》和《最后的歌》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和主题是多么明显地互相呼应。

远非所有的《散文诗》流露出悲观的情调。诗中关于个人的内容常常服从于全人类的广阔主题。其中也不乏生气勃勃的作品，这里，作家赞美英雄主义、功勋、普通人的高尚道德、他们在精神上对富翁的优越。

在著名的《俄罗斯语言》一诗中，气势磅礴地表现了作家对祖国，对祖国语言，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的炽烈的爱。“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索祖国命运的日子里，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呵，你是我唯一的支持和依靠！”屠格涅夫写道。

在整组散文诗中，屠格涅夫逝世后才和民意党人纪念作家的传单一同发表的《门槛》一诗，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首诗是受到七十年代的政治案件，特别是薇拉·扎苏里奇案的影响而写成的。

诗中塑造了甘愿承受任何考验和折磨的俄国女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她晓得，等待着她的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她不畏惧“与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走向死亡时，她知道，她的功勋将默默无闻，但这也不能阻挡她，因为她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怜悯。

一八八一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国。几个月后，他在巴黎患了重病，因而他当时迁回俄国的打算成为泡影。

“我如此受苦受难，竟致每天上百遍地呼唤死亡。我不惧怕和生命永诀。”有一回，屠格涅夫对探望他的画家瓦·瓦·维列沙金说。（后来尸体解剖证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因患脊髓癌而死，三块椎骨受癌症损坏。）在长期患病期间，无论屠格涅夫在肉体上是多么痛苦，却始终保持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他即使丧失了把作品记下来的能力，也不放下武器。一八八三年六月，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用法语向波琳娜·维阿尔多口述自传特写《海上火灾》，随后，这篇特写由女作家阿·尼·卢卡尼娜应他的请求译成俄语。

“任何旅行都无法考虑啦。”他给朋友们写信道，“因此，劳驾你们不要邀我回斯巴斯科耶，这只会使我更加痛苦。”——原注。

瓦·瓦·维列沙金（1842—1904）：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

临死前两个星期，屠格涅夫又向波琳娜·维阿尔多提出请求：

“我想把我脑海里酝酿成熟的一个短篇小说记下来，”他说，“但这会使我疲劳过度，我恐怕办不到。”

“那就请您向我口述吧。”女演员答道，“我用俄语写不快，但如果您有耐心，我想我能笔录下来的。”

“不，不，”屠格涅夫叹息道，“倘若我用俄语口述，那我就要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文学的形式，为了选择词句，我说一句话、一个词都要停顿，但我觉得，做这样紧张、这样耗费精力的工作，我是无能为力的。不，我想用您我都会的各种语言向您口述，当我寻找能最好、最快地表达我的思想的词句时，您就可以用法语叙述这一切了。”

他们便这样做了。屠格涅夫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口述了短篇小说《末日》。录下几个短小的场面之后，维阿尔多夫人用法语向他念了草稿，他表示满意。“可怜的屠格涅夫，”波琳娜·维阿尔多给斯塔秀列维奇写信道，“口述这篇小说使他感到这么快乐，他竟想当即和我这样开始做写他构思好的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的巨大准备工作。可是，唉，病情恶化了，所以他只能来得及口述人物的名字……”

当代革命运动的题材仍然使作家深深激动。他打算在下一部长篇小说里将两个人物——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激进主义者加以比较，并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区别。他向一些朋友和熟人讲述过构思好的作品的情节和总的提纲。祖国、辽阔的奥廖尔半草原地区和心爱的斯巴斯科耶，一直使屠格涅夫魂牵梦萦。“您去斯巴斯科耶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给波隆斯基写信说，“请代向我的宅子、花园和幼小的橡树致意，代我向祖国致意，我大概永远看不到她了。”

屠格涅夫真可以和自己的短篇小说《多余人的日记》的主人公楚尔卡图林一同喟然长叹：“呵，我的花园，呵，浅水池塘旁杂草丛生的小径！呵，破旧的堤坝下我在那儿钓鱼和白鱼的一方沙地！……在和生命永诀的时刻，我只向你们伸出我的双手。我真想再一次尽情地呼吸艾蒿的新鲜的苦涩，我故乡的田野上收割了的荞麦的甘甜……”

获悉屠格涅夫身染重病之后，列夫·托尔斯泰悲痛万分。他感到，在他们的结识历尽重重波折之后，如今老朋友重又使他感到多么亲近和珍贵。

屠格涅夫用一切机会——或通信，或会面——几次三番劝列夫·托尔斯泰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临终前不久，屠格涅夫吃力地用铅笔与了一封信，将信交人付邮时说：

“请作速发出去，非常、非常必须这样做。”

信中，呼吁列夫·托尔斯泰牢记自己肩负的作家的使命。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现在给您复函，无非是为了告诉您，我对自己有幸作您的同时代人深感欣慰；同时；也是为了向您提出我最后一次的、诚恳的请求。我的朋友，请您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啊，假如我能认为，我的请求会对您有所影响，我将万分庆幸！……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

八月二十日（公历九月三日）下午二时，屠格涅夫在布吉瓦尔逝世。客死异国时，他请求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在直至生命即将终结时，他还满怀柔情，希望长眠在别林斯基的墓旁。屠格涅夫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这位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外最负盛誉的作家之一。许多国家不断出版他的文集。

屠格涅夫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体家之一。他深切体会并热情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值得深入研究。”普希金指出。屠格涅夫懂得，语言的丰富乃蕴蓄于人民语言的活生生源泉之中。“我和霍尔谈话时，才第一次听到了俄国农民质朴而聪慧的语言。”他在《猎人笔记》中写道列宁透澈地研究了屠格涅夫的作品，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中这一方面的才华。列宁指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语言。”

在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我国人民的往昔和俄国大自然令人难忘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才艺超群的语言巨匠遗下的作品是俄国现实主义艺术的优秀典范，世代相传，千古流芳。

伊·谢·屠格涅夫生平著作年表

1818年10月28日（公历11月9日）：在奥廖尔城，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娃（娘家姓卢托维诺娃）生下一子，名叫伊凡。

1827年：屠格涅夫一家迁居莫斯科。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被送进维伊坚加密尔寄宿学校，在那里学习约两年。

1929年8月至11月：屠格涅夫与其兄尼古拉在亚美尼亚学院（后改名拉扎烈夫学院）寄宿学校学习。

1833年9月：屠格涅夫经考试后被录取为莫斯科大学语文组学生。

1834年秋：随全家迁居彼得堡，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被录取为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组学生。11月：屠格涅夫的父亲去世。12月：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完成剧本《斯捷诺》。

1835年：与季·尼·格拉诺夫斯基结识。

1836年：在彼得堡大学毕业。翻译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李耳王》和拜伦的《曼弗雷德》。8月：《国民教育部杂志》刊载屠格涅夫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对安·尼·穆拉维约夫的游记的评论。

1837年1月：屠格涅夫在恩格利加尔特大厅的音乐早会上见到普希金，几天后与伟大诗人的遗体告别。屠格涅夫通过候补博士学位考试。

1838年：《现代人》杂志刊载屠格涅夫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傍晚》。5月：屠格涅夫失去德国，进柏林大学。与尼·弗·斯坦凯维奇相识。

1839年秋：屠格涅夫返回俄国。年底：在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晚上和除夕在贵族俱乐部的假面舞会上遇见莱蒙托夫。

1840年1月中旬：屠格涅夫与彼·伊·克里弗佐夫由彼得堡出国。春季：他在罗马与斯坦凯维奇接近。7月：与米·亚·巴枯宁相识并开始建立友谊。

1841年5月：屠格涅夫修完大学课程后离开柏林。春季和夏季：在斯巴斯科耶居留。秋季：在巴枯宁家的庄园普烈穆欣诺作客。

1842年3月：屠格涅夫获准参加哲学硕士学位考试。4月：屠格涅夫的女儿波琳娜出生。5月：硕士学位考试结束。7月：出国。屠格涅夫从那里回来后于年底与别林斯基相识。

1843年春：发表长诗《巴拉莎》。去斯巴斯科耶。同年中期：进内务部办公厅供职，任十级文官。11月：与随意大利歌剧团来彼得堡演出的波琳娜·维阿尔多相识。《祖国纪事》杂志刊载屠格涅夫的短诗、戏剧作品和批评文章。

1844年夏：和别林斯基经常在彼得堡近郊的一所别墅见面。11月：《祖国纪事》刊登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与涅克拉索夫接近。

1845年春：辞去在内务部的职务，去国外旅行。回到彼得堡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

1846年初：涅克拉索夫发行的文集《彼得堡文集》问世，文集刊登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三幅肖像》、长诗《地主》和许多译诗。

1847年1月：改组后的《现代人》杂志创刊号出版，刊登屠格涅夫的

短诗、关于库科尔尼克的论文、讽刺小品和《猎人笔记》的第一篇小说——《霍尔和卡里内奇》。《祖国纪事》刊登中篇小说《好决斗的人》和评论哥萨克弗·卢甘斯基（弗拉季米尔·达里）的短篇小说的论文。1 月后半月：屠格涅夫去柏林。从这时起，《现代人》连载《岑人笔记》中的短篇小说。7 月：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在萨尔茨勃伦。

1848 年 2 月：屠格涅夫目睹了在巴黎的革命事件。和赫尔岑接近。5 月 26 日：获悉别林斯基病逝的噩耗，屠格涅夫建议涅克拉索夫为资助亡友的家庭出版《猎人笔记》。10 月：他在法国作长途旅行。

1849 年 4 月：屠格涅夫将完成的喜剧《单身汉》寄给谢普金。10 月：借谢普金生日的机会，该剧在彼得堡首次上演。12 月：在彼得堡上演喜剧《贵族长的早宴》。

1850 年 6 月：由巴黎去俄国。屠格涅夫在故乡消夏，10 月：屠格涅夫把女儿从彼得堡送至巴黎波琳娜·维阿尔多处。11 月 16 日：屠格涅夫的母亲去世。年初：与谢·季·阿克萨科夫家接近。10 月：在莫斯科与米·谢·谢普金一同拜访果戈理。11 月 3 日：出席朗诵会，听果戈理朗读《钦差大臣》。12 月：借纳·瓦·萨莫依洛娃生日的机会，在彼得堡首次上演喜剧《麻绳爱在细处断》。

1852 年 1 月：在彼得堡首次上演喜剧《身无分文》。《现代人》第二期刊载短篇小说《三次会见》。4 月至 5 月：屠格涅夫因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章被捕，由彼得堡流放到斯巴斯科耶村，这里，他在流放中度过了一年半。夏季：《猎人笔记》单行本在莫斯科问世。遵照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批准出版此书的书刊审查官被撤职。

1853 年 3 月：米·谢普金来斯巴斯科耶，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朗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各守本份》。3 月底：屠格涅夫由斯巴斯科耶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逗留了数天，与波琳娜·维阿尔多幽会。11 月：接到结束流放的通知。12 月 9 日：屠格涅夫到达彼得堡。12 月 13 日：《现代人》编辑部为欢迎他归来举行宴会。

1854 年 4 月：《现代人》第四期刊载屠格涅夫论费·伊·丘特切夫的诗歌的论文。5 月：屠格涅夫在阿勃拉姆采沃阿克萨科夫家作客。夏季：在彼得戈夫消夏。9 月：和涅克拉索夫来斯巴斯科耶。

1855 年：《现代人》第一期发表喜剧《村居一月》。1 月 12 日—14 日：屠格涅夫出席莫斯科大学周年庆祝会。《现代人》第四期登载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雅科夫·巴先科夫》。夏季：在斯巴斯科耶创作长篇小说《罗亭》。11 月 7 日：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参加格拉诺夫斯基的葬仪，并写悼念他的文章。屠格涅夫在《现代人》编辑部朗读长篇小说《罗亭》。11 月：自塞瓦斯托波尔抵彼得堡的列·尼·托尔斯泰来访屠格涅夫，以便与他相识。12 月 5 日：屠格涅夫举行宴会。宴会上，尼·基·奥加廖夫与列·尼·托尔斯泰相识。12 月 14 日：奥加廖夫在屠格涅夫家的晚会上朗读长诗：《冬天的道路》。

1856 年：《现代人》第一、二期刊登长篇小说《罗亭》。年初：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奥斯特罗夫斯基和格里戈罗维奇与《现代人》发行人（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签定专为这一刊物撰稿的“义务合同”。2 月底：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屠格涅夫家朗读《家庭场面》。5 月：屠格涅夫来斯巴斯科耶。6 月：列·尼·托尔斯泰去那里看望他。7 月：屠格涅夫由彼得堡出

国。8月：在伦敦与赫尔岑会见。10月：开始创作《贵族之家》。11月：在彼得堡出版《伊·谢·屠格涅夫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六年中、短篇小说三卷集》。自年底起：屠格涅夫开始给赫尔岑在伦敦的刊物寄材料。

1857年1月底：涅克拉索夫自罗马抵巴黎，访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抵巴黎。屠格涅夫陪他去迪戎旅行。《现代人》第三期发表喜剧《食客》。5月：去伦敦访赫尔岑。在英国逗留期间，屠格涅夫与卡莱尔、沙克莱和马考莱相识。6月：屠格涅夫在津齐格开始创作中篇小说《阿霞》。8月：在巴黎和费特冈察洛夫、鲍特金相会。冈察洛夫对他们朗读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10月：屠格涅夫在罗马。与画家亚·伊凡诺夫相识。12月：继续创作《贵族之家》。

1858年：《现代人》第一期刊载中篇小说《阿霞》。3月：屠格涅夫自罗马去维也纳。4月：去伦敦旅行。5月：自巴黎告知赫尔岑，该处禁止出售伦敦自由印刷所的一些出版物。6月初：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去俄国。夏季和秋季：在斯巴斯科耶加紧创作《贵族之家》；10月：长篇小说脱稿。12月底：安年科夫在屠格涅夫家依他的请求朗读《贵族之家》，出席朗诵会的有：涅克拉索夫，德鲁日宁，皮谢姆斯基，冈察洛夫等。

1859年：《现代人》第一期刊登《贵族之家》。1月：屠格涅夫被选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正式会员。2月：文学基金会创始人在屠格涅夫家举行午宴。春初：屠格涅夫在期巴斯科耶草拟《前夜》提纲。4月末：出国。5月：由巴黎去伦敦旅行。屠格涅夫翻译并作序的玛尔科·沃弗乔克的《乌克兰短篇小说》问世。8月：《贵族之家》单行本问世。9月：回俄国。秋季：在斯巴斯利耶继续创作《前夜》。11月8日：屠格涅夫作为文学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被选为该会委员会委员。

1860年1月10日：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为文学基金会募捐而举办的第一次公开朗诵会上发表题为《哈姆雷特和唐·吉珂德》的演说。《俄国导报》第一、二期刊登长篇小说《前夜》。2月中旬：屠格涅夫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前夜》的论文是不公允的、过火的，要求涅克拉索夫不在《现代人》刊载这篇论文。3月：《读者文库》第三期刊载中篇小说《初恋》。3月29日：在屠格涅夫与冈察洛夫之间举行仲裁会。和冈察洛夫绝交。4月：屠格涅夫去巴黎。7月：去伦敦访赫尔岑。9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父与子》。11月24日：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文学分会会议上被一致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1861年3月：屠格涅夫请求赫尔岑在《钟声》报上报导塔拉斯·谢甫琴科的死讯。4月：屠格涅夫回到祖国。5月26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和列·托尔斯泰去斯捷潘诺夫卡访费特。5月27日：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发生口角，几乎造成决斗。7月：屠格涅夫完成长篇小说《父与子》。8月底：他由斯巴斯科耶去莫斯科，将长篇小说交给《俄国导报》发表。几天后他去彼得堡。9月：由那里去巴黎。9月25日：他执意邀赫尔岑去那里，

卡莱尔（1795—1881）：英国反动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沙克莱（1811—1863）：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马考莱（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家。

《读者文库》：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文学月刊。它反对俄国文学中的进步潮流，因而受到先进作家们的公正的批评。

声言他们“必须相会”。

1862年1月：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保证每年资助巴枯宁一千五千法郎。5月：为了与赫尔岑、巴枯宁相会，去伦敦逗留三天。他应巴枯宁的要求负责为允许他的妻子由西伯利亚迁至特维尔省而奔走。5月下旬：去彼得堡。6月：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8月：出国。9月：长篇小说《父与子》单行本问世。12月：《北方蜜蜂》刊登屠格涅夫关于拒绝为《现代人》撰稿的信。

1863年1月：屠格涅夫告知赫尔岑，他接到枢密院关于“三十二人案”的传票。3月：他寄去有关这一案件的书面供词。9月：屠格涅夫接到枢密院的第二次传票后，请求推迟到十一月出庭。11月：他又为推迟出庭奔走。

1864年1月：为了向枢密院提出供词，屠格涅夫抵达彼得堡。月7日和13日：他提出这些供词。《钟声》报发表赫尔岑的评论，他在评论中强烈谴责屠格涅夫因《三十二人案》上书亚历山大二世。1月21日：屠格涅夫与冈察洛夫和解。1月28日：枢密院作出决定，允许屠格涅夫出国。6月1日：枢密院作出裁决：就《五十二人一案》对屠格涅夫免于起诉。

1865年2月13日：屠格涅夫的女儿波琳娜与加斯东·布吕埃尔在巴黎结婚。5月：屠格涅夫回到俄国。6月：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6月29日：出国。9月：屠格涅夫文集第三版问世。11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烟》。

1866年5月：屠格涅夫去鲁日蒙女儿那里旅行。7月：冈察洛夫来巴登巴登逗留了几天，和屠格涅夫会晤。

1867年1月：屠格涅夫完成长篇小说《烟》。2月：抵彼得堡。在朋友中间朗读长篇小说。3月：与德·伊·皮萨烈夫相识。《俄国导报》第三期刊登《烟》。5月：屠格涅夫寄给赫尔岑一本长篇小说，并建议恢复通讯。赫尔岑回一封和解信。屠格涅夫请求皮萨烈夫将关于《烟》的意见告诉他。7月：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吵。

1868年：《欧洲导报》第一期刊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旅长》；《俄国导报》第一期刊载《叶尔贡诺夫中尉的故事》。2月：屠格涅夫在致彼·伊·鲍索夫的信中写道，他“怀着巨大的喜悦”读完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11月：屠格涅夫去福楼拜的庄园克鲁瓦塞。12月：创作《文学回忆录》。1869年：《俄国导报》第一期刊登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少女》。《欧洲导报》第四期发表《回忆别林斯基》。创作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耳王》和短篇小说《奇怪的故事》。

1870年1月15日：屠格涅夫最后一次与赫尔岑会面（在巴黎）。1月22日：屠格涅夫在巴登巴登获悉赫尔岑逝世的噩耗。7月至9月：《彼得堡新闻》刊登屠格涅夫的《普法战争通讯》。

1871年2月：屠格涅夫抵彼得堡。与雕塑家马·安托科利斯基相识。2月27日：屠格涅夫在为加里波的义勇队募捐而在艺术家俱乐部举办的文学、音乐早会上朗读短篇小说《总管》。3月：在莫斯科朗诵《猎人笔记》中的小说。出国。4月：创作中篇小说《春潮》。8月：屠格涅夫抵爱丁堡参加

《北方蜜蜂》报：第三厅密探布尔加林办的政治、文学报纸。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在彼得堡出版。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后来成为反动报纸，反对四十年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自一八六一年改变方针，发表民主主义者的作品。

指《战争与和平》。——原注。

瓦特·司各特百年诞辰纪念会。

1872年：《从欧洲导报》第一期登载中小篇说《春潮》。1月：屠格涅夫与爱·左拉、阿·都德相识。在莫斯科第一次演剧本《村居一月》。福楼拜对屠格涅夫朗读剧本《圣安东尼的诱惑》。9月：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诺甘访问乔治·桑。年底：与在俄国逃离流放地后侨居巴黎的彼·拉·拉弗罗夫相会。

1873年1月：屠格涅夫将长篇小说《处女地》的构思告知朋友们（“我打算以这部小说结束我的文学生涯”）。4月：屠格涅夫与乔治桑、居·福楼拜相会。

1874年3月：为饥民募捐而出版的文集《赀资》刊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活尸首》。4月：《欧洲导报》第四期登载短篇小说《普宁和巴布林》。发起“五人聚餐会”（屠格涅夫，爱·龚古尔，福楼拜，左拉和都德。）月底：回国前屠格涅夫看望女儿。

1875年1月：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在巴黎访问屠格涅夫。2月：为巴黎俄国阅览室募捐而举办文学、音乐早会、参加早会的有屠格涅夫、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波·维阿尔多等。5月：为俄国阅览室募捐而举办第二次文学、音乐早会，参加早会的有屠格涅夫、波·维阿尔多和阿·皮谢姆斯基。6月：屠格涅夫和阿·康·托尔斯泰在卡尔兹巴德为莫珊斯克火灾受害者募捐而举办朗诵会。7月：屠格涅夫收到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儿子馈赠的普希金的宝石戒指。9月：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来布吉瓦尔访屠格涅夫。10月：屠格涅夫写关于塔·格·谢甫琴科的回忆录。

1876年1月：《欧洲导报》第一期刊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时钟》。2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处女地》。4月：屠格涅夫介绍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与爱·左拉、居·福楼拜相识。6月：屠格涅夫抵莫斯科后获悉乔治·桑逝世的噩耗，写了悼念她的文章。屠格涅夫为资助米克卢霍—马库拉伊奔走。7月15日：长篇小说《处女地》竣稿。7月：自斯巴斯科那去彼得堡，然后出国。12月：与莫泊桑会晤。

1877年：《欧洲导报》第一期刊载长篇小说《处女地》。年初：与彼·拉·拉弗罗夫频繁相会。《欧洲导报》第四期刊载福楼拜的《圣于琏的传说》，第五期刊载福楼拜的《厄罗狄亚》；这两部小说均由屠格涅夫翻译。5月：屠格涅夫自国外抵彼得堡后出席枢密院特别法庭审理的南俄工人协会案的审讯。7月：屠格涅夫最后一次与涅克拉索夫相会。出国。12月：在巴黎成立俄国艺术家救授会，会员有安托科利斯基、鲍戈留波夫、屠格涅夫等。

1878年1月：屠格涅夫获悉涅克拉索夫逝世的噩耗。5月：列·尼·托尔斯泰给伊·谢·屠格涅夫写了和解信。屠格涅夫在回信中写道，他“十分乐意恢复昔日的友谊……”6月：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屠格涅夫被选为大会副主席。8月：屠格涅夫回国后去列·尼·托尔斯泰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这一年，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创作大部分《散文诗》。

1879年1月：屠格涅夫的哥哥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去世。1月17日：借玛·加·萨维娜生日的机会，在彼得堡首次上演剧本《村居一月》。2月：屠格涅夫抵彼得堡后与盖尔曼·洛帕金会见。屠格涅夫事先告知他可能被捕

尼·尼·米克卢霍—马库拉伊（1846—1888）：俄国杰出的学者，旅行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自然科学家。

的消息，劝说他到南方去。3月4日：屠格涅夫在为贫寒大学生募捐而举办的音乐会上对莫斯科大学生作演说。3月9日：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为文学基金会募捐而举办的朗诵会上朗诵短篇小说《孤狼》。和玛·加·萨维娜一起朗诵《外省女人》中的一个场面。5月：屠格涅夫在巴黎为俄国侨民募捐而举办的文学、音乐早会上朗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故事《一位农民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和《猎人笔记》中的小说。6月：屠格涅夫去牛津，出席授予他习惯法法学博士学位仪式。

1880年2月：回到祖国。屠格涅夫与民粹派青年小说家小组（兹拉托弗拉茨基，纳乌莫夫，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等）会见。3月：屠格涅夫参观巡回展览派画家在彼得堡举办的画展。3月30日：在为文学基金会募捐而举办的朗诵会上朗诵短篇小说《莓泉》。4月：屠格涅夫被选为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文学基金会代表。5月：屠格涅夫获悉福楼拜逝世的噩耗。6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式。屠格涅夫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又在祖国》一诗。6月7日：屠格涅夫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会议上作《论普希金》的演说。6月8日：屠格涅夫出席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第二次大众晚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阿克萨夫作了论普希金的演说。

1881年6月：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斯巴斯科耶。夏季：格里戈罗维奇、波隆斯基、萨维娜、列夫托尔斯泰先后到他这里来作客。8月19日：屠格涅夫出国。9月：在巴黎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会面。《欧洲通报》第十一期刊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爱的凯歌》。

1882年3月：屠格涅夫开始身染重病。12月：《欧洲导报》第12期刊载屠格涅夫的五十首《散文诗》。

1883年：《欧洲导报》第一期刊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克拉拉·密里奇》。3月12日：屠格涅夫在致拉弗罗夫的信中表示希望能见到逃离流放地后来到巴黎的盖尔曼·洛帕金。4月：屠格涅夫的健康情况恶化，于是他被从巴黎送至布吉瓦尔。5月12日：他写信给日·波隆斯卡娅，说他已无痊愈的希望。6月5日：屠格涅夫对波琳娜·维阿尔多口述特写《海上火灾》。6月底：他给列夫·托尔斯泰写最后一封信，呼吁他继续从事文学活动。8月：屠格涅夫对波·维阿尔多口述短篇小说《末日》。8月22日（公历9月3日）：屠格涅夫于下午二时逝世。9月10日（公历10月1日）：在巴黎北站送走屠格涅夫的遗体。9月27日（公历10月9日）：屠格涅夫安葬于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

